



中共党史人物传

第三十四卷

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

· · · · ·

第三十四卷

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

陕西人民出版社

中共党史人物传
第三十四卷

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
主编 胡 华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安北大街 131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国营五二三厂印刷开
本850x1168 1/32 印张11 插页8 字数 244,000

1987年7月第1版 1988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 (精) 5,000

统一书号: 11094·210 定价: (平)3.40元

毛泽东博览 网站编辑
www.mzdbl.cn

目 录

王稼祥	戴惠珍	(1)
张云逸	曾傅先 罗永平	(56)
李 源	何锦洲 杨 清	(144)
沈剑华	孙自诚 文耀奎	(158)
戴克敏	袁新安	(166)
张文彬	凌 辉	(187)
卢冬生	李海文	(204)
许晓轩	冯开文	(225)
赖若愚	李贵仁	(239)
黄火星	缪凤翔	(263)
张曙时	乔毅民 阙孔壁	(300)
赵品三	李峻晨 于 平	(332)



王稼祥



张云逸



李 源



戴 克 敏



张 文 彬



卢 冬 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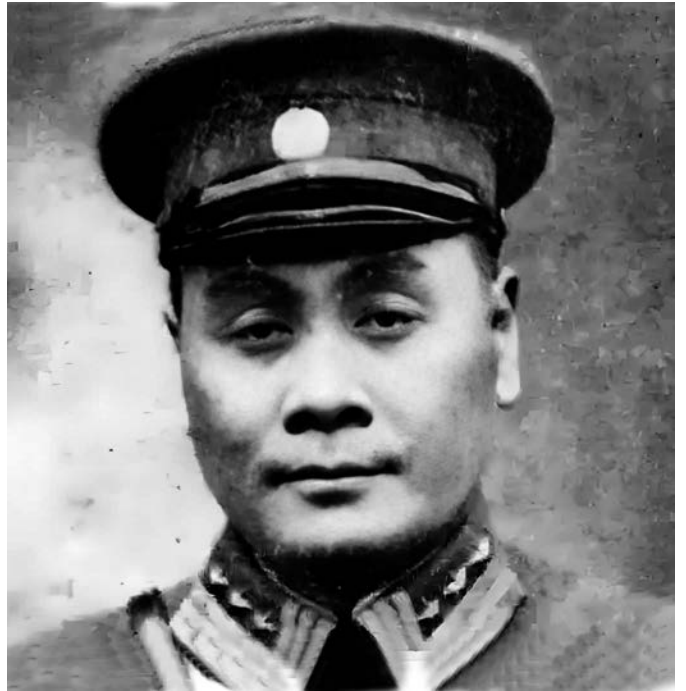
许 晓 轩



赖 若 愚



黄 火 星



张 曙 时



赵 品 三

说明：本卷缺沈剑华烈士照片

王 稼 祥

戴 惠 珍

王稼祥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位杰出领导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为争取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卓越贡献。他把毕生精力，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

学生运动的闯将

王稼祥，原名嘉祥，曾用名稼蔷，一九〇六年八月十五日出生于安徽省泾县厚岸村。父亲王承祖在南陵县弋江镇入股经营过当铺和油坊，母亲是旧式家庭妇女，略有文化，心地善良，肯救济穷人。稼祥有两个姐姐，他是最小的独子。他自幼聪慧过人，父母对他十分喜爱，希望他长大后成为一个有学问的人。由于父亲在外地经商，母亲便经常督促他学习，使他自幼养成了爱读书的习惯。

一九一三年，王稼祥七岁时，进入本村柳溪小学（现泾县厚岸小学）读书。这所规模不大的山区小学，师资却相当整齐，对传授知识和培养学生也颇为重视，从高小一年级起还开设有英语课。王稼祥在这里受到了良好的学校教育。他学习十分勤奋，每学期考试几乎都是第一名，英语成绩尤为突出。一九一九年，王稼祥小学毕业后，又在本村读了一段时间私塾，

攻读了《论语》、《孟子》等经书，打下了良好的语文基础。

一九二二年，王稼祥十六岁时，进入南陵县乐育学校读书。这是一所圣公会办的教会学校，教师有时用英语讲授和提问，促使王稼祥提高了英语的口语能力。

一九二四年，王稼祥以各科成绩优秀、未经考试直接升入芜湖的圣雅各中学高中部读书。

芜湖是长江沿岸的水陆交通要道，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战斗洗礼，各种新思潮比较活跃。中国共产党的一批早期党员恽代英、张秋人、高语罕、沈泽民、薛卓汉等，曾在这里进行过革命活动，传播革命思想。一九二三年一月，芜湖建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地方组织，不久又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地方组织。当时设在长街的科学图书社是发行进步书刊的一个阵地；书店虽小，却吸引了不少革命青年，《新青年》一到书店，就被抢购一空。王稼祥在圣雅各中学读书时，常利用课余时间，到长街科学图书社，用省下来的钱，购买进步书刊。后来他自己回忆说：“一九二四年我开始接触到一些进步书刊。”到了一九二五年，“阅读了图书馆中所有的有关社会科学的书籍以及当时可以在书店买到的《新青年》、《向导》和《中国青年》。”^①在进步书刊的影响下，王稼祥对社会问题开始有所认识。一九二五年四月一日，他在给本村同学王柳华的信中说：“你看社会阶级多么悬殊；经济制度多么恶劣，他们毕竟把全人类的自由幸福剥夺尽了。富者骄侈，贫者凄楚，你若没有势力和金钱，你站在社会里，是危险极了。你我都是平民，又是中产阶级里的分子，将来的生计，真是茫茫无路，毫

^①王稼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自述材料。

没有把握呵。”^①立志要为谋求人民的幸福，去改造社会，做一个二十世纪的新青年。

那时，外国帝国主义利用教会在中国开办学校，对中国人民进行奴化教育。芜湖圣雅各中学就是其中比较突出的一所。学校不仅强迫非教徒去参加宗教仪式，而且用森严的校规，禁止学生参加社会活动，更不准学生参加反对帝国主义的活动。王稼祥对这种种戒规深恶痛绝。在他进入圣雅各中学的这年年底，便参加发动了一次罢考的风潮。他后来回忆说：“虽然圣雅各是教会学校，但革命之风也吹到这个学校中来了。一九二四年我开始接触到一些进步书刊，于是利用了学生们怕考试的心理，于一九二四年年终考试前掀起了学校中罢考的风潮。这次风潮是一哄而起的，罢考后学生自动回家，学校只好妥协。”^②这次风潮，是王稼祥进行反帝爱国斗争的初次尝试。

教会学校里也闹起风潮来了，这是出乎王稼祥父亲意料之外的事。对此，父母很不放心，就在家乡给稼祥订了一门亲事，想把他束缚在小家庭里。王稼祥对这种包办婚姻是反对的。一九二五年春节放寒假回家时，在父母的一再催逼下，他还是不得不结了婚。对此，王稼祥内心感到极其痛苦。但他并没有因此悲观，相反，更坚定了他献身社会革命的意志。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表示：“只把我的全力，置之社会革命。唉！革命是我终身的寄托了。”^③

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先行者孙中

①王稼祥 1925 年 4 月 1 日给他在柳溪小学读书时的同学王柳华的信。

②王稼祥 1968 年夏撰写的历史自述材料。

③王稼祥 1925 年 4 月 1 日给王柳华的信。

山在北京病逝。举国上下，为之哀悼。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联合发动各界举行追悼会，形成了广泛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宣传。芜湖各中等学校，于三月下旬先后举行了追悼中山先生大会，并停课一日以示哀悼。圣雅各中学的学生冲破校方的阻拦，也开了追悼会。王稼祥在会上登台演讲，慷慨陈词，对中山先生哀悼之情和强烈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热忱，溢于言表，使很多人深为感动。

四月二十四日，芜湖各界举行追悼中山先生大会。恽代英以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代表的名义专程赶来参加大会，在会上作了激动人心的演讲。他从军阀政府的腐败无能，列强侵略，国势凌夷谈起，进一步揭露外国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罪恶。他还指出教会学校是奴化教育的基地，号召青年们奋起救国，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统治。他强调，要拯救中国，非彻底革命不可。王稼祥和圣雅各中学的同学们聆听了恽代英的演讲，很受鼓舞。五月，芜湖教会学校掀起了收回教育权、反对奴化教育的学潮。这次学潮，是在五月十八日首先从圣雅各中学初中部开始的。为了支援初中部的学潮，圣雅各中学高中部全校学生集会，于当日晚上推出代表向校方提出两项要求：一，圣经改为选科；二，礼拜祈祷听学生自由。遭到校长蓝斐然的拒绝，群情愤慨。第二天上午，学生拒绝祈祷，撕碎圣经，从钟楼上掷下，全体学生罢课，组织了学生自治会，并推出王稼祥等四人为代表，至县教育会请求援助；同时决定以圣雅各高中全体学生的名义，致函芜湖《工商日报》，把学潮真相公之于众，把斗争锋芒指向教会对学校的统治，反对校方强迫非教徒读经祷告，争取信教自由。

为了破坏这次学生运动，校方宣布放假，但圣雅各中学的

学生都没有离校，仍在校内坚持斗争。王稼祥和其他学生代表一起，在校内外奔走呼号，揭露校方的阴谋，申述学生的正义行动，废寝忘食地工作着，战斗着。

这次学潮，取得了芜湖各界的支持。安徽省学联、安庆圣保罗中学、上海非基督教同盟，对芜湖教会学校学生的正义斗争表示声援和支持。薛卓汉^①也以安庆非基督教同盟代表的名义，前来芜湖，指导这次斗争。

五月二十六日，王稼祥作为圣雅各中学的学生代表和萃文中学的学生代表一起，同去省府一安庆，向省教育厅送交了芜湖五百多名要求从教会学校退学的学生一览表，要求解决转学等问题。经过王稼祥等人多次陈述、交涉，取得了各方面的援助，教育厅终于同意解决。在安庆，王稼祥与圣保罗中学同学组织了安徽反对教会教育联合会。

六月三日，王稼祥等人胜利返回芜湖，受到大家的热烈欢迎。王稼祥在学潮中得到锻炼，迅速成长为学生运动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可是，他被学校开除了，但他坚信自己所走的路，是一个二十世纪新青年应该走的路。他决心“努力直往，决不中馁。”

走上革命道路

一九二五年九月，王稼祥不顾家庭的阻拦，毅然选择了革命的道路，前往上海大学中学部学习。

上海大学是一所培养革命干部的摇篮，设有社会科学院、文艺院和附属中学，著名的共产党人邓中夏、张太雷、蔡和

^①薛卓汉，安徽寿县人。1923年11月在上海大学参加中国共产党，1925年3月经组织派遣，到安庆从事筹建地方党组织的工作。

森、恽代英、瞿秋白都在这里授课。此时正值五卅运动之后不久，上大学生与帝国主义英勇搏斗，不怕流血牺牲的爱国主义精神和革命气概，使王稼祥受到极大的教育。他入学之初，在给王柳华的信中说：“上大为革命之大本营，对于革命事业，颇为努力，余既入斯校，自当随诸先觉之后，而为革命奋斗也。”^①他说：“社会之腐败，至今日可谓登峰造极，我辈青年，置身斯中，不受其同化，不受其压制，盖亦难矣。欲解放青年，必自改革社会始，事理昭然，不可否认。”^②他已认识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压迫，是中国社会腐败的根源。他在信中指出：“现在这两重压迫已日益加紧了。可是压迫愈紧，反抗力也愈大，我们一息尚存，总应拚死命去向他们猛攻，何患他们没有推倒之一日。”他告诉王柳华，“我们应该以国民革命的手段，联合国内的革命分子和世界上的被压迫者，去打倒帝国主义，去铲除军阀，那我们的自由才可能恢复，我们的生活才可安宁。”^③

王稼祥进入上大附中高三班，被推选为该班学生代表，参加上大附中学生会的领导机构，不久，就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开始了他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一生。十月间，上大附中学部、主任侯绍裘^④找王稼祥个别谈话，问他是否愿意到俄国去读书，并说那里的生活很艰苦。王稼祥立即表示愿意

①王稼祥 1925 年 9 月 8 日给王柳华的信。

②王稼祥 1925 年 10 月 1 日给王柳华的信。

③王稼祥 1925 年 10 月给王柳华的信。

④侯绍裘（1896—1927），江苏淞江（今属上海市）人。1923 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25 年任上海大学中学部主任，1926 年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兼任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常委。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后，任上海临时政府委员，1927 年 4 月 10 日在南京被捕就义。

去。他在给王柳华的信中说：“我们既要革命，必须先研究革命理论，实习革命方法。于是我毅然决意到莫斯科进中山纪念大学，去预备革命。”^①

一九二五年十月二十八日，王稼祥搭乘苏联货船，从上海出发到达海参崴，又换乘火车抵莫斯科。他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后，由于英语基础好，即同张闻天、沈泽民、吴亮平等十一人编入英文班，直接听外语讲课。王稼祥学习十分勤奋。当时莫斯科中山大学宿舍条件并不很好，在走廊里放了许多小桌子，供学员自习之用。王稼祥每晚自修回宿舍后，至少还要伏在小桌上加班两个小时，认真阅读英文或俄文的理论书籍。经过一年多刻苦努力，他已经熟练地掌握了英、俄两门外语。一九二六年，学校分配他当英文和俄文翻译。一九二八年二月，王稼祥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他同张闻天、沈泽民等人经过严格的考试，进入红色教授学院深造；同时又在中山大学教一门课——中国问题。

王稼祥在莫斯科经过几年系统的马列主义理论学习和实地考察，认为苏联是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榜样。他在给王柳华等的信中说，俄国是“第一个无产阶级打倒资产阶级而握得政权的国家，吃人膏血的资本主义至此遂宣告死刑，其他的国家的工人，必然的不久也要推倒资产阶级获得政权，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那时就实现了。”^②他认为，中国要从帝国主义的侵略下解放出来，“只有用革命去推倒帝国主义不可，要革命必须有组织的政党来组织民众不可。”^③而中国共产党是真正完

①王稼祥 1925 年 10 月给王柳华的信。

②王稼祥 1927 年给柳华、久长的信。

③王稼祥 1926 年 3 月 15 日给王柳华的信。

全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头一步是与其他的革命阶级联合，以图打倒帝国主义，使中国从帝国主义的铁蹄下解放出来，建立独立的国家，而后再打倒本国的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共产主义。”^①他还经常向国内的同学友好转达苏联人民对中国革命的关注和支持：“苏联人民对于中国革命运动，极其注意，而尤其对于中国革命青年，表示出十二分的热烈欢迎。我曾参加过几次俄国工人庆祝一九〇五年的纪念会，在谈话中，在讲演中，都可表白他们十分希望中国革命早日成功，来同苏俄携着手，共同打倒国际资本帝国主义，来建设社会主义的世界。”^②他用自己的实际体会，规劝王柳华抛弃“实业救国”的幻想，最好来莫斯科学习。他要王柳华拿出勇气来，冲破家庭束缚，投身到社会政治革命中去。为了帮助王柳华学习革命理论，王稼祥向他推荐了下列书刊：1.《社会主义讨论集》；2.《中国青年社丛书》；3.《阶级斗争》；4.《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A·B·C》；5.《列宁主义》；6.《向导》及《中国青年》周刊。充分体现了王稼祥对同时代青年成长的关怀。

稼祥在苏联时刻惦记着灾难深重的祖国，每次写信回国，都要求友人详细告诉他国内的政治情况和家乡的变化。随着国内革命形势的发展，他要求回国参加实际斗争的心情越来越迫切。

一九三〇年二月，王稼祥回国的要求得到了组织批准，实现了他回国参加国内革命斗争的愿望。回国后，他被分配在上海中共中央宣传部任干事，担负编辑党报的工作。

^①王稼祥1927年给柳华、久长的信。

^②王稼祥1926年1月19日给柳华、久长的信。

一九三〇年六月，在李立三主持下，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对中国革命形势、性质和任务提出一整套错误的主张，形成了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错误，主要表现在，错误估计了中国革命形势，认为中国革命已进入新的高潮，可发展到全国直接革命形势，制定了全国武装暴动的冒险计划，要求立即夺取上海、南京、武汉等中心城市，然后取得全国革命胜利，引起世界革命总爆发。由于王稼祥在党中央机关工作人员的会议上对李立三的错误发表了批评意见，这本是正常的，但却受到了当时担任党中央总书记的向忠发的当面指责，并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被撤掉了中央宣传部干事的职务，调往香港，担任党报驻香港的记者。他遵守党的纪律，服从党的调动，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同年十二月，中央政治局撤销了对他的处分，又重新调他回上海。

一九三一年一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王稼祥任中央党报委员会秘书长和《红旗》、《实话报》总编辑。由于王稼祥回国不久，对国内革命斗争的实际情况了解不够，支持和拥护了当时共产国际的某些错误观点，也认为李立三犯的“左”的错误是在“左”的词句掩盖下的右倾机会主义，因而卷入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但是，他不同意当时某些人的主张：把所谓执行“立三路线”的同志一齐从领导机关中甚至从党内开除出去。他认为，反对“立三路线”是一个各方面的斗争，决不是一个简单的组织制裁，对于一般的同志应当采取教育的方法^①，区别对待，通过教育给予纠正错误的机会。

^①王稼祥：《我们须要布尔什维克的转变》，《实话》第5期，1931年1月5日

进入中央苏区

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由于王稼祥向往江西中央苏区的斗争，主动请求赴苏区工作。一九三一年三月，王稼祥同任弼时、顾作霖作为中央代表团，被派赴中央苏区。此时，正值蒋介石纠集二十万兵力，以何应钦为总司令坐镇南昌，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法，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二次“围剿”。因上海通往江西的道路被阻，王稼祥等只好绕道香港，经广州、福建去江西。

中央代表团到达中央苏区后，在江西龙岗地区第一次与毛泽东见面。他们向毛泽东介绍了四中全会的情况，毛泽东也向他们详细地介绍了苏区中央局内部争论的问题，还给他们看了苏区的许多文件。毛泽东常和王稼祥谈论有关政治、军事和路线斗争等问题，使王稼祥感到毛泽东所谈的问题，简单明了又很有说服力。对毛泽东丰富的武装斗争经验，他更是由衷地敬佩。

王稼祥来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即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的重要职务。

十一月初，中央苏区党组织在江西瑞金叶坪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即赣南会议）。这时，王明“左”倾错误已在中央苏区贯彻。赣南会议根据临时中央的指示，在中央代表团主持下，把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说成是“狭隘的经验论”、“富农路线”、“右倾机会主义”，开始排挤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对党和红军的正确领导。会议改选了中共苏区中央局，撤销了毛泽东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务，改由项英、任弼时负责，临时主

持苏区中央局的工作。在这个问题上，王稼祥作为中央代表团成员之一，支持并执行了临时中央的指示，是有过错的。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至二十日，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瑞金举行，毛泽东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王稼祥被任命为外交人民委员。二十五日成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以朱德为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同年十二月，王稼祥和刘伯坚、左权受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委派，指导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在宁都的起义工作。

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原是冯玉祥指挥下的西北军的一部，早在大革命时期就有共产党组织的秘密活动，刘伯坚曾在冯部当过政治部副部长。一九三一年春，二十六路军被调到江西进攻红军，数次交战受挫，困守宁都。鉴于这支部队的历史和现状，中央军委从上海派王超、李肃、袁汉澄（血卒）三人到该部去做兵运工作。他们在二十六路军中很快发展了一批党员，建立起党的组织，不久又发展了二十六路军参谋长赵博生入党，通过赵做高、中级军官的工作。在筹划起义的过程中，党的特别支部派袁汉澄赶赴瑞金，向中革军委的领导同志作汇报。

王稼祥在叶坪会见了袁汉澄，并向他详细了解了军队内部的情况，认为二十六路军存在着直接的革命形势。中革军委立即召开专门会议，讨论和研究二十六路军起义问题，参加的有朱德、王稼祥、叶剑英、刘伯坚、左权等。王稼祥在会上详尽分析了二十六路军的现状，经过讨论，制定了起义的方案，决定十二月十三日夜十二时举行起义，并派王稼祥、刘伯坚、左权携带电台到彭湃县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固厚村，就近指导。

中共二十六路军特支根据中革军委的指示，立即进行起义

的具体部署。鉴于国民党从南昌给二十六路军运来二万多套棉衣和薪饷已到达广昌，为了在起义前能得到这批服装和薪饷，特支又派袁汉澄到彭湃县向王稼祥、刘伯坚请示。经研究，批准将起义时间推迟一天。

十二月十四日，宁都起义按预定方案胜利举行，全军二万多名官兵从国民党军阀的控制下解放出来，走上了革命道路。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十五日下午，当起义部队到达宁都城东南六十里的固厚村时，受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代表王稼祥、刘伯坚、左权等的热烈欢迎。这天，在王稼祥的主持下，由刘伯坚执笔起草了《原国民党二十六路军于宁都起义后加入红军宣言》（又称《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宣言》），晚上，通过电台向全国播发。

一九三二年一月，反国民党军第四次“围剿”前，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要苏区中央局开会讨论攻打赣州的问题。在会上，毛泽东认为赣州是敌人固守的坚城，红军技术装备差，很可能久攻不克，于我不利，因此他反对打这一仗。王稼祥开始赞同毛泽东的意见。后来，临时中央来电，坚决主张打赣州，认为打下赣州后，可以把江西苏区联成一片。在这种情况下，王稼祥也就同意打赣州。二月四日，红三军团强攻赣州未克，红五军团又开上去接应。但由于敌军工事完备，防御力量较强，红军缺乏攻坚的战术经验和武器装备，围城一个月零三天，伤亡很大，被迫撤退到赣县江口一带。在总结围攻赣州教训时，王稼祥认识到对敌军力量估计不足是造成战略上、战术上错误的根源。三月中旬，毛泽东应邀抱病赶赴江口，与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彭德怀一起参加中央局会议，研究下一步行动计划。会上，大家同意毛泽东主张，决定向敌人力量薄弱

的赣东北发展，以打通赣南与赣东北两区，使中央苏区得到扩大和巩固。

四月，红军攻克漳州，缴获大批物资给养，鼓舞了红军士气，恢复和扩大了闽西、闽南根据地。七月二十五日，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联名致电临时中央，明确提出北上作战计划，并要求部队改设政治委员制，以毛泽东任总政委。八月八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王稼祥、彭德怀发布《红一方面军总政委毛泽东已到军工作的命令》。在毛、周、朱、王领导下，指挥红军北上作战，一周内连克乐安、宜黄、南丰、宁化四城，取得了很大胜利。可是，这个作战计划，却遭到临时中央、苏区中央局的反对。一九三二年十月，苏区中央局在宁都举行扩大会议，错误地批评毛泽东反对攻打赣州等中心城市，是反对临时中央“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总方针；指责毛泽东在历次反“围剿”中行之有效的“诱敌深入”战略方针，是所谓“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并提出讨论毛泽东是否留在前线指挥军队作战的问题。在会议的激烈争论中，王稼祥是支持毛泽东仍留在前线指挥军队的。他根据前三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认为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和战略战术是正确的。他在会上阐述了自己的看法，力争毛泽东留在前方指挥军队。但他的意见在会上处于少数。宁都会议错误地决定撤销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调他回后方主持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工作。毛泽东被解除军权后，王稼祥不仅没有疏远且增强了同他的革命友谊。

一九三三年二、三月间，红一方面军取得了黄陂、东陂战役的重大胜利。总政治部直属队迁到乐安县谷岗村。四月二十八日，周恩来、王稼祥、肖向荣等在村子的一个古庙开

会，研究扩军问题。大约九点多钟，忽然有两架敌机飞来。正在开会的领导同志，在飞机快要投弹时，才急急忙忙地疏散。王稼祥刚跨出庙门，一颗炸弹就在不远处爆炸了。他被弹片击中，不幸身负重伤，倒在血泊中，顿时失去了知觉。周恩来、肖向荣等立即请军委卫生部部长贺诚前来救护，并派警卫班随贺诚带领的医务组护送王稼祥去瑞金治疗。

到了瑞金，由主治大夫彭真（龙伯）和王斌替王稼祥会诊。经检查发现弹片从他的右下腹打进去，打穿了升结肠，弹片嵌在右肠骨窝上，升结肠已经穿孔污染，有发生弥漫性腹膜炎的危险。按常规必须在负伤后的六小时内手术，缝合升结肠上的穿孔，防止腹腔污染。可是没有爱克司光机，弄不清残留弹片的位置，主治医师不同意动手术。后来从上海搞来一台爱克司光机，运到苏区，虽查清了弹片的部位，但因医疗条件太差，主治医生只同意切开引流，采用保守疗法。由于病灶未除，王稼祥的伤部一直流脓，留下了终身痛苦的后遗症。

同年九月，蒋介石集中了一百万兵力向苏区发起第五次“围剿”，其中以五十万兵力，重点进攻中央苏区，临时中央书记博古不懂军事，完全听信共产国际派来的李德的瞎指挥。他们推行“左”倾冒险主义，在作战方针上，反对游击战、运动战，主张正规战、堡垒战。为研究粉碎第五次“围剿”的作战计划，王稼祥不顾身负重伤，躺在担架上参加了军委会议。李德、博古反对毛泽东提出的积极防御、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继续坚持其“御敌于国门之外”、“全线出击”、“与敌人拚消耗”等错误主张。王稼祥在会上没有坚决抵制李德、博古的错误方针。多年来他常为此自我谴责。一九七二年他在给毛泽东的信中又一次检讨了自己的错误。他说：如果没有第五次反

“围剿”的“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错误，就不会有我军空前的惨败，就不会有撤出中央苏区根据地，也不会有千辛万苦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我虽然在遵义会议有功劳，但却不能补我的过失于万一，我为此而终生不安。

一九三三年十月，王稼祥伤势突然恶化，体温升高到四十度，急性腹膜炎发作，病情垂危。经医生会诊后，急救的唯一办法是打开腹腔放脓。但是当时要做这样大的手术，困难很多，既没有麻醉剂、羊肠线，又没有消炎药。在征得王稼祥本人同意后，医生们在条件十分简陋的手术台上，给他做了一次大手术。没有麻醉剂，给他吃镇静药，打强心针，大腿皮下输液。他在手术台上，一声不吭地咬着牙，忍受着剧烈的疼痛，几次昏迷过去。每当他昏迷时，医生便暂停手术，全力抢救；情况好转一点，又继续进行。就这样经过八小时紧张的手术后，到第三天清晨，王稼祥才慢慢地苏醒过来。他又一次战胜了死神，露出胜利者的微笑。

一九三四年一月，临时中央在江西瑞金召开六届五中全会。会上，王稼祥被增补为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二月七日，王稼祥在瑞金主持召开了全国工农红军第一次全国政治工作会议。出席大会代表共二百五十四人，都是各部队的政治工作领导干部。王稼祥在开幕词中反复强调：只有红军在思想上政治上的一致，才能保证每个战斗的胜利。他说：“政治工作是提高红军战斗力的原动力”，“是我们红军的生命线，一切战争如果没有政治工作的保障是不能达到胜利的。”^①

^① 《全国政治工作会议上王主任的开幕词》，1934年2月17日《红星报》。

遵义会议

由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中央根据地的第五次反“围剿”遭到严重失败。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红军被迫开始长征。在长征途中，虽然突破了敌人四道封锁线，但由于博古、李德在军事上又犯了逃跑主义的错误，部队受到重大损失，十一月红军渡过湘江，到达湖南的通道地区时只剩下三万余人。当时敌人已调集四十万军队，准备围歼预定向湘西转移的中央红军，形势对我极为不利。在这党和红军的命运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中央政治局部分同志在湖南通道县开会，讨论红军的战略行动方针问题。毛泽东提出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以避免全军覆没的危险。这个主张得到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的赞成。于是，中央红军立即由湖南进入贵州东部，先克黎平，甩开了敌人的合围，开始扭转长征以来的被动局面。十二月十八日在黎平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充分讨论了军事行动计划，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确定了创建川黔边苏区的新的战略行动方针，放弃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并确定在适当时候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审查黎平会议的决定和总结长征以来及五次反“围剿”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

王稼祥在长征途中，因病伤坐担架随军行动，毛泽东也因病坐担架，两人同行，在宿营地休息时，常在一起商谈党和军队前途等重大问题。王稼祥忧虑地对毛泽东说，如这样下去红军就不行了！要改变目前危急的局面，必须纠正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改变中央错误的领导。毛泽东十分同意王稼祥的想法。

于是，王稼祥又把自己的想法和毛泽东的观点同张闻天交谈，取得了一致意见。

这时，红军第一军团政委聂荣臻因脚伤坐担架，随中央军委纵队行动。王稼祥有机会同聂荣臻在一起交换意见。他们一路走，一路扯，共同认为博古、李德等人不行，坚决主张请毛泽东出来领导。王稼祥说：“我参加第二次、第三次反‘围剿’，两次都取得了那样大的胜利，完全是毛泽东同志采取诱敌深入、隐蔽部队、突然袭击、先打弱敌、后打强敌、各个击破等一系列战略战术原则指挥的结果。”王稼祥从亲身经历，深切地感到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正确，因而坚决主张毛泽东出来统帅部队，用他自己当时的话来说：“到时候要开会，把他们‘轰’下来！”^①聂荣臻对于王稼祥的意见，完全赞成，他自己也有这个想法。王稼祥在酝酿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中主动做了许多工作，使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逐步为中央多数同志所拥护。

一九三五年一月七日部队攻占遵义城后，由于蒋介石的嫡系薛岳、周浑元纵队被阻隔在乌江以南，难以很快采取行动，红军获得短期休整的机会。在这种条件下，一月十五日至十七日，召开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遵义会议集中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会上博古作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总结的报告，周恩来作了副报告。毛泽东首先起来对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的失败教训作了系统的发言，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路线上先是冒险主义，继而是保守主义，然后是逃跑主义的错误；正确阐述了中国

^①聂荣臻：《回忆王稼祥同志在遵义会议上的重要作用》，《回忆王稼祥》，人民出版社1985年1月版。

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指明了今后正确的方向。王稼祥紧接着发言，旗帜鲜明地支持和赞同毛泽东的意见，批评了博古、李德的错误，拥护由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张闻天也积极支持毛泽东的意见。毛、张、王的主张得到会议绝大多数同志的完全赞成。据陈云在长征途中写的手稿记载：在“扩大会中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博古没有完全彻底的承认自己的错误，凯丰同志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A（即李德——引者）同志完全坚决的不同意对于他的批评。”^①会议经过三天讨论，作出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这一决议，会后由张闻天整理成文），在组织上也作了调整，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王稼祥也被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随后在行军途中，根据会议精神，常委进行分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又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参加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作为当时红军作战的最高统帅部；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邓小平后来指出：“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同志对全党起了领导作用。……尽管名义上他没有当总书记或军委主席，实际上他对军队的指挥以及重大问题的决策，都为别的领导人所承认。朱德同志、周恩来同志、张闻天同志、王稼祥同志，他们这些同志确实照顾大局，确有党性原则，只要毛泽东同志是对的都一致支持，坚决执行。”^②从此，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

^①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1935年2月或3月），1985年1月17日《人民日报》。

^②转引自邓力群：《介绍和答问——学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

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在这个历史关键时刻，王稼祥作出了重大贡献。

此后，毛泽东曾多次讲到王稼祥对遵义会议的贡献。一九四五年党的七大期间，毛泽东曾说：“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账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他们两个人是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的，作用很大。从长征一开始，王稼祥同志就开始反对第三次‘左’倾路线了。”“没有他们的赞助，遵义会议的成功是不可能的。”^①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又说：“遵义会议王稼祥投了关键的一票”。

胡耀邦在《深切地纪念王稼祥》一文中写道：“长征开始后，毛泽东同志孜孜不倦地说服当时中央的很多同志改变错误的军事路线，稼祥一直坚定地站在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一边，并且帮助毛泽东同志作了许多说服工作。因此，在实现中国革命伟大转折的遵义会议上，他发挥了重大作用。遵义会议后，稼祥同志和周恩来同志被指定为中央三人军事小组的成员，协助毛泽东同志指挥全军，胜利地实现了红军的战略转移。”^②

在悠久的岁月中，王稼祥从来不讲这些事情，从不夸耀自己的功劳。即使在十年动乱时，在他的历史自述材料中也只简单

^①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关于选举问题的两次讲话（节录）》（1945年5月24日、6月10日），1985年1月17日《人民日报》。

^②胡耀邦：《深切地纪念王稼祥同志》，《回忆王稼祥》，人民出版社1985年1月版。

地提了一下：“在这个会上，我支持了毛主席，拥护了毛主席。”直到这时，和他共同战斗生活了三十多年的夫人朱仲丽，才约略知道他在遵义会议上所起的作用。

带伤在长征路上

王稼祥是参加长征的中央领导同志中受伤最严重的一位。正如他本人所说：“一直到长征开始时，才把我从医院用担架抬上长征之路的。”^①长征途中，他的伤口经常向外流脓血，医生不得不用橡皮管塞进伤口，在橡皮管外面穿上丝线，缠上纱布、棉花，使脓液排出体外，以减少发炎的机会。每当医生帮他换药时，总是小心翼翼地替他取出四、五寸长的橡皮管子，只见他脸上冒出豆大的汗珠，牙齿咬得咯咯响，但从不呻吟一声。他用最大的毅力，忍受着巨痛，与伤病作顽强的斗争。遵义会议期间，不管伤痛如何剧烈，他总是捂着肚子参加会议，从不缺席。警卫员见他那副疲惫不堪的样子，劝他请假休息一天。他带着责备的口气说：“你们懂得什么？那么重要的会议，还顾得上请假！”

一月十九日，红军离开遵义，移师北上，四渡赤水，五月间胜利地渡过金沙江。接着，飞夺泸定桥，胜利通过大渡河。六月中旬，部队到达夹金山下。夹金山海拔四千多公尺，山峰直插云霄，气候变化无常，到处都是白茫茫一片的冰雪。过雪山是长征途中最困难的一段路程。王稼祥冒着刺骨的寒风，骑着牲口上山，到了半山腰，伤口痛得支持不住，便下来步行，

^①王稼祥：《我的履历》（1968年夏）。

一直踉踉跄跄地爬到山顶。山顶上空气稀薄，呼吸越来越困难，他脸色苍白，嘴唇发紫。担架员见此情景实在过意不去，一定要他坐担架下山。他说：“你们也太累了，还是让我慢慢走吧！”^①他终于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胜利地翻过了人迹罕至的大雪山。六月十四日，红军第一、四方面军于懋功胜利会师。中共中央根据会师后的形势，确定了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而张国焘与中央方针背道而驰，主张向川康边境退却。中央于二十六日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否定了张国焘的错误主张。王稼祥为维护一、四方面军的团结，与李富春、林伯渠、刘伯承、李维汉等组成中央慰问团，到四方面军慰问和贯彻中央决定。对于张国焘的错误主张，王稼祥作了耐心的说服工作。

七月，部队到达藏族区毛儿盖西边一百多里的沙窝时，王稼祥突然发高烧。经医生检查，原来是伤口发炎，肠子腐烂，决定采取紧急措施进行抢救。此时，大部队已到毛儿盖，周恩来等领导同志专程从毛儿盖来到沙窝，看望王稼祥。

八月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沙窝召开会议，继续对张国焘进行耐心的说服工作。会议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决定北上抗日。王稼祥因病未能参加会议。据当时王稼祥的警卫员邱仁华回忆：“为了纠正张国焘分裂红军的错误路线，朱总司令请王稼祥同志做做张国焘的工作，为了照顾王主任的身体，谈话地点定在他的房子里。王稼祥同志和张国焘从太阳落山一直谈到午夜三点多钟，

^①邱仁华：《长征途中的王稼祥同志》，《回忆王稼祥》，人民出版社1985年1月版。

……听到王主任耐心说服张国焘，使他提不出任何反对的理由，最后只好同意北上抗日。”^①根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红一、四方面军混合编为左右两路军共同北上。

八月二十日在毛儿盖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王稼祥伤势略有好转，拄着拐杖参加了会议，作了重要发言，反对张国焘向西发展的错误主张。他说：“我们不应以一些困难，而轻易放弃向东发展的方针。向东发展，背后无敌，背后的少数民族我们要争取，成为苏区的一个主力。但如果向西发展，则要缩小苏维埃运动，而且性质上会因为失去汉人广大工农群众，失去社会基础，而变成少数民族的民族革命运动。”^②会议决定由毛泽东起草一个决议（即《关于目前战略方针的补充决定》）。八月二十六日部队离开毛儿盖，王稼祥因行动不便，坐担架与党中央一起，随右路军行动。往北不远，便进入了纵横数百里、人烟稀少的水草地。这里瞬息万变，时风时雨，草丛上浓雾弥漫，草丛下积水泛滥，根本没有道路，人只能在草上走，用力过猛就会陷下去，不少红军战士牺牲了。更为困难的是背的干粮有限，粮食断绝了，只能靠挖野菜、草根充饥。经过这样艰苦的跋涉，王稼祥身体已非常虚弱，但他心里始终想着战士。邱仁华回忆说：“出草地的头一天晚上，我们露营在前不靠村，后不靠店的旷野里，到了半夜，天下起大雨来了。当时我们都没有雨具，稼祥同志见此光景，赶快叫担架员把担架上的唯一的一块雨布撑开，把我们叫到他身边说：都围过来吧，大家挤在一起暖和，下这么大的雨，衣服淋湿了，会冻坏的。第二天就要出草地了，他看见战士们带的口粮都已吃完，就叫我

^①邱仁华：《长征途中的王稼祥同志》。

^②《王稼祥在毛儿盖会议上的发言》，1935年8月20日。

们把节省下的一点粮食统统拿出来煮给大家吃。他说：部队很快就要出草地了，你们长期吃不饱，吃点充充饥吧。当出了草地到了哈达铺，他又很风趣地同大家说：“第一顿饭无论如何不能吃得太饱，很长时间没有吃顿饱饭啦，猛然吃得太多会胀死的。”①

八月下旬，左右两路军先后到达阿坝和巴西，张国焘自恃人多枪多，拒绝执行中央北上方针，并要挟右路军和党中央南下。因此，党中央率一、三军团从巴西北上，并于九月十二日在俄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并致电张国焘，命他率领部队北上。王稼祥在这个会上明确指出：“现在向南的方针走不通，只有死路。”为了使部队迅速脱离险区，俄界会议又决定，将红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改组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继续北上。王稼祥担任陕甘支队政治部主任，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委。

在此期间，王稼祥除了要同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作斗争，还用很大精力关心干部战士的成长。由于长期的艰苦行军，战士牺牲很多，有些同志感到革命前途渺茫。王稼祥耐心细致的向干部战士作思想工作，帮助他们树立革命必胜的信心。他说：“革命斗争是艰苦的，长期的，有时甚至要经过流血牺牲才能取得胜利。眼前，我们是苦，是累，有的同志还会牺牲自己的生命，但前途是光明的。我们一定要坚持革命立场，宁死不屈，为我们的后代造福。”②他还常常教育下属干部和战士，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可丝毫违犯。当红军进入少数民族地区时，常发生有钱买不到粮食和见到存粮又找不到主人

①②邱仁华：《长征途中的王稼祥同志》。

的情况，他也决不允许违反群众纪律，让部队给群众留下购粮银币，并耐心教育、批评那些不执行纪律的干部和战士。在当时的情况下他还经常关心和鼓励干部、战士学文化。他说：学文化对工作、对革命都有利。部队到达陕北后，根据新形势的要求，他曾把一批干部、战士推荐到红军大学、中央党校、军委通讯学校去学习，使这些同志能为革命作出更大的贡献。

赴苏治伤

一九三六年十月，红军三大主力——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地区胜利会师。十一月，经过山城堡一仗，稳定了陕北的局势。

这时，王稼祥住在党中央临时所在地保安县城一座小山脚下的窑洞里，与毛泽东、朱德、张闻天、博古、林伯渠等的住处接邻。王稼祥由于长期病痛折磨和营养差，脸色发黄，身体非常虚弱。一天，王斌邀请刚刚从上海到达陕北根据地的美国医生马海德来替他会诊。马海德见他腹部的伤口很大，腹膜炎，体温偏高，如要彻底治疗，非打开腹腔不可，但当时的设备条件，远远达不到这个要求，只好仍旧采取保守疗法，打针吃药，尽可能加强一些营养，力求控制病情，不至于进一步恶化。当马海德知道王稼祥是拖着重伤的身体经过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时，惊叹不已地说：这么重的伤，居然能长征过来，要有多么顽强的意志啊！简直令人难以想象！

鉴于王稼祥伤情严重，党中央决定送他赴苏联治疗。毛泽东亲自指派红军总卫生部部长贺诚陪同护送。十二月初，王稼祥在贺诚、邹大鹏等伴送下，从保安出发，准备经西安转上海去

苏联。在去西安途中，传来“西安事变”的消息。到西安后，由于陇海铁路交通被国民党何应钦的军队阻断，他们只好又返回陕北，到党中央新的所在地延安待机。不久，通过党的地下工作关系，搞到去太原的护照，王稼祥乃于翌年二月，仍由贺诚等陪同，秘密由延安出发，以乘火车去太原为名，由宜川过黄河，经临汾到榆次，乘上东去石家庄的火车，然后经北平到天津。在天津住了一些日子，王稼祥又在贺诚陪护下到达上海，准备等候轮船去苏联治疗。

上海地下党负责人潘汉年、冯雪峰为他们在僻静地区汾阳路六十四弄五号安排了住处，并指定进步作家周文、郑育之夫妇担任政治交通，负责掩护。这是一幢三层楼的洋房，王稼祥就住在三层楼上，足不出户，每天躺在床上阅读各种书报。贺诚每次出去都要从外面买回一大堆书报、杂志供王稼祥研究。他根据所掌握的抗日救亡运动的情况以及国内外的形势，曾对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向党中央提出过建设性的意见。

抗日战争前夕，上海白色恐怖仍旧严重。为防止敌人破坏，王稼祥来此不久，即要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同志检查一下有无粗心大意的地方，不要给敌人抓住把柄。郑育之拿出方志敏的《清贫》和《可爱的中国》两份手稿，请示处理意见。恰巧那天潘汉年和冯雪峰也在，王稼祥与潘、冯共同研究，认为既是方志敏烈士遗著，就应该很好地珍藏起来，以免遗失。过了两天，潘、冯二人来到郑育之住所，带来了照相机，把文稿一页一页地拍下来，并把底片拿走，原稿则由冯雪峰拿去转移到别处，使这两份手稿得以完整无缺地保存下来。

王稼祥和贺诚在上海期间，由潘汉年通过宋庆龄的关系，托人以植物学教授去比利时考察为名，去国民党外交部办理出国

护照，直到一九三七年六月中旬才将出国手续办好。

六月下旬的一天，王稼祥和贺诚乘苏联轮船离开上海，到海参崴后又转乘火车，抵达莫斯科，受到共产国际的亲切接待。苏联政府很快安排王稼祥住进医院。当苏联大夫打开他的腹腔作手术治疗时，发现里边已化脓，且有掉进去的纱布、橡皮管等污物。苏联大夫大吃一惊，这是多么危险啊！王稼祥在医生的精心治疗下，转危为安后，又去南俄罗斯疗养院住了一个时期。

同年十一月，王稼祥在莫斯科见到王明。此时王明同康生即将回国，由正在莫斯科养病的王稼祥，接替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职务。王稼祥只同意在养病期间代替短期工作，病愈即回国，要王明回国后请中央派人接替。王稼祥在莫斯科担任共产国际的代表时，主要工作是向共产国际反映中国党内和国内的革命形势。他常把党报党刊上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独立自主原则等材料，用俄文编写成短文，送季米特洛夫参阅，这对取得共产国际对中国党的了解和支持，起了积极的作用。

王稼祥开始到共产国际工作时即表态说：“我是习惯军事生活的，养成了军事工作作风。所以同我在一起工作，就要严谨而雷厉风行，不可吊儿郎当！”他要求工作人员办事要准确无误，不许模棱两可，拖拖拉拉。在他的严格要求下，一改王明时期的那种自由散漫的不良习气，受到共产国际机关工作人员的高度赞扬。

王稼祥在共产国际工作期间，曾对于王明在苏联不顾事实地整人而造成的冤案，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予以纠正。共产国际于一九三五年八月开过“七大”后，在列宁学校设立了一个特别班，参加特别班学习的中国代表有陈云、陈潭秋、滕代

远、周和森、曾山、孔原等人，由曾涌泉任翻译。在学习期间，孔原因反对王明而受到打击，被开除学籍，既不给工作，又不准回国，一拖就是两年。王稼祥对此案作了调查，澄清了事实，纠正了这起冤案，决定让孔原回国。接着又解决了曾涌泉的冤案。由于曾涌泉在党小组会上揭发了列宁学校校长包庇两个中国托派的事实，引起这位校长怀恨在心，利用苏联肃反扩大化之机，对曾涌泉打击报复，开除了工作。曾涌泉向中共代表团申诉，而王明、康生却置之不理。在这种情况下，曾只好向共产国际监委申诉，要求对他进行全面审查，彻底搞清问题。王明、康生回国后，王稼祥主动审理这件冤案，认真研究了监委所提供的调查材料和证明，并亲自找曾涌泉谈话，在事实真相全部了解清楚后，为曾涌泉明辨是非，后来组织上撤销了对他的错误处分，并同意他回国的请求。一九三八年，曾涌泉、孔原一起离开苏联，取道新疆回国。

重大的使命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王明与康生一起从莫斯科回到延安。王明以共产国际代表身份提议召开政治局会议。他在十二月九日至十四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系统地提出了右倾投降主义的主张，强调“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幻想依靠国民党军队求得速胜，批评中央洛川会议“过分”强调独立自主，反对党的正确路线。接着，在翌年二月二十七日至三月一日的政治局会议上，王明又做了《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继续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的报告，更加强调一切“统一”，绝

对服从于“统一”，完全放弃无产阶级在全民族的抗日战争中的领导权。由于王明打着“共产国际”旗号，说是奉“共产国际”之命回国的，因此他的右倾投降主义主张，迷惑了一部分同志。虽然，由于毛泽东等人进行了抵制，在许多原则性问题上坚持了正确观点，使王明的错误意见没有在全党占统治地位，但当时共产国际有的领导人并不太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比较相信王明，把王明看作中国革命的领袖。

为了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国共产党的工作情况，争取共产国际了解我国具体情况和我党的具体政策，一九三八年四月，中共中央派任弼时赴莫斯科。任弼时到莫斯科后，共产国际召开了听取和讨论任弼时报告的会议。王稼祥参加了这个会议，并在会上作了补充发言。王稼祥分析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第一次统一战线的区别，主要是中国共产党拥有巩固的陕甘宁抗日根据地和工农武装力量，它有力量团结全国各阶层人民，同国民党联合一致抗日。他还强调指出：“现在中国共产党不会重复第一次国共合作时陈独秀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因为毛泽东同志坚持共产党的独立性”^①。在这次会议上，通过了一个支持中国抗战的公开文件和一个内部文件。会后，王稼祥预备回国，他的工作由任弼时接替。临行前，季米特洛夫对王稼祥和任弼时语重心长地说：应该告诉全党，支持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其他的人如王明，不要再争领导人了。季米特洛夫还托王稼祥把共产国际通过的两个重要文件带回国内，交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

^①伍修权：《同学、战友、师表——怀念王稼祥同志》。

《回忆王稼祥》，人民出版社1985年1月版。

一九三八年夏，王稼祥取道新疆回国。他由苏联乘飞机到新疆，然后由新疆改乘汽车东行。当汽车行驶到离兰州城外几十公里的荒山野地时，突然遭到了土匪的抢劫。护送的机枪手和警卫排战士一个个倒下去了，情况十分紧急。为了保存共产国际交给的重要文件，王稼祥急中生智向敌人喊话，问他们要钱还是要人？当对方答话说要钱要东西时，王稼祥紧张的心情才松弛下来。他打开箱子给了他们一些现款，同时又把手表摘下来给了他们，机智地脱离了危险，赶到兰州，又由兰州到西安，在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住了一夜，第二天清晨，再乘汽车直奔延安。

八月初，王稼祥回到延安，立即把共产国际讨论中国革命形势的详细情况，向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其他同志作了汇报。在九月十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的会议上，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中心思想是认为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尤其是毛泽东、朱德等领导的八路军执行了党的新政策，在复杂的环境和困难的条件下中共真正运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要以毛泽东为首解决统一领导问题，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九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再次举行会议，决定召开六届六中全会，并确定了全会的主要议程是：一，张闻天主持开幕式；二，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指示；三，毛泽东作政治报告。

当时王明在武汉，中央打电报叫王明回延安，参加六届六中全会，听取共产国际文件的传达。王明不肯到延安参加会议，竟无理要求党中央到武汉或西安去开会，遭到毛泽东的严词拒绝后，王明又要王稼祥速赴武汉，与他单独见面。王稼祥

抵制了王明的上述企图，一面报告党中央和毛泽东，一面以筹备六届六中全会秘书长的身份打电报通知王明，要他迅速回延安参加六届六中全会，听取共产国际的重要指示，否则，一切后果将由他自己负责。在这种情况下，王明不得不来到延安。

在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维护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统一领导和正确路线。毛泽东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和会议总结，要求全党同志认真地负起领导抗日战争的重大历史责任。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批准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政治路线，基本上克服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并重申全党要独立自主地放手组织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后来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期间说过，“中国党历史上有两个重要关键的会议，一次是三五年一月的遵义会议，一次是三八年的六中全会。”“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如果没有共产国际指示，六中全会还是很难解决问题的。共产国际指示就是王稼祥同志从苏联养病回国带回来的，由王稼祥同志传达的。”^①

在革命圣地——延安

六届六中全会后，王稼祥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军委总政治部主任，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并兼任中央华北华中工作委员会主任，协助毛泽东处理了大量有关党、军队和抗日根据地的重大事务，成为毛泽东在延安的主要助手和战友之一。从一九三

^①1945年6月10日毛泽东在七大关于选举问题的讲话。

八年到一九四三年，以毛泽东同王稼祥或者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联名发给八路军、新四军和各抗日根据地的指示文电数以百计。在这期间，王稼祥在为中央起草或者主持起草的重要文件和撰写的重要论著中，提出了不少重要创见，丰富了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宝库，为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和成熟作出了贡献。

中共中央一九四一年七月一日作出的《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是王稼祥主持起草的重要文件之一。《决定》要求“每个党员，特别是每个领导干部都应该深刻反省自己的弱点，把党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任何人都不应该有自满自足，自私自利的观念。要提倡大公无私，忠实朴素，埋头苦干，眼睛向下，实事求是，力戒骄傲，力戒肤浅的作风。要用自我批评的武器和加强学习的方法来改造自己，使适合于党和革命的需要。要改造那些把理论与实践，学习与工作完全脱节的现象。这样来更加坚定自己的阶级立场、党的立场和党性。”规定“中央委员以至每个党支部的负责干部都必须参加组织生活，听取党员群众对自己的批评，以增强党性的锻炼。”这是一份加强我党建设的十分重要的文件，以后被列为延安整风运动中的必读文件之一。

一九四三年七月八日，王稼祥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这篇文章在中共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毛泽东思想”这个科学概念，对毛泽东思想的产生、发展和成熟的过程，以及它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作了阐述。文章指出，毛泽东思想“对于党内存在过和存在着的教条主义与机械搬运的公式主义进行过不调和的斗争。同时，又反对了那些脱离马克思主义基

础的错误观点”；“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运动实际经验相结合的结果。”文章还特别指出，随着中国革命运动不断向前发展，毛泽东思想“这个理论也正在继续发展中”，“这是引导中国民族解放和中国共产主义到达胜利前途的保证。”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经王稼祥第一次提出后，逐步为党内许多同志所接受。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把毛泽东思想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七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中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

王稼祥在延安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工作期间，十分重视加强人民军队的政治和军事理论建设。一九三九年二月，在他的主持下，在延安出版了《八路军军政杂志》，以交流抗战经验，提高部队战斗力。他对办好这个刊物很重视，除约请其他中央领导同志撰写文章外，自己也撰写了不少文章。他的文章概括了中国共产党在军事理论和实践方面的伟大成就，指出这些成就是党“能够把马列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环境联系起来的结果”^①；同时对建设革命军队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并着重指出：“我们军队是共产党领导的先进军队，不是所谓‘老粗’的军队，也不是单纯的农民军队，不识字和无知识应当不是光荣，而是痛苦，而是我们进步的最大障碍。我们共产党不仅应当有前线指挥作战的将领，还需要有自己的军事家和军事理论家。”^②他为《八路军军政杂志》写的题词就是：“没有战争的理论，就不会有战争的胜利，为提高八路军的政治、军事理论水平而斗争。”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他又提

^{①②} 《中国共产党和革命战争》，《八路军军政杂志》1940年第1期。

议并经中央军委决定，成立了八路军军政学院，由他担任院长。他为军政学院确定的教育方针就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培养具有理论修养，有高度觉悟和指挥才能的八路军各级军政干部，为抗日前线输送领导骨干。

王稼祥在延安时就重视知识分子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当时有一批著名医学专家如何穆、魏一斋、史书翰等，还有国际友人白求恩、马海德、柯棣华等，先后来到延安，充实八路军医务工作者的队伍。王稼祥十分欣喜地对军委总卫生部政委刘惠农说：“今天与当年红军时代不同了，参加革命的有工人、农民，还有许多知识分子，不仅有科学家、艺术家、还有医生，对这批知识分子，党首先要信任他们，充分发挥他们的专长。为革命事业服务。我们做领导工作的同志一定要认识到，没有革命知识分子，没有文化知识和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当然也就不能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①

为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王稼祥认为必须执行党对知识分子的正确政策。他对知识分子问题概括了三个字：容、化、用。容就是大量吸收；化就是教育改造；用就是大胆使用，给以提拔。他对总卫生部领导同志具体交待说：我们要帮助医学专家们解决生活上、工作上的困难。现在我们的条件还不好，但也要尽最大努力，给他们较好的待遇，创造较好的环境，使他们安心工作。我们要发挥他们的专长，依靠他们办学校、办训练班，培养出更多的医生和护士。在王稼祥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支持下，一九四〇年九月，在延安创办了第一所八路军医科大学，也叫中国医科大学，由王斌任校长，史书翰任副校

^①刘惠农：《王稼祥同志在抗日战争时期同我的几次谈话》，《回忆王稼祥》，人民出版社1985年1月版。

长，饶正锡任政委，何穆、魏一斋等担任教员。第一批招收学员五百多人，都是从沦陷区、国统区来到延安的爱国青年。他们经过五年的刻苦学习，毕业后，输送到陕甘宁边区、华北各解放区工作，后来有不少同志成为我国医务战线的各级领导骨干和专家。

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发出了精兵简政和大生产运动的伟大号召。王稼祥亲自为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起草文件，还主持召开军委直属机关精兵简政的会议。他要求直属政治部：一，将原有六十余名干部和勤杂人员减去一半；二，取消科一级编制；三，取消单独的伙食单位，同总政治部机关合并为一个伙食单位。军委和总政各单位精简工作进展很快，用了很短时间就达到中央提出的要求，压缩了机关后勤人员，减轻了人民负担，提高了部队战斗力和机关工作效率，被精减的同志也都得到妥善的安排和使用，大家都感到满意。

大生产运动开展以后，王稼祥召集军委各直属单位负责同志开会，要求按照党中央的精神，制定本单位如何实现自给的计划。他还在王家坪礼堂召开的军委直属单位经济工作人员大会上作政治动员，使大家认识到大生产运动非开展不可，这是关系到能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关系到革命事业成败的大问题，从而使大家确立了一定要把生产搞好的信心和决心。

动员大会之后，军委直属各机关立即行动起来，开荒种地，纺纱织布，饲养猪羊。大家除了搞好本职工作外，起早摸黑搞生产，干得很起劲。大生产运动使机关、部队分别达到部分自给或基本自给，改善了大家生活，减轻了人民负担，进一步密切了党政军民的关系。

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

了《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决定在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之下，设立宣传委员会和组织委员会，作为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助理机关。中央宣传委员会由毛泽东任书记，王稼祥任副书记；中央组织委员会由刘少奇任书记，王稼祥为委员。

这一年的夏秋之际，王稼祥患了严重的肠胃病，住进医院，未能参加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和党的七大。在七大选举中央委员时，由于相当多的代表来自各地，对王稼祥缺乏了解，因而落选了。在选举候补中央委员前，毛泽东在大会上向代表们作了耐心细致的工作，给予王稼祥很高的评价，历述他为中央起草各种文件，在遵义会议和六届六中全会两次关键性的会议中作出的贡献，并建议把他列为候补中央委员候选名单的第一名，希望大家选他。以后，候补中央委员选举结果，王稼祥名列前茅。

工作在东北局

抗日战争胜利后，王稼祥病情仍时好时坏，但他要求继续工作。对于他的健康，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都很关心，安排他担任以叶剑英为组长的北平执行小组顾问，顺便在北平作健康检查。在北平检查，发现在延安时因照爱克司光不慎而得了二度爱克司光烧伤，已经开始溃烂。党中央闻讯后，又让他住进张家口的白求恩附属医院，并特地从延安派去著名外科医生为他医病。一九四六年五月，经中共中央同苏联方面联系，确定由苏联派飞机接王稼祥去治病。同年五月十九日，毛泽东在致聂荣臻（时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并转王稼

祥的电报中说：“现在只有一个稼祥身体能否坐飞机的问题，请稼祥自己决定告我”。毛泽东关切地说：“我意只要身体勉强可以乘机，以去苏医治为上策。”^①

在党中央的关怀下，王稼祥由张家口乘飞机到苏联医治，病情有所好转。这为他以后继续坚持革命工作创造了条件。

稼祥在苏联治病期间，国内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蒋介石先派重兵在东北大打，接着，又于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六日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在关内也打起来，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解放区军民为了保卫胜利果实，奋起进行自卫战争，形势发展很快，到一九四七年二月，就粉碎了国民党的全面进攻。王稼祥密切注视国内形势的发展。当他的病情经过治疗开始好转后，就急于回国参加人民解放战争。他对他的爱人朱仲丽说：现在我身体好了，可以工作了，不能再在苏联待下去了。苏联有关方面为他在海滨安排了一个舒适的疗养场所，被他谢辞了。

一九四七年五月，王稼祥由莫斯科回国，来到哈尔滨。中央决定他留在东北，担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城市工作部部长。当时，中国共产党对城市工作尚无经验，特别是管理象哈尔滨这样的大城市，在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王稼祥对这里的一切也很生疏。但是他知道，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已面临一个伟大的转折，工作中心开始逐步地由农村转向城市，摆在全党面前的迫切任务，就是尽快地制订党的城市工作政策，充分发挥城市的作用，以支援解放战争，夺取全国胜利。

哈尔滨市是东北解放较早的大城市，有六七十万人口，工

^①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271页。

业基础较好，商业、交通均很发达，而且当时前线供给，收容俘虏，安置伤员，训练民兵，都要依靠这个城市。由于有些干部长期战斗在农村，缺乏城市工作经验，不了解城市工作的特点，因此曾一度出现农民进城抓逃亡地主，清算地主、富农在城市经营的工商业，发动工人、贫民起来斗争资本家，把工厂分给工人，侵犯工商业者利益等现象。以致造成生产停滞、市面萧条、工人失业增多的局面，对恢复生产和发展生产都极为不利。针对这些问题，在王稼祥主持下召开会议，认真总结管理城市的经验教训。为了便于分析情况，他要参加会议的十几个同志都带第一手资料。会上，他在听取各方面意见之后，根据党中央颁布的一系列城市工作的政策和指示，严肃地指出，我们在新收复的城市工作中，最重要的是防止收复初期的破坏和混乱。现在和游击战争时代不同，游击战争时代占领城市是临时的，在部队大量补充物资后，随时要撤退；而今天占领城市后，城市中的商店、工厂、房屋建筑、学校、医院，都成了人民的财产。因此，在接管城市后，一定要把城市保护好，把城市保护好就是一个很大成绩。他认为进城后首先要组织市民搞生产，而不能只搞斗争、不抓生产；对于旧政权机构要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改造，不能一下子都“彻底砸烂”，影响城市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一定要限制农民进城乱抓人，搞乱社会秩序。对哈尔滨市委正确做法，如把几个有代表性的大资本家保护起来，并保障他们的财产不受侵犯；同时，又把确属汉奸、特务、土豪劣绅的坏分子，通过群众斗争进行处决等，王稼祥都予以支持，因而稳住了中小资本家，使哈尔滨市的生产迅速得到恢复，社会秩序很快得到稳定，人民生活也安定了下来。

一九四八年六月，王稼祥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城市工作指示精神，结合东北解放区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一个《城市工作大纲草案》，对城市工作的方针政策、施政纲领、经济政策、政权工作、群众工作、建党工作等，都作了详细的规定，强调在城市工作中要坚决执行“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

六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东北局将《大纲草案》发至各省，并通知七月底召开城市工作会议，总结过去工作，讨论《大纲草案》和拟定今后工作方针。对这个《大纲草案》，东北局内部有不同意见。当时东北局的负责人高岗、林彪认为它是右倾思想的代表作，责令将其收回。王稼祥因病而未能参加城市工作会议。会上，《大纲草案》虽然未被通过，可是参加会议的大多数干部认为它是符合中央精神的，其中的一些规定，对恢复和发展生产、保障人民生活都是有利的。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日，沈阳解放。王稼祥随东北局进入沈阳，他被免去东北局城市工作部部长，改任东北局宣传部代部长。

翌年初，王稼祥去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参加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会议期间，毛泽东、刘少奇对王稼祥在东北的工作给予高度评价，肯定了“王稼祥在东北局关于城市工作中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①，并在不久后批评了东北局在对待民族资产阶级政策上的“左”的错误^②。七届二中全会上，王稼祥递补

^①王震、廖承志等，《回忆与继承》，1981年2月4日《工人日报》。

^②参见《中共中央关于民族资本家政策问题给东北局电》（1949年5月31日）。

为中共中央委员。

出使苏联

七届二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由西柏坡迁往北平。为了与苏联商谈有关我国建国方面的问题，党中央决定派王稼祥帮助刘少奇做出国的准备，并调邓力群、师哲、戈宝权等协助他工作。七月二日代表团从北平出发去苏联，主要任务是沟通和加强中苏两国两党之间的新关系，介绍我国革命形势下我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在取得苏联的谅解和支持的基础上，争取苏联对我国的援助。代表团在莫斯科期间，工作十分繁忙，双方连续举行了四、五次会谈，每次都要花去四、五个小时。王稼祥全力以赴，协助刘少奇全面安排代表团的的活动。特别是每次同斯大林会谈之前，都作了充分准备，会后写出纪要向党中央汇报。在王稼祥具体周到的安排下，会谈有条不紊地进行，取得很大成绩，为中苏建交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最后，还对我国在莫斯科筹建大使馆的问题，交换了意见。在圆满完成会谈任务后，同年八月，刘少奇和王稼祥等人回国。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新中国成立，王稼祥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协助周恩来主持我国的外交工作。十月二日，苏联政府正式承认我国，决定与我国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毛泽东亲自推荐熟悉苏联情况的王稼祥出任我国首任驻苏特命全权大使。

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日，王稼祥肩负着为巩固发展中苏友好关系的光荣使命，率领随从人员乘专车离开北京，经过十天的长途旅程，于十月三十一日抵达莫斯科，受到苏联外交部

副部长葛罗米柯、莫斯科苏维埃主席、苏联外交部官员以及各建交国使节的欢迎。

王稼祥到莫斯科后，首先拜会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葛罗米柯，商谈中国大使向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呈递国书事宜，并派曾涌泉、戈宝权去苏联外交部礼宾司，了解呈递国书的仪式和程序。王稼祥非常重视这一工作，为呈递国书作了充分准备。十一月三日上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什维尔尼克在克里姆林宫接见呈递国书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特命全权大使王稼祥。呈递国书仪式完毕后，全体合影。什维尔尼克还单独接见了王稼祥，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谈。

王稼祥任职不久，大使馆接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相继出访苏联的通知。他立即动员全馆人员，为迎接两位领导人的到来，作好一切准备。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六日，毛泽东在苏联驻华大使罗申陪同下由北京到达莫斯科，受到苏联政府高级官员的隆重欢迎，王稼祥也率领使馆全体人员到车站迎接。当天下午，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会见了毛泽东。中苏两国首脑的会见，表明中苏两国人民友谊进入到新阶段。

毛泽东在苏访问期间，王稼祥一直在毛泽东身边，协助他工作，并竭尽全力做好，甚至毛泽东送给斯大林的祝寿礼品，稼祥也都亲自检查。

十二月二十一日，为庆祝斯大林七十寿辰，在莫斯科大剧院举行盛大的祝寿大会。晚上，毛泽东参加了祝寿大会，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祝斯大林健康、长寿。王稼祥和使馆人员也应邀参加。

一月十一日，毛泽东在王稼祥和使馆人员陪同下，拜谒了

列宁墓，敬献了“献给列宁—革命的伟大导师”的花圈，瞻仰了列宁的遗容。

一月十五日，毛泽东在王稼祥的陪同下去列宁格勒游览参观，访问了基洛夫机器制造厂，参观了列宁格勒战线防御工事，晚上在基洛夫歌剧院观看了芭蕾舞。第二天返回莫斯科。

根据参加此次中苏会谈的伍修权、师哲等回忆，毛泽东这次访苏，还希望苏联宣布废除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原中苏同盟条约，另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签订新的同盟互助条约，但未马上向苏方直接表明此意图。而苏方特别是斯大林，鉴于过去过多地干涉我党内部事务，造成强加于人的错误，也未主动提出签订新约，以致双方一度在互打哑谜。王稼祥在了解了上述情况后，作为大使首先向苏联外长维辛斯基透露了毛泽东的意图，促使苏方积极行动起来，着手准备与我国政府签订新的条约，并公开宣布此事。毛泽东也决定由周恩来代表我国政府至莫斯科参加这一工作。在中苏两国这一历史性事件中，王稼祥为沟通双方意图并促成两国进一步友好合作，做出了重大贡献。

一月二十一日周恩来奉毛泽东的指示，率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团抵达莫斯科。王稼祥除陪同毛泽东和周恩来参加拜会和参观活动外，还要为中苏两国领袖和政府会谈，做大量的准备工作。二月初，中苏谈判基本结束，王稼祥又亲自参与指导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苏联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以及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大连的协定的起草、定稿等工作。

二月十四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克里姆林宫正式签订。在斯大林和毛泽东参加下，周恩来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的全权代表，维辛斯基作为苏联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全权代表，分别在条约上签了字。这一划时代事件震动了全世界。从此，中苏两国人民友谊的发展和巩固进入了新的纪元。

毛泽东归国前，我驻苏使馆在“大都会”饭店为毛泽东举行盛大的告别宴会。王稼祥考虑到毛泽东赴苏与斯大林会见，是世界共运史和外交史上的重大事件，全世界都在关注；同时也考虑新中国和毛泽东的威望，于是，他亲自拿着请帖到克里姆林宫会见莫洛托夫，请他转呈斯大林，务请出席宴会，以象征中苏之间兄弟般的牢不可破的友谊。

二月十四日晚上八时半，王稼祥大使夫妇在宴会厅门口迎接来宾。参加宴会的有苏联党政机关最高的领导人和各部门的负责人，有与我国建交国家的外交使节，总数达五百余人。斯大林亲自光临，为宴会增添了友好和热烈的气氛。席间，毛泽东先举杯祝斯大林健康，斯大林也几次举杯祝毛泽东和周恩来健康。此时此刻，王稼祥为完成这一重大的历史使命而由衷地高兴。

二月十七日，毛泽东和周恩来离开莫斯科回国。王稼祥继续同苏联方面谈判，签订了中苏两国建立电报、电话的协定，交换邮件、包裹的协定，在我国新疆创办中苏石油公司的协定，创办有色金属及稀有金属公司的协定，创办中苏民航公司的协定，有关苏联专家在中国工作条件的协定等等，并代表我国政府在协定书上签字。

驻苏大使馆是我国第一个驻外使馆，王稼祥针对使馆人员缺乏外交工作经验的弱点，聘请了苏联外交部有关部门的负责人，系统地为大家讲授外交礼仪、外交文书和法律条约等方面的基本知识，自己也参加听讲，并要求整理出文字资料，在实际

工作中运用和充实，从而为我国外交工作建立了一套制度，也为我国派往东欧等国的外交人员学习外交业务提供了经验。王稼祥还一再强调，外交人员应掌握所在国语言，组织使馆全体人员学习俄文。在他的严格要求和督促下，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使馆工作人员的业务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

驻苏使馆有着严格的外事纪律，一切重要的外事活动，都要向党中央事先请示，事后报告。王稼祥对使馆人员要求也很严格，如参赞和秘书的外事活动，回来后一定要向大使汇报。由于他考虑问题细致周到，工作又严肃认真，因而在驻苏大使工作上做出了出色的成绩。

王稼祥偕夫人朱仲丽来到繁华的大城市莫斯科，仍然保持着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克己奉公的优良作风，他身为首任驻苏大使，但他衣着朴素，精神焕发地出没于各种外交场合。当中央批准使馆工作人员实行薪金制时，他为自己定的工资很低，几乎只相当于使馆司机的薪金，仅够维持两人日常生活。有时为了工作需要，夫人自己动手缝制衣服。王稼祥和夫人就这样在国外节衣缩食过着外交家的生活，用节约的薪金买了一部苏联斯大林汽车厂出的“吉姆”牌汽车，送给国内的中央领导人使用。

一九五〇年夏，王稼祥身体不好，由夫人陪同到捷克斯洛伐克的卡罗维尤利温泉疗养区治疗，后又回到莫斯科住进近郊的疗养院。同年秋后回国，即未返任。当时正当我党国际威望急剧提高，不少国家的共产党，要求同我党建立联系和加强往来。一九五一年初，党中央决定成立对外联络部，作为党中央与其他国际共运和各国兄弟党相互关系和联络事务的常设机构。毛泽东考虑到王稼祥熟悉各国共产党、工人党，特别是

苏联共产党的情况，又富有同外国党打交道的经验，经中央决定，他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兼外交部副部长，负责党中央的国际活动方面的工作。

中联部部长

一九五一年初，王稼祥担负起第一任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的重任。他一到中联部，首先抓了机构设置和干部配备。他提出中联部在机构设置和干部配备上，必须少而精，人员不宜过多，不能搞成庞大臃肿的机构，工作必须讲求效率。因此在他主持中联部工作期间，机构层次少，部下面只设组（后改为处），工作效率是高的。

当时中联部的干部，大部分是从中央统战部调来，缺乏国际知识和外事工作经验。王稼祥要求干部，通晓业务知识，掌握世界各国和各国兄弟党的基本情况，以及工人运动情况。他常对干部说，我们不能满足于一知半解，更不能沾沾自喜，以外行自居。一定要不断地提高国际方面的知识，否则就不可能对国际现象和国际关系进行科学分析，就不可能比较有把握地来掌握党在国际事务中的方针政策。

王稼祥对科以下的业务干部，提出每天最少要写五百字材料给他，逼着大家去钻研业务。开始有许多同志叫苦连天，后来不少干部就是在这个每天五百字的要求下苦练成才，业务提高快，成果出得快，感到有前途有奔头。王稼祥对下属起草的简报和文电，有五个字的要求：即快、准、短、通、雅，尤其要求快和准。他说，不快可能失了时效，不准可能犯错误，这两点一定要做到。

中联部是政策性、业务性很强的机关，王稼祥认为，要完成党交给的联络兄弟党的国际任务，必须正确地掌握党际关系的原則。他根据多年来国际共运的经验，提出了比较完整的有关党际关系准则。他说，我们党同其他国家共产党的关系，用一通句俗的话来说，就是“是一家人，又不是一家人。”我们必须掌握住这个特点来进行工作。我们党和各国共产党都是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奋斗目标的。因此，各国党就象“兄弟”一样，可以称为“一家人”。但是，另一方面，每一个共产党，总是首先代表某一个国家和某一个民族的。每个国家的情况殊异，要制定这个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只能由这个国家的共产党人独立自主地进行探讨和作出决定。因此，各国共产党是独立自主的，是完全平等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又不是一家人”，更不能是“父子党”。王稼祥说，如果不能妥当地处理好“是一家人，又不是一家人”这个关系，那就会发生大国主义或狭隘民族主义的错误。

如何处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王稼祥认为，社会主义国家都是独立的主权国家，因此更应该建立在独立自主完全平等的基础上，发展两国友好关系，这是真挚的友爱的新型的兄弟国家关系，而不是父子关系，不能搞大国主义，干涉别国内政。他在处理兄弟党和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上始终遵循这个原则。

一九五一年四月，王稼祥受中共中央委派去苏联，同以斯大林为首的苏共领导人会谈。第一次与斯大林会见时，在座的还有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等领导人。双方对朝鲜问题、国际共运、亚洲革命形势和中国情况，广泛地进行了交谈。斯大林当时对中国共产党评价很高，甚至说：“联共党了解的主要是欧

洲、西方的情况，亚洲、东方的情况还是中国熟悉。他提出这样一个设想，即：以中国为主建立亚洲社会主义国家的联盟，其根据是小国在建设和防卫方面有许多困难，只有和大国联合起来才能解决这些难题^①。对于斯大林的这个设想如何作出反应，这对王稼祥是一次考验。他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兄弟党、兄弟国家之间关系的方针，用和缓但明确地语气说：“我们不能这样做。”^②在五十年代，敢于对斯大林的意见提出不同见解，是极为难得的。王稼祥坚持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原则立场，赢得了对方的尊敬。斯大林还亲自陪同王稼祥共进午餐。

一九五三年三月，中共中央任命王稼祥为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主任，指导工会、青年团体、妇联以及保卫世界和平组织等群众团体的对外活动。他在一九五五年四月中央国际活动工作会议的开幕词中指出，国际活动委员会工作的目的，“就是争取更多的国际友人，直接间接地影响各国人民的运动，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发展以和平民主社会主义阵营为主体的国际和平力量，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争取一个较长时期的国际和平环境。”^③他要求工作人员认识国际活动的重要性，要学习国际知识，提高国际工作能力，不断总结经验，做出成绩来。在王稼祥的指导下，工、青、妇等群众团体的国际交往活动很有成效地开展起来。

王稼祥在担任中联部部长期间，在处理各国兄弟党之间关系中始终坚持互相尊重，平等相待，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因而

①②林莉：《稼祥同志的革命品格将永远铭记在后代的心中》，
《回忆王稼祥》，人民出版社1985年1月。

③王稼祥：《在中央国际活动工作会议上的开幕词》（1955年4月4日）。

使中国共产党在国际上的威望急剧提高，影响迅速扩大，至一九五六年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就与世界六十多个兄弟党建立了关系。这是在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取得的，同时也充分表明了王稼祥主持下的中联部工作是有成绩的。

一九五六年九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邀请了六十四个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团前来参加，盛况空前。王稼祥担任接待委员会主任，主持整个接待工作。这是一项极其繁重复杂而又十分细致的工作，从发出邀请、组织迎送、安排与领导人会见、参观访问等，都不能有丝毫差错。王稼祥指挥若定，部署有方，日以继夜，不辞劳苦，鼓舞和带动全体接待人员共同努力工作，终于顺利完成了任务，受到各国代表们的高度赞扬。

在党的八大会议上，王稼祥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了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后，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反响，也引起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动荡和混乱。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兴高采烈，乘机在全世界掀起反对共产主义的恶浪。面对这股逆流，作为中共中央参谋机关的中联部，立即投入新的紧张的工作。王稼祥除带领中联部干部搜集、翻译和整理有关这方面的资料，供中央政治局讨论参考外，还对有关斯大林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在中联部多次谈到，斯大林除了犯有肃反扩大化和对个人崇拜的错误外，还对一些国家共产党的内部事务进行干涉。他指出，斯大林犯这些错误是有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的。苏联前身的俄国，是一个落后的小生产占优势的封建帝国。这是个人崇拜和大国主义赖以生存和滋长的土壤。他认为个人崇拜除斯大

林要负责任外，其周围的人包括赫鲁晓夫自己也要负责。指出，赫鲁晓夫丑化斯大林，不仅不能纠正斯大林的错误，而且还会以新的形式发展家长制的大国主义。苏联由大国主义发展为霸权主义的事实，证明王稼祥的预见是正确的。

一九五七年一月七日至十九日，以周恩来为团长的我国党政代表团，访问苏联、波兰、匈牙利，王稼祥是代表团成员。这次出访的任务，主要是交换对波、匈事件的看法。会谈日程和工作安排都很紧张，周总理还在公开场合作了多次演讲。王稼祥作为周恩来的主要助手，主持起草了三个联合声明、两个新闻公报和周恩来的十四次演讲稿，对这次访问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发表了错误的言论，毛泽东决定开展反右派斗争。由于把情况估计得过于严重，发生了扩大化的错误，把大量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一大批人被错划为“右派分子”。此时，刚从苏联回来不久的王稼祥，在领导中联部机关整风和反右派斗争中，实事求是地对于整风鸣放中的言论进行了具体分析，感到尽管中联部也出现了某些违反社会主义原则的错误言论，但基本上还是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基于这种分析，在中联部已有两人被打成右派后，他就及时地把运动停下来，使反右派斗争在中联部没有再行扩大。

一九五八年，毛泽东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起来。王稼祥对此始终保

持冷静的头脑。为了检验自己的思想认识，他日以继夜地研读有关“大跃进”的内部材料和文章，听取从农村参观回来的同志的汇报，同时自己也外出去通县、武昌等地参观。他看到农村刮“共产风”的情况后，心里非常着急，坐卧不安，思考了许多问题，有时甚至失眠。

十一月，在中共中央召开的武昌会议上，王稼祥向中央一位领导同志谈了人民公社办得过早的意见，并请他转告党中央和毛泽东。他的意见在武昌会议上未被接受。回到北京后，他又研究了苏联农业公社问题，更感到我国在组织高级社不到两年，就建立起“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是非常草率的，是不符合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规律的。一九五九年四月，中共中央准备下达一个关于整顿人民公社的文件，明确地提出制止“共产风”，毛泽东特意要中央一位领导同志将此件转给王稼祥过目。王稼祥为自己在武昌会议上提的意见被采纳而高兴。他这种在错误浪潮冲击的时候不随波逐流的精神，表现出了一个共产党员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一九五五年三月王稼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曾说过：“现在共产党当权了，共产党员干部要保持和发展自己的革命性格，为人民服务的无畏精神和共产党人的纯洁品质，并不是没有困难的。象我这样过去犯过错误的人，应当经常控制自己，以所剩不多的‘余年’，做出些有利于党和国家的工作。戒骄戒浮，不做有损于党和国家的事，以便补偿过去的错误，以便去见马克思时，能够手上拿着党和人民的鉴定书，虽然犯过错误，但一般的说，还是一个忠诚的共产主义者。”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一九六〇年，康生开始插手中联部工作，积极地推行

“左”的一套，企图控制中联部。王稼祥对阴险好诈的康生是深有警惕的。对有些不必要让康生插手的事，就尽可能不让他插手。康生三番两次地伸手向王稼祥要机密文件，王稼祥坚决予以拒绝。他说：这些重要文件，如不经毛主席、周总理、邓小平同志批准，谁也不能看。康生怀恨在心，待机报复，在部里散布流言蜚语，挑唆干部对王稼祥不满。尽管如此，他毫不畏惧，对“左”的思潮坚决抵制。他曾语重心长地对张香山说，我过去犯了“左”的错误，那时以为这些“左”的东西很革命，后来算是认识到了，并非如此。“左”的危害很严重，害得红军被迫长征。当然，认识“左”的错误比认识右的错误要难，因为它用革命词藻修饰起来的。识别了，就要同错误划清界线。

一九六二年初，王稼祥考虑到我国连续三年自然灾害，工作上也有严重失误，再加上苏联背信弃义，以及面临的国际环境等等，他在中联部党委会上，就党的对外工作提出一些意见。二月二十七日，王稼祥同中联部两位副部长刘宁一、伍修权联名给周恩来、邓小平、陈毅写信，提出对外工作的方针性建议。他认为：为争取时间渡过国内经济困难，对外有必要采取和缓的方针；建议发表一个全面的对外关系声明，正面地、准确地阐明我们的对外政策；在同帝、修、反斗争时要注意策略；对外援助必须“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王稼祥的这些意见是从当时面临国内国际的情况出发的，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原则的，也是符合党的对外工作基本方针的，并得到中联部党委一致同意，从组织原则讲也没有错。可是，这些正确意见不但未被重视，反被康生诬蔑为中联部在王稼祥领导下搞所谓“三和一少”（即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

和，支持各国革命运动少）。并且自一九六三年起，就不再让他主持中联部工作，他只好在家读书。

一九六六年三月，周恩来要王稼祥带几个人从事国际问题研究，并兼任中央外事小组副组长，稼祥欣然接受。不久，席卷全国的十年动乱开始，这项工作也就无法进行了。

惨遭迫害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康生就直接插手中联部的运动，恶意煽动批判“三和一少”，蓄意把火引到王稼祥身上。一九六七年，康生又说批判“三和一少”不够了，进一步提出批判“三降一灭”（即投降帝、修、反，扑灭各国革命运动），为王稼祥制造了许多可怕的罪名，攻击王稼祥是中联部的定时炸弹。当时，周恩来亲自过问中联部的工作。他向伍修权传达毛泽东的意见：“王稼祥是有功劳的人，现在身体不好，不要揪斗。把人弄死了，只有损失，没有好处”^①，第二天，伍修权在中联部十七级以上的干部会议上，以个人口气传达了这个精神。康生一伙不仅继续残酷迫害王稼祥，并把伍修权打成“王稼祥的黑干将”，惨遭关押八年。接着，中联部一大批老干部，也都遭到种种打击迫害，蒙受不白之冤。王稼祥因忍受不了肉体上和精神上的折磨，处于病危状态。周恩来得知后，立即派杨德中赶到医院，向医务人员转达了他的意见：全力抢救，只能活，不能死。在医务人员解除顾虑后，王稼祥经过精心治疗，才得以活命。

^①朱仲丽：《紧握周总理温暖的巨手——忆周总理对王稼祥同志的关怀》，1979年4月5日《工人日报》。

一九六九年十月，林彪以战备疏散为名，把朱德、陈云、陈毅、叶剑英等大批老干部撤离北京；王稼祥也被赶出北京，下放河南信阳。周恩来知道那里气候炎热，特地派人从徐州送去一只澡盆，并指示信阳地委，要让王稼祥安心休养。一九七〇年冬，王稼祥在信阳患急性肺炎，生命垂危。可林彪、江青一伙令其改名换姓，不让看病吃药，欲将王稼祥置于死地。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医生说服了信阳地委的同志，给毛泽东、周恩来发出电报。毛泽东接到电报，立即批准王稼祥回京治疗。王稼祥回到首都后，住进了北京医院。

王稼祥努力为党工作的精神，一直坚持到他的晚年，甚至在遭受林彪、江青、康生残酷迫害，被隔离、监禁的时候，还多次写信给周恩来，要求在被囚禁的环境中，做一些如俄文翻译等力所能及的工作。当然，他的信是不可能转给周恩来的。尽管这样，他并不灰心，而是主动地在禁闭的小屋子里，以手中仅有的俄文本毛泽东著作，进行俄语对照勘误工作。

一九七一年后，毛泽东和周恩来曾多次提出，要让王稼祥站出来工作，周恩来还曾当面告诉王稼祥，让他组建一个中央外事工作班子，研究外事政策。可是，在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蛮横反对下，王稼祥一直未恢复工作。

一九七一年九月，林彪叛逃、自取灭亡后，王震、陈云、李富春等商量说，毛泽东多次赞扬过王稼祥，中央应该分配王稼祥的工作。于是王震去看望王稼祥，并劝他给毛泽东写信，汇报一下思想情况。王稼祥很快把信写好了，在信中又一次检讨自己在三十年代前期执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的错误，并说自己“为此终身不安”。这封信由王震转呈毛泽东。一九七二年党的九届三中全会期间，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对王

稼祥的一段很长的评价。大意是：王稼祥同志写了一份报告给我。这样的老干部只讲过，不讲功，很难得。应该很快让他出来工作，他是有功的人，他是教条主义中第一个支持我的。王稼祥功大于过。遵义会议没有他不行，后成立了三人军事领导小组嘛，我嘛，你嘛（指周恩来同志），还有王稼祥嘛，夺了王明等人的军权。毛泽东还批示让王稼祥参加老中委学习班，请周恩来办^①。廖承志、王震先后到王稼祥家中，讲了毛泽东对他的评价。王稼祥听了，极为感动。

一九七三年，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王稼祥被选为十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一九七四年初，“四人帮”提出开展所谓“批林批孔”。他们以“大批判组”的名义，在《北京日报》上批判所谓“三和一少”，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和王稼祥。一月二十四日，王稼祥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了这篇转载文章。这天傍晚又接到通知，要他自带粮票去参加“批林批孔”大会。夜里，肖劲光来看望他，又告知江青已派人到海军点火，发动“批林批孔”，一场摧残党的新灾难即将来临。肖劲光饭后告辞时，两人互相叮嘱要多加保重。由于王稼祥处于极度忧虑之中，感到大祸临头，整整一夜不能入睡，心情异常沉重。他深沉地对朱仲丽说：“我深信，这不是毛泽东同志的政策，有人在捣蛋，要整总理，可耻！你要坚定地跟毛主席，跟总理！千万要记住啊！”^②谁知这番话竟成了王稼祥对朱仲丽的临终赠言。凌晨，王稼祥心脏病发作，抢救无效，含恨与世长辞，终年六十

^①王震：《怀念王稼祥同志》，1984年4月4日《人民日报》。

^②朱仲丽：《紧握周总理温暖的巨手——忆周总理对王稼祥同志的关怀》。

八岁。

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在党中央亲切关怀下，一九七九年三月九日，中央对外联络部发出关于所谓“三和一少”、“三降一灭”问题平反的通报，推倒了林彪、江青、康生一伙强加在王稼祥身上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为王稼祥彻底平反昭雪。

附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

1. 1924—1928年王稼祥 16 封亲笔信。
2. 1925 年芜湖《工商日报》。
3. 1930—1931 年《实话报》。
4. 《回忆王稼祥》，人民出版社，1985 年 1 月版。
5. 王稼祥在 1968 年夏撰写的历史自述材料。
6. 《回忆宁都起义》，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7. 朱仲丽：《关键一票的由来——王稼祥同志谈遵义会议》，革命史资料(1)，文史资料出版社出版。
8. 朱仲丽：《紧握周总理温暖的巨手——忆周总理对王稼祥同志的关怀》1979 年 4 月 5 日《工人日报》。
9. 朱仲丽：《追念》，1984 年 1 月《工人日报》。
10. 王震、廖承志等：《回忆与继承》，1981 年 2 月 4 日《工人日报》。
11. 陈文源：《王稼祥同志对党的贡献》，《江淮论坛》，1982 年第 3 期。
12. 石肖岩：《王稼祥与“毛泽东思想”的提出》，《百科知识》，1981 年第 7 期。
13. 1932—1934 年《红星报》。
14. 1939—1940 年《八路军军政杂志》。
15. 1949 年 10 月—1950 年 2 月《人民日报》。
16. 1982 年 12 月在京召开王稼祥生前部分老战友座谈会会议记录。

17. 访问王震、肖劲光、方强、曾涌泉、钱亦民、袁血卒、王斌、马海德、陈光远、郑育之、李质忠、戈宝权和王稼祥夫人朱仲丽等的谈话记录。

18. 参阅中央档案馆等单位提供的王稼祥的电文、会议发言、论文等有关资料。

张云逸

曾傅先 罗永平

张云逸，早年参加辛亥革命，一九二六年参加北伐战争，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后历任红七军军长，中共中央军委副参谋长，新四军副军长，华东军区副司令员，山东军区司令员，中央华南分局第二书记，中共广西省委书记兼广西省人民政府主席，广西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监委副书记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等职，又是党的第七届至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委员^①。

(一)

张云逸，原名张运镒，曾用名张胜之，一八九二年八月十日出生于广东省文昌县头苑区造福乡上僚村的一个贫苦农家。其父张景琚是一个诚实正直的农民，母亲邢氏，勤劳俭朴、和蔼善良，有子女六人。一家八口，只有一亩多水田和一点薄地，不得不租种别人一些田地，生活十分困难。一九一〇年冬，张云逸的母亲邢氏积劳致疾去世。不久，两个弟弟也先后在贫病交加中夭亡。

^① 《张云逸干部档案正本》第1—10页，原件存中共中央组织部。

张云逸是家中的长子，很小就参加各种家务劳动。他的父母希望他能读一点书，摆脱当牛做马的命运，便拚命劳动，省吃俭用，在他七岁时被送进了本村的长发小学，十二岁时又入头苑乡启明高等小学学习。高小毕业后，由于家庭经济更加困难，无法再供他继续升学，他便在家里参加劳动和白学。有一年，在广州当军官的同乡赵士槐回家省亲，看到张云逸聪明好学，劳动勤快，便答应了张云逸四叔张景起的请求，把张云逸带到广州当他的勤杂工。一九〇八年，广州黄埔陆军小学招生，张云逸在赵士槐的支持下报名投考，以优异成绩被录取。在陆军小学学习期间，张云逸和少数爱国学生秘密参加了同盟会。一九一一年夏，他离开陆军小学投身辛亥革命，积极参加了推翻清王朝的武装起义，担任革命军炸弹队队长。清王朝垮台后，一九一二年，张云逸入广东陆军速成学校学习。一九一四年，他从陆军速成学校毕业后，被派到海南杨锦隆部队任排长，后升任连长。一九一五年十二月，袁世凯复辟称帝。张云逸响应孙中山的号召，积极参加反袁斗争。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三年，张云逸任广东香山护沙营营长。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四年，他调任广东揭阳县县长。随后，又到广东军队许崇智部任旅长。

一九二五年七月，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张云逸所在的部队统一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一九二六年七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张云逸参加了北伐战争。由于他作战英勇，被任命为第四军第二十五师参谋长。第四军中的共产党员在北伐战争中冲锋在前，不怕牺牲的精神，使张云逸受到极大的教育，中国共产党的彻底革命纲领，使张云逸认识到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才能消灭人剥削

人的制度。他在党的教育下，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使自己由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迅速成为一个共产主义战士。一九二六年十一月，经王之仁的介绍，张云逸在武汉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在白色恐怖笼罩全国的严重情况下，张云逸根据党的指示，继续留在国民革命军张发奎部第四军第二十五师从事党的秘密工作。他极力推荐和说服张发奎任命共产党员卢德铭为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警卫团团长。七月，第二十五师驻防江西省九江市。由于他的秘密掩护和大力支持，该师大部分人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八一南昌起义。他自己仍留在四军张发奎部队。不久，他随张发奎部到了广州。十二月，在广东的桂系军阀势力李济深、黄绍竑等，与广东军阀张发奎矛盾日益尖锐。张发奎派张云逸带领数百名军队到海南岛，代替黄镇球任琼崖司令。这时，中共琼崖特委正根据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准备领导海南各族人民举行武装起义，夺取琼崖政权。张云逸按照党的指示，计划到海南岛后，进行里应外合，配合海南党组织夺取琼崖政权。但在关键时刻，张发奎在海南岛的驻军某部副团长叶肇被桂系军阀收买叛变。结果，张云逸带领的队伍一上海南岛即被缴械，夺取琼崖政权的计划未能实现。张云逸只身脱险后，经广州取道香港到上海寻找党组织。

(二)

一九二八年上半年，党中央准备派张云逸和一批共产党员到苏联学习。在他快要动身的时候，国内局势发生了新的变

化，一场新的军阀混战正在酝酿。根据这个新情况，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军事部部长杨殷，在这一年的八月两次找张云逸谈话，向他传达党中央的决定，要张云逸准备到广西去开展革命工作。

一九二九年春，第一次蒋桂战争结束后，桂系军阀首领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被迫下野。同年七月，俞作柏就任广西省主席，李明瑞任广西绥靖司令。俞作柏、李明瑞在大革命时期受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同情革命，他们掌握政权后，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请求中共派干部来广西工作。中共中央为了发展广西革命力量，派邓小平为代表到广西做上层统战工作和领导广西全盘工作。随后，共产党派遣一些同志，通过各种社会关系进入广西，开展革命工作。

一九二九年五月，张云逸根据党的指示，从上海到达香港，同当地党组织接上了关系。负责同他接头的叶季壮，为他开了到广西去的组织关系介绍信。随后，他就从香港到了广州。当时任广东省海军总司令的陈策，是张云逸过去的好朋友，辛亥革命时，他们同是炸弹队的队长。张云逸到广州找到了陈策，陈只知道张云逸在北伐时是张发奎的部下，但不知道他是共产党员。因此，陈策为张云逸写了到广西去向俞作柏找事做的介绍信。张云逸遂于七月间顺利地到达南宁。这期间，先后到达广西的共产党员还有叶季壮、袁任远、李干辉、袁振武、李谦、冯达飞等。他们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同原来在广西工作的雷经天、韦拔群等一起，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开展做俞作柏、李明瑞的统战工作。

俞作柏、李明瑞在共产党的影响和支持下，把共产党派来的干部安排到他们的军政机关中任职，释放和任用了被桂系军阀

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逮捕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人士；解散了被反动派把持的国民党各级党部，逮捕了一批桂系军阀在地方政权中的反动骨干分子，下令开放工农群众运动。共产党利用这些有利条件，大力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发展工农运动和学生运动。

党又通过俞作柏的弟弟（李明瑞的表弟）、共产党员俞作豫，促成李明瑞开办了一个训练初级军官的教导总队，张云逸任教导总队的负责人。一个多月后，他又兼任了广西警备第四大队的大队长。广西警备第五大队的大队长则由俞作豫担任。为了把教导总队和广西警备第四大队这两支旧军队改造成为新型的革命军队，张云逸根据邓小平的指示，采取了一系列坚定、果断的措施，使这两支军队的面貌在短时间内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首先，紧紧地掌握了教导总队和广西警备第四大队的领导权。教导总队是由李明瑞管辖下的三个师抽调来的班、排长组成的，全队有一千多人，设有三个营九个连。张云逸任教导总队负责人后，根据共产党的指示，把广东和广西地方党派遣来的工人、学生党员大部分都安插到各连里当干部和学员，使九个连的干部都是共产党员，排长也由学员中思想比较进步的人担任。广西警备第四大队是李明瑞回广西后，收容土匪、民团、散兵游勇编成的，成份复杂，纪律涣散。张云逸兼任大队长后，呈请李明瑞将共产党员李谦委任为副大队长，随后，张云逸又在教导总队和第四大队各个连建立了共产党的秘密支部，形成党的秘密领导核心。对于教导总队和第四大队中的反动军官，张云逸分别采取“升迁”和撤换两种办法，来剥夺他们的实际指挥权。那样，教导总队和第四大队的各级领导权就完全为共产

党所掌握了。

其次，开展士兵运动，充分发动群众。张云逸在第四大队中成立士兵委员会，对广大士兵进行民主教育，发动他们起来揭发反动军官的罪恶，使广大士兵的觉悟迅速提高，更加拥护共产党的主张。张云逸还在党内强调，每个共产党员都要以身作则，密切联系群众，处处作群众的榜样。他自己身为少将级军官，却毫无架子，和士兵打成一片，许多士兵有话都愿意和他谈。通过和广大士兵的接触，党组织及时了解士兵群众的思想，有针对性地进行教育，并从中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发展新党员，壮大党的队伍。短短的两个多月里，教导总队即发展了三百多个新党员，占全总队人数的三分之一，第四大队也发展了许多党员。

第三，张云逸在改造这两支旧军队的过程中，还十分注意从组织上增加工农成份的比例。特别是在第四大队，由于大量吸收工人、农民和进步学生参军，使部队在一个月里，就从原来的一千多人扩大到两千人。

在张云逸的直接领导下，经过全体共产党员的紧张工作，几个月后，教导总队和第四大队的面貌就焕然一新。从而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为后来的武装起义创造了条件。

（三）

一九二九年九、十月间，俞作柏、李明瑞不听中共党的劝告，仓促决定与张发奎联合反对蒋介石，率领军队进攻亲蒋的广东军阀陈济棠。我党决定利用这个时机，大胆发展我们的力量。张云逸根据党的决定，以教导总队和广西警备第四、第五大队

是新建部队，没有训练好和需要保卫后方为理由，向俞、李提出让这些部队留守南宁，维持后方治安。俞、李同意这个意见，只从教导总队调走三百多人回各师去，并委任张云逸兼南宁警备司令。张云逸便利用这个职权，接管了省军械库等机关。

俞作柏、李明瑞的部队出发后，张云逸根据党的指示，把第四大队的一个营派到右江地区，准备今后的工作；第五大队也派出一个营到左江去作准备。十多天后，俞、李的反蒋斗争因他们手下的几个师长如吕焕炎、杨腾辉和黄权等被蒋介石收买叛变，宣告失败。消息传来，在教导总队中引起很大骚动，加上一些坏分子的煽动，许多人闹着要回原部队去。当晚，张云逸召集各支部的干部开会研究对策，决定第二天分小组开会，党员参加到各小组去，揭露坏分子的阴谋，宣传革命的光明前途，争取大多数人站到共产党这边来。经过一天的辩论和斗争，少数坏分子孤立了，大部分人认清了是非，解除了顾虑，愿意跟党到右江去干革命。但仍有一些人要走。为了进一步做好思想工作，张云逸在小组斗争胜利的基础上，又召开了教导总队全体学员大会。他在会上讲话，指出革命是光荣的，反革命是可耻的。每一个人要走什么道路，应当慎重地选择。他对大家说：“有些同学还是要走，这也可以，我们革命部队是由有革命觉悟的人组成的。现在就站队，愿意跟我们去右江继续革命的，站在这边，愿意去投降反动派的，站在那一边”^①。重新站队的结果，愿意跟随共产党到右江的，有五百多人，加上三百多名党员，一共八、九百人，坚决要走的是一些

^①张云逸：《百色起义与红七军的建立》，载《星火燎原》第1卷（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反动军官、兵痞和坏分子，只有一百人左右。

接着，张云逸根据党的指示，组织部队和民工，把省军械库里储存的五、六千支步枪以及山炮、迫击炮、机关枪、电台和堆积如山的弹药，搬上了汽船，由邓小平率领党委和在地方作秘密工作的同志及警卫部队，溯右江而上。张云逸带领着教导总队和第四大队，从陆路掩护前进。俞作豫等带领第五大队到左江去。这样，几千人的武装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几天之内胜利撤出了南宁，到左右江去开辟革命根据地。

十月二十二日，张云逸率领教导总队和第四大队到达百色。邓小平在百色召开党委会议，决定公开宣传共产党的主张，进一步发动群众，整顿和补充部队，组织和武装群众，继续清洗部队中的反革命分子。会议还决定利用旧有的督办官衔，宣布张云逸为右江督办。

会后，张云逸同其他领导同志一道坚决贯彻党委会的决定。首先，他们在部队中宣传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实行官兵平等，建立士兵委员会，发扬民主，反对军阀制度，反对虐待士兵，惩办了一些一贯克扣军饷、打骂士兵的反动军官。这些措施大大推动了部队的民主改革，进一步提高了广大官兵的政治觉悟和革命积极性。接着，他们将部队分散到各地，配合地方党组织，发动群众。在有工作基础的地方，还通过地方党组织，将枪支发给群众，领导群众开展对地主恶霸分子的斗争，没收其财产分给群众。在部队和地方党的共同努力下，右江地区的工会、农会组织恢复了，革命群众运动蓬勃发展。群众政治觉悟大大提高，纷纷报名参军，部队迅速壮大。张云逸还以右江督办这个公开的行政长官名义，通知右江各县县长、税务局长将全部税款上交，为武装起义准备了经费。

右江地区的地主、豪绅对此十分仇恨。他们到南宁去勾结反动的广西警备第三大队到右江驻防，以对付革命群众运动，企图消灭革命武装力量。我党决定先发制人，智歼反动的第三大队。十月二十八日，张云逸以右江督办的名义，“邀请”第三大队头目熊镐到百色“商谈防务”，在宴会上捉拿了熊镐。与此同时，张云逸等又秘密调集恩阳、奉议等县农军配合驻平马的第四大队的一个营，向第三大队发动攻击，将其全歼，粉碎了敌人妄图扑灭右江革命烈火的反革命阴谋，为举行百色起义扫清了障碍。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中共中央关于在左右江地区创建革命根据地、创建红军的指示传到了百色，中央颁给了红七军的番号并委任了负责人。邓小平召开党委会议，传达中央指示，经过讨论，决定在广州起义两周年纪念日宣布起义。会议结束后，邓小平带领一部分干部到左江地区去部署龙州起义事宜，随后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张云逸则领导右江地区军民加紧继续进行百色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

十二月十一日，在中央代表邓小平和张云逸、雷经天、韦拔群等的领导下，百色起义胜利举行。这天一早，百色城里红旗招展，锣鼓喧天，鞭炮齐鸣。部队集合到广场上，庄严宣布起义和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宣布了党中央的任命：张云逸为红七军军长，邓小平为政治委员、前敌委员会书记，陈豪人为政治部主任，龚鹤村为参谋长。军部下辖三个纵队：第一纵队司令李谦，政治部主任沈静斋，第二纵队司令胡斌（后由冯达飞接任），政治部主任袁任远，第三纵队司令韦拔群，政治部主任李朴。接着，身穿灰色新军装、衣领上系着红带子的红军指战员，排着整齐的队伍，走上街头，欢呼起义的胜利；

工人、农民和学生挥舞彩旗，引吭高呼，欢声动地庆祝自己的解放。这一天，还在平马召开了右江第一届工农兵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了右江工农民主政府，雷经天任主席。平马五万多军民集会，热烈庆祝右江工农民主政府和红七军的诞生。张云逸代表中共红七军前委参加了平马的庆祝大会，并在会上讲了话。右江军民沉浸在一片欢乐之中。

红七军诞生和右江工农民主政府成立后，百色、东兰、凤山、恩阳、奉议、恩隆、恩林、果德、隆安、向都、镇结、凌云等县也相继建立了工农民主政府和赤卫军。

百色起义前，李明瑞从龙州来到百色，邓小平、张云逸代表党组织对他进行了耐心的教育。他表示愿意留在革命队伍里工作，随即返回龙州，参与领导龙州起义工作。一九三〇年二月一日，龙州起义爆发，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和左江革命委员会，俞作豫任红八军军长，邓小平兼任政治委员，何世昌任政治部主任，李明瑞任红七军、红八军总指挥。随后，左江地区的龙州、宁明、上金、明江、崇善、左县、雷平、养利、凭祥等县也相继成立了革命委员会。

红七军、红八军的诞生和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开创了广西革命斗争的新局面。它给了广西反动派以沉重的打击，给灾难深重的广西各族人民带来了希望。

（四）

面对左右江地区革命斗争的蓬勃发展，广西反动派惊恐万状。桂系军阀首领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经过密谋策划，于一九三〇年二、三月间，调集大批反动军队向左右江地区发动猖狂进攻，妄图把革命军队和新生的革命政权扼杀在摇篮里。

二月四日，敌以五个团的兵力向我右江根据地前线城镇隆安进攻。我军驻隆安的只有红七军第一纵队部和一个营，情势非常危急。张云逸和李明瑞带领红七军主力，从百色、果化等地日夜兼程赶赴前线，六日到达隆安城外，立即投入战斗，使守城部队得以冲破敌人的重围转移到城外。由于双方力量过于悬殊，张云逸和李明瑞在取得了消灭敌军五百多人的胜利之后，带领部队撤出战斗。接着，我军又在马鞍山、亭泗战斗中予敌重创。隆安、亭泗战斗后，张云逸和李明瑞带领红七军指战员到东兰、凤山一带休整。敌军占据了我右江沿岸城镇。

三月初，张云逸等红七军前委领导人在凤山县盘阳乡召开会议，总结前一段斗争的经验教训，研究部队今后的行动计划。为了扩大红七军的政治影响，避开敌人主力的锋芒和在游击战争中消灭敌人，武装自己，前委作出红七军主力到外线出击的决策。三月底，红七军第一、二纵队进驻河池县。随后，张云逸和李明瑞带领第一、二纵队到广西、贵州边境进行游击战争，韦拔群等率领第三纵队留在右江，保卫和建设根据地。邓小平到中央汇报工作后，于三月底回到东兰武篆，同韦拔群一起领导右江的土地革命。

四月上旬，张云逸等率领红七军第一、二纵队占领了怀远镇。在这里召开了几千人的群众大会，张云逸在大会上讲话，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压迫、剥削人民的罪行，阐明我党的方针政策和部队的纪律。当地老百姓眼见我军指战员爱护群众，秋毫无犯，高兴地说：“红军对老百姓很好，张军长的队伍非常和气，没有官架子。反动派的宣传是假的。”^①

^①张云逸：《回忆漫谈广西革命斗争情况》（1960年2月）未刊，存广西档案馆。

四月三十日，张云逸率部到达贵州的榕江城外。榕江是贵州军阀的后方，囤积着许多军需品。当时贵州军阀正与湖南军阀在湘黔边境打仗，城里只有一个副师长带领六百多名武装防守。我军到达这里后，立即发起攻城战斗。敌人仓促应战，凭借优良的武器和坚固的城墙作掩护，进行顽抗。红七军军部提出了“攻下榕江，纪念五一节”的战斗口号，张云逸、李明瑞亲临前线指挥，我军士气高昂，反复猛烈冲击，终于在当天下午攻克榕江。五月一日，红七军召开万人群众大会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张云逸在大会上讲话，宣传我党的纲领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中国工农红军要领导人民进行土地革命，打土豪、分田地，主张公平买卖，保护商业交通。会后，又把没收地主官僚得来的衣服、粮食等分发给贫苦人民。我军在榕江战斗中缴获了几门大炮、六百支步枪、十多万发子弹、一部电台及其它军用品，并筹得军饷数万元。这次胜利，鼓舞了我军的斗志。部队在榕江休整几天之后，即回师右江，于五月上旬在河池同邓小平等会合。

六月初，张云逸和李明瑞率领红军攻打百色。这里自二月被敌人占领后，已成为桂系军阀在右江的一个反革命大本营，四处碉堡密布，炮台林立。我军抵达百色城外，先以山炮、迫击炮轰击，而后一、二两个纵队齐头并进，向敌人穿插迂回，摧毁了敌人城外的据点和许多小碉堡，侦察人员已经进入市区。但是，敌人依仗城北山上的一个大碉堡进行顽抗，战斗直到第二天下午仍未解决。张云逸、李明瑞等亲自到离敌人很近的山顶上观察敌情，研究新的作战方案，命令把山炮拉到距敌人只有五百米远的山顶上来进行平射，同时命令一个排在敌人碉堡二百米远的死角处埋伏待命。当李明瑞总指挥亲自瞄准、

亲自开炮，连续两炮打中敌人大碉堡时，我埋伏的攻击部队立即突起进攻，消灭了大碉堡里的敌人，所有部队分路冲进了城。这次战斗消灭敌军三百余人，缴枪三百多支，敌团长岭建英化妆坐船逃走。百色城又重光了。

收复百色后，张云逸等率部乘胜前进，连续解放了右江沿岸的恩隆、思林、奉议等县。随后，红七军前委决定在右江地区开展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根据地建设，同时加强红军主力部队和地方部队的建设。经过三个月的努力，土地革命得到深入发展，红七军的政治素质、军事素质亦进一步提高。根据地农民的政治热情空前高涨，纷纷报名参加红军和赤卫队。接着，红七军第四纵队成立。我军的力量空前壮大。

（五）

一九三〇年九月二十四日中共党在上海召开的六届三中全会上，停止了李立三等组织全国总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行动，中共中央结束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统治。但是因为交通阻滞，六届三中全会的决议未能及时传达到右江革命根据地。十月，张云逸等依照中央代表邓岗传达的六月政治局会议通过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将红七军第一、二、三、四纵队分别从平马、东兰等地调到河池。十一月七日，在邓岗的主持下，红七军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在河池召开，按照中央打下柳州、桂林，在广东小北江建立革命根据地，阻止两广军阀向北增援，然后夺取广州，以保证全国红军首先夺取武汉的命令，通过相应的决议，提出了“打到柳州去”、“打到桂林去”、“打到广州

去”的错误口号。会议改选了红七军前委，会后，红七军集中整编，张云逸任军长，邓小平任政委，李明瑞任总指挥。原四个纵队整编为十九、二十、二十一三个师。红八军第一纵队剩下的几百人从龙州经过艰苦转战到达右江，在河池也编入了红七军。二十一师师长韦拔群根据党的决定，将大部分人员、武器拨给十九、二十师后，带领少数武装人员回东兰重新组建二十一师，在当地坚持革命斗争。

十一月中旬，张云逸等率红七军第十九、二十师从河池出发，执行中央交给的任务。部队在东进中占怀远，攻四把，打长安，大战武岗城。由于敌众我寡，力量悬殊，红七军攻打敌人重兵据守的城镇，连遭挫折。特别是在广西的长安和湖南的武岗等地进行的长时间的攻坚战中，部队受到重大损失，许多指战员壮烈牺牲。张云逸和广大指战员对“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的不满与日俱增。一九三一年一月二日，红七军进占全州县城后，召开了军前委员会，少数人仍然坚持攻打桂林的错误主张。邓小平、张云逸和前委的多数同志正确地总结了几个月来的经验教训，决定取消攻打柳州、桂林，最后夺取广州的冒险计划。会后，邓岗、陈豪人离开红七军去上海。邓小平主持召开了部队的政治工作会议，分析形势，统一大家的认识。前委会议和政工会议的精神传达后，广大指战员明确了方向，增强了信心，鼓舞了斗志。随后，红七军前委带领部队沿湘桂粤边界前进，准备到中央苏区与毛泽东、朱德领导的中央红军汇合。

一九三一年一月，部队离开全州，经湖南的道州、江华，到达湘桂边界的桂岭。在这里，军部根据减员情况，将十九、二十师缩编为五十五、五十八两个团。一九三一年二月初，梅

花村遭遇战之后，红七军在广东乐昌附近的杨溪渡河时，又遭到从乐昌和韶关两处赶来的敌军的袭击。邓小平、李明瑞率领五十五团和五十八团一部分人员渡过了乐昌河，同敌人展开激战，掩护后续部队渡河。因敌军不断增兵，已渡河的部队被迫撤退，我军被截为两部分，张云逸带领的五十八团一部和卫生队、休养连、供给处等七、八百人未能过河。敌人从河对岸向我军猛烈射击，我未渡河的部队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张云逸临危不惧，沉着坚定，在敌人封锁了渡口之后，亲自去探索路径。由于敌情极其严重，天色已晚，已无立即渡河的可能，他便带领部队撤退到三十多里以外的山村休息，同时派出人员到梅花村去同地方党联系，争取协助。没有过河的部队大部分是伤病号、后勤工作人员。而要到中央苏区，还有艰巨的战斗任务。必须加强部队的战斗力，轻装前进。第二天清晨，张云逸把部队集合起来，对大家说：“同志们，咱们面前有两条路，一条是被敌人消灭，一条是战胜敌人，去找中央红军！大家看走哪条路好？”几百人齐声答道：“找中央红军去！”张云逸接着说：“对！这是唯一的出路！可是到处有敌人阻拦我们，追击我们，几个连的战斗人员能对付得了吗？不能！因此，我希望每个共产党员、每个革命战士，都要武装起来，用实际行动告诉敌人：我们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是打不垮拖不烂的！”^①张云逸的话震撼着每个人的心，队伍里立即沸腾起来，共产党员、革命战士、炊事员、饲养员、卫生员、伤病员一个个振臂高喊：“给我枪！我要战斗！伤病员把手里的棍子摔掉了，拿起了烈士留下的枪杆。残缺不全的五十八团很快重新组织起

^①莫文骅：《回忆红七军》，广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0页。

来，由黄子荣任团长。张云逸率领这支满怀胜利信心的队伍，又踏上了征程。经过几天的急行军，他们到达乐昌河上游，在地方党组织和群众密切配合下，终于在乐昌和坪石之间顺利地渡过了乐昌河。

新组建的五十八团进入湘南后，敌人的堵截和追击有增无已，几乎每天都要在翻山越岭和频繁的战斗中渡过。无论情况如何紧张，每次部队出发前，张云逸都坚持作思想鼓动工作，使指战员明确行军的路线和目标，勉励大家百折不挠地去争取胜利。行军时，有敌情，他走到队伍的前面，了解情况，指挥战斗；无敌情，他走在部队的中间和后面，同干部、战士谈话，鼓舞他们的斗志。他强调在行军中要注意适当的休息，到达宿营地后一定要抓紧时间煮饭吃，以保证广大指战员有充沛的精力行军作战。在张云逸的坚强领导下，部队团结一致，坚定不移地朝着中央苏区的方向前进。

一九三一年二月中旬，张云逸部到达湖南酃县的黄泥潭。这里山峦重叠，地势险要，是红色游击区，有党的组织、红色游击队和人民政权。他们热烈欢迎五十八团的到来，纷纷送来吃的、穿的和日常生活用品，游击队员们还主动给部队站岗、放哨，让指战员得到充分的休息。不久，汝城土霸、民团团总胡凤璋带领一千多地主武装进犯黄泥潭。张云逸充分利用这里险要的地理条件，把部队隐蔽在有利于伏击敌人的半山腰中。当敌军进入山沟，刚停下来煮饭时，他一声号令，指战员立即象猛虎一样冲下山去，向敌人进攻。我军的凌厉攻势和周围游击队的呐喊助战，使敌人陷于一片惊慌混乱之中。只用了半个小时，即将敌人击溃，杀伤、俘虏敌人近百名，缴获枪支百余支。而我军却无一伤亡。

在黄泥潭休整十多天后，张云逸率领五十八团依依不舍地离开了这里的人民和游击队，继续前进，二月底，他们在水口镇与王震领导的湘赣红军独立一师第三团会合，一起向湘赣边区的永新前进。三月中旬，当我军进入湖南茶陵县李家村游击区时，遭到湖南军阀何键部两个团的阻击。敌人占领了两个山头，处于有利位置。张云逸统一指挥五十八团和独立一师第三团，从正面和左侧向敌人控制的山头发起攻击。敌人居高临下，向我军疯狂扫射，战斗十分激烈。红军战士多次奋力向山顶挺进，但因敌军在数量和武器装备上占绝对优势，屡屡不能得手。为了避免消耗，张云逸毅然作出抽兵迂回敌后奇袭敌人的决定，命令五十八团第四连执行这一任务。四连指战员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迅速穿过敌我阵地间的田坝，攻占敌军控制的小村庄，从敌人的后方冲上山头。在我军前后夹击下，敌军阵脚大乱，迅即溃败。我军乘胜追击，大获全胜。此役歼敌三百多人，俘虏百余，缴获大批军用物品。接着，我军在张云逸和王震指挥下，先后占领了茶陵、攸县和酃县，取得了一系列战斗胜利。五十八团的威名在湘赣边区大震。

三月下旬，张云逸和王震率领红七军五十八团和湘赣独立师第三团到达中共湘赣省委所在地永新城，受到党、政府和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慰问的人群络绎不绝。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中，艰苦转战数千里来到这里的五十八团指战员，犹如到了母亲的怀抱，倍感亲切和温暖。湘赣根据地的红军，除独立师外，还有红二十军。会合后，为了统一指挥赣江以西的红军部队，湘赣省委决定成立河西总指挥部，由张云逸任总指挥，曾炳春任政治委员。

一九三一年四月初，为了牵制敌人兵力，配合中央红军粉

碎敌人的第二次“围剿”，张云逸指挥五十八团、独立一师和红二十军进攻敌人盘踞的吉安县永阳镇，歼灭了大量敌军。

永阳战斗后，张云逸率部回到永新城休整。随后，经湘赣省委同意，张云逸又带领五十八团南下寻找红七军五十五团。五十五团过乐昌河后，在邓小平、李明瑞的领导下到达崇义。后来前委决定邓小平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部队由李明瑞等率领到达湘赣边区后，也在找五十八团。两个团终于在永新县的天河重新会合。不久，张云逸得了重病，随军治疗和休息。李明瑞代理河西总指挥职务。接着，红七军在永新召开了第二次党代表大会，总结了红七军从广西到江西行军作战的经验教训，宣布到中央苏区与中央红军会合的任务已经完成，今后的任务是为保卫与扩大中央苏区而斗争。五月中旬，红七军、红二十军和独立一师在张云逸、李明瑞的领导下，攻打安福县，取得了消灭敌军一个团，活捉敌人八百，缴获枪支近千的重大胜利。接着，红七军又与兄弟部队紧密配合，连克茶陵、安仁、酃县、遂川等县。红七军在湘赣边区的对敌作战，保卫和发展了湘赣边区革命根据地，有力地配合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军民粉碎敌人的第二次反革命“围剿”。

一九三一年七月，张云逸和李明瑞奉命率领红七军开往赣江以东，在于都县桥头圩与中央红军会师。从此，红七军成为中央红军的组成部分。会师不久，红七军领导人张云逸、李明瑞在瑞金北面的壬田寨，受到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和总司令朱德的亲切接见。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和工农民主政府对红七军的战绩给予高度的评价，特授予“转战千里”的大红锦旗。

(六)

张云逸、李明瑞率领的红七军同中央红军会师后，于一九三一年七月划归红三军团建制。这时，由于张云逸重病未愈，中央任命李明瑞为红七军军长，张云逸任参谋长^①。张云逸服从组织安排，带病工作，当好配角。根据中央要部队分兵发动群众的决定，张云逸曾带小部队到于都打土豪分田地。十月，由于肃反扩大化的错误，李明瑞蒙冤不幸牺牲后，中央又决定张云逸为红七军军长。十二月，张云逸由红七军调到中央军委，一九三二年一月十一日被任命为中国工农红军最高裁判所委员。一九三三年五月三十日，军委任命张云逸为总司令部一局局长兼第一方面军副总参谋长^②。在这期间，张云逸还担任过粤赣军区司令员^③。张云逸在中央军委一局工作期间，对我军的建设和战略战术的研究作了许多工作。一九三三年五月和九月，他在《红色战场》上曾先后发表《战斗指挥研究事项》、《大战和小战以及游击战的动作怎样分别》等文，强调指出每个指挥员在接受上级任务后，必须对指挥战斗的有关事项从头到尾进行研究和了解，并作充分的准备，才能做到“胸有成竹”。还说，必须将大战和小战及游击队战斗的不同点加以研究和区分，否则必然不能取得战斗的胜利。他特别强调游击战的任务除完成军事任务外，主要是完成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为被压迫工农谋解放；强调游击队的战术是出没无常，游动不定，乘敌不备猛行攻击，无一定的目标，常在敌兵

^{①②③} 《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第168、169、193、199、208页。

力薄弱处动作，来去无踪，使敌人无从捉摸，向敌人攻击时，要秘密迅速，才能取胜。这些观点，对于反对当时王明所推行的“左”倾冒险主义军事路线有一定意义。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日，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李济深等，发动了福建事变。他们以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为旗帜，在福建公开宣布反蒋抗日，并愿同红军停战，联合反蒋抗日。事变前，福建方面曾派代表同红军谈判，十月二十六日红军代表潘汉年和十九路军代表徐名鸿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根据协定的第一、二、七等条款中关于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暂时划定军事疆界线、双方恢复交通、贸易等有关规定，党中央派张云逸作为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代表和方方作为福建省苏维埃政府代表到福建汀州具体谈判划分边界及交通贸易来往等问题。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张云逸同福建方面谈判后，以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代表身份同福建人民政府闽西善后处代表陈小航签订了《闽西边界及交通条约具体规定》。此规定由正文十七条、附约四条和备忘录组成，主要内容是对划分闽西地区的双方界线和相互交通、贸易来往等问题作了具体规定。十二月，应十九路军的要求，中央派张云逸作为红军军事联络员到了福州。以博古为首的党中央派张云逸去，不是要他真正去协助福建人民革命政府，而是要他去拉十九路军的部队到红军这边来。张云逸到福州时，十九路军由于蒋介石的进攻和得不到红军的援助，已经决定放弃福州；陈铭枢、蒋光鼐悄然去港，李济深也准备在一两日内离去；蔡廷锴的锐气也已完全丧失。当张云逸到福州会见李济深时，李劈头就问：“你们部队什么时候出动？”张云逸回答说：“五军团已经出动，现在到哪里，还不知道，我可打电报去问。”这

时，李济深知道红军援助无望，脸色马上变得阴悒。面对他们的悲观情绪，张云逸鼓励说：“红军即使不能赶到，只要保持有生力量，事情还大有可为。第一步可以退到泉州，第二步可以退到漳州。最后，我们背后还有这么大的苏区，不管蒋介石有多大的兵力，也奈何我们不得。”但这时李济深等已无心再图进取，蔡廷锴从前方回到福州后，就布置撤退，很快放弃福州，率司令部渡过乌龙江，退到莆田，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就这样迅速被蒋介石摧毁了。后来，张云逸在《一次重大的失策》一文中总结福建事变的教训时曾指出：由于十九路军领导人的软弱动摇，空喊民主口号，不知道发动和组织人民群众与广大士兵，其失败早在意料中。但是，假如我们利用这个大好形势，积极帮助他们，使这个从敌人内部分化出来的反蒋抗日力量，得以生存发展。这样，不但是粉碎蒋介石对我中央苏区第五次“围剿”的关键之一，抗日高潮也会来得更早。可是，由于“左”倾的错误领导，竟把这个有利时机错过，这样就使蒋介石在消灭了十九路军之后，得以驱军南下，继续围攻中央苏区，以致苏区大部沦丧，中国革命战争濒于绝境，不得不进行长征。

在长征中，张云逸开始在八军团任参谋长。八军团在冲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即突破湘江的战斗中，遭到严重损失。在黎平整编了部队，五、八军团合编为五军团，取消了八军团番号，张云逸又调回中央军委任军委副参谋长兼一局局长。在此后的长征途中，张云逸协助军委领导同志作组织侦察、部署军事，收容部队等工作^①。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二日，当红军从

^①1982年3月19日访罗若遐谈话的记录，1982年3月31日访侯正谈话记录。《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第203页、228页、280页。

湖南进入贵州时，张云逸亲自带侦察队进行前站侦察，设法找到几个贵州农民作为红军向贵州进军的向导^①。年底，在强渡乌江的战斗中，张云逸随同刘伯承参谋长赶到江边，经过实地侦察，决定佯攻大渡口，主攻上游五百米处小道，并利用时机，抓紧架桥。根据这一部署，二师四团在耿飏团长、杨成武政委的带领下，于一九三五年元旦佯攻大渡口，主攻小道没有成功，入夜又用三个双层竹筏偷渡，仍未成功。一月二日凌晨，张云逸带领红军工兵营来到二师四团，说明当时追踪我军的薛岳纵队已离我军不远；形势危急，军委要求四团迅速完成渡江任务，工兵营归四团指挥，担负架桥任务。他一再强调，如果不能渡江，势必只有背水一战，这对我军非常不利。四团听了张云逸带来的情况和军委的要求后，情绪激昂，纷纷请战，愿作最大牺牲渡过江去，确保党中央和我军主力安全渡江。拂晓时，四团以六十多个竹筏强渡，在头晚先行偷渡过江的几个同志的配合下，强渡成功，控制了乌江渡口，接着后续部队胜利地渡过了乌江，并乘胜占领了遵义城。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后，在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的军事路线指引下，红军摆脱了被动局面，继续进行长征。

长征途中，张云逸同周恩来同在总部机关一个党小组里。虽然战斗紧张，工作繁忙，但他们仍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党的组织生活。一九三五年八月底，红军过了草地来到两河口一带，总部机关的党组织决定利用暂短的休息时间进行一次整顿。在改选党小组长的会上，张云逸提议由魏国禄担任，周恩

^①见1934年12月12日张云逸给朱德、周恩来的亲笔信，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来含笑说，很好，同意。大家都表示赞成^①。对张云逸这种始终以普通党员身份自觉过基层党小组生活的事，后来毛泽东曾在一次会上表扬说：张云逸同志从不以为自己是领导干部就可以不过组织生活，或不尊重职务比他低的小组长，反而处处以身作则，尊重党小组长的工作，带头参加组织生活，向党小组长汇报自己的思想，自觉交党费，执行党小组的决议。张云逸同志是模范共产党员^②。

中央红军同四方面军会合后，由于张国焘反对党中央北上的正确方针，公开分裂党和红军，党中央于一九三五年九月上旬，毅然率中央红军主力组成北上先遣支队（又称“陕甘支队”）北上，张云逸在北上先遣支队中任副参谋长^③，协助叶剑英参谋长工作。

一九三五年十月，党中央和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十一月，红一方面军番号恢复，张云逸仍为红一方面军副参谋长^④。十一月三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张云逸被委任为该委员会后方办事处参谋长^⑤，协助办事处主任周恩来工作，具体负责管理后方供给、运输、医院、学校、地方武装及地方兵站等事项。

一九三六年二月，为了打通抗日路线和巩固扩大现有苏区，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将红一方面军主力部队和原在陕北的红军组成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以彭德怀为总司令，毛泽东为政委，叶剑英为参谋长，张云逸为

①魏国祿：《随周恩来副主席长征》第37页。

②参见《冯白驹将军传》，《琼岛星火》1981年第3期。

③④⑤《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第240页、246、247页。

副参谋长，渡河东征^①。东征期间，张云逸在后方负责联络、后勤工作。一九三六年五月初，为了避免全面内战爆发，保存抗日力量，争取国民党政府抗日，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现，中央决定东征红军回师陕北，在红军西返时，组成了以张云逸为司令员的渡河司令部。他亲自布置，并到黄河边检查、督促，直到认为已完成了渡河的一切组织准备工作后，才电报毛泽东、彭德怀^②。由于渡河西返的准备工作做得好，东征红军顺利渡河西返，使陈诚率领的进攻红军的部队扑了空，只好望河兴叹^③。

为了保卫和扩大陕甘革命根据地，迎接红军三大主力会师，进一步争取和团结一切愿意抗日的武装力量，党中央于一九三六年五月十四日决定中央和陕北红军西征。在西征中，相继占领了十余座县城，开辟了九个县的新根据地，张云逸到新占的游击根据地侦察，并将情况电报毛泽东、周恩来，提出：为了发展和加强米脂、横山等地的游击战争，使敌不能西进，我须派兵坚决打击和消灭进占宁条梁之敌。他还协助中央调遣部队向宁条梁方面加强侦察警戒^④，张云逸为巩固和扩大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做出了贡献。

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七日，中央军事委员会进行改组，张云逸为委员^⑤。张云逸在陕北担任军委副

① 《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第248页。

② 1936年4月8日张云逸给彭德怀、毛泽东、林彪、聂荣臻电，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③ 1982年3月6日访问姚杰记录。

④ 1936年7月6日张云逸给毛泽东、周恩来电报，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⑤ 《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第262页。

参谋长期间，对于军委机关的建设也颇多建树，诸如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五日，他根据军委的决定同叶剑英一起制定发出了无线电技术人员津贴标准^①；一九三七年二、三月间，他以军委编委会代主席的名义根据二月十六日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编委命令，对军委后方机关和部队进行缩编工作，裁减了冗员，提高了工作效率，节省了经费，改善了机关、部队的伙食^②，等等。

(七)

为了争取地方实力派和各界人士，促成全国抗战，党中央派张云逸到华南进行统一战线工作。一九三七年四月，张云逸离开延安到西安的路上，和周恩来、孔石泉等同行，当汽车行至延安以南的劳山时，遭到国民党组织的武装土匪的袭击。张云逸临危不惧，他一面协助周恩来指挥护送少数部队还击敌人，一面护卫着周恩来冲出匪徒的包围向密林深处撤退。由于红军援兵及时赶到，匪徒仓惶撤走，张云逸和周恩来得以安全脱险。五月，张云逸不顾个人安危，又踏上征途，从延安到达香港，从事华南的统一战线工作。

为了掩护工作，张云逸将离别多年的夫人韩碧和儿子张远之接到了香港。先期到港工作的云广英夫妇和稍后到港工作的林青，也搬到他那里同住。在港期间，张云逸利用各种关系和场合，对在港的爱国民主人士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促进团结抗

^①叶剑英、张云逸：《关于无线电技术人员津贴新规定的通知》。

^②张云逸：《军委后方机关与部队编制经过情况报告》（1937年3月2日）。

日。这年十一月下旬，主张联共抗日的爱国将领杨虎城从欧洲归来，路过香港。张云逸作为中共中央驻港代表拜访并宴请了他，向他转达了我党欢迎他同我们共筹抗日的意见，希望他经武汉会见周恩来和到延安去。但杨虎城当时对蒋介石的反动本质还认识不足，准备和蒋会见。他从香港到长沙后，就落入特务头子戴笠之手。此后，被长期监禁。解放前夕，惨死在蒋介石的屠刀之下^①。

一九三七年六月，张云逸由香港到广西桂林从事统战工作。由于得到了在李宗仁手下工作的刘仲容的帮助，张云逸很快就同李宗仁、白崇禧取得了联系^②。在六月十二日的初次会谈中，李、白表示同意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愿意团结抗战。事前，张云逸从刘仲容那里了解到，由于李、白同陈济棠曾于一九三六年掀起反蒋抗日的“六一”运动，遭到蒋介石的围攻，直到此时，对蒋仍然不满。他们愿同我方合作抗日，是经李、白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决定的。因此，张云逸认为李、白的谈话是有诚意的^③。再次会谈时，李宗仁原则上已同意我党提出的巩固国内和平，实现民主和团结抗战等主张，并同意由张云逸同桂方几个高级干部具体讨论如何巩固和平、实现民主和团结抗战的具体方案^④。这时，四川省主席刘湘也因受蒋介石的欺压，自知无力单独抗蒋，想联络各方力量，抗蒋自卫，并派张斯可作代表来桂联络。经李宗仁介绍，张云逸又同

①1982年3月2日访问林青记录。

②《刘仲容遗稿》，《文史资料选辑》第73辑第35—36页。

③张云逸致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电（1937年6月13日），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④张云逸致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电，（1937年6月16日）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张斯可见面会谈。六月十三日、十六日，张云逸两次致电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汇报了上述会谈情况。六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致电张云逸，同意他在港桂的活动方针，并指示：第一，应坦白向李、白说明，只有以抗日、民主与蒋介石比进步才能生存发展，如以军阀政策与蒋介石比前后，则只有失败。第二，我们联蒋也只有抗口与民主的道路上去推动，他如挑拨内战不仅无益，也不可能。第三，为了扩大蒋在庐山函请谈话的范围，应设法推动粤、桂、港各方政治人物应约前往，并请他们在与蒋谈判中，注意宣传我党的救国纲领：要求开放爱国言论，释放政治犯，召开国民大会讨论救亡任务，大会代表应扩大并由各地团体推出候选人，由国民政府聘任等等^①。张云逸根据这一指示，连日与桂系当局及四川代表讨论，拟出了巩固国内和平、实现民主和团结抗战的纲领草案七条，其要点是：巩固和平和统一，实现民主政治，团结抗日，收复失地；充分接纳各方抗日领袖主张，召开国民会议；树立抗日旗帜，扩大抗日宣传；开放民众抗日运动，改善人民生活，释放政治犯，开展国民会议制宪运动，国民会议代表名额，应分配于各党派指定；各抗日力量彼此团结互助，以充分力量推动中央领导实现抗日，不得含有分裂民族统一战线的意图^②。这几项协议草案于六月二十六日电报毛泽东后，毛泽东于次日即复电表示：纲领草案是对的，我们赞成本此去做，并促请桂方向粤、港、沪各方也努力去做^③。

七七事变爆发后，张云逸依据党中央和红军将领的通电精

①②原电均存中央档案馆。

③1937年6月27日毛泽东致张云逸电，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神及中央指示，对桂系当局及各团体进行统一战线工作。桂方各抗日团体均同意一致通电抗日，李宗仁经与张云逸面谈后，即同意致电华北及南京中央政府表示支持抗战。四川的刘湘由于屡受蒋介石的欺压，对蒋是否有抗日诚意，深表怀疑，向我方电询对七七事变的主张。张云逸与刘湘派驻桂林的代表张斯可商谈，张斯可表示满意我党做法。他将我党宣言全文转回四川，还邀请张云逸去四川与刘湘详谈。七月十三日，张云逸将上述情况电报毛泽东。由于当时华北形势危急，李宗仁要留他在桂林面商对策。因此，他在电报中建议中央最好另派一得力同志去川^①。七月十四日，毛泽东电复张云逸，强调在全国存亡关头，又是蒋及国民党转变政策的关头，此时各方任务应一方面促成蒋建立全国抗战之最后决心；一方面应自己真正的准备一切抗日救亡步骤。为了促成蒋的抗战决心，各方应表示诚意拥护蒋及南京政府抗日，不可有牵制之意。毛泽东在复电中告张云逸：中央已派李一氓去川，他不必去了，以后仍来往于桂、粤、港之间。电报具体指示他在桂再工作若干天之后，便请李宗仁介绍去广州，以便对余汉谋做工作，求得他们允许我方在广州设立办事处，赞助抗战，实现国共合作，开放爱国运动^②。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张云逸在桂林同李、白商谈实现抗战的实际步骤后，于八月到了广州，同广东当局商谈。张云逸向广东当局阐明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要他们赞同国共合作，实现民主和抗战，停止对我闽粤边区和游击队的包围和进攻，依照中共中央的指示，改编南方红军游击队，开赴前线

^①1937年7月13日张云逸致毛泽东电，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②1937年7月14日毛泽东复张云逸电，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抗战。但粤方只同意停止双方军事冲突，指定我军活动区域；给我们在边区公开和半公开活动等^①。后经张云逸多次同余汉谋谈判，余汉谋表示同意国共合作，全面抗战^②，允许我党在广州建立八路军办事处。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张云逸和云广英在广州筹建了八路军办事处，由云广英担任主任。办事处在张云逸领导下，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宣传党的政策，办理我军有关事宜，取得了成绩。

一九三七年十月一日，中央将南方各游击区工作方针电告张云逸等，强调南方各游击区是今后南方革命运动的战略支点，这些战略支点是十年血战的结果，应该十分重视。国民党时刻企图拔去这些战略支点，在西安事变后，还用全力以屠杀方法拔去它们。这个方法失败之后，现在又想利用抗日题目把它们拔去。中央指出，把各区游击队完全集中，对我们十分不利。我们应采取下列步骤，达到保存这些战略支点，同时又答复了国民党的目的：一、原则上不拒绝集中，但必须由中央派人传达方针，各区游击队调动前，邻近周围二百里内之驻军保安队，民团应首先调动参加抗日，至少同时调动，往后不能再让部队去；按照附近驻军、民团保留数目，保留游击队数目，以保护原有游击区内之游击队员家属；游击区实行民选制度；土地关系不变；国民党不得派任何人、任何部队移入及破坏游击区。二、国民党首先要把何鸣部人、枪交还^③，方能谈判各游

^①1937年8月张云逸关于与粤方商谈问题的请示电，此件存中央档案馆。

^②1937年9月11日张云逸致毛泽东电，此件存中央档案馆。

^③1937年7月16日，我闽南游击队独立第3团领导人何鸣，接受粤军157师要求，将该团撤离根据地，到潭浦县城集中，被粤军全部缴械。

击区问题。三、张鼎丞、何鸣、刘英之部原地不动，就地抗战和为保卫游击区及土地而战。四、游击队集中之时，该集中部队的领导及作战指挥，国民党不得干涉，不得插入任何人^①。

一九三七年十月中旬，张云逸奉命去福建向邓子恢等传达中央的上述指示，由林青以秘书身份陪同。他们乘货船离开香港，经过一昼夜的海上颠簸航行，到达厦门，又从厦门取道漳州转抵龙岩。此前，闽西的党和游击队根据党中央和南方工委有关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方针政策，已在群众中大力开展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宣传活动，得到了广大群众和地方开明绅士的同情和支持。在同福建当局和驻闽粤军达成的协议中，我军一部分开到龙岩城东之雁石，一部分移驻苏邦，向雁石靠拢。但国民党却趁此散布流言，说我们“未奉命即驻雁石，企图进攻龙岩城”等等。闽西红军游击队在此进退两难的情况下，张云逸带来了中央指示，使邓子恢、张鼎丞感到心里踏实了。张云逸在传达中央指示后说：“中央准备在南方也编一个军，一定要保持我们队伍的独立性，不编给国民党，他要打、就打，不怕他；他要收编我们做不到，不然就再上山和他们干！当然为了顾全抗日大局，我们还是应该尽量地争取和平。”^②邓子恢、张鼎丞等根据中央指示精神，研究了当时闽西的形势，明确认识到龙岩专署是在制造摩擦。为了避免不利的形势，决定将驻雁石的队伍撤到苏邦，并向龙岩商会和群众说明，为了和平，团结抗日，情愿从雁石撤到苏邦的道理，揭穿了国民党说我们

^①中央关于南方游击区工作方针的指示（1937年10月1日），该件存中央档案馆。

^②1982年3月2日访问林青记录。

要进攻龙岩城的谣言^①。这支队伍后来组编为新四军第二支队。

张云逸还深入闽西部队了解情况，宣传党的政策。在了解了闽西红军游击队的干部情况后，他对当时担任组织科长的陈茂辉说，当前日本要灭亡中国，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我们要顾全大局，同国民党合作抗日，这是一个伟大的战略转变。为此我们要做艰苦的工作，要依靠广大骨干，向干部战士和群众讲清道理，以便改编和集中部队，实现同国民党合作抗日^②。

张云逸在福建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又奉命到澳门迎接叶挺，请他就任新四军军长。叶挺于十一月下旬到南京八路军办事处，会见了叶剑英，年底到延安会见了毛泽东，详细商谈了组建新四军的事后，于一九三八年一月初到南昌。一月六日，新四军军部在南昌成立，叶挺为军长，项英为副军长，张云逸为参谋长兼第三支队司令员。

一九三八年二月，张云逸奉命再次去福建，同福建国民政府谈判红军游击队集中北上抗日，在福州成立新四军办事处和追回何鸣部人枪等问题。他偕同王助及秘书、机要警卫人员、记者十余人，于二月九日从南昌出发，十一日到达崇安，经南平乘船前往福州。过古田县时，与国民党县长洽谈了闽东红军游击队叶飞所部第六团北上抗日的问题（该团于同年秋由叶飞率领进入苏南抗战）。二十三日，他们到达福州，当即与陈仪进行了谈判。次日，张云逸偕同王助接见福州记者发表了谈话。据二十五日的《福建民报》报道：张云逸将军这次“奉

^①《闽西三年游击战争》，载《星火燎原》第4集第223—228页。

^②1981年5月25日访陈茂辉记录。

命……来闽，时王助部下正集中江西待命，张为编组，即与王助从闽北到福州。到福州后，张参谋长即与陈仪接洽一切，将队伍开赴前方杀敌”。经过张云逸的谈判斗争，陈仪同意在福州设立新四军驻福州办事处，并释放了七八名被捕的共产党员，归还了被国民党缴去的闽中游击队的人枪。二月底，新四军驻福州办事处正式成立，由王助任办事处主任。随后，张云逸又从福州到漳州，交涉追回何鸣部的人、枪问题。经过多次抗议、交涉，福建省当局和粤军被迫归还了三百多支坏枪。张云逸还在闽南收集了失散的一百多人、枪，一并带到闽西，交给了张鼎丞。以后，这部分队伍编入了新四军第二支队第四团第一营^①。在福建期间，张云逸还到闽北地区动员游击队下山集中。以后他将这支队伍从福建带到安徽岩寺。行军途中，这支部队在张云逸的领导下，认真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受到沿途群众的欢迎和称赞，这就有力地揭破了国民党对我军的种种造谣诬蔑。一路上，张云逸经常深入班排，详细询问有无掉队的指战员，每到宿营地都嘱咐战士用热水洗脚，亲自去探望病员，要医生及时诊治和煮稀饭给他们吃。张云逸不仅在生活上关心干部、战士，而且在政治上要求严格，发现有缺点或错误的干部、战士，就及时批评教育。干部、战士都觉得他是一个可亲的长者^②。新四军第三支队的组建工作，就这样在张云逸的辛苦奔波和反复斗争下胜利完成了^③。

张云逸在华南进行的统一战线工作和新四军的组编工作，

^{①②}1981年5月27日访问张炎记录。

^③1982年3月30日访问朱云谦记录。

对于团结南方各派力量，在抗日、民主的道路上，实现全国团结抗战，对于保存和发展我南方各游击战略支点的力量，作出了贡献。

（八）

一九三八年二至四月间，新四军在江南的各支队先后到达皖南岩寺地区集中整训，待命开赴前线杀敌。整训中，张云逸强调治军先治干。他说：有什么样的干部就会带出什么样的部队，因此，对干部的训练尤要严格。他要求干部保持三年游击战争时期艰苦奋斗的精神，搞好官兵关系、军民关系，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用实际行动教育战士，反对游击习气。他既重视部队的政治教育，又抓紧部队的军事训练，认为平时训练多流汗，战时打仗才能少流血。他对怎样投弹、怎样刺杀、怎样骑马等军事技术训练都抓得很严格很具体。经过整训，使部队从过去分散游击、比较自由、散漫的状态向正规化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张云逸在皖南期间，积极拥护并坚决贯彻中央关于东进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的方针。他为了支持第一、二支队东进江南敌后，将所率的第三支队第六团调归第一支队领导，自己率领第三支队立即进入皖南前线展开对敌作战，以策应一、二支队东进。一九三八年十月，国民党第三战区强令第三支队担任青戈江阵地防务。对这一“借刀杀人”的阴谋，项英不敢严正抗拒。张云逸和谭震林领导第三支队以机动防御方式与敌周旋，先后取得了清水潭、马家元等战斗的胜利，毙伤敌伪三百余人，终于坚持了这个阵地。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张云逸遵照党中央、

毛泽东的指示，率军部特务营抵达江北无为地区。活动在江北的新四军第四支队，按照中央向津浦路东敌后挺进的方针，打了一系列胜仗，于九、十月间攻克了津浦路西的庐江、无为、襄安等城镇。武汉沦陷后，国民党军纷纷溃退，正是我军向津浦路东发展的大好时机，但这时四支队领导人高敬亭却以就地巩固为由，不愿继续东进。张云逸这次到江北，就是传达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督促高敬亭率领四支队继续东进的。十二月中旬，张云逸到达四支队司令部所在地舒城的东汤池，对高敬亭进行耐心的说服、教育。同时又以坚决认真的态度向四支队广大干部传达贯彻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和中央的东进方针，强调军队要服从党的领导。他还派干部深入各团，做干部、战士的工作。对拥护党的东进方针、如实反映情况而被打击、排挤的干部，张云逸采取了极慎重的态度处理。他一方面向高敬亭说明，军部和四支队都应执行中央的东进方针，干部要求积极执行中央的东进方针是对的，不应指斥和打击；另一方面动员被打击、排挤的干部回四支队工作，团结高敬亭共同贯彻中央的东进方针^①。一九三九年一月，在张云逸的推动下，第四支队恢复了由于项英的“精兵主义”错误的影响而被解散了的第九团建制，以詹化雨为团长，胡继廷为政委；还办了一个教导大队，训练干部，把受过训练的干部派出去搞武装，扩大队伍。

在这期间，张云逸还到驻全椒县大马厂的八团团部，在团党委会上讲话，说明他来江北的任务一是督促四支队东进敌后，直到东海岸边为止，要求八团要团结高敬亭东进；二是传

^①1984年4月4日访问李资平的谈话记录。

达六届六中全会精神。他要求四支队要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指出没有山地，平原也可以打游击，而且津浦路两侧也有山，地势好，可以打游击。因此，要开展津浦路西的游击战争，路东也要先去一部分力量，打开局面，逐步建立路西路东根据地。他还说明，要开展游击战争，没有根据地不行，要建立根据地，没有武装也不行。他指出，国民党不发饷，我们部队没有供给，只靠募捐和没收大户汉奸的财产不行，必须做群众工作，派区长、县长，建立根据地政权，成立税收机构搞税收。在张云逸的推动下，当时八团对执行中央的东进方针是比较坚决积极的^①。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张云逸由谭知耕等陪同，到当时安徽省政府所在地的金寨，向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兼安徽省政府主席的廖磊进行统一战线工作。由于张云逸早年参加辛亥革命和北伐战争，在国民党军队中尤其是在桂系军队中有较大的影响，因而受到廖磊的尊重和敬仰。廖磊还邀请张云逸在群众大会及干部训练班中宣讲了国共合作和游击战争问题。但谈到新四军的活动时，廖磊虽表面上表示支持，实际上却加以限制。说什么，你们没有供给，兵要精，不要多。张云逸说，我们的力量不是多了而是少了。你们为什么要住在大别山，不住在安庆、合肥；蒋介石为什么要到四川，而不到上海、南京，就是因为中国的抗日力量不够嘛！张云逸还说，你们不给我们发饷，发枪，叫我们怎么去同日本鬼子打仗？你们还限制我们部队在津浦路西三十里以内活动，叫我们怎么去开展游击战争^②。经过张云逸反复工作，廖磊终于同意以下几

^①1982年7月24日访问张翼翔的谈话记录。

^②1984年4月4日访问李资平谈话记录。

点：四支队向淮南及津浦路南段活动，在三个月内开拔完毕，留下一部在无为与军部联络；经费由省政府发给，还拨给一些军需服装；同意江北游击总队以地方名义成立，报五战区李宗仁批准。但他仍想限制我军发展，规定军饷不得就地自筹；要尊重国民党政府的行政系统，不得收缴民枪^①。对于双方抗战分区地域的问题，也未解决。

张云逸同廖磊谈判后，为解决经费的具体拨发问题，又去找当时任安徽省财政厅厅长的章乃器。章乃器按国民党政府承认的四支队两个团和一个游击纵队的建制发给（后来李品仙接任安徽省主席，下令停发）。

张云逸由金寨返回无、庐地区后，以合法名义，以他从江南来的军部特务营为骨干，并将无、庐地区党领导的一部分游击队和人民自卫军统一整编为江北游击纵队，以孙冲德为司令员，黄岩为政委，桂蓬为政治部主任，担负开展皖中地区的抗战任务。

经过中央和新四军军部的一再指示和张云逸的一系列工作，四支队的绝大多数干部要求执行中央的东进方针。在此情况下，高敬亭于一九三九年春同意率部东进到淮南路东沿线合肥众兴集一带，但以后又停止前进，在高敬亭的错误尚未纠正，国民党又加紧对我军限制的重要时刻，项英又屈服于国民党的压力，在四月间，对江北工作作了错误的指示：军事上要控制津浦、淮南两铁路；“政治上以巩固扩大统一战线为主”，“避免单独活动形式”，不宜“单纯”扩大部队等，给张云逸在江北的工作带来很大困难。党中央及时地批评了项英的这些

^①见1939年1月7日项英、周子昆给中央的电报。

错误，先后于四月二十一日、四月二十四日，发出“关于发展华中武装力量的指示”和《关于建立皖东抗日根据地的指示》。中央指出：华中是我党发展武装力量的主要地域，在战略上是联系华北华南的枢纽，关系抗战前途甚大，蒋介石已批准成立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我应利用此机会作发展的布置；除指挥我原有武装外，更有建立和发展新的队伍之任务。中央还指出：目前我党我军在皖东的主要任务是：建立皖东抗日根据地。因此，我们必须长期努力进行统战工作，坚决打击汉奸和顽固分子，尽力扩大党和群众运动，推动地方政府进步，在军事上必须在坚决消灭汉奸、土匪部队，打击日寇中迅速扩大和巩固我军，成为皖东抗日武装主力，并积极向东、向北发展，建立后方，而不是单纯的以控制两条铁路为目的。要大大发展地方党，开办教导队与党的训练班，分派干部到每个县区去建立县委、区委，发展地方武装与民众运动，要特别注意推动地方政府进步，努力求得同志和进步分子作县长、区长、联保主任，对坚决反对我党我军的顽固分子必须实行坚决的斗争，不要轻易让步。中央的这些指示，给张云逸以很大的鼓舞，在工作方向上也更加明确了。根据中央的指示，张云逸先后到四支队各团和江北游击纵队做工作。他再次到八团驻地全椒县的余家圩子传达了中央的方针，并准备以八团为基础成立五支队，开展津浦路东的游击战争，以彭雪枫部为基础在淮北成立第六支队，同时准备成立江北指挥部，统一指挥四、五、六支队^①。在张云逸的领导下，当时八团和江北游击纵队对执行中央的东进方针比较积极、坚决。因此，除江北游击纵队仍坚

^①1982年8月19日访问张翼翔谈话记录。

持在皖中地区进行游击战争，保持与军部的联系外，八团先在淮南路以东津浦路以西开展游击战争，站住脚后，以一营和团警卫连及程明远的游击队合组成挺进团，由成钧任团长，于四月进到定远、风阳、嘉山交界地区，开展游击战争。一部分过了津浦路东。在张云逸的推动和广大干部的支持下，七团也越过淮南路，进入皖东地区。但主力九团和四支队司令部仍留在舒城、无为之间。

四月底，新四军分委决定叶挺军长带领邓子恢、罗炳辉、赖传珠等过江北，五月初到达庐江东汤池，五月五日正式宣布成立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任命张云逸兼江北指挥部指挥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兼政治部主任，张劲夫为副主任。同时成立江北指挥部前委，张云逸为前委书记，统辖江北新四军和江北游击纵队。

六月下旬，根据中央指示，对江北指挥部及四支队等部队成员作了调整。徐海东为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第四支队司令员，未到任前由戴季英代理四支队司令员，郑位三为政治委员，林维先为参谋长。辖第七、九、十四三个团，约四千余人；以原四支队的八团为基础，加上十五团和挺进队组建第五支队（国民党政府未承认）。七月一日，第五支队正式于定远藕塘宣布成立，罗炳辉为司令员，周骏鸣为副司令员，郭述申为政治委员，方毅为政治部主任，赵启民为参谋长，辖第八、十、十五三个团共约二千余人。随叶挺北来的第二支队四团一营编入江北游击纵队，担任军部与江北指挥部的联络。

为了进一步对桂系驻安徽当局做统一战线工作，张云逸同叶挺于七月七日动身往金寨县。十一日、十三日，由叶挺、张云逸分别同廖磊会谈。叶挺主要谈军事问题；张云逸主要谈政

治问题，向廖磊分析了皖东的敌、我情况和当时的抗战形势。廖磊在会谈中，仍企图限制我军的扩大，指出要少设兵站等。张云逸逐一解释，并向廖磊提出，请他通令各地今后如有与我军关系问题，应向我在该地最高指挥员交涉解决，若解决不了再向上级报告，但情报要确实，我军活动地区，要发动民众抗战，不能无原则地限制我军活动；我军活动地区的民众武装要归我统一指挥；协助我方合理筹备给养；要发八月份补助费等。以上各项廖磊附一解释后大多同意，只对民众武装归我统一指挥仍有保留。这次会谈，廖磊比较冷淡，但从结果看，双方还有团结的愿望^①。

七月十五日，张云逸同叶挺返回江北驻地指挥我江北部队作战。新组建的五支队，分三批开往津浦路东以半塔集为中心，积极发动群众，宣传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十月，胜利地伏击了来犯的日军，并占领了来安县城，初步开展了路东抗战的局面，开辟了以半塔集为中心的津浦路东根据地。四支队于七月整编后，在新的支队领导成员率领下，也在淮南路东开辟了以定远的藕塘为中心的津浦路西游击根据地。江北指挥部也于七、八月间从东汤池迁到藕塘大桥三王家。江北游击纵队充实后，仍坚持在巢县、无为地区抗战，扩大武装力量，保持与皖南军部的交通联系。一部分进到和县、含山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并大力进行争取小刀会的工作。至此，张云逸领导我江北部队初步完成了向皖中、皖东敌后实施战略展开，广泛发动游击战争的任务。

张云逸到江北后的一年中，以坚决执行中央指示的态度，

^①1939年7月15日叶(挺)张(云逸)致项(英)并转延安、重庆电，
《关于叶、张与廖会谈结果》。

经过耐心慎重的的工作，终于克服了来自右倾错误的阻挠，开展了统一战线工作，发动了群众，扩大和充实了四支队，新成立了江北游击纵队和新四军第五支队。到一九三九年十二月，新四军江北部队发展到七千人，加速了东进的进度，初步完成了皖东敌后抗战的战略开展任务，为进一步创建皖东根据地作了计划并打下了基础。

但是，这一时期由于受项英执行王明右倾错误的影响，根据地政权的建立未能采取坚决措施，以致大江以北，淮河以南，淮南路以东，运河以西我军活动之十余县中，依然为顽固派反共政权及反共地方武装所盘踞。由于没有根据地政权作依托，部队的供给没有保障，生活十分困难，使抗日游击根据地和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受到了限制。

（九）

一九四〇年一月，党中央批准张云逸、徐海东、邓子恢等为中原局委员，并同意新四军的四、五支队及李先念部队归中原局统一领导指挥。徐海东是先年十一月底偕同刘少奇从延安到达皖东江北指挥部所在地定远县大桥镇的。刘少奇到江北指挥部后，相继召开了三次中原局会议，次第传达了党中央于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二月和一九四〇年一月发出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其主要精神是要求整个江北新四军广泛猛烈地向东向北发展，把发展武装力量作为一切工作的中心，在今后一年内中原局至少发展到十万人枪，同时要发展十倍于正规军的有组织有训练的抗日自卫军。而要建立这样大的武装力量，没有政权是不行的，因此，必须以坚决和逐步的计划极力争取豫东、皖

东、皖北、苏北等地的大部分政权归入我们与进步人士的手中。这是一个严重的斗争过程，因此，不能避免摩擦，要在有理有利的条件下给武装进攻者以反击，绝对不轻言退让；我们应极力争取一切进步的和比较进步的势力共同建立抗日根据地，并争取中间势力中立。要使全党干部都明白这个正确的发展路线，才能造成猛力向前的作风，才能实现这个计划。强调集中一切力量为发展武装建立根据地而斗争乃是最主要的任务。张云逸同徐海东、罗炳辉、邓子恢、赖传珠等江北指挥部和支队领导人，在一九四〇年一月前后根据这些精神和刘少奇的具体指示，对各项工作做了全面的布置，将四、五支队分区展开于路东和路西，抽调干部和战地服务团组成大批民运工作队（组）深入农村、城镇，放手发动群众，组建各种群众组织，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猛烈扩大部队，组建民兵游击队。五支队进入津浦路东后，以半塔集为中心，以团为单位，分兵于周围的天长、扬州、六合、仪征、来安、滁县、嘉山、盱眙等八县开展活动，群众工作，统战工作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各团兵力也得到了充实和扩大，还建立了支队特务营、教导大队，粉碎了日军对来安等地的“扫荡”，迅速的打开了津浦路以东的抗战新局面^①。四支队在徐海东的领导下，经过进一步整顿，团结了干部，振奋了精神，以藕塘为中心迅速开展工作，根据地发展了，部队也扩大了，群众也进一步发动和组织起来了。十二月，当日伪向我滁县、沙河集、全椒等县“扫荡”时，张云逸同徐海东、罗炳辉一道商量研究，决定采取“诱敌深入”，“敌退我进，敌守我攻”的战术，在徐海东的指挥

^①周骏鸣、郭述申：《半塔保卫战》，见《老战士诗文集》第1集。

下，于二十一日取得了周家岗战斗的胜利，共毙伤俘敌军一百六十余人，敌被迫回窜原防，我乘胜收复了周家岗、复兴集、大马厂、古河等地^①，取得了我军在皖东首次反“扫荡”的重大胜利。从此，我军威震皖东，树立和扩大了在群众中的威信和影响。我军在津浦路西的游击根据地也扩大到定远、凤阳、嘉山、寿县、滁县、全椒、和县、含山等县；四、五支队由原来的七千余人发展到一万余人。这期间，在蒋介石的策划下，国民党顽固派在皖东挑起了更大的摩擦，逐步扩大了对我军的进攻。

一九四〇年一月，国民党皖东专员李本一，先是给张云逸来函，说奉命要将新四军江北部队南调，并指斥我军向民间勒派粮款，不尊重地方行政系统，组织扩大游击队妨碍征兵等。对此，张云逸于二月二十三日复函李本一，坚决拒绝要我军南调的无理要求，并一一驳斥了李本一对新四军的种种诬蔑。他在复函中还揭露了皖东国民党顽固派的种种反共行径，要求其明令制止^②。

但是，李品仙、李本一不顾我党的抗议，竟在皖东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进攻，欲将我江北部队完全消灭，切断新四军与八路军联系，并使江南新四军处于无退路境地。二月底，国民党滁县县长樊公纯率常备队数次向我四支队七团进攻。戴季英奉张云逸令亲赴前方解决，屡经交涉要其退还人枪，均置之不理。李本一还捕杀我军人员数十人及优秀青年数百人。三月四日至七日，李本一不顾我一再呼吁和平停止冲突，竟指挥所部

^①1960年7月许祖范、钟恩道、汪庆报访问张云逸谈话记录，安徽省委党史办公室提供。

^②张云逸：《论皖东摩擦》，1940年抗战书局出版。

第十游击纵队两千余人由古河出发，配合国民党皖北行署主任兼第十二游击纵队司令颜仁毅率两千人及定远县常备队五、六百人从定远出发，分三路向大桥我江北指挥部、四支队司令部及后方机关进攻，扬言要驱逐新四军离开皖东。与此同时，苏北顽军韩德勤也忙于调集兵力，准备向我津浦路东的第五支队进攻。这一东西夹击的形势，严重地威胁着皖东我军的生存和发展。刘少奇、张云逸召集会议研究对策。他们在干部会上说：现在敌人向我们进攻了，这次摩擦仗非打不可。要打就一定打好、打赢，要坚决打退敌人的进攻，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为了打好这一仗，张云逸同刘少奇、邓子恢、郑位三等组成了领导机关，一连几天废寝忘食，日以继夜地研究制定作战方案，决定首先集中四、五支队主力于津浦路西反击对我威胁最大而战斗力较弱的地方武装，以求巩固路西阵地，尔后再挥戈向东，击破韩顽的进攻。三月七日，我七团在界牌集附近击溃了由南向北进攻我指挥部的李本一部，将他们逐回古河。五支队主力及苏皖支队密切配合攻克滁县的施岛集，打掉了滁县的保安队；十四团在北面攻入定远县城，接着又和九团合兵击溃了来援的定远县常备队五、六百人，还消灭增援定远的颜仁毅部主力于高塘阜，生俘其支队副司令以下数百人。至此，路西顽军主力大部被歼，无力再袭击我军。在我军占领定远县城以后，遵照中央指示精神，建立了华中的第一个县抗日民主政权，张云逸以江北指挥部名义委派魏文伯担任定远县县长。几天之后，部队打下了滁县、凤阳等一些地区，肃清了这些地区的土顽反共势力，相继成立了凤阳、滁县抗日民主政权，随后又成立了定（远）风（阳）滁（县）办事处，魏文伯兼任办事处主任。这些胜利，为进一步在路东消灭地方反共势

力，组织发动群众，建立政权打下了基础。

正当我集中四、五支队主力在路西作战时，顽军韩德勤部乘我路东空虚，以一万余人的兵力，从三月二十一日起向我五支队指挥机关所在地半塔集及竹镇、西高庙、古城等处进攻。当时，我路东部队总共兵力仅约三千人，在半塔集仅五百余人，而且新战士多，武器装备劣于顽军，情况十分危急。而在津浦路西对桂系顽军的斗争虽然已取得了初步胜利，但肃清地方反动势力，建立民主政权，巩固胜利的工作任务十分繁重，加上李品仙已决定调一七二师来皖东增援，一三八师两个团也在向皖东北进迫。据此情况，刘少奇、张云逸、郑位三等研究后，决定以主力移往路东，以稳定和巩固路东，路西则以游击坚持，除给进攻者抵抗外，要求对李品仙和缓，停止摩擦；在路东则动员和组织一切力量，坚持半塔集，待路西主力挥戈东援，歼灭韩顽。同时，张云逸就皖东路西军事摩擦问题两次致电李宗仁、白崇禧，揭露李品仙挑起皖东军事冲突的事实真相，要求李、白致电李品仙迅速制止对我的敌对行为，严惩挑起内争的顽固分子，以固团结抗战^①。张云逸还同戴季英联名发表告安徽各机关团体各界领袖电，发表《论皖东摩擦》一文，批驳顽固派反共的种种借口，揭露桂顽挑起军事冲突的事实真相，并请各界呼吁和平，停止军事行动，团结抗战。对于江苏韩顽围攻我驻地半塔集事，张云逸于三月二十六日公开致电蒋介石、顾祝同、李品仙、于学忠予以揭露，吁请严令制止^②。

我路东部队在邓子恢、郭述申、周骏鸣的指挥下，采取积

^①张云逸：《论皖东摩擦》。

^②《解放》杂志第104期，1940年4月20日出版。

极防御战术，以教导大队五百余人固守半塔集，以十团、十五团各一部及特务营在地方游击队配合下，从南北两翼钳击围攻之敌。虽敌众我寡，敌强我弱，而我军指挥员不畏强敌，在地方党和群众、自卫队积极参战和支援下，苦战七昼夜，击退了韩顽的多次进攻，保证了我路西反桂顽作战的胜利进行，实现了先打桂顽后打韩顽的战役计划。路西大捷后，张云逸即和罗炳辉率主力兼程回师路东，三月二十七日到达半塔集西南四十华里的张山集。这时，陈毅亦命令叶飞率挺进纵队，陶勇率苏皖支队增援。在张云逸的统一指挥下，我军于三月二十九日开始分三路全线反击。韩顽在我三路反击下，伤亡惨重，仓惶溃退。我军乘胜追至三河南岸。四月九日占领马坝后，我主动停止追击。此役共歼顽敌千余人，缴获大量武器弹药。韩顽主力溃逃到三河以北，路东土顽几乎被我全部消灭，反共顽固派政权被一扫而光，路东地区反顽作战胜利结束^①。

这次路西、路东反顽作战的胜利，奠定了淮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基础，也对华中的抗日反顽斗争和建立发展华中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全局起了重大作用。陈毅曾高度评价了半塔自卫战的重大意义，说：“先有半塔，后有郭村，有了半塔，才有黄桥”。

在自卫反击胜利后，张云逸等江北指挥部领导人，根据中央和中原局、刘少奇的指示，把从大别山撤出的一千多干部分到路东各县，深入农村，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斗争，建立政权。张云逸以江北指挥部名义独立自主地在路东委派了六合、来安、盱眙、嘉山、天长、仪征、高邮等县县长，同时各

^①郭述申、周骏鸣：《半塔保卫战》，见《老战士文集》第1集；张云逸：《半塔烈士纪念碑碑文》。

区、乡也成立了抗日民主政府和人民抗日自卫队，各乡成立了农民协会，并开展了肃清汉奸的斗争。四月十八日，成立了路东人民抗日联防办事处。

在这次桂顽、韩顽挑起的摩擦中，反共顽固派到处捕杀迫害我军官兵及其家属，甚至拘捕了张云逸的妻子。张夫人韩碧和幼子从香港经河内到桂林^①，再由桂林经江西辗转跋涉到了皖南新四军军部。在由新四军军部渡江前往江北指挥部的途中，于一九四〇年二月二十二日在安徽无为县襄安镇被安徽保安第八团扣留，同时被扣留的还有指挥部干部及所携军款七万元、重要文件及子弹一批，长短枪十一支。事后，我军派去交涉的人员也被扣押。反共顽固派逼着要韩碧给张云逸写信，企图以人质为要挟软化张云逸，但被韩碧严词拒绝。张云逸得知夫人和幼子被扣押，极为愤慨。但他仍把主要精力放在紧张的指挥反顽自卫作战上，并且把抗议顽固派对自己妻子的迫害同反对顽固派捕杀迫害我军官兵家属结合起来进行斗争。三月三十一日，张云逸致电蒋介石、林森和李宗仁、白崇禧，揭露顽固派的这一反动行径，要求政府释放全部被扣人员和枪支、物资等，并通令各省地方政府对我官兵家属，应同全国一切抗日将士家属一样，一视同仁，给予优待，严办残害我官兵家属的肇事者^②。经过严正抗议和不断斗争，韩碧母子被敌人扣押七个月之久，于同年九月被释放。

皖东抗日根据地的建立，直接威胁着南京等城镇的日军及

^①曾昌明：《回忆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和李克农同志》，见《广东文史资料》第29辑。

^②《张云逸为家属惨被劫掠致电蒋委员长、林主席、李、白长官》，载1940年4月10日《大众日报》。

两条铁路运输线，引起了日军侵略者的震惊。一九四〇年四月底，日伪向我路西“扫荡”，占领定远县城，五月被我四支队击退。接着，日伪又向我路东“扫荡”，骚扰破坏我盱、嘉地区，二十七日又占我来安县城。五月底，我五支队胜利地进行了“火烧来安城”的战斗；六月又对津浦路南段开展破击战，袭击乌衣滁县县城、沙河集、张八岭、嘉山集等敌据点，破击津浦路，迫使敌撤出来安县城。

当我军集中力量粉碎日军“扫荡”时，桂顽又乘机于六月初向我路西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本来路西的军事摩擦在三月被我胜利反击以后，并未停止过。三月下旬当我主力移向路东援救被韩顽围攻的半塔集之际，路西的桂顽五路军千余人就配合地方顽军共二千余人于四月五、六日占我青龙厂；驻无为的保四团、保八团又向我白马川、三官殿之部队进攻；一三八师、一七六师也调来皖东向我四支队进逼不已。对此，张云逸除向蒋介石、林森等吁请迅予制止外^①，又电令四支队司令员戴季英与桂顽提出商谈和解，并对敢于来犯者给以反击。四月八日，张云逸同刘少奇还电令李先念、陶铸以我湖北之挺进纵队从平汉路西部队中抽调二至三个团的兵力过平汉路东行动，有计划地向大别山桂顽后方推进，并派得力游击队向大别山伸入，以牵制桂顽不能向东攻我四、五支队^②。我路东半塔集保卫战胜利以后，为对付路西桂顽的进逼，四支队回驻路西，会同江北游击纵队在张云逸的统一指挥下，对路西桂顽的进攻给予反击，局势才基本稳定下来。但桂顽凭借其优势兵力，对我

①《张云逸电复蒋委员长林主席请严令制止倒退暴行》，载1940年5月10日《大众日报》。

②1940年4月8日胡服、张云逸等给李先念、陶铸并中央电。

仍进逼不已。对此，五月五日毛泽东、王稼祥曾来电指示：李品仙的反动，不加以打击是不会回头的。李如愿和，可以谈判，我在军事上亦可不打桂军。但凤阳、定远、合肥、无为一带的地方反动武装及顽固势力必须肃清干净，这可以孤立桂军。四、五支队主力宜向西调，完成此任务，同时也是压迫李品仙让步之必要步骤。李先念主力仍须继续打击鄂东反动派，如此，东西加以痛击，才可能缩小李品仙的反动范围，压迫他让步^①。六月初，桂顽调其在大别山的一三八师进入津浦路西，协同第五专员李本一和皖北行署主任颜仁毅两部共二千余人，分别由古河、梁园向我进攻，北路占我古城集、青龙厂等地，南路向含山、和县地区我江北游击纵队进攻，企图逼我退出津浦路西。为制止摩擦，张云逸遵照中央指示，一面再三请李品仙派员前来商谈，以绝抗敌后忧，并请各界群起号召反对内战，或请政府制止，或动员舆论主持公道，倡言和平，停止内战，团结抗日^②。另一方面，为自卫计，张云逸令我四支队和江北游击纵队奋起自卫反击，令五支队八团及十团一部驰援路西。我四、五支队密切配合，于六月二十七日在古城集、栏杆集等地展开猛烈反击，经三天激战，歼顽第十游击纵队千余人，其残部西窜，经八斗岭一带退回古河。此役胜利后，五支队又在返回路东途中歼滁县常备队残部五百余人。此时，策应我路西反顽的豫鄂挺进纵队一部正向大别山桂顽后方进袭，且八路军南下部队已进入豫皖苏边区。桂顽在此三面压力下，才被迫向我表示和意。张云逸即令停止追击，与桂顽谈判，八月间

①1940年5月5日毛泽东、王稼祥给刘少奇电。

②1940年张云逸关于制止国民党顽固派向皖东新四军进攻的呼吁电，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达成了皖北以涡河为界，皖东以淮南路为界的停战协议。协议签字后，张云逸于八月二十二日致电李品仙，要求其转令皖东顽军遵照协议，停止袭击我军，释放我军被捕人员，维护我军交通，停止敌对及危害我军人员。为了迅速解决上述问题，张云逸提出：在皖东请李品仙派代表继续谈判^①。后来，李本一于八月底前到大桥江北指挥部，同张云逸、赖传珠谈判。李本一还是重复李品仙所说的，军队他们不过淮南路东，我们不过淮南路西，路东在行政上仍归他们管辖，所以行政等问题未达成协议^②。

一九四〇年七月，皖东根据地少数地主恶霸在韩顽和桂顽的煽动支持下，进行暴乱。张云逸和江北指挥部及路东联防办事处领导人，及时指示各地党政军民迅速动员起来，打击暴乱头子，争取受骗和被胁迫的群众，粉碎暴乱阴谋，并命令教导队击溃了配合暴乱偷渡三河的两团顽军，命令五支队警卫营在来安一带，军法处和保安处在天长、仪征、高邮一带发动群众，镇压暴乱。暴乱被镇压之后，又广泛发动群众进行减租减息，重建和整顿了被破坏的群众团体和人民自卫武装，彻底改造了基层政权，清理和整顿了党的基层组织，纯洁了内部，清除了隐患，使皖东根据地得到巩固。

此后，张云逸坚决地贯彻了坚持路西，巩固路东，向西防御，向东发展的方针，命令四、五支队配合陈、粟部队和八路军南下部队开辟了淮宝地区，沟通了皖东与淮海两个地区的战略联系，全力支援了陈、粟部队于十月初进行的发展苏北根据地的黄桥战役。八月下旬至九月中旬，张云逸又同邓子恢等江

^①1940年8月22日张云逸致鹤公电。

^②1984年4月6日访问李资平谈话记录。

北指挥部的领导人分散到各个部队，指挥粉碎日伪以万余兵力对我皖东的七路大“扫荡”，锻炼了根据地全体军民，有力地保障了根据地的建设和发展。

（十）

从一九四〇年十月十九日何应钦、白崇禧的《皓电》开始，蒋介石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华中顽军反共气焰极为嚣张，李品仙要我“交还”整个皖东政权，韩德勤要我恢复黄桥战前状态。顽固派的目的是驱我于黄河以北，然后沿河封锁，置我于日、顽夹击之间加以消灭，为其投降做准备。为此，在军事上，蒋介石密令汤恩伯、李品仙、韩德勤等部三十万大军及顾祝同所部，准备向华中大举进攻。对于蒋介石的这次反共布置，中共中央决定对皖南采取让步政策（即北移），对华中采取自卫政策，在全国则发动大规模反投降、反内战运动，用以争取中间势力，打击亲日派的阴谋挑衅，争取我党在全国的有利地位。十二月八日，蒋介石又以何、白《齐电》命令我军：在十二月三十一日前，长江以南新四军全部开到长江以北，黄河以南之八路军全部开到黄河以北，一九四一年一月底以前，华中之新四军也要全部开到黄河以北。并下达了“剿灭”黄河以南和长江以南我军的密令。对此，党中央向全党发出紧急指示，号召以自卫战斗粉碎反共顽军的进攻，争取时局好转，命令皖南部队迅速北移，华中全党全军紧急动员起来，为坚持抗日阵地，打破反共顽军的猖狂进攻作好充分的准备；华北再抽调兵力增援华中。为适应斗争的需要，在组织领导方

面，根据中央的决定于十月中旬在盐城，成立了以叶挺、陈毅为副指挥，以刘少奇为政委的华中总指挥部，统一指挥华中八路军、新四军。十一月，中央又决定将中原局、东南局合并，改称华中局，同时组成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华中分会，以刘少奇为书记，陈毅、张云逸、邓子恢、赖传珠为委员，以加强和统一华中党、政、军的领导，应付突然事变。十一月初，刘少奇离开皖东赴盐城，皖东工作的重任主要由张云逸担负。对于皖东，早在十月十二日，毛泽东等就指示：我皖东部队应速部署向西防御，坚持皖东根据地。如失皖东，则蒋介石必沿河构筑封锁线，断我向西之前途。十一月三日，中央又指示：张云逸的任务是指挥四支队谭希林游击纵队，巩固皖东造成苏北皖西通道。当时向皖东抗日根据地进攻的顽军主要是桂顽。对于桂顽，十一月十八日中央在关于争取桂系策略给新四军的指示中曾指出：在对日对共的关系中白与何仍有区别，李、白虽参加了蒋的反共集团，但桂系现在还应算作中间力量，我们仍应实行一打一拉又打又拉的政策。张云逸在粉碎蒋介石掀起的第二次反共高潮中，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方针政策，胜利地完成了党中央给予的任务。

皖东的桂顽在蒋介石的策划下，十一月就开始了反共的军事挑衅，妄图把我军赶过津浦路东。十一月二日，一三八师的一个团攻占了我游击纵队驻地梁园、草庙集，九日，另一个团又攻占我四支队驻地复兴集，十四日，一三八师全部进到淮南路东，十六日占我王子城驻地，十七日占杜集，二十日攻占四支队司令部附近的周家岗，二十三、二十四日进攻我军的中心驻地界牌集。对于桂顽的进攻，张云逸根据中央又打又拉的策略指示，一面电请蒋、何、白、李制止李本一和一三八师向皖

东的进攻，并呼吁团结抗战^①；一面致电叶、项转朱、彭请令驻苏北的八路军、新四军兼程前来增援。当时，罗炳辉率五支队配合八路军南下部队和陈、粟部队反击韩顽的进攻，不能返回路西，张云逸命令四支队的七、九、十二团在周家岗抗击桂顽的进攻，经三天三夜激战给进攻之顽军以重大杀伤后退出周家岗。令江北游击纵队坚守界牌集，打退了顽军的多次进攻，破坏了顽军妄想中间突破、占领藕塘的企图，保住了路东路西的通道。以后，张云逸根据中央和军部关于坚持路西、巩固路东的方针，以游击纵队两个团和四支队一个团在路西坚持游击，四支队主力则过路东协同五支队一起巩固津浦路东根据地^②。

一九四一年一月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于一月二十日发布了重建新四军的命令，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命令要求他们悉心整饰新四军，团结内部，协和军民，巩固并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保卫民族国家，坚持抗战，防止亲日派袭击而奋斗。一月二十三日，新四军将领陈毅、张云逸、刘少奇等发表就职通电，二十四日又发表了声讨亲日派通电。

皖南事变后，蒋介石为了突现其“驱逐”华中我军至黄河以北，以配合日军聚歼我军的罪恶目的，不顾我党的抗议，命令汤恩伯、王仲廉、李品仙、顾祝同等，率领反共大军继续东进、北上，向我豫皖苏边、皖东、皖中、鄂中、苏南敌后根据地进攻。日伪为迅速解决“中国问题”一面积极诱迫蒋介石投

^{①②}1982年8月19日访问张翼翔谈话记录。

降，一面配合蒋介石进攻我抗日根据地。在皖东，李品仙部之一七二师及第十二游击纵队已进至吴山庙，准备向淮南路东等地配合原已进至淮南路东的一三八师进行新的进攻。

对于桂顽在皖南事变后对我皖东的进一步进攻，刘少奇、陈毅于一月二十日指示江北指挥部：我四支队和江北游击纵队应以游击战抗击反共顽军之进攻，不让反共军进入路东，应在部队及地方党员中动员，必须以最大决心，坚持路西阵地，保障路东，否则皖东一失，华中面目全非，我军无路可走。

张云逸充分意识到坚持皖东根据地的重要战略意义。因此，他坚决遵照中央和刘少奇、陈毅的指示，依靠四支队和江北游击纵队，坚决以游击战反击桂顽的进攻。张云逸对江北指挥部所属部队的部署是：由江北游击纵队政委孙仲德，率领该纵队第二团、第三挺进团八百人，在无为、巢县南、桐城东等地坚持游击战，还派一部到和县、含山两县游击；由谭希林率游击纵队（缺二团）在定远以西，合肥以北及凤、怀等地区活动，坚持建立抗日根据地；罗炳辉、郑位三率七、八、九团在定远东、滁县地区活动，后陆续将七、九两团调路东集中整训，而留八团归谭希林指挥，坚持路西根据地；第十团在天长北之淮、宝、通地区活动。指挥部则率第十四、第三、第四独立团在津浦路东地区，坚持保障路东根据地^①。张云逸根据中央指示，还派江北游击纵队第一团由团长张翼翔率领到江浦和淮南路边上巢县一带游击，以期接应收容失散的皖南部队。他们在那里打了几仗，收容了部分失散部队之后，为了避免顽军夹击造成损失，不久返回^②。从而坚持了皖东根据地。

^①1941年1月28日张云逸、邓子恢致胡服、陈毅等电。

^②1982年8月19日访问张翼翔谈话记录。

皖南事变后，由于我党在政治上对国民党采取攻势，在军事上采取守势，坚持自卫反击原则，加之日伪利用蒋全力反共之际，集中了五个师团以上的兵力，于一月下旬发动了豫南战役，汤恩伯部损失不少，李仙洲、何柱国两部同日军激战，也遭溃败，这就迫使蒋介石在军事上的反共进攻不得不暂时停止；而集中在大别山的桂军主力，由于其后方交通已被切断，三月间，桂军在皖东又被日军打得七零八落，使李品仙处于困难境地，而且汤恩伯占皖北后，又企图夺取桂系的大别山根据地，因而蒋桂矛盾日益加深。在此情况下，白崇禧只好电示李品仙，要他保存实力，不打硬仗，巩固大别山。至于东进“剿匪”已完全不提。针对这一情况，张云逸致电毛泽东、朱德，建议利用蒋桂矛盾，加强桂系统战工作，而集中力量打击汤恩伯挺进队对我的进攻。由于当时在皖东我军与李品仙联络已断，张云逸还以他个人名义，通过香港转告李、白表示和解^①，实现了与桂系的暂时和缓。

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五日，重建的新四军军部在盐城成立。二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军委委任了新四军所属部队各师军政负责人。全军扩编为七个师，其中第二师由江北指挥部所属部队编成，张云逸兼师长，罗炳辉为副师长，郑位三为政委，周骏鸣为参谋长，郭述申为政治部主任，张劲夫为副主任。张云逸仍任新四军副军长，但直到一九四二年夏以前未到军部工作，主要在第二师主持工作。成立第二师后，原江北指挥部撤销。整编后的新四军的任务是，坚持华中敌后抗战，阻止反共军的进攻，迅速加强根据地各项建设，积聚力量，准备

^①1941年5月张云逸致毛泽东、朱德电。

与敌伪顽军进行长期斗争，一待条件成熟即向西、向南发展。二师的具体任务是坚持淮南根据地，巩固津浦路东，坚持津浦路西，加强对西防御，随时准备迎击敌伪顽军的进攻。

一九四一年三月，张云逸同邓子恢主持召开了二师政治工作会议，总结一九三九年秋季以来二十个月的政治工作，以皖南失败为经验教训，强调要把二师建设为正规化的党军。这次会议对二师进一步贯彻中央关于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及反顽斗争的指示，加强部队的政治工作，克服项英右倾错误的影响，增强坚持根据地的决心和信心，使部队成为更有高度组织纪律性、坚决执行党的政治路线的人民武装，具有重要的意义。

四月三十日，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新四军第二师组成以张云逸为书记的军政委员会，成员还有罗炳辉、郑位三、郭述申、周骏鸣^①。一九四二年二月成立淮南军区，张云逸兼军区司令员，郑位三任政治委员，罗炳辉为副司令员，周骏鸣任参谋长^②。

从一九四一年四月到一九四二年底的一年多中，张云逸同邓子恢、罗炳辉、郑位三、郭述申、周骏鸣、张劲夫等一起，根据中央、华中局及军部指示，对二师和淮南党、政、军、民各个方面的建设整顿、训练、巩固和提高，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

张云逸一贯重视部队的建设，早在江北指挥部期间就办了一个教导大队，开始是培养班排干部，以后又培养营级干部。一九四〇年三月，他在教导大队的基础上，在天长县的汉涧镇成立了江北军政干校，他兼任校长，赖传珠兼任副校长，谢祥

^①齐锡明、梁明建、郑康的回忆。

^②《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第416、417页。

军任教育长，全校共八个大队，一千多学员^①。为适应二师及淮南地区各组织对军政干部的迫切需要，一九四一年五月四日，他又在天长县张公铺正式成立了抗日军政大学第八分校，由他兼任校长，罗炳辉任副校长，冯文华任教育长。直到一九四三年实行“精兵简政”，抗大八分校才改为二师教导团。张云逸主持开办的江北军政干校和抗大八分校培养了大批军政干部，仅抗大八分校开办的四期中就培训了二千五百多名干部，为加强二师部队和淮南根据地的党政军建设作出了贡献^②。

张云逸很重视从组织上建党建军。一九四二年，他在二师组工会议上作了《略论组织工作的内容与任务》的报告^③，强调组织工作是我党我军工作最主要的部分，组织工作的好坏，影响于我军建设之成败。他具体论述了组织工作的内容和二师当时组织工作的任务，指出：做好党的工作，健全党委、总支的领导工作，这是我党我军整个组织工作中最中心的一环；正确的挑选干部配备干部，做好干部工作又是组织工作主要的一环，要对干部进行了解、审查、培养、提拔。目前要适当的配备干部，求得将二师创造主力兵团任务的实现；要加强干部的党性，坚持党的组织原则的正确执行；纪律是革命军队的生存和斗争胜利的最根本的条件，也是团结统一的基本保障，因此，我们组织工作要有高度的纪律性，等等。

张云逸不仅以正确的组织原则教育干部，而且身体力行，以身作则，模范地执行党的组织原则。当时邓子恢常向同志们介绍说，张云逸同志是毛主席表扬的模范共产党员。

①刘健飞、徐飞、陶容等的回忆。

②刘健飞，张诚的回忆；晓星：《抗大在明天》（1942年1月）。

③《组织工作文选》，新四军政治部1942年5月15日编印。

张云逸具有很强的组织观念，对中央华中局和军部下达的指示都是认真研究，坚决执行的。他常说，中央、华中局、军部来的指示，不但看一遍，甚至看二十遍也不多。他常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来团结、教育干部、战士，反对自成系统，不执行中央和军委的指示、命令。他对刘少奇、邓子恢、徐海东、罗炳辉等都很尊重，而且善于团结各方面的干部。他在把江北这支部队建设成为坚决执行党的路线的人民军队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

张云逸具有很好的民主作风，遵守集体领导原则。平易近人，没有架子。对干部在政治上，在执行上级的指示上，在原则问题上从不含糊，要求很严、很认真，但又都是从团结教育出发，循循善诱，从来不采取命令、打击的方法。因此，干部在他跟前都感到无拘无束，无话不谈，心情舒畅。对有实际困难的干部，他非常关心，总是设法帮助解决，即使条件不具备，一时解决不了，也要解释清楚，使他们理解、体谅。

张云逸极为重视干部、战士的学习。他对身边工作的秘书、警卫人员、工作人员的学习，都抓得很紧，常说：有事我自然叫你们，没有事你们就学习。他还布置学习任务，检查学习情况，进行具体帮助。

张云逸是我军老一辈的参谋工作者，对我军的参谋工作建树颇多。在皖南突塘、云岭召开的两次新四军参谋会议上，他都到会讲话，阐述我军参谋工作的建设问题。一九四一年夏，他在二师作战参谋会议上作的《作战参谋战时怎样工作？》^①的报告中说，作战参谋在战前要了解自己所负的战斗任务，要

^①此件存江苏省档案馆。

了解敌、友、我以及居民、地形等情况，要研究敌人的战略战术原则和我军的战略战术原则，如何避敌之长，用敌之短，发扬我们的优点，克服我们的弱点，从我之长击敌之短。并对作战参谋应如何制定作战计划，在作战中，如何注意各部队的协同作战，掌握情况的变化，适时地给各分队作补充指示；战斗后，如何精确地了解敌人情况，整理部队，协助首长下新的决心，定出新的作战计划或命令，整理战斗经验，作出战斗的详细报告，等等，都作了详细精辟的论述。他对身边参谋人员的工作，要求十分严格。经常对他们说，要使指挥员对情况了如指掌，参谋处一定要把情况确实弄清，强调参谋人员都应去掉“一般”、“可能”、“大概”这类说法。不这样，对工作会造成失误。他还说，对起草的各种文书，都要求文字准确，不容含糊，电报稿要简明准确，第一句话就要把最重要的内容点破，以引起收报人重视及时处理；时间，数字绝对要准确，要双保险，保证无误。他还以自己艰苦细致、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给部属作出了榜样。张云逸对地方政权建设和民运工作也很重视。他于一九四一年六月十三日拟制了《关于改善地方行政机构试行大纲》，在皖东试行，对加强皖东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起了积极作用。在他的领导下，到一九四一年底，二师活动的淮南地区建立了来安、嘉山、六合、天长、高邮、仪征、盱眙、滁县、全椒、定远、合肥、凤阳、含山、和县、巢县等十五个县的政权，地区面积约为二万二千四百四十八公里，人口有近七百万人；地方武装八千四百六十四名，而且工抗、农抗、青抗、妇抗、商抗、儿童团等各种民众组织都普遍建立起来了，使淮南抗日民主根据地日益巩固和完善。

张云逸很重视地方的生产建设和部队的供应工作。早在藕

塘、半塔集自卫战以前，张云逸就指示要建立税收机构搞税收。藕塘、半塔集自卫战后，随着县、区、乡政权的逐步建立，在发动农民发展生产的基础上，建立了田赋和税务制度，取消了国民党的苛捐杂税，使抗日民主政府和部队有了经常的经济来源，部队的供应也很快得到改善。但由于当时部队发展快，根据地又比较小，在前进中又有了新的困难。二师建立后，部队有很大发展，加上各县支队约有四万人，根据地的经济更为困难。张云逸遵照党中央提出的生产自给方针，领导二师进行了生产自给，陆续办起了被服厂、飞马烟厂、水壶铸铝厂、手榴弹厂和修械所等。飞马烟厂是在张云逸的提示和大力支持下于一九四二年办起来的，由于质量不断提高，发展很快，对满足部队和群众的需要，增加烟农和政府的财政收入，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起了重要的作用^①。当时，淮南根据地和二师，还在财政和粮食上，支援了其它根据地，在张云逸领导下，二师的军工生产搞得也很好，可以生产手榴弹、子弹、迫击炮弹、地雷，供应部队的需要。

对于张云逸主持下的淮南地区的政权建设和各项工作，刘少奇在一九四二年三月召开的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上所作的《目前形势，我党我军在华中三年工作的基本总结及今后任务》的报告中，作了充分肯定和评价。他说，二师部队在党的领导之下，建立了二师各部统一的指挥，重新训练了干部，使二师各部成为正规的党军。因此，“在多次的反‘扫荡’和摩擦的战争中，获得很大胜利，并使部队有发展，初步建立了地方

^①胡弼亮：《骏马飞腾》《星火燎原》第6集第503—506页；《新四军二师的供给和生产》，《盱眙史志资料》第4期，1982年11月编印。

军，主力军则已经过初步的整训，在军事上，政治上，组织上，均获得了相当大的成绩，这是值得其它各师学习的。二师还抽调了一批干部，并以主力之一部分去加强地方军，又以一批干部供给军部及其它部分，在财政上粮食上帮助其它根据地，以主力之一部经常到其它地区活动。在津浦路西则基本上坚持了原来阵地，建立了路东根据地，开辟了淮皇区，而皖东特别是路东根据地的工作与华中其它各根据地的工作比较是最好的，最正规的，已经相当深入的发动和教育了群众，大大改善了基本群众的生活，并在基本群众中切实地进行了组织工作，党和群众有了相当密切的联系，并训练了较多的干部积极分子，又向敌后地区进行工作，获得了一些成绩，建立了人民武装，在政权上已部分的完成了改造工作，财政粮食工作及扩军工作，都比较正规的进行。”^①

（十一）

一九四二年夏，张云逸根据中央决定，离开二师到新四军军部和华中局机关驻地苏北阜宁任新四军副军长职^②。年底，他同军部和华中局机关一起，转移到盱眙县黄花塘。一直到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他都同军部和华中局机关住在这里，领导全华中各抗日根据地和各师的工作。

日军发动浙赣战役后，张云逸协助陈毅等根据浙东地区的形势，确定了争取有利时机，扩大与发展武装，大刀阔斧地进

^①该报告在《真理》第6期刊印。

^②1982年3月19日访问罗若退，3月30日访问朱云谦的谈话记录。

行工作，广泛发展统一战线，进一步发展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方针；同时决定成立浙东区党委，派谭启龙、何克希等率领一批干部前往浙东加强与统一地方与军队的领导。一九四二年七月，成立了浙东区党委和三北（即姚江以北的余姚、慈溪、镇海三县地区）游击司令部，随后又建立了总办事处，将部队统一整编为第三、四、五支队。这对于进一步发展和巩固浙东敌后游击根据地具有重要意义。此后，针对国民党三战区派遣人员到浙东敌后，整理土顽和“忠义救国军”等队伍，企图配合其挺进部队，向我浙东部队压迫，与我争夺浙东敌后地区，向我游击队进攻的情况，张云逸又协助陈毅及时指示浙东我游击队坚持向敌后发展的方针，在沿海山区打下长期游击坚持基础，利用矛盾，多交朋友，埋头苦干，采用隐蔽方式，力求保存和发展自己，达到保持浙东战略支点的目的。十月底，在顽军内讧、火并之际，张云逸协助陈毅等集中浙东三、四、五支队主力，于十一月下旬将“三北”地区的“忠义救国军”六股共约一千九百余人全部击溃，控制了三北地区。随后，陈毅、张云逸又指示我游击队注意开展该地区党政民工作，加强四明山、会稽两处游击活动，加强杭州湾、玉盘湾海上工作，并派人开辟沿海地区。这就为建立三北游击根据地和发展四明山、会稽两地的游击区，创建浙东游击战略支点，组成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打下了基础^①。

一九四三年二、三月间，当敌伪大举向我盐阜区“扫荡”时，陈毅、张云逸等指示三师集中适当有力部队，选择敌之弱点及时进行反击。同时指示一、四师立即在苏中、淮海、淮北

^①1942年12月7日陈毅、饶漱石、张云逸、赖传珠关于浙东顽我斗争情况的报告。

等地区选择敌之后方空虚与要害处，以及交通线上发动攻势，务必攻击几个据点，破坏与切断敌前后方交通，威胁调动敌人，以策应和配合盐阜区反“扫荡”的战斗^①。在陈毅、张云逸等军部领导人的指导下，三师部队和盐阜、淮海军民取得了这次反“扫荡”的胜利，共毙伤敌伪军一千零七十余名，俘敌伪七百八十余名，攻克据点五十余处。这一胜利，严重地打击了敌伪，鼓舞了我根据地人民继续反蚕食、反伪化斗争的意志。

一九四三年三月下旬，韩德勤残部为接应王仲廉部东进入侵我淮北中心区之金锁镇、界头集、山子头一带，企图侵夺洪泽湖两岸，断我苏北与皖东和山东的交通线。陈毅、张云逸等令四师主力及五旅、淮北部队，趁韩、王对我东西夹击合围之前，首先给韩部以痛击，坚决驱逐进入洪泽湖东岸之王光夏部，并逼其返回原防，然后抗击王仲廉部东进。四师按照陈毅、张云逸等军部领导人的指示，以三个团的兵力，在二、三师一部的配合下，全歼了进占我山子头的王部，王光夏被击毙，韩德勤被生俘（后释放）。这一胜利，粉碎了顽军的东进计划，铲除了顽固派留在我华中根据地的一个反共堡垒。

一九四三年下半年，张云逸在抗大九分校作了《坚持敌后抗战现阶段中在军事上必须研究的几个问题》^②的报告。在报告中，张云逸着重阐明了目前坚持敌后游击战争之所以要执行积极防御战略方针以及怎样执行积极防御方针的问题，还阐明了与此相联系的坚持与转移、隐蔽与暴露、集中与分散、军民密切合作等问题。他认为，在抗日游击战争的第一阶段中，我

^①1943年2月21日陈毅、饶漱石、张云逸、赖传珠关于配合三师进行反扫荡的指示。

^②载新四军司令部1943年出版的《军事建设》第3期。

们在敌后执行战略进攻是对的，但现在的情况与过去不同了，现在进入敌后游击战争的第二阶段，之所以采取积极的战略防御方针是根据下面的几个具体条件决定的：1，敌人对我国全面进攻已停止，现在采取保守其占领区的方针，因此，敌人对敌后我军及抗日根据地的进攻是必然的。2，我们在敌后发展的任务基本上已完成，现在主要的是粉碎敌人的“扫荡”与清乡，保存与巩固根据地和军队，不是继续战略进攻。3，我们总的任务是继续坚持敌后抗战，完全巩固根据地，聚集力量准备反攻，这是互相联系的三位一体的任务。根据上述这些条件，张云逸认为：如果我们在敌后完全采取战略进攻，不转到战略防御，那就会过早的与敌人决战，这是不对的。在敌我力量没有基本变化以前，我们在敌后的战略进攻是有一定限度的，敌人的防守也是有一定的时间性的。如果没有认识这一点，就会忘记我们的战略是防御的、持久的方针，将会走入极错误的速战速决战略论中去。我们敌后有个别地区，不能坚持而失掉，就是由于只知道过去的战略进攻，不会相机转到战略防御，同时也不能适时的部署战略防御的各种工作所造成的。反之完全采取消极的战略防御，实行退却逃跑，放弃根据地则更是错误的。现在坚持敌后斗争，只有执行积极的战略防御的正确方针，才能完成总的任务。张云逸在报告中还具体阐述了怎样执行积极的战略防御的各方面问题。他的这些阐述，对于指导我华中根据地军民粉碎敌伪的多次“扫荡”和清乡，挫败顽军的进攻，渡过困难，积蓄力量，准备反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在全党整风运动中，张云逸认真的学习中央指定的文件，联系思想作风，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他还担任军直属队整风

分会主任，领导军直属队的整风学习。他在特务团干部会上作了《整风学习怎样自我批评》的讲话，指出：整风学习是要把毛泽东的马列主义思想方法变为我们同志的思想方法，并以这个方法对着歪风进行革命，战胜非无产阶级意识，改进我们的思想，转变我们的作风，坚定我们的阶级立场，提高我们的战斗力。要做到这些，就要拿起自我批评的武器。应认识党员勇敢的进行自我批评，揭露自己的错误，纠正自己的缺点，才能使自己成为坚强的无产阶级战士，保证党的正确路线的实现。在高级干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学习阶段中，张云逸作了《王明博古宗派机会主义路线在抗战时期的具体表现及其对华中各地的影响》的报告，系统地揭露和批判了王明在抗日战争中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总结了华中敌后抗战的经验教训。为了总结红七军及广西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历史经验，他同韦国清等还在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一日提出了关于起草红七军及广西根据地的发展史的倡议。经他们倡议，当时在延安的叶季壮、莫文骅、雷经天负责召集了在延安的红七军及参加广西斗争的同志座谈、讨论。并于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三十一日写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史》。

一九四三年底，陈毅去延安参加整风和党的七大，直到一九四五年秋才回到华中。在这期间，张云逸代理军长主持全军军事工作。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被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

一九四四年四月，日军开始发动豫湘桂战役。在河南的三十多万国民党军有的一战即溃，有的不战而溃，使河南广大地区沦入敌手，郑州、洛阳相继陷落。五月四日，张云逸和饶漱石、赖传珠等命令四、五、七师除加强原地区的巩固外，作好

进军河南敌后的准备。正当我准备西进河南敌后时，顽军耿继勋部向我微山湖东西两岸地区进攻，企图断我华中与冀鲁豫联接及华北与华中地区交通，阻止我军西进。张云逸和饶漱石、赖传珠即给毛泽东、朱德去电建议：乘顽军向我进攻之际，由十八集团军总部组织八路军一部南下，四师加以配合，进行丰（县）、沛（县）、砀（山）反顽自卫战役，给顽军以严重打击，尽可能控制丰、沛、砀地区，以利我西进。毛泽东、朱德等同意这个建议，即令八路军山东部队南下，对丰、沛、砀地区的顽军给予打击，歼其大部，使耿继勋、冯子固部退守铜山西北一带，为我四师西进创造了有利条件。七月二十五日，中央正式下达了向河南敌后进军的部署，并颁布了进军河南敌后的有关政策。根据中央的部署，张云逸主持军部决定，以四师主力五个团执行西进任务，两个团配合地方武装和民兵坚持淮北路东根据地，并调三师七旅到淮北地区作为机动力量，以二师、七师钳制桂顽，策应四师西进。四师主力经过充分准备，由师长彭雪枫率领于八月十五日开始西进，沿途扫除了顽军的阻挠，粉碎了敌伪的跟踪，连克黄庄等据点，恢复了萧（县）、永（城）、宿（县）地区的根据地。此时，顽军乘我立足未稳，除令第十九集团军以三个军在涡（河）南阻我西进外，另以涡河南的王毓文主力三个师及四个纵队，陇海路以北耿继勋、刘瑞岐部以及津浦路以东之段海州、苗秀霖部，分别由南、北、东三面夹击我四师西进部队。据此，张云逸等拟即集中路东主力配合路西首先打击歼灭由东向西之段、苗等部，以确保我军西进的联系，然后集中主力对付由涡河北上之顽军；并建议八路军继续向陇海路北之耿、刘、冯等部推进，以策应四师作战。九月五日，张云逸将上述意见电报中央，取得同意。

于是我军于九、十月间先迎头痛击了段、苗部的进攻，扩大了我西进主力作战的回旋余地，确保了前后方的交通；接着剿灭了陇海路以北的耿、刘残部，控制了丰、沛、铜、碭之间的广大地区；以后又粉碎了王毓文勾结敌伪由渦、蒙向永城我区的进犯。经过四个月的战斗，我四师主力在兄弟部队的大力支持下，配合下，歼灭了敌伪和顽军共计一万三千余人（包括伪军投诚的），拔除据点三十六处，粉碎了敌伪的“扫荡”和顽军的进攻，控制了东起津浦路，西止商亳公路，北至陇海路，南迄渦河的广大地区，基本上恢复了原有豫皖苏根据地，使我淮北解放区扩大了将近一倍，巩固并延长了我军在西线战略反攻的前进阵地。一九四四年冬至一九四五年秋，张云逸根据党中央、中央军委和刘少奇、陈毅的一系列指示，组织粟裕、叶飞等率部渡江南下。南下部队经过九个多月英勇艰苦的战斗，取得了粉碎日伪军的多次进攻和三次天目山反顽战役的胜利，歼灭顽军一万三千余人，开辟了苏豫皖浙边敌后边区。连同浙东游击纵队原创的根据地，解放区面积达十万八千平方公里，人口增到三百七十余万，主力部队及地区部队发展到五万余人，加强了敌后工作，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苏南根据地，扩大了我军在江南实施战略反攻的前进阵地。

张云逸在贯彻中央关于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整训部队等工作中，也做出了不少贡献。一九四四年，他在军直属队干部会上作了《实行拥政爱民的办**法**》的讲话，要求华中全党全军必须认真执行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党中央发出的拥政爱民号召及华中局和军政治部于同年十二月十五日发出的拥政爱民指示，在部队中加强拥政爱民的思想教育，定期进行军政民联欢，并且要努力生产，厉行节约，减轻人民负担。为了贯彻

一九四四年七月一日党中央颁发的整训部队的指示，他主持军部对全军的军政训练作了具体部署。并领导全军于一九四四年冬开展了军事训练，提高了部队的军事技术，增强了战斗能力，为迎接反攻做了准备。

一九四五年八月八日，苏军对日宣战，出兵东北。九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号召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应在一切可能条件下，对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十日、十一日，朱德发布受降及配合苏军作战的七道命令，令我人民军队迅速前进，收缴敌伪武器，接受日军投降。据此，张云逸等于八月十日致电党中央，对是否派大兵入宁、沪等请示方针。十二日，中央电示华中局设法派人和日本及伪政府接洽，令其向我投降。遵照这些指示、命令，张云逸主持的新四军军部，一面命令华中各地敌伪立即限期向我缴械投降；一面部署我军反攻，准备夺取宁、沪、徐、蚌、芜、汉等大城市，并号召解放区全体军民和沦陷区同胞迅速行动起来，为迫使敌伪投降、收复华中全部国土而战。但是，蒋介石为了抢夺人民的抗战胜利果实，却下令要解放区人民军队就地驻防待命，不得擅自行动。根据反攻形势的新变化，党中央于八月十二日确定华中我军任务是：江南部队就地向四周发展，夺取广大乡村和许多县城，准备反对内战的战场，不作占领大城市的打算；江北部队力争占领津浦路及长江以北、津浦路以东、淮河以北一切城市，消灭伪军，以有力部队配合八路军占领陇海路，并准备在顽军李品仙、何国柱部向我进攻时进行自卫作战。陈毅也从延安来电，对江南、江北的具体进攻目标作了进一步指示。遵照党中央、延安总部的指示命令，张云逸等领导华中全体军民，从八月九日到二十二

日，解放了大江南北的县城十七座，重要市镇近二百个，歼灭敌伪军一万二千余人，获得了战略反攻的初步胜利。

八月十五日，日本政府正式宣布投降。蒋介石一面抢占大城市和交通要道，一面伪装和平，电邀毛泽东到重庆谈判。据此情况，毛泽东于八月二十四日给张云逸等指示，抗日战争结束，和平建设阶段开始，我党口号是和平、民主、团结，我党、我军对大城市是进行和平、民主、团结工作，争取我党的有利地位，不取军事占领政策，而力争占领小城市和乡村，迅速设法占领运河沿线及串扬河沿线各城市，将苏中、苏北、淮南、淮北打成一片；江南江北我军主力，各就地集结整训，恢复疲劳，养精蓄锐，准备于顽军进攻时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一切作持久打算，注意收集军用资材。据此，张云逸等命令，华中我军各师，各按具体情况进一步开展对敌伪的进攻。从二十二日到九月二日日本签字投降的十天作战中，华中军民又解放县城十五座，重要市镇二百余个，歼灭敌伪一万二千余人。连前总计，共解放县城三十二座，重要市镇四百余个，歼灭敌伪三万余人，完成了占领南京、太湖、天目山之间的广大乡村和许多县城的任务；把苏中、苏北、淮南、淮北打成一片的任务也基本完成。至此华中解放区已有县城四十座，人口达四千三百四十六万，军队三十一万八千六百余人，民兵八十多万。保卫了人民的抗战胜利果实，为反对蒋介石挑起的内战作了准备，打下了基础。

（十二）

抗战胜利后，党中央为实现“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和

“夺取东北，巩固华北、华中”的战略方针，做出了“山东主力及大部分干部迅速向冀东及东北行动；华中新四军调八万兵力到山东、冀东；浙东我军即向苏南撤退；苏南、皖南主力即撤返江北”的战略部署。随后，中央还指出：我华中解放区，要一面抽兵北上，调整战略部署，组织准备反内战的战场，一面继续肃清敌伪，阻止蒋军沿津浦路北上。根据中央上述部署，张云逸及其主持的新四军军部，为了肃清江北敌伪，即令第三师主力于一九四五年九月上旬和下旬分别攻占了淮阴、淮安，歼灭伪军一万三千余人，我军控制了苏中、苏北、淮南的枢纽。我军占领淮阴后不久，张云逸率军部迁到淮阴。随后，三师又攻占新安镇、陈家港等重要市镇，完全解放了苏北盐场。我苏中部队根据中央及军部的部署，也先后攻克泰兴、如皋、海安、安丰等城镇，之后又转兵北上，于十一月十一日解放了盐城，歼灭伪军一万余人。九、十月间，为了阻止蒋军沿津浦路北上，张云逸等又组织领导第二、第四师大部主力和地方部队民兵彻底破坏了津浦路徐宿段和浦滁段，攻占了曹村、夹沟、符离集、乌衣等九个车站。这些斗争的胜利，沉重地打击了蒋介石勾结敌伪分割、侵占我华中解放区，妄图加速挑起内战的阴谋，迟滞了蒋军北上，进一步扩大了华中解放区，并将华中、山东连成一片，为我军准备了反内战的战场。

根据中央的部署，张云逸等还组织领导了苏南、浙江、皖北、皖南的机关部队北撤和主力北上的工作，使黄克诚率领的新四军第三师三万五千余人全部胜利地调往东北，接替了由山东开往东北各部队的防务；苏南、浙东、皖南、皖中等四个解放区的部队和党政机关干部共七万余人也相继撤出原地北返，并布置了撤出地区坚持斗争的力量，安排苏浙军区第一纵队和

第三纵队留在华中，由粟裕领导坚持斗争。十月，张云逸率领华中局及新四军军部北移山东临沂，与山东军区合并。十二月十五日，中央书记处电示批准，由陈毅、饶漱石、张云逸、黎玉、舒同五人组成华东局常委，饶漱石任书记，陈毅、黎玉任副书记。一九四六年一月七日，中央军委正式决定，新四军军部和山东军区合并，统一指挥山东和华中部队，陈毅为新四军军长兼山东军区司令员，张云逸为副军长兼山东军区副司令员^①。陈毅于一九四五年秋从延安回到山东，即亲赴前线指挥，组织从徐州到济南津浦路沿线的战斗，以粉碎蒋军打通津浦路的企图，保卫解放区，直至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一日国共双方签订停战协定后，才又回到临沂。在这期间，张云逸在临沂主持军部和军区工作，为调整、组建部队做了许多工作。各地到军部分配工作的团以上干部，张云逸都亲自接见谈话，使他们愉快地奔赴新的岗位。张云逸还安排布置了对敌军的策反工作。他对不愿做敌军工作的一位同志说，派你去策反敌人，比多几个师、几个旅都重要。那位同志被说服，后来在策反敌军工作中起了重要作用^②。

一九四六年二月，张云逸去延安，随即又于三、四月间从延安带一些干部回到山东。这时，他一面配合党中央争取国内和平民主的斗争，揭露国民党破坏和平谈判和停战协议、发动内战的阴谋；一面领导我华东军民开展减租、生产和练兵运动，做好自卫战争的准备，对国民党的进攻进行自卫反击。四月十六日他通过新华社发表谈话，以停战协定生效至三月二十

^①1946年1月7日中央军委关于新四军与山东军区合并及分工问题的决定。

^②韦国清：《怀念张云逸同志》，1984年11月18日《人民日报》。

五日，仅山东境内蒋军向我进攻次数即达一百八十余次；在胶东地区，先后占我村庄四百余处，在华中地区占我城镇九十七处的事实。说明在停战令下达后，我方即命令所属切实遵守，停止军事行动，但蒋军却从未停止其对我的军事攻击与敌对行动，揭露了国民党挑起内战的阴谋^①。

为了做好自卫战争的准备，华东局和军区决定开展百日练兵运动。张云逸在给部队作报告和为《大众日报》写的《全军加紧训练、迎接整编任务》专论中^②，强调这次练兵运动的内容，应当是七分政治，三分军事；提高思想认识；整理组织机构；整顿部队军容。政治训练应以时事教育为中心，明确我军浴血奋斗其目的是为建立民主统一的新中国；我军是来自人民，属于人民，为人民服务的军队，今后更应发扬我军为人民服务的优良本质，更加学习毛泽东思想，提高政治理论水平；不因由于实现政协决议，整编全国军队，在组织形式上可能有改变，而改变我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永远为人民服务的本质。他说，军事训练则以整顿军容，加强管理教育，健全各种制度，力求正规化为主。前方机动部队要以一定的时间进行技术训练。在训练中一切工作均应贯彻群众路线，发扬民主作风，抓紧思想领导。经过百日练兵运动，我军在思想上、政治上提高了对当时形势发展的认识，赢得了全军上下团结一致，并使党外民主人士认识到我军真正是为和平民主而斗争的军队。

百日练兵结束后，针对国民党正准备发动全面内战的形势，张云逸同华东局的领导同志，又于一九四六年五月二十九日再次发出练兵工作的指示。指示提出练兵教育的内容，应以

^①新华社山东 1946 年 4 月 16 日电。

^②1946 年 3 月 3 日《大众日报》。

练射击、刺杀、投弹等三大技术为准，并附以必要的土工作业、爆破作业；加强防空与反坦克、防炮的教育；地方部队应以射击、投弹、地雷、爆破技术为主。强调搞好练兵，是决定战争胜败的重要因素，应当把练兵工作看作目前部队的中心任务之一，要重新掀起备战热潮，使我全军战斗力更加提高一步。经过这次掀起的练兵运动，为粉碎蒋介石挑起的全面内战、进行自卫战争作了准备。

一九四六年六月，全面内战爆发。陈毅作为山东野战军司令员，主要精力是在前方指挥作战，军区的军事工作主要由张云逸主持。这期间，他领导了山东军民配合野战部队进行自卫战争。六月二十一日，敌五十四军由青岛沿胶济路向西进攻，先后占我胶济路东段的即墨、南泉等地。七月五日，敌又开始从济南沿胶济线东犯，先后占我济阳、邹平、周村、淄博、张店、金岭镇等地，企图与青岛西进之敌打通胶维铁路。张云逸同黎玉等根据当时形势和敌我力量对比，于七月二十六日发出指示，要求我各军区与敌长期纠缠斗争，牵制敌人；以地方武装同民兵结合开展游击战争，迷惑、消耗敌人，寻求敌之弱点，然后集中主力歼灭其一部，积小胜为大胜，以期转变战局，并配合野战军的南线作战。八月二十七日，张云逸等又指示我胶济线上各兵团，应各自集中主力寻找敌较弱的一点或数点坚决打击消灭之，胶东兵团应集中优势主力有重点地打击敌五十四军西进部队，以求得歼灭其一路或一部；鲁中渤海兵团及地方部队，须在胶济西段积极向敌七十三军、第八军之侧后不断打击，以牵制其不能东犯，配合胶东兵团作战；各地方武装、民兵则应广泛发动游击战争及地雷战，有力地配合主力作战。根据这些指示，我军经过两个月在胶济西段连续阻袭及反

击敌人，歼灭了敌七十三军、九十六军等部七千三百余人；在胶济东段的胶县、高密等地也给敌五十四军等部以重大杀伤。使敌企图在半个月内打通胶济线的阴谋完全破产，保卫了解放区，配合了野战部队的南线作战。

当侦知敌正布置向我胶东北部进攻，企图切断我山东与东北海上联系时，张云逸同黎玉等于一九四六年十月三十一日发出指示，要求我胶东各地党、政、军、民紧急动员起来，充分进行备战，以迎接和粉碎敌人的进攻。指示还要求加紧主力部队的整训，总结集中主力歼敌之一路的经验；加强地方武装游击队、武工队、民兵之组织配备，作为就地展开游击战、地雷战的准备，同时做好必要时撤退的准备；秘密分散转移粮食及物资、兵工原料，预先布置在各主要点线上的秘密情报、交通站等。十月三十日敌五十四军及整编六十四师等开始向我胶东北部地区进攻，先后占我平度、掖县等地。由于我胶东各地党政军民预先做了准备，在敌人进攻时不断予以打击，在一个多月的战斗中，取得了歼敌一万五千余人的胜利，还一度收复平度、掖县，粉碎了敌人占我龙口、断我与东北海上联系的计划。我鲁中的第四、第九师为配合胶东作战，也一度攻占了安丘县城。

张云逸在主持山东军区军事工作期间，对于组织和建立地方武装极为重视，并做了许多工作。一九四六年下半年，他在一次会议上作了《关于组织地方武装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的发言^①，专门阐述了建立地方武装的重要意义以及在组织地方武装中应注意的问题。他指出，地方武装的建设是中国革命武装

^①1946年11月1日中共华东中央局编印的《斗争生活》第42期。

斗争重要问题之一，在十年内战、八年抗战中都起了伟大的作用，尤其是在蒋介石反动派集中全力向解放区进攻，我们需要集中主力机动作战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坚强的地方武装配合，要取得胜利是极端困难的。因为，如果没有地方武装，要保卫地方安全，要配合主力机动作战，要给主力不断的补充；主力转移时，要就地坚持游击战争，配合主力外线作战，待机反攻，恢复失地等等都是不可能的。为了建设坚强的地方武装，张云逸还就建立地方武装要保证党对地方武装的领导；地方武装干部的配备和培养；地方武装成分的纯洁和新老成分的调剂；武器和火力的配备；地方武装的供给以及政治、军事的训练等问题作了具体的安排和布置。在张云逸的领导下，山东的地方武装得到了广泛的发展，发挥了重大的作用，谱写了野战军、地方军和广大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的巨大威力的新篇章。例如，为配合野战军进行鲁南战役，鲁南三军分区地方武装在郯县码头、新村一线，沿沂河东岸进行防御。保证了北上主力侧翼的安全，维护了华中、山东境内的交通。一支支民兵爆炸队，深入到兰陵、邳县、峄县、台儿庄等边沿区，在敌人经常经过的河边、路旁、直至据点周围，大摆地雷阵，袭扰杀伤敌人，迟滞敌人的行动。又如鲁中沂南县高、金飞行爆炸队，从博山调至鲁南后，转战于锄头林、兰陵、洪山等地，四次用地雷阻击二十六倍于己的敌人，杀伤了大量敌人，圆满的完成了任务。

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央决定华中分局与华东局，华中军区与山东军区，华中野战军与山东野战军机关合并，使华中与山东的领导力量得以统一。为了进一步统一和加强华东全军的指挥，一九四七年一

月，中央又决定取消新四军番号，分别成立华东军区及华东野战军。陈毅、粟裕分别为华东野战军正副司令员；陈毅、张云逸分别为华东军区正副司令员。华东军区的军事工作主要仍由张云逸主持，继续领导地方武装，配合野战军作战。

在一九四七年二月进行的莱芜战役中，张云逸等领导组建起来的地方武装起了重要作用。当敌人以八个师分三路北犯临沂，北线李仙洲集团三个军又南下新泰、莱芜策应，企图与我主力在沂蒙山区决战时，我主力为了北上莱芜歼灭李仙洲集团，在南线则以一部阻袭敌人，逐步诱敌深入，主动于二月二十五日撤出临沂城。张云逸领导各地方武装，为配合主力作战，以积极行动向胶济线展开破袭战，一夜之间将坊子至兰村二百余里的铁路完全破坏。莱芜县委组织了十万余民兵，对铁路连续七夜大破袭，完全切断了敌人的交通，使敌人进退无路，联络中断，成了瓮中之鳖，为主力部队分割歼敌创造了条件。战斗打响后，各地组织的一百二十个子弟兵团，村村布雷，节节阻击，日夜袭敌。鲁中警卫五团在配合歼击七十三军之三十七师战斗中，将该师师长击毙，俘敌及缴获也不少^①。其它地方武装在配合主力作战中也取得很大胜利。为表彰在莱芜战役中各地方武装配合主力作战取得的重大胜利，张云逸特通报嘉奖，并鼓励他们继续努力扩大战果，以达到整个战役的全部胜利。

一九四七年四月，蒋军开始对山东解放区进行重点进攻。张云逸组织、指挥地方部队坚持斗争，避免了损失，赢得了胜利。

一九四七年八月，华东我军挺进鲁西南地区向敌进攻，开

^①1947年2月23日张云逸、黎玉关于地方武装部队活动情况的报告。

始了华东我军的外线作战。此时虽然民兵、地方武装进行分散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大大减少了，但张云逸对地方武装和民兵自卫队的建设仍然十分重视。一九四八年七月六日，他在华东局高干会议上提出的《山东人民武装今后工作的意见》中就明确指出：解放区的民兵自卫队不是可以不再加强领导，不再加强建设，甚至可以取消了。相反的还要努力广泛的建设民兵自卫队武装，扩大充实其组织，加强其训练，增加其质量与数量。只有这样，才能作为警备力量巩固后方民主政权，才能在边沿区坚持游击战争，保卫人民，才能在后方防止和镇压地主阶级的反抗，保护农民的土地改革，同时支持人民解放战争。因此，巩固后方，支援前线，仍是民兵自卫队武装的基本任务。他还阐述了民兵自卫队是劳武结合的人民武装的性质，提出了普遍发展民兵，使之成为国民后备兵的民兵发展方向。这对于在新形势下加强民兵地方武装工作，更有力地巩固后方，发展生产，支援战争，夺取全国的胜利具有积极的意义。

一九四七年八月初，为便于支持主力作战，华东局和华东军区机关由张云逸、邓子恢率领转移到渤海惠民地区，由张云逸、邓子恢等组成党的华东后方工作委员会，张云逸为书记，领导华东后方工作和渤海地区的土改、整党、三查三整和整顿后方等工作。由于战争发展的规模越来越大，支援战争的任务越来越繁重。一九四七年下半年，华东解放区的财政经济出现了困难。华东局工委召开了高干会议，通过了关于“精简编制”、规定“供给标准”、“清理资财”三大方案，以克服财政的暂时困难。张云逸在这次会议上作了《坚决反对山头主义、本位主义与贪污浪费》的发言。指出，在大规模的自卫战争中，不论任何一个地区，一个部队，一个机关部门或个人都

没有力量单独支持，如果没有全国解放区所有的群众的伟大力量以及党政军的力量积极支持，则不能获得战争的胜利。为此，必须克服由于我军长期处在游击战争的分散环境所养成的山头主义、本位主义。必须在部队中、党员中，深入进行教育，使每个同志懂得党和阶级的利益高于一切，个人和少数人的利益要服从党和阶级利益，懂得我们的人民军队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是为个人或少数人服务，才能彻底执行会议通过的三大方案，克服暂时的财政困难，支援战争，夺取战争的胜利。

在贯彻执行三大方案，克服财政困难，支援战争中，张云逸同邓子恢、曾山等带头把自己的小厨房取消了，同大家一起吃大灶。由于张云逸等在后方埋头工作，依靠各地方军区党政军民的共同努力，虽然在困难的条件下，仍然保证了对前方的后勤支援，使战争取得了胜利。在三年解放战争中，山东人民有七百多万人参加了支前工作，将八亿五千多万斤粮食及巨量的作战物资运到前方，使我数十万华东野战军，在大兵团运动作战中，有了可靠的物资保障。一九四七年秋，为解决我军转入外线作战部队的冬装问题，华东野战军的领导同志要求后方在十月前务必使前方战士都穿上棉衣。为此，惠民地区的党和政府发动群众，全力以赴，组织人员调集布匹、棉花和生产工具，日夜赶制。在当时物资条件极为困难的情况下，只用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提前完成了赶做棉衣的任务。在整个淮海战役中，山东解放区每天平均运出原粮三百万斤，在各解放区支援前线的四亿五千万斤粮食中，山东就占了两亿三千万斤。淮海战役后，为支援我军渡江南进，张云逸主持军区后勤工作，在一九四九年一月初就提出了对前方需要的兵员、弹药、被

服、粮食、现金、医药、电讯器材、运输工具等必须抓紧时间及早预作准备。对于所缺物资，又提出了清理仓库，加紧生产，尽力采购，厉行节约等办法加以解决^①。由于有了准备，我军在渡江南下时，山东人民又全力“推着小车”，载着支前物资下江南，为渡江战役，以及解放南京、上海作出了贡献。

张云逸对拥军优抚工作十分重视。为了加强荣军工作的领导，统一华东地区的优荣工作，成立了华东荣军管理委员会，张云逸任管委会主任委员。在一九四七年四月十六日的第一次管委会上，做出了统一和加强荣军工作的决定，采取了建立荣军学校、规定伤残荣军的分类及复员安置生活待遇等措施，并切实加以贯彻落实。这对于鼓舞前方将士、安定后方工作起了积极作用。

在战争、土改不断发展的新形势下，要求我党适应新的形势，不断加强我军的建设，以担负解放全中国的伟大使命。张云逸对此极为重视。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四日，他在渤海军区政工会议上作了《目前建军中几个基本要求》的报告，紧密结合战争形势、土改和整党的要求，阐述了人民解放军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它是坚决的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为人民的利益而战斗的。针对当时我军存在的各种问题，他提出了军队建设的基本要求：要保证党在军队中的绝对领导；认识目前的政治任务；保持无产阶级思想的纯洁性，在组织上要有明确的阶级路线，防止阶级异己分子混入；加强铁的纪律，发扬民主作风等。随后，根据中央关于开展新式整军运动的指示，他又组织领导山东各地方军区进行三查三整，提高了干部战士

^①1949年1月4日康、张、曾关于《军队南进后勤准备意见》给陈、饶并报中央电。

的觉悟，增强了我军的政治素质。

在军事建设上，张云逸除了注意战略战术、军事技术外，还重视从新的军事装备、建设新的技术兵种上建设我军。一九四六年，在研究山东军政干校的教学方针时，张云逸就提出要建立特种兵。根据当时的需要和可能，他特别提出要建立炮兵，要训练炮兵干部，在军政干校中要成立炮兵大队。新四军与山东军区在临沂合并成立炮兵司令部时，他知道陈锐霆搞过炮兵，就要陈负责炮司的工作。鲁南战役后，缴获了敌人不少坦克、大炮，在张云逸的提议和其他领导同志的积极支持下，成立了特种兵纵队，任命陈锐霆为司令员。为了建设炮兵，张云逸把自己骑的大骡子，也送给炮兵部队拉炮去了。随着战争缴获的增多，炮兵部队也不断壮大，一支强大的炮兵部队、特种兵部队在战斗中成长^①。

张云逸还十分重视我军干部队伍的培养提高，他亲自担任山东军政干部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后为华东军政大学校长兼政治委员，为我军培养了大批军政干部，输送给野战部队和各军区地方部队、党政机关，解决了军政建设中干部的急需。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一日，中共中央军委颁发了全军整编命令，华东野战部队整编为华东野战军（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五日又改称为第三野战军），同时按地区建立各级军区，华东军区为一级军区，下辖山东军区等二级军区。张云逸任华东军区副司令员兼山东军区司令员，继续在后方主持华东军区和山东军区的军事工作。

一九四九年三月，张云逸赴河北平山西柏坡，参加党的七

^①1982年3月30日访问陈锐霆谈话记录。

届二中全会，聆听并参加讨论了毛泽东在会上所作的报告。会后，他返回驻地，主持召开了山东军区会议，作出了关于建军、治安、生产、支前等工作的指示，并在四月二日举行的山东军区正式成立大会上传达了这些指示。随后，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正确路线、方针的指引下，张云逸为进一步加强人民军队的建设，恢复和发展解放区的生产，肃清土匪、巩固解放区，支援大军渡江南下、解放全中国作出了贡献。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二日，党中央电示华中局并华南分局：同意广西省委以张云逸任书记兼省政府主席，陈漫远、莫文骅、何伟、李楚离为第一、二、三、四副书记，陈漫远兼省政府第一副主席。这时，他作为华南解放军的首席代表，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开幕会上，代表华南解放军作了发言。在这次会议上，张云逸被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十月十九日，张云逸又被任命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十三）

一九四九年十月，张云逸就任广西省委书记和省政府主席之后，就以主要精力筹建广西的党政军领导机关。他在离京前，就同陈漫远等商谈了进入广西应注意的各项问题。他提出要注意同进入广西的部队搞好团结，同广西地下党搞好团结，要熟悉和团结各方面的干部，要正确对待起义人员，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同他们合作共事。张云逸到广西是从北京经济南、徐州、上海、南昌、赣州、韶关、广州，最后到达南宁

的。一路上，他向华东局、华南分局要支援干部，并了解上海、广州解放的情况和开展工作的经验。贺希明、骆铭等就是他向华东局要求调到广西的；原是广西籍的干部能回广西工作的，张云逸都积极要求把他们调回广西工作^①。陈漫远经武汉、长沙到桂林，一路上也向华中局要干部，乔晓光、赵茂勋等就是从湖南调到广西的。由莫文骅率领进入广西的十三兵团留下来的干部和广西地下党及游击队，则是最初成立广西军区的主要部队和党政军机关干部的重要来源^②。广西解放后，又开办了广西人民革命大学，张云逸兼任校长，各地委也开办了干校，培养了一批干部，解决了解放初期广西干部的急需。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至十二月二日，我军将白崇禧集团主力围歼于博白、陆川地区。十一月二十二日桂林解放。十二月四日南宁解放。十二月十一日镇南关（现为睦南关）解放。至此，广西全境宣告解放。张云逸进入广西后，立即着手建立军管会，先后成立了桂林、柳州、梧州、南宁等市的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着于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九日正式成立广西军区，张云逸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莫文骅任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李天佑任副司令员。广西军区领导各级军管会继续肃清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残余势力，接收国民党的省、县各级机关，接收官僚资本，建立各级临时人民政府。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很快克服了解放初期社会的混乱和匪特的破坏，建立了革命秩序，保护了国家和人民的财产，恢复了工厂、学校、医院的生产、教学和医疗工作。经过和工、农、学、商、青、妇等各阶层各界座谈和召开人民代表会议，充分同各民

① 1981年8月3日访问骆铭谈话记录。

② 1982年3月7日访问陈漫远，3月12日访问莫文骅谈话记录。

族、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座谈、协商，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一九五〇年二月八日以张云逸为主席的广西省人民政府正式成立。一九五〇年十月二十三日至十一月二日，广西省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召开，张云逸致开幕词并作会议总结发言。他指出，这次会议主要是讨论如何肃清匪特、完成重点土地改革试点这两个任务，会议要充分发扬民主。他说，土改是关系着一千五百万广西人民生活的大事，希望大家多多提意见，说错了经过大家讨论，可以取得一致意见，没有关系，说对了人民有好处。他的这番话，受到全体代表的热烈鼓掌，表示衷心拥护。代表们说：共产党真讲民主，真正是为了团结大家办好事情的。会议期间张云逸还给出席会议的工农代表、少数民族代表每人赠送一套衣服、一双力士鞋、一条毛巾，并附上一封信，表示党对他们的关怀和爱护。张云逸这种平易近人、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充分发扬民主的作风，使这次会议开得非常融洽。经过充分协商，产生了广西省第一届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张云逸被推选为主席，陈漫远、莫文骅、陈此生、莫迺群、张一会为副主席。

在这期间，张云逸还担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委员、华南分局第二书记、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

张云逸在主持广西工作期间，勤于到处去了解情况，作出正确决策；善于团结党内外干部，团结各民族、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开展工作。他同陈漫远、莫文骅、何伟、李楚离、李天佑、雷经天等省委、省军区、省人民政府的领导人都亲密团结，各项重大问题都在张云逸的主持下，经过集体讨论作出决策，然后分工负责去作^①。一九五〇年二月，张云逸参加中南

^① 1982年3月7日访问陈漫远，3月12日访问莫文骅谈话记录。

行政委员会会议。同年六月，张云逸参加了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之后，他坚决按照全会所提出的任务和方针政策进行工作。在他的主持下，在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期间，广西以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为中心，开展了一系列工作，取得了重大成就。

张云逸针对广西解放初期金融市场混乱，物价波动和收支不平衡的情况，主持省委进行统一货币，稳定物价的工作，迅速地禁止了金银外币流通市场，使全省物价很快趋于稳定。为了平衡财政收入，省委于一九五〇年二月二十八日至二十四日召开了全省第一次财经会议，具体制定了整顿收入、开辟财源、厉行节约、缩减开支，达到收支平衡的具体措施。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到同年十月，广西全省财经工作就走上了正轨，财政经济状况开始好转。在稳定物价、平衡财政收支的同时，为了恢复农业生产，省委提出了“生产自救”的方针，并确定以恢复生产作为一九五〇年广西农村工作的基本任务。为此，通过开展减租退押斗争，使农民获得了五十五万斤粮食，加之省政府发放救济粮一千六百万斤，发放农贷粮二百三十万斤，使农民渡过了春荒，恢复和增加了生产能力，农业生产逐步走上恢复和发展的轨道。张云逸还领导广西各级军管会按照中央的指示，没收了属于官僚资本的工矿企业，并立即组织进行恢复生产。其中政府增加投资使之恢复生产的就有十七个工矿企业，还有重点的扶助和领导私营企业恢复和发展生产；有重点的修整公路，恢复交通事业，建立国营商业领导机构和批发零售店、站，调整公、私商业经营范围和批零差价等，使工商交通事业也得到了初步的恢复和发展。到一九五〇年已恢复了生产的较大工矿企业就有三百八十二家，工商业开业户数比解放

前大为增加。到一九五一年底已恢复的公路干线达二千三百余公里，还开拓了梧州至信都的新干线，一九五二年六月修成通车。

解放初期的广西土匪极为猖獗，仅白崇禧集团被歼后残留下来的股匪，就有三万余人。他们同历史上的惯匪以及恶霸、特务、旧军官、反动地主串通一气，并配合美蒋反动派对新中国大陆进行侵略和颠覆；残杀革命干部、群众，破坏生产，扰乱社会秩序，危害十分严重。张云逸主持的广西军区，一开始就抓紧剿匪工作，并确定一九五〇年以“清剿匪特，巩固治安，发动群众”为全省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经过政治争取和全面清剿，一方面和平改编了大部分残留下来准备同我长期“游击”的军队；一方面消灭了不肯投降的股匪，还扑灭了危害最大的恭城土匪暴动和玉林土匪暴动。到一九五〇年六月底，猖獗一时的匪乱，基本得到平息，取得了剿匪的初步胜利。一九五〇年七月到九月，由于部队分别进入夏季休整，加之美帝侵朝战争爆发，美蒋颠覆活动加紧，残留的土匪串通反动地主、恶霸、旧军官、国民党反动骨干，煽动不明真象的落后群众，加紧进行暴乱，企图推翻新建立的人民政权。针对这种情况，张云逸主持广西省委和省军区于一九五〇年九月十八日发出了冬季重点进剿土匪的指示。经过两个半月的猛烈重点进剿，南宁、玉林、梧州等重点区域，基本上消灭了股匪，打击了土匪的猖狂气焰。但是，就全省而言，全部剿灭土匪的任务，仍然相当艰巨。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党中央对广西军区发出指示，要求在一九五一年五月以前一定消灭全省股匪，并对执行政策方面有过于宽大的偏向进行了批评。张云逸在十一月二十三日至三十日召开的省委第三次高干会议上作了《为坚决

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在半年内肃清全省股匪的任务而斗争》的报告，他代表省委总结了过去的剿匪工作，进行了自我批评，对明年五一前消灭全省股匪的指示表示坚决执行，并做了部署。此后，广西省委、省军区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加紧动员布置，经过从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到一九五一年初集中优势兵力，选择土匪盘据的主要区域，组织了强有力的围剿，先后剿灭了大小瑶山、六万山、十万山，以及天峨、南丹、西隆、西林、田西等处的土匪，完成了党中央限期在一九五一年五月一日前消灭全省股匪的任务。以后，又结合土地改革、清匪反霸，进一步肃清了散匪。总计从一九四九年十月到一九五一年八月，广西共消灭了土匪四十七万余人，取得了剿匪的完全胜利，巩固了社会秩序，打破了美帝妄图通过支援南越，进而以广西为跳板、以土匪作内应入侵我国的阴谋，巩固了祖国南疆的国防。

在清匪反霸、减租退押的基础上，张云逸主持广西省委领导了全省的土地改革。一九五〇年冬至一九五一年春，省委先在桂北和容县地区的十七个县进行了第一期土改试点，取得了经验。一九五一年九月十一日至二十六日，召开了以土地改革为中心内容的中共广西省第一次代表会议，决定将实行全省土地改革，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作为广西省一九五二年的中心任务。会议还按中央政策精神，结合广西情况，规定了土改的方针、政策和方法、步骤。党代会后，接着召开了广西省首届二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通过了与党代会内容相应的决议。此后，土地改革运动就在广西全省范围内开展，到一九五二年底全省基本完成了土地改革任务。在土地改革的胜利推动下，也完成了城市的民主改革和其它社会改革的工作。

广西是一个多民族的地区，居住着壮、汉、苗、瑶、侗、回、水家、毛难、仡佬、傣、侬、仡佬等民族。因此，处理好民族关系，对于巩固搞好各种社会改革和进行生产建设关系极大。张云逸在广西工作期间，对于贯彻执行共同纲领规定的“各民族一律平等，禁止民族间的歧视”，“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等政策极为重视。在省委、省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经过深入宣传党和人民政府的民族政策，全省消除了民族隔阂，加强了民族间的互相了解和团结。在此基础上，在一些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相继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到一九五二年底，建立了相当于县一级和区一级的自治区域就有龙胜各族联合自治县、大瑶山瑶族自治县、大苗山苗族自治县、三江侗族自治县等七个县。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九日还成立了专区一级的桂西壮族自治区。

一九五二年，张云逸因身体不好，中央调他到北京休养，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到苏联疗养。一九五三年夏自苏联回国后，在中央他历任中国共产党的第七、八、九、十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届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一九五五年九月，张云逸被授予大将军衔。一九六二年，张云逸任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

由于过去在革命战争年代工作过度紧张，又长期过着艰苦的生活，张云逸的身体显得过早衰老，但他一直保持着优良的革命品质和作风。

他对党、对人民忠心耿耿，把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虽然身体不好，但对中央召开的会议尽力参加，对人大常委会和中央监委的工作，仍然尽力去做。人大常委会要讨论的

文件，他都认真阅读、研究，参加讨论，提出自己的意见。

他虽然在党和人民政府机关中担任着相当高的职位，但仍然保持着平易近人，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优良作风。对干部、群众，对在他身边工作的秘书、警卫人员、勤务人员，都平等相待，他教育自己家人不搞特殊，经常要求他们在自己的学习、工作岗位上锻炼，为人民多作贡献。他告诉秘书和司机，家属不能坐他的车。

他一贯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重视下去视察工作，了解情况，先后去过山东、广西、广东、北京郊区等地视察，深入工厂、农村，同干部群众座谈。为了处理一封向人大常委会反映干部打击报复的人民来信，他到山东视察时，曾到文登县的一个小村，召开群众座谈会，弄清事实真相后，对那个干部进行了批评教育，会同当地党政部门妥善作了处理。

他毕生艰苦朴素，生活俭朴。住房该修了，但他怕花公家的钱，不让修。他用的公文包还是抗战时的战利品，样子已经很旧很老了，就是坚持不买新的。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十九日，张云逸在北京不幸病逝。党中央为他召开的追悼会于同月二十六日下午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由叶剑英主持，邓小平致悼词，对张云逸的一生作了高度评价。悼词说：张云逸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几十年来，他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在长期革命战争中，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忠于党忠于人民，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积极工作，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为革命事业贡献了一生。

作者附记：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系由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国革命博物馆、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江苏省档案馆、安徽省档案馆、北京图书馆、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史研究办公室、广东省党史研究办公室、广东省档案馆、安徽省党史研究办公室。滁县地委党史研究办公室、半塔纪念馆等单位提供的；还访问了张幼夫、朱云谦、张震、陈锐霆、成钧、赵启民、周骏鸣、谢飞、郭述申、黄岩、李世农、刘瑞龙、莫文骅、陈漫远、袁仕运、钟夫翔、云广英、林青、郭化若、张翼翔、谭知耕、张凯、罗若遐、侯正、郑重、金冶、李资平、赵俊、姜乃真、盛英、覃国翰、姜茂生、吴西、覃恩忠、黄超、何子友、谭庆荣、张明秀、叶超、沙林、张凯帆、陈茂辉、蔡圆、马长炎、张要先、姚杰、项明、栗亚、周华彪、卢永克、磨力、骆铭、黄荣、黄征、覃波、黄松坚、吴运铎、孙湘、黄凯、陈健、王剑青、张广华、廖荣铿、丛树芬、范进才、陈岸、詹克勋、廖联原、王效文、王益、芦秀玲、陈福兴、张从让、韩碧、张远之、王亨、张从琤、张从璜、张琼、张广东、曹莉冬等。

李 源

何锦洲 杨 清

(一)

李源，又名梦龙，一九〇四年出生于广东省东莞县^①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他在家乡小学读了二年书，便从事农业劳动。

一九二一年，为了生计，李源离别家乡，只身流浪到香港，在英国昌兴公司亚洲皇后轮船当海员，不久加入了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经常印发刊物给工会会员，陈郁、李源、陈权等在亚洲皇后轮船上组织海员阅读，并同大家一起讨论国家大事和争取改善海员生活待遇等问题。

为了丰富海员文娱生活，更好地把海员工人组织起来，李源提议成立一个剧团，得到陈郁、陈权等人的赞同。于是，他们发动海员捐款购买剧团道具。船上的包工头何沛出来干涉，说：“你们组织剧团演戏，影响做工，不行！”李源反驳道：“我们用工余时间演戏，怎么会影响工作？”^②其他海员也纷

^①李源早年离开家乡，后全家迁居香港，父母妻儿均已去世，其出生村镇尚待进一步查证。

^②崔丙南的回忆。

纷指责何沛的无理干涉。他们冲破工头的阻拦，凑了一百多元钱购置道具，组织起剧团，取名工余乐社。李源、陈郁、陈权等排练了一批群众喜闻乐见的龙舟、粤曲、粤剧等节目，演出后受到海员们的欢迎，从而逐步把海员工人吸引到工余乐社的周围，使工余乐社成为团结、教育海员的阵地。

一九二二年一月，在香港海员工会组织海员罢工前，李源、陈权等把海员的苦难生活编成歌曲，在海员中演唱，启发海员觉悟。一月十二日，海员工会宣布举行罢工。当晚，香港当局派华民政务司司长夏理德到海员工会威胁罢工海员。苏兆征跟夏理德说理斗争，李源领着工余乐社海员高呼：“不答应条件，誓不复工”^①！夏理德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香港当局为了阻挠海员罢工，于一月十三日发布通告，企图诱骗海员复工，说什么“船务东主允愿将各船员困难情节，磋商办法，如彼此仍有未协之处，则由政府即委公正人出为调处，务求妥善”^②。李源等人认为这是香港当局耍出的新花招，要罢工海员切勿上当，一定要船主签字同意加薪才能复工。接着，李源带领亚洲皇后轮船海员和苏兆征领导的其它轮船的罢工海员乘火车相继回到广州。

海员大罢工期间，正是寒冬季节，几万名罢工海员云集广州，生活非常困难。罢工海员每天仅能吃两顿饭，每餐伙食费只有一角钱，许多海员只穿一二件单衣或被麻袋御寒。为了鼓动罢工海员克服困难，李源带领工余乐社到罢工工人宿舍和街头、工厂、居民区开展宣传、控诉外国资本家对海员工人的压迫剥削，进一步启发罢工工人的觉悟，增强罢工信心，同时争

^①崔丙南的回忆。

^②1922年1月22日上海《申报》。

取广州各界群众的同情和支持。

香港当局对罢工海员最初采取高压政策，封闭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并强行将工会招牌抢去。这一暴行激起了工人的更大愤怒。香港当局又改变策略，企图用“调停”、“谈判”来破坏罢工。他们指使中国绅商集团出面，致电罢工海员派代表赴香港商谈，提出可以重新成立海员工会，只是改变工会名称，迁移会址。这些花招使少数海员动摇，认为只要工会可以存在，改名也无所谓。李源等反对这种看法，认为这是香港当局破坏罢工的阴谋手段。在李源等人的宣传影响下，二月十日罢工海员大会讨论了这个问题，一致决定要“将本会原状依旧恢复，才能派代表谈判磋商”^①。

香港海员工人坚持了五十六天的罢工斗争，终于迫使香港当局和轮船资本家答应海员提出的复工条件，罢工斗争最后取得胜利。经过这次斗争，亚洲皇后轮船的工余乐社成为该船团结海员开展斗争的核心。

当时，海员工会的经费比较困难，苏兆征到各轮船动员海员筹款支持工会。李源和工余乐社的海员一起到船上和馆口（海员岸上宿舍）演戏，把全部收入捐给工会作经费。

一九二五年夏，亚洲皇后轮上的海员工人在海外听到“五卅”惨案的消息，海员们非常愤怒。船在返航途中，李源接到准备罢工的电讯，立即召集工余乐社主要成员开会，秘密讨论组织罢工问题。船到香港海湾时，包工头何沛获悉香港工人已经罢工，企图阻拦轮船靠岸。工余乐社成员发动海员围住何沛讲理。何沛未能阻拦住轮船靠岸，但仍不死心，又带来香港

^①1922年2月19日《申报》。

警探，对海员们说：“五卅”事件跟香港政府无关，也跟你们无关，你们要安居乐业，不要罢工闹事！海员们立即反驳说：“帝国主义屠杀中国同胞，为什么跟我们无关？”^①接着，亚洲皇后轮船五百多名海员不顾包工头和警探威胁，在李源和工余乐社积极分子带领下全部离船上岸，参加罢工斗争。

八月，李源回到广州后，考进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十一月结业后，他被分配到省港罢工工人纠察队，在广东沿海港口执行封锁香港的任务。当时，由于封锁香港，农产品出口受到限制，影响农民对工人罢工的支持。李源和其他纠察队员一起，深入到沿海农村，开展反帝宣传，使农民群众提高了对省港罢工的认识，积极支持纠察队封锁香港。

李源带领纠察队除完成执勤任务和军事训练外，还定期组织政治学习，邓中夏、赵自选、熊雄亲自给纠察队讲课。李源文化水平较低，但他听课非常用心，认真做笔记，不会写的字就空着，课后虚心请教别人；还经常阅读省港罢工委员会主办的《工人之路》等报刊。经过学习，他不仅提高了文化，而且政治思想有了很大的进步。一九二五年秋，李源经苏兆征介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②。

一九二六年初，李源被任命为国民政府财政部缉私检查队指导员。他曾率领队员到石岐、江门等地巡逻，截获奸商和不法之徒的粮食、生猪等走私货物，送回财政部拍卖处理。他不辞艰辛、日夜巡查，在反走私斗争中作出成绩，受到财政部表扬。在这期间，李源跟顺德丝厂女工、共产党员丘脉闲在斗争

^①崔内南的回忆。

^②根据罗珠的回忆(1962年5月17日)。

中建立了爱情，并于一九二七年春结婚。

(二)

广州“四一五”反革命大屠杀后，中共广东区委改为广东省委，省委机关由广州迁到香港。李源担任省委特派员，从事秘密工作，负责与中共广州市委联系。四月二十二日，李源在广州市委举行的第一次会议上，传达了省委对广州市党的工作意见。会后，李源与妻子丘脉闲在广州太成街租房住下，坚持地下斗争。

一九二七年九月，党中央根据“八七”会议精神，指示广东省委“在广州城内，即需准备暴动，勇猛地号召手工工人、一般贫民起来夺取驻军警察武装”^①。李源根据上级指示，和广州市委负责人吴毅、周文雍一起研究了发动广州工人群众，准备武装暴动问题，决定一方面领导工人群众公开同反动派作斗争，另一方面秘密组织工人武装。

李源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开展工作，发展省港罢工工人利益维持队、海员义勇团等秘密武装组织，成员达四千五百多人，他指导和帮助这支秘密武装进行军事训练，和他们一起在市内散发传单，号召各阶层人民群众起来反对白色恐怖。

广州国民党反动派唆使工贼分裂工会，组织所谓“改组委员会”。李源组织工人群众同改组委员做斗争，把改组委员从工人宿舍和工会中赶出去。他还组织秘密工人武装，采取严厉

^①1927年9月《中央致南方局暨广东省委信》，载《广州起义（资料选辑）》，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8月版。

手段惩处改组委员，使那些工贼不敢轻易活动。

十月，粤系军阀张发奎的军队由江西开入广州，与当时统治广东的桂系军阀争夺地盘。十月底，汪精卫、陈公博由上海到广州，帮助粤系军阀出谋划策。粤系军阀重新伪装“左派”，企图骗取工人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为了揭露汪精卫等人的阴谋，李源和中共广州工委书记周文雍一起，发动在“四一五”反革命大屠杀时被驱逐的一千多名铁路工人和被解雇的五百多名火柴工人，齐集汪精卫的东山住宅“葵园”前示威，要求恢复就业。汪精卫拒绝接见工人，激起群众无比愤慨。这时，李源带领群众高呼“打倒汪精卫”、“拥护中国共产党”等口号^①，并组织队伍游行。游行队伍行至惠爱东路时，遭到反动军警的包围。周文雍、李源指挥工人与军警搏斗。李源英勇地夺过敌人的短枪，带领工人突围。周文雍和三十多名工人在突围中被军警逮捕。

周文雍是广州工人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被捕后，广东省委和广州市委决定，一定要设法营救，并组织以李源、沈青为领导的营救小组。李源认为，公安局监狱警卫森严，应首先诱使敌人将周文雍转移到别处，再乘机抢救。他与沈青、陈铁军等研究了行动计划，并秘密转告周文雍。按照计划，陈铁军打算用生姜、辣椒煎炒的食物托政治犯家属带进监狱。身患肺病又受了伤的周文雍吃了这些食物，很快发高烧，呈现重病状态，呻吟不止。狱中犯人见状都吵闹起来，要求将患严重传染病的周文雍转移到医院治疗。公安局反动分子听说周文雍病重，害怕重要政治犯死亡遭受上司责怪，只好同意把周文雍押到

^①李沛群、赖生声的回忆(1962年4月18日)，存中共广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九曜坊市立医院治疗。李源、沈青派人侦察了医院的地形、岗哨，组织人员抢救接应。那天上午，李源、沈青带领十多个工人伪装探病到了医院附近。中午十二点，正当医院站岗的警察换班时，沈青带领几位工人冲到哨位，以快速动作解除了门警武装。与此同时，李源率领几个工人飞快跑进病房，背起带着脚镣手铐的周文雍，迅速跑出医院，送上按约定时间开来的汽车，快速驰向沙河郊区，在一间茅屋附近停下，砸开周文雍的手铐脚镣，把他转移到一个安全的地下据点。

十一月中旬，粤系军阀把盘据在广州的桂系军阀驱逐出广州。李源和中共广州市委书记吴毅等共同研究，决定利用军阀忙于应付战争的时机，组织工人开展斗争，为武装暴动做好准备。十一月十八日，他们组织广州工人举行盛大集会，揭露粤系军阀的所谓“护党战争”，实质上是粤桂军阀争夺广东地盘的战争。会议通过了打倒军阀政权、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组织广东工农代表会议等八项决议^①。会后，组织群众示威游行，高呼口号。这次大会对动员广大工人群众开展斗争起了积极作用。

广州工人运动的高涨，使国民党当局十分害怕。汪精卫、张发奎为了驱逐广州工人阶级的中坚力量——省港罢工工人，采取发给每人九十元大洋后封闭罢工工人宿舍和饭堂的蛮横手段。李源等组织罢工工人在第一公园示威游行，表示抗议。反动派不顾工人反对，仍然封闭罢工工人宿舍和饭堂。李源协助省港罢工委员会安置罢工工人工作，并鼓励罢工工人继续斗争。反动派又派出大批军警，用武力驱散二万多省港罢工工人。然而不

^① 《布尔塞维克》第9期，1927年12月5日。

少罢工工人在李源等的鼓励下仍然留在广州坚持斗争，成为广州起义的一支重要力量。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中共广东省委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决定利用粤桂军阀混战的有利时机，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成立了“行动委员会”。李源根据行动委员会指示，同周文雍一起把广州工人群众组织省港罢工工人利益维持队、义勇团、剑仔队、工人自救队等改编为工人赤卫队，编成七个联队。他深入到工人群众中，组织大家学习《红旗》、《广州工人》等革命刊物，号召工人群众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十一月二十八日，广东省委秘密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广东省委员会号召暴动宣言》，李源立即向工人赤卫队员传达，鼓励大家积极准备参加武装起义。

为了便于组织工人群众参加武装起义，行动委员会把广州市划分为六个区，成立了暴动委员会。李源、邓发分别担任第五区暴动委员会正、副指挥。李源对邓发说：“我们负责这个区，反动武装非常充足，反动机关又如此重要，我相信这一次一定与反动派拚个你死我活罢！”^①

十二月十一日，广州武装起义爆发。李源和邓发分别率领第五区部分赤卫队员，手持短枪、大刀、长矛、手榴弹，攻打了米市路一带的敌人据点。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战斗，攻破了第五区警察署和王仙观驻军等军事要隘，缴获了一批武器。接着，李源又把赤卫队员分成七个小组，根据预先确定的名单搜捕反革命分子。那些平日作恶多端的反革命分子，有的正在蒙头睡觉，被李源率领的赤卫队员从被窝里拖了出来；有的正准备

^① 《悼念李源同志》，载《红旗周刊》1929年第2、3期合刊。

逃跑，也被抓获。

几个小时后，李源到起义总指挥部汇报第五区战斗情况，又受命率领赤卫队在广州长堤一带防守。十二日早晨，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联合对起义武装进行反扑。国民党第五军的两个团分兵两路由“宝璧”、“江大”两艘军舰掩护渡江。李源率领赤卫队在长堤用门板、铁桶、砖头构筑工事，与渡江敌人展开激战。敌两个团在炮舰掩护下曾四次进攻，都被起义武装击退。

鉴于敌军不断增援，敌我力量悬殊，起义军总指挥部决定保存革命武装力量，命令教导团、赤卫队立即撤出广州。李源率领赤卫队与疯狂反扑之敌浴血奋战，掩护起义武装主力撤退。完成任务后，李源命令赤卫队员分散隐蔽。他自己化装到香港，向中共广东省委汇报广州起义的情况，并出席了中共广东省委在西环羲王台召开的常委扩大会议，总结广州起义的经验教训。会后，李源根据省委的指示，到宝安县等地调查了解革命斗争情况，帮助各地党组织分析革命斗争形势，克服广州起义后悲观失望情绪，领导广大人民群众继续奋斗。

(三)

为了加强海南革命斗争的领导，一九二八年二月，中共广东省委派李源担任中共琼崖特委书记。

二月十一日，李源和省委派驻琼崖工作的黄雍一起，离开香港经海口乘车到嘉积市，然后步行。途中被敌人发现追击，李源临危不惧，一面开枪还击，一面向树林里撤退。这时，他与黄雍散失，只得独自绕道前进，连续走了十八个小时，终于

到达琼崖特委所在地东会县第四区。

李源到特委后，听取了特委负责同志的汇报，深入到乐会县第四区调查研究和总结斗争经验，并于二月十日主持召开中共琼崖第二次代表大会，贯彻省委对海南工作的指示精神。他在政治报告中总结推广了乐会县第四区关于土地问题的经验，号召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进一步扩大武装斗争，进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在全岛掀起土地革命的高潮。他的报告受到了与会代表的拥护。大会通过了有关暴动、政权、土地分配、职工运动、士兵运动等项决议，选举了新的中共琼崖特委。李源、黄雍、王文明、郭经绪、王卓余五人被选为常委，李源任书记。

会后，李源与琼崖工农武装负责人王文明、冯平等一起研究，组织了几支短枪队，深入到敌人后方突袭敌人据点。在斗争中，工农武装不断壮大，琼崖的工农革命军发展到一千二百多人，农军三千多人。随着军事上的胜利，海南各县纷纷建立了县、区、乡苏维埃政府，随后又成立了全琼崖苏维埃政府，使没收与分配地主土地的斗争迅速开展起来。

正当李源在海南领导人民群众掀起土地革命热潮的时候，中共广东省委于一九二八年三月通知李源回省委机关工作，任省委常委，负责营救邓中夏等被捕同志。受命后，他了解到香港当局没有抓到邓中夏等人任何证据，便到处奔波筹款，请律师，为邓中夏、罗登贤等辩护。终于把他们营救出狱。

不久，李立三离开广东，李源接任广东省委书记。当时，全省正在发动农民开展武装斗争。李源积极领导这场斗争，并引导各级党组织克服单纯军事行动，组织广大农民群众进行土地革命，没收和分配地主土地，建立农村苏维埃政权。海南陵水

县早在一九二八年一月就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但今年四月，在反动武装包围攻击下失败了。李源分析了陵水失败的原因，认为主要是没有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和分配土地给农民，因而不能把农民充分发动起来。他要求海南和全省各地党组织从陵水失败中吸取教训，克服单纯依靠军事行动的倾向，深入宣传土地革命，凡已夺取政权的乡村，应该迅速没收和分配土地，以保卫和巩固红色政权。

随后，李源亲自到东莞、宝安等地农村调查研究，深入到穷苦的农民家中访问，和农民谈心。了解到农村中地主、土豪残酷压迫剥削农民，群众生活十分痛苦，但一些基层党组织不关心农民的切身问题，开口便讲武装暴动，从而脱离了群众，斗争开展不起来。根据调查情况，李源召集省委常委开会，研究进一步发动农民开展土地革命问题。接着，省委向各级党组织发出指示，要求党的干部要切实了解农民群众的疾苦，提出切合群众要求的口号，开展群众性的小斗争。广宁县委最初对小斗争的意义认识不清，仍准备用大暴动来发动群众。李源发现后，立即批评了广宁县委的错误，并帮助县委分析开展小斗争的可能性，从具体情况出发，研究了斗争的做法。在李源的具体指导下，该县通过抗缴筑路经费，开展反对地主豪绅的群众性斗争，终于把农民群众逐步发动起来。

在农村土地革命斗争中，李源十分重视建立农民武装。他领导各地党组织首先把大革命时期散失的农军集中起来，改编为农民赤卫队，并进行政治和军事训练，使农民赤卫队在土地革命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与此同时，李源派出干部到各地帮助农民开展土地革命，及时掌握各地斗争情况，纠正各种错误做法。当他发现东江特

委在工作中注意潮安、惠来、普宁三县，而忽视其它各县工作，便以省委名义指示东江特委：不可“将目光专注意惠来或湖惠普三县，必须同时对海陆丰、紫金、五华、潮安、揭阳乃至潮梅各属，加以切实注意……”。因为各县同时能动作起来，方可使敌人疲于应付”^①。一九二八年六月，东江特委在领导武装斗争中采取硬打硬拚的盲动做法，使斗争遭受挫折。李源知道这个情况后，立即下令制止，避免了东江革命遭受不应有的损失。

一九二八年夏，中共广东省委和李源领导全省农村开展夏收斗争，决定以党组织比较健全的县作为斗争的中心，与邻近各县互相联系，以带动其它县的斗争。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广大农民群众的斗争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其中有六十多县建立了县农会。

(四)

中共广州市委机关在一九二八年上半年两次遭到敌人破坏，派往广州坚持工作的周文雍等先后壮烈牺牲。李源秘密地来到广州恢复党组织，重新成立广州市委，编印《工农兵》、《手榴锤》等刊物，开展宣传，发动工人群众，取得很大成绩。

一九二八年六月，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李源没有出席六大，但被选为中央委员。十月，李源召集中共广东省委机关干部开会，学习和领会党的六大文件精神。会后，李源到东江传达六大精神，领导东江人民开

^① 《中共广东省委致东江、潮梅特委信》（1928年6月8日），载广东省档案馆编《中共东江特委档案选编》（内部发行）。

展革命斗争。

当时，东江地区形势比较紧张，国民党反动派大肆搜捕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省委派去几个干部先后牺牲。李源出发前对丘脉闲说：“我这次到潮汕、兴梅工作，你已怀孕不能同去。粤东斗争很复杂，如果我牺牲了，将来生下孩子，教育他继承革命事业。”^①

李源先后到了潮阳、普宁、惠来、揭阳、丰顺等县了解情况，向各县党组织负责人和在大南山、八乡山坚持武装斗争的领导人传达了党的六大精神，布置了斗争任务。他说：“第一次革命高潮已经过去，第二次革命高潮尚未到来，我们的斗争方式必须改变”。“不能硬拚硬打，必须善于调动群众”，“壮群众胆量，然后逐渐引导群众以年景不好要求减租减息，一直到抗租抗息的斗争，结合地下武装，待机行动”^②。粤东各级党组织根据李源的指示，深入群众，做艰苦细致的工作，逐步地扩大了党的影响。潮阳、普宁、惠来、澄海、饶平、五华、丰顺、大埔、兴宁、梅县等地农民减租减息斗争迅速开展起来。八乡山、大南山、凤凰山、桑浦山、铜鼓嶂先后成立了农民革命武装，为后来建立东江革命根据地打下了基础。

十一月初，李源从丰顺县出发准备到大埔县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由丰顺到大埔，要经过三河坝渡口。渡口没有党的秘密联络点，地下交通员用钱买通了把守渡口的民团，党的干部经过这里，只要说一声就免受检查，顺利通过。这一次，

①方世林的回忆。

②方方：《四十年来普宁革命运动史纪要》（初稿），载《广东老革命根据地人民斗争历史资料》，存中共广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交通员送钱给民团时麻痹大意，说：“今天有重要负责人经过渡口，请予方便”^①。民团知道捉到共产党重要干部可以发大财，立即向警察告密。当李源到达渡口时，埋伏在四周的便衣警察蜂拥而出，逮捕了他。在狱中，敌人严刑拷打李源，要他供出粤东党组织和游击队的情况。李源宁死不屈，保守党的机密，最后被敌人秘密杀害。

李源牺牲了，他英勇战斗的顽强精神，永远激励着人民奋发前进。中共香港市委书记邓发说：“虽然李源同志牺牲了，但他一生奋斗的精神，都有深刻的印象在无数的工农兵群众的心坎里。他的鲜血可以凝成革命的鲜红的血花！”^②

①李沛群回忆。

②《悼李源同志》，《红旗周刊》1929年第2、3期合刊。

沈 剑 华

孙自诚 文耀奎

沈剑华,原名沈传勋,化名宋家珍,一九〇四年九月十九日出生于湖北省黄梅县沈家湾一个贫苦的谱匠家中。沈剑华是赣北红军游击队的创建人之一。历任中共德安县委书记,中共江西省委农委书记、省委秘书长、省委书记等职。一九三〇年初,由于叛徒告密,英勇牺牲。

沈剑华五岁时,父母相继去世,在祖母抚养下,七岁开始读私塾,因家境贫寒,十二岁辍学,跟着做谱匠的小叔学刻字谋生。他看到农村中的贫富悬殊和穷人受欺压,非常气愤,遂离开家庭到城市另谋生计。

一九二三年春,沈剑华到了九江,在轮船码头上作搬运瓷器的工人,工人兄弟见他聪明、诚实,能吃苦,介绍他到夏宝记瓷器店学绘瓷器。

沈剑华在瓷器店时,结识了共产党员帅鼓农(曾任九江县长)、吴久思(曾任九江地委农民部长、九江县农协主席),熊振球(曾任国民党九江县党部常委)等革命分子,开始接受革命思想。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发生后,九江人民组成了“九江援助上海同胞惨死委员会”,工人举行总罢工,在租界附近与英、日帝国主义展开面对面的斗争,学生深入街头巷尾揭露控诉帝国主义的暴行,检查日货,捐款援助上海工人。沈剑华

积极参加了这些斗争，在斗争中提高了阶级觉悟。此后，他进一步靠拢共产党组织，主动争取共产党员的教育和帮助，“于一九二六年初加入了中国共产党”^①。

沈剑华入党后，遵照党的指示，离开夏宝记瓷器店，与人合伙在张官巷开设九景瓷业公司，他以公司老板的身份作掩护，秘密进行革命活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四日，北伐军攻克九江，沈剑华积极奔走于工人群众中宣传革命，大大激发了九江工人对帝国主义的仇恨。

一九二七年一月六日上午，九江市人民在中共九江地委书记曾延生的领导下，爆发了收回租界的斗争，数万群众齐集大校场，沈剑华手持“打倒帝国主义”的纸旗，高喊“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率领群众向租界进发，他们把租界团团包围。这时停泊在江中的英国军舰发空炮两响威胁群众，水兵上岸阻拦示威群众，并枪杀工人一人，打伤数人。沈剑华临危不惧，领着群众冲进租界，占领了英租界，英舰见势不妙，起锚开走。同月九日，以共产党人为骨干的九江市党部和九江总工会联合九江各公团和驻军，组成“九江市民对英外交行动委员会”（一名“英租界临时管理委员会”），处理英租界的一切事宜，迫使英国领事欧马利于二月二十日在归还九江、庐山租界的协议上签字。三月十五日，正式将租界管理权交还中国政府。

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七日，蒋介石指使九江的国民党右派势力和流氓地痞，捣毁了执行三大政策的国民党九江市党部，并打伤工人群众，杀害了工人纠察队员曹炳元。沈剑华面对敌人暴行，领导工人救出了被敌人包围的同志，随后又积极参加惩

^①徐上达：《关于星子农民暴动和沈剑华的历史问题答孙自诚问》（1956年7月）。

办制造“三·一七”惨案凶手的斗争。

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之后，国民党反动派在九江大肆逮捕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一九二七年八月九日，枪杀共产党员熊好生、戴振球等二十六人。沈剑华在九江不能立足，党组织要他暂时回家乡隐蔽。一个多月后，中共九江地委书记林修杰派交通员通知沈剑华，要他参加星子农民暴动。十月三日晚上，以林修杰为总指挥，徐上达为前敌指挥，沈剑华为前敌副指挥的星子农民暴动爆发了，沈剑华随同徐上达带领星子县和九江县属的马楚等地的数百贫苦农民，攻入了星子县城，县长及其他反动派深夜乘船从鄱阳湖上逃命，农民焚烧了租约和钱粮簿子，打开监狱，救出了省委巡视员淦克鹤和关押的群众。星子暴动揭开了赣北革命武装斗争的序幕。

星子暴动的第二天，林修杰、徐上达、沈剑华率领起义人员撤离星子县城，调集九江的同志，开始游击战争。他们从九江县小阳铺出发至湖口，试图夺回被流氓以警备司令部侦缉队名义诈骗去的枪械，没有成功，仍回到了小阳铺。这时，内部出了一个叛徒，他们活动被反动派探悉，受到敌人的围攻。在小阳铺一带不能立足，便转移到德安县秦山金盆寺，再调集德安县农民自卫军保留下来的一部分武装扩大游击活动。

一九二七年十月底，中共江西省委派张源健到赣北负责军事。沈剑华积极协助张源健开展工作，将游击根据地转移至德安彭山，将岷山彭山连成一片，在百华里内左右呼应，前后屏障，扩大了游击根据地和游击队的力量。同年十一月三十日，《中共江西省委致中央信》中说，星子农民起义的队伍“变成游击形式，至今实力尚保存。”十二月下旬，赣北工农游击队在德安县秦洞朱家垅朱村（今林泉乡屏峰行政村境内）举行成

立大会，张源健任队长，李凌云任党代表，沈剑华任副党代表。以后，游击队不断壮大，分别改编为红八军和红十五军。

十二月底，中共江西省委调沈剑华任德安县委书记兼军事部长。他冒着生命危险，化装深入到德安西乡白区的杨坊，将分散隐藏的党员组织起来，恢复杨坊的党团组织和农民协会。亲自率领县委的同志和赣北游击队武装，于农历正月十五日夜，在洞霄喻家山刘村、彭山湾里张村和张十八村铲除了当地的反动派，巩固了彭山游击根据地，群众称这次行动为“大闹元宵”^①。

一九二八年三月间，中共德安县委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沈剑华当选为县委书记。四月初，县委组织赤卫队配合由瑞昌回师德安的赣北游击队，与地方反动武装作战，打垮了夏家铺的团匪，击毙三名伤六名，俘虏十余名，缴获步枪二十九支。四月十七日，赣北游击队和德安各区赤卫队，当夜赶到邹桥王村，围歼反共靖卫团，经过一个多小时战斗，打死团匪数十名，缴长枪十六支，短枪一支，子弹和物资一批，“从此当地的党也得到发展，以后打黄老门、彭山上工作均有广大群众参加，此后军事上渐渐发展起来，与各地靖卫团交战，也有好几次。”^②

当时德安建立了四个党的区委和二十余个支部，全县有党员二百九十余人，“德安大部分乡村，差不多全都是我们的势力范围之下，虽无苏维埃组织，都差不多与割据相等”^③，毛

^①《德安县人民革命史》，内部刊印，存德安县档案馆。

^②中共江西省委：《江西军事工作报告》1921年5月4日，存江西省委档案馆。

^③中共江西省委：《江西工作近况—综合性报告》1928年7月，存江西省档案馆。

泽东在分析全国革命形势时，也肯定了德安革命力量，“以江西论，赣北之德安、修水、铜鼓尚有相当基础”^①。沈剑华主持德安县委工作所取得的成绩，为后来成立德安县苏维埃政府打下了基础。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十五日，江西省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在湖口县德舜乡王遂村举行，沈剑华出席了大会，被选为中共江西省委执行委员和省农委书记^②。当时省委机关一度设在九江，为了便于领导全省革命斗争的发展，省委派沈剑华到南昌市开展工作，以便省委机关相机搬回省城。

一九二九年三月间，沈剑华化名宋家珍抵达南昌。当时南昌反动势力猖獗，“党的组织自去年遭受了残酷的破坏，至今未能恢复组织和工作，仅仅保留九个同志在那里”^③。住旅社要铺保，住家要三户连保。沈剑华没有被困难吓倒，经过艰苦努力，很快在敢于展开斗争的牛行火车站、织袜厂、铅印厂和一些学生、知识分子、国民党士兵和警察中建立了十二个党支部，党员发展到四十三名。交通网伸向省内各城市。

后来，省委机关迁回南昌，沈剑华曾一度任省委秘书长，同年八月二十一日，他向党中央写报告，汇报江西的敌我情况，指出反动政权内部冲突在不断加剧，省委工作“最近比较进展了一点，已经发动了减租斗争，已取得了相当胜利，还在继续发动斗争”^④。同年九月，“中央决定，为加强江西工作，改组省常委，指定宋家珍（即沈剑华）为书记，君小云（即阮啸

^①《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02页。

^②《江西第二次全省党代表大会会议经过》，存江西省档案馆。

^③《中共江西省委报告》1929年5月20日，存江西省档案馆。

^④沈剑华：《江西省委工作报告——江西政治概况与工作概况》1929年8月21日，存江西省档案馆。

仙)为组织,吴道一(即王同根)为宣传。常委需特别加强南浔铁路及南昌至九江的工作。”^①

沈剑华到职后,召开了省委常委会议,根据党中央指示的路线,分析江西全省的斗争形势,对全省政治、组织、军事工作做了总布置,同意中央取消信江特委,成立赣东北特委,将信江特委管辖区域的地方党组织划归赣东北特委指挥的意见,对中央取消赣西特委的意见,提出了疑意,未予执行。

这时,省委的工作几乎全落在沈剑华一人身上。管宣传的常委王同根(化名吴道一),虽在南昌,但有病不能坚持工作;而管组织的阮啸仙(化名君小云)又因病去上海治疗;阮啸仙的爱人高恬波(在江西省委做交通和会计工作)在南昌牺牲。消息传到上海,阮啸仙用杜甫《蜀相》诗中“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二句来痛悼她。

一九二九年,江西各地的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不断深入,红色区域迅速扩大,造成了向南昌包围的形势,反动派对此惶恐不安。鲁涤平加紧了破坏我党组织的特务活动。十一月五日,敌人在吉安破获了我赣西特委总机关,从而牵连到省委机关。国民党南昌卫戍司令部严密检查吉安、赣州寄来的邮件,把赣西特委给省委的密信识破,逮捕了收信人李兴国(省委总交通员)。李兴国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下叛变,供出了赣北都昌等地通讯处——高文龙鞋店。高文龙被捕。沈剑华得到高文龙鞋店被破坏的消息,立即开会研究对策,通知有关同志切断和高店的联系。但省委发行分配科主任舒心嫩不以为然,竟于二十三日早晨跑到高店,当即被捕。舒心嫩叛变后,又把自己的

^①《中共中央致江西省委 350 赣 19 信》1929 年 9 月,存江西省委档案馆。

住地供出，大批中央、省委文件及各地报告被敌人抄去。这时省委还不知道舒心嫩被捕。二十四日，秘书处文件科主任刘企勋送都昌等地报告抄本到舒家保管亦被逮捕。省委常委胡子寿擅自跑到高店侦察消息也被敌人捕去。

在这危急时刻，沈剑华把生死置之度外，镇静自若，处理善后工作，决定把大部分同志疏散到各地工作。派吴道一到九江巡视，派赵丕良到赣东北特委工作，派张世虚到信江特委巡视，派张剑光到赣西特委工作。省委经费奇缺，沈剑华决定采取卖光借尽的办法，为奔赴新的工作岗位的同志筹集路费。还决定自己和冯任仍然留省城恢复省委的部分工作。这时冯任在街上接二连三碰见自首变节分子，在南昌无法立脚，沈剑华即要他赴九江、德安巡视，十二月一日，冯任离开南昌抵九江。

沈剑华只身居处虎穴，继续寻找恢复工作的线索，他在特务、叛徒到处搜捕的险恶环境下，于十二月三日离开南昌，赴九江与吴道一、冯任会合，商讨进一步的对策。他化装出行，一路上机智地躲过叛徒的耳目。到达九江找到了冯任，冯要他等中央交通员和阮啸仙回来，再到中央报告工作，在这之前先到九江近郊巡视。第三天，沈剑华正准备下乡巡视，不幸与中央交通员同时被捕，在九江狱中两天，即解往南昌关押在南昌卫戍司令部。

监狱中，沈剑华受尽了酷刑，受审时，他踢翻审讯桌，坚贞不屈，视死如归。国民党卫戍司令张辉瓒在给蒋介石的《破获中共江西省委报告》中无可奈何地说：“皆迷信共产主义甚深，于审讯时，态度倔强，大有以身殉主义，视死如归之概”。

一九三〇年初，沈剑华和九位战友一道英勇就义于南昌，

时年二十六岁。

附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

1. 振鹏：《江西的青年工农》，载《无产青年》1928年第4期。
2. 《九江地区革命斗争史年表》，中共九江地区革命史办公室编（未刊）。
3. 《九江革命斗争史》，九江市革命斗争史办公室编（未刊）。
4. 《德安县人民革命斗争史》，中共德安县委党史办公室编（内部刊印）。
5. 《星子县人民革命斗争年表》，中共星子县委革命史转公室编（未刊）。
6. 《德安县革命烈士传》，中共德安县委党史办公室编（内部刊印）。
7. 徐上达、宋昌杰、黄石子、邓炳秀等人的回忆资料。

戴克敏

袁新安

戴克敏，湖北黄安、麻城一带的农民领袖。一九二七年四月曾带兵平定麻城会匪叛乱。一九二七年十一月著名的“黄麻起义”领导者之一。随后创建柴山堡根据地和红三十一师。在战争中屡立战功。一九三二年三、四月间，在张国焘罪恶的“肃反”中遭受诬陷，惨遭杀害。

(一)

一九〇六年，戴克敏出生于湖北黄安县紫云区上戴家。父亲戴雪舫早年与董必武要好，是一个思想进步的乡村知识分子，以后加入中国共产党，为革命英勇牺牲。为戴克敏后来走上革命道路奠定了基础。

一九二四年，戴克敏考入武昌第一师范附属高级小学。学习期间，他结识了在武汉大、中学校读书的黄安籍学生戴季伦、王秀松、徐希烈等人。这些学生在董必武、陈潭秋的培养下，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戴克敏常与他们一起议论政治，传阅进步书籍，探求救国救民之道，思想益受启发。一九二四年底，戴克敏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参加了五卅爱国运动。一九二五年六月，武汉人民为声

援上海工人、学生、市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屠杀中国工人和学生的暴行，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罢工、罢课、罢市的斗争。戴克敏冒着被反动军警逮捕的危险，多次到汉口外国租界散发传单和张贴标语。这年暑假，戴克敏和一批在武汉读书的黄安籍学生回到家乡，采取走访、讲演、办农民夜校等形式，从事传播革命思想，发动和组织农民的革命活动。这期间，戴克敏等还在黄安创办了《黄安青年》小报，转载各地反帝斗争的消息和传播革命理论，在黄安人民中间掀起了反帝反封建军阀的高潮。同年底，戴克敏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①。

一九二六年，戴克敏升入武昌第一师范班学习。由于他在五卅运动中表现得勇敢积极，深受同学们的敬佩，因此被选为一师东斋秘密学生会成员。这时，武汉仍在吴佩孚的军阀势力统治下，武昌一师校长思想反动，他巧立名目，制定繁琐的校规，限制和干预学生参加进步的社会活动。为了冲破学校的禁锢，戴克敏等秘密学生会领导成员，在一师发动了一场反限制的斗争。他们强烈要求校方废除限制学生自由的校规，撤换不受学生欢迎的校长。结果，反动校长被驱走，限制学生自由的校规被废除，一师的学生运动更加活跃起来。

一九二六年十月，北伐军攻占武汉。戴克敏激动不已，他与同学们一起，深入大街小巷，张贴标语，进行演讲，号召群众支援国民革命军的北伐斗争。不久，戴克敏以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农民运动特派员身份到黄安指导工作。这时，中共黄安县党团特别支部（简称黄安党团特支）已由秘密活动转入公开活动，并将党团特支的办公地址，从七里坪迁到县城。戴克敏等

^①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烈士资料汇集》。

领导人决定从清算教育经费入手，与地主军阀支持的旧势力展开争夺教育局领导权的斗争。斗争的结果是党组织夺取了县教育局的领导大权。接着又用“至诚学款”^①开办了一大批公费学校和乡村贫民夜校，通过教育系统，往各区各乡派遣干部，以学校为立足点，扩大革命影响，组织发动群众。戴克敏等还利用国共合作的有利形势，经过积极努力，于一九二六年冬天正式建立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黄安县党部和县农民协会筹备委员会。戴克敏被选为县党部和县农协筹备委员会的常委，参加领导全县的工作，戴克敏还会同曹学楷、程翰香等深入七里、紫云一带的农村，召集群众大会，建立农民协会，斗争土豪劣绅。戴克敏经常向群众宣传未来的社会是“点灯不用油，耕田不用牛”的美好社会，以此鼓舞广大农民的革命斗志。在他们的发动和组织下，黄安农民运动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好局面，广大贫苦农民通过农民协会同豪绅地主进行斗争。一九二七年二月，中共黄安党团特支扩大为中共黄安县委和青年团县委。与此同时，黄安县召开了农民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县农民协会，戴克敏、王健等被选为县农民协会的常委，负责领导全县的农民革命运动。

在开展农民运动期间，戴克敏就十分重视建立农民武装的工作。一九二六年冬天，他积极支持吴焕先、吴先筹等在箭厂河四角槽门等地办三堂红学。一九二七年初，戴克敏等又抽出一部分接收的至诚学款与地主罚款，派人到武汉通过董必武购买枪支子弹，同时还请来一些铁匠修造旧“来复枪”等枪械。二月间，县农协挑选了一批积极勇敢的青壮年农民，组成了一

^①这是黄安县教育局控制着的一笔巨款，是黄安南乡一些资本家在沙市的六十年的存款，名为“至诚学款”。

支一百余人脱产的农民自卫军，有枪七十余支。随后，各区乡的农民自卫军也相继建立起来。四月间，还成立了黄安县农民自卫军管理委员会。黄安农民自卫军成为后来发动黄麻起义的基本武装力量。

(二)

一九二七年三月，受黄安县党组织的委派，戴克敏和汪奠川等进入毛泽东在武昌举办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毛泽东除给学员讲授《农民问题》、《农村教育》等课程外，还专题讲授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恽代英、方志敏、彭湃、夏明翰等都在农讲所授课。戴克敏亲聆一代革命导师的教导，如饥似渴地学习钻研农民运动的理论，积其所得，撰写了《农民运动在中国革命运动中的地位》一文，宣传农民运动的重要意义^①。

一九二七年四月底，麇集在河南光山县新集一带的豪绅地主，以红枪会为主力纠集了各种反动武装一万多人，在麻城县大恶霸地主丁枕鱼的儿子丁岳屏等带领下，向乘马、顺河等区发动了猖狂进攻，继而包围了麻城县城，制造了震动全省的“麻城惨案”。湖北省政府负责人董必武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在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召开了省政府、省农协联席会议，决定组织“麻城惨案调查委员会”。命令原在黄安县剿匪的一个警卫营，火速赶往麻城，并抽调农讲所三百武装学生星夜驰援麻城。戴克敏随学生军参加了这次平定麻城会匪叛乱的战斗。五

^①《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烈士资料汇集》。

月，学生军返回武汉。戴克敏为总结这次斗争的实践经验，撰写了《剿灭麻城会匪经过》一文。在文中，他详细地记述了学生军、警卫营在麻城农民群众的支援下，平定麻城会匪叛乱的战斗经过，并深有感触地说：“这次战斗，是我们没有受过许多训练的农讲所学生，第一次走上战场。我也在这次战斗中，才实际上过兵士的生活。以前的一切浪漫性情完全弃掉……。我们在武昌时，一向喊着打倒土豪劣绅的口号，这一次居然躬行实践，我觉得自己很安慰，总算实际上在革命中尽了些力，虽然这是微小的一点。”^①严酷的阶级斗争现实使他清醒地认识到：“现在革命已不是空口喊喊的事了！反革命者弓上弦刀出鞘，张开了他们贪狼饿虎似的大口，我们革命者若不自己武装起来，把我们的枪口对准敌人扫射，我们自己是没有命的！”^②因此，他大声疾呼：“中国革命在一天天紧张起来，同志们！武装起来！”^③

一九二七年六月下旬，戴克敏在农讲所学习期满，党组织派他回黄安，任中共黄安县委委员，并兼任县农民自卫军大队长。

七月十五日，武汉汪精卫政府叛变革命，黄安成为敌人“清剿”屠杀的重点。被反动派通缉的黄安重要共产党人共九十二名，戴克敏是其中之一。在白色恐怖下，黄安党组织转移到七里坪，戴克敏的家成为党开展活动的秘密据点。每逢同志们在这里开会碰头，商量工作，戴克敏家中的人便站岗放哨，烧茶做饭。在戴克敏的影响和带动下，他的几个叔父及亲房兄妹均先后参加了革命。

^{①②③}戴克敏：《剿灭麻城会匪的经过》，载《中国青年》第7集，第167期。

大革命失败后，党为了继续团结广大人民群众坚持斗争，重组了黄安县委，恢复了大革命时期防御河南光山南部红枪会进攻的防务委员会组织，戴克敏被选为县委委员，并被推选为黄安县防务会主要领导人之一，负责指挥全县的军事斗争。一九二七年八月，他同潘忠汝等一道，参加了处置由阴谋分子策划的农民自卫军一排叛乱事件。原来，麻城县农民自卫军教官熊振翼（旧军官出身）在恶霸地主反动区长王既之的唆使下，企图拖枪叛变。中共麻城县委得知这一阴谋活动后，决定派王树声星夜去找中共黄安县委，请求派兵援助。中共黄安县委当即决定，由潘忠汝、戴克敏带领黄安农民自卫军十五人，吴先筹等带领红枪会一百多人，连夜出发，前往麻城协助平叛。第二天早晨他们赶到麻城农民自卫军驻地——北界河附近的东岳庙。麻城的农民自卫军以为他们是新集的反动红枪会来袭击，就放起枪来。黄安农民自卫军被迫还击，双方相持不下，情况危急。戴克敏和潘忠汝、王树声等进行研究，决定由王树声向麻城农民自卫军喊话，揭穿熊振翼的叛变投敌阴谋。这一着果然奏效，麻城农民自卫军队员们在共产党员的带领下，停止了射击，并逮捕了叛徒。麻城农民自卫军这支革命武装终于化险为夷，完整地保存下来。八月中旬的一天，麻城县防务会侦悉原西张店大恶霸地主、民团团总王芝庭，纠集光山、新集的民团和反动红枪会共三、四千人，订于八月十七日还乡，企图恢复乘马岗区的反动统治。戴克敏等黄安党组织领导人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出动全部的农民自卫军，埋伏在光、黄、麻边界的北界河一带。十七日下午，王芝庭带着大队人马进入了伏击圈。三声炮响，农民自卫军和上万名武装农民，一齐向敌人猛攻。敌人遭突然打击，顿时慌乱不堪，百多人被击毙，余匪抱

头鼠窜退回新集。农民自卫军活捉了反动头子王芝庭，缴枪十五支，马六匹，刀矛无数，有力打击了反动派的嚣张气焰。

八月七日，党中央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确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和开展土地革命的总方针，并决定在湘鄂赣粤等省举行武装起义。湖北省委拟定了“秋收暴动计划”，将全省划为七个起义区，黄麻属鄂东区。由于反动派的封锁，黄安党组织与省委失去联系，八七会议精神和省委的暴动计划未能传达下来。九月间，黄安县委决定派人去武汉找党的机关取得联络，接受指示。九月中旬，去武汉的郑位三、陈定侯等返县，带回了八七会议精神和长江局负责人罗亦农对黄安工作的指示。戴克敏和曹学楷、吴先筹等听说长江局有了指示，都很兴奋。于是，县委立即在七里坪文昌宫举行会议，传达八七会议的精神，讨论了上级党关于组织农民进行秋收武装起义的指示。虽然有个别人说，我们只有这几十条枪，打起红旗也抵不住敌人两个团。但是，戴克敏等大多数领导人都满怀热情，充满着信心。他们说：“俄国的武装革命，从一九〇五年，到一九一七年经过了十二年的时间，工人阶级掌握了政权，我们也决心干它十年、二十年。……我们只要不懈的长期奋斗，革命一定会胜利。”^①会议最后通过了戴克敏起草的具体的暴动计划。计划规定：（一）迅速恢复各区乡的防务会，以此作为公开领导起义的机构；（二）以祠堂、庙宇作为暴动队伍的集结地点；（三）大大扩充农民自卫军和农民义勇队，并加强训练；（四）镇压土豪劣绅，没收大、中地主的财产，以发动群众，并为起义作好物质准备。计划中还明确提出了实行土地革

^①郑位三：《红色的黄安》，原载《星火燎原》第1卷第1集。

命的口号。会后，戴克敏和曹学楷等奔赴紫云区一带，积极发动和组织农民，以防务会组织为指挥机关，以祠堂庙宇为集结点，打刀造枪，掀起了捕杀土豪劣绅的斗争。从九月二十六日起，黄安紫云、七里等区的农民纷纷起来暴动。熊家咀附近的农民三百余人，在共产党员程昭续的带领下，处决了程卜畷的大土豪程瑞林。继熊家咀暴动后，戴克敏等因势利导，发动了有九乡万余名武装农民参加的长冲农民大暴动。暴动群众涌向长冲集会，高呼“打倒蒋介石新军阀！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贪官污吏！铲除流氓地痞！”的口号，并镇压了无恶不作的土匪王道金（外号王胡子），广大农民的革命斗志高涨起来。

十月间，国民党魏益三之三十军一部进扰黄安，“九月暴动”因此停滞下来。土豪劣绅又抬头活动。在这斗争的关键时刻，黄安县委提出了“以革命继续革命，以革命发展革命”^①的口号，决定留戴克敏、曹学楷、吴焕先等依靠群众力量，以黄麻北乡为大本营，以七里坪为活动中心，继续坚持斗争，再派郑位三、戴季英赴武汉向省委请示。十一月三日，省委派来的代表在七里坪文昌宫第二高等小学召开了黄麻两县党团活动分子会议。会议根据省委指令和“两湖暴动计划”中的规定，成立了鄂东特委，同时亦改组了新组成的黄安县委。会议还决定，加紧训练黄麻两县农民自卫军，以此为骨干，以黄安之潘家河、阮家店、箭厂河、程卜畷等地义勇队和麻城之乘马岗、顺河集的农民为主要依靠，组织起义队伍，武装夺取黄安县城^②。会后，戴克敏负责组织 and 训练农民自卫军武装，为起义

^①戴季英：《鄂豫皖苏区红军历史》和占以锦：《回忆鄂豫皖红军的产生》。

^②见《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烈士资料汇集》。

作准备。

经过各级党组织的深入宣传和发动，起义队伍迅速组织起来。黄麻“两县农民自卫军共有枪三百余支，以刀矛土枪武装起来的农民义勇队及其它形式的农民武装达三万人以上。”^①

十一月十三日，声势浩大的黄麻起义开始了。鄂东特委调集黄安县农民自卫军全部、麻城县农民自卫军一部及七里、紫云等区千余精锐农民义勇队，组成攻城部队，于当晚十时浩浩荡荡向黄安城进发。黄安七里、紫云、高桥、二畹、仙居、桃花、城关等区成千上万的群众积极响应。午夜时分，部队到达了城北三里岗，停下作短暂休息。休息时，作为起义主要军事领导人之一的戴克敏作了战前动员。随后，起义队伍按照总指挥部的统一部署，包围了黄安县城。十四日四时，攻城部队一举攻入城内，全部歼灭了反动警察武装，捣毁反动县政府，活捉伪县长贺守忠和土劣数十人，缴枪三十余支，子弹九十箱，被子百余床，并打开了监狱，释放了被捕的农民协会干部和群众。

十一月十八日，中共鄂东特委在黄安城南门外校场岗召开万人大会，宣布成立黄安县农民政府，随之将参加暴动的黄、麻农民自卫军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鄂东军，黄安农民自卫军编为第一路，麻城农民自卫军编为第二路，戴克敏被任为鄂东军党代表兼第一路党代表。这支工农武装，是党在鄂豫皖边创建的第一支革命军队，是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的最初来源和骨干力量。

^①王树声、陈再道、占才芳：《从黄麻起义到鄂豫边武装割据》（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军征文稿）。

(三)

根据中共鄂东特委决定，十一月二十六日，戴克敏和鄂东军总指挥潘忠汝率鄂东军第一路，携带农民政府的宣传品，到县南开辟工作。他们经桃花到达了八里区，发动了三四千农民暴动，打垮了八里塆土劣的一堂红枪会，毙会匪四五十人，缴刀枪五十余件。

黄麻起义的胜利，鼓舞了人民，震惊了敌人。十二月五日夜，桂系十二军任应岐部从宋埠奔袭黄安城。戴克敏和鄂东军总指挥潘忠汝等率领域内守军与敌展开了英勇的抗击，县城附近的农民武装亦纷纷驰援。战斗自晚十二时到翌日四时，打退了敌人多次进攻，但终因敌众我寡，城门被敌攻破，革命军被迫突围。在激战中，总指挥潘忠汝、黄安县委书记王志仁光荣牺牲。

在革命遭受挫折面前，戴克敏没有悲观失望。十二月下旬，他和吴光浩、曹学楷、戴季英等在木城寨举行会议。戴克敏在会上坚定地说：“我们党领导的革命是长期的，我们不能为了一个城市同国民党反动派拚死拚命地争夺。只要我们不放下手中的枪，跟人民群众站在一起，坚持斗争，黄安县城是一定会回到我们手里来的。”^①会议决定，除留下少数人枪就地坚持斗争外，将大部分力量转移到敌人统治最薄弱的黄陂木兰山开展游击斗争。会后，党组织在黄安县的闵家祠堂集合了七十二个战士，带着五十三支长短枪，经七里坪北折向南进，二

^①参见《黄麻起义》，湖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十九日到达木兰山。

一九二八年一月一日，工农革命军鄂东军改编为第七军，戴克敏任党代表。同时成立了党委会，由戴克敏和吴光浩、曹学楷、汪奠川、戴季英五人组成。一月十七日，戴克敏等七军领导人率领部队袭击了长岭岗敌据点，破坏敌人的电线数里。二十三日拂晓（农历正月初一），又打下了木兰山下的反动封建堡垒罗家岗。二十六日，敌十二军一个团向木兰山进攻，第七军连夜冲出敌之包围，由戴克敏、吴光浩率第七军主力向黄冈游击。留曹学楷、徐朋人等在当地坚持斗争。二十七日，第七军在黄冈大崎山与黄冈县委和工农革命军第六军会合。旋遭麻城反动武装郑其玉部进攻，两军分开。第七军转战于黄冈、罗田边界一带。在转战中，部队因无群众基础，往往一日数迁，一夜数移，活动异常困难。戴克敏与战士们风餐宿露，患难共度，坚定了战士们克服困难、与敌血战到底的决心。三月初，第七军复又返回木兰山。这时敌情日益严重。吴光浩、戴克敏等七军领导人便在洪界山召开会议，决定将部队编为四个短枪队，分散游击，隐蔽活动，准备在适当时打回黄、麻。当即由戴克敏、徐其虚率一个队北出黄安；王树声、廖荣坤率一个队东进麻城；吴光浩率一个队到河口以北；汪奠川率一个队留在黄陂活动。部队分散后，亦采取“昼伏夜出，远袭近止，绕南进北，声东击西”的游击战术，打击敌人和土劣的反动武装。四月初，敌十二军与桂系十八军发生冲突，十二军撤回河南。戴克敏率领的十人小队，装扮成绅士、买柴、算命的，回到紫云区，隐蔽在清水塘戴克敏的岳父家中。在工农革命军离开黄安的近四个月时间内，黄安的豪绅地主在敌十二军的指使和支持下，组织“清乡团”等反动地方武装，他们见人就捉，

捉去就杀，大肆烧杀抢掠。戴克敏的叔父戴先伯、戴先诚、戴先治和舅舅高寿成等九人，在上戴家村被敌人一次集体杀害。戴克敏的母亲和弟妹们被迫逃到姑姑家暂时躲避，后来被敌人发觉抓去关了起来，直到由戴克敏的外祖母花钱营救，才使他（她）们幸免一死。当戴克敏小队从木兰山回到黄麻起义区时，仍有一队民团驻扎在上戴家村戴克敏的家中，等待捉拿戴克敏。战友们的牺牲，亲人们的遭难，使戴克敏悲痛万分。他满腔仇恨，怒不可遏，当即决定，消灭上戴家反动民团，为死难的革命烈士和亲属报仇！

四月七日夜晚，戴克敏率领全队战士从清水塘出发。行前，他一边将盒子枪的子弹上膛，一边愤恨地说：“老子这子弹是赏给民团的！”^①趁着夜色，战士们摸到了民团驻地——上戴家，并迅速包围了民团的住房。民团哨兵喊了一声“哪个！”，戴克敏一个箭步冲上去，低沉有力地吼道：“老子！”一刀解决了哨兵。戴克敏和战士们随即冲进了屋里。正在赌博的团丁们仍未发现，团长郑维席还在聚精会神地写清明节上祖坟的灵牌。戴克敏大喝一声：“不许动！”郑维席和团丁们吓呆了，当他们清醒过来时，拚命地夺门而逃。团长郑维席逃出门后，跳进了门前的池塘。戴克敏紧追不放，将其击毙。驻扎在上戴家的民团很快被歼，革命军缴枪十余支。檀树岗民团闻风逃窜。戴克敏乃派程启光去木兰山，通知第七军全部返回紫云。第七军返回后，原来留下坚持斗争的吴焕先、石生财、甘济时、程昭续等人，领导群众配合第七军一起向土豪劣绅、反动民团展开进攻。先后打垮和赶跑了长冲、谭畈河、

^①见《七里坪革命根据地史料调查录》，藏红安县革命博物馆。

长塘边、料棚等地民团。于是，七（里）、紫（云）、乘（马）、顺（河）的革命斗争重又活跃起来。

戴克敏率领革命军打回黄麻起义区，消灭了上戴家反动民团，重新打开了黄麻起义区的革命局面，为第七军全部重返黄麻并将大本营放在鄂豫边界的大别山区创造了条件。从此，第七军便开始了开辟柴山堡革命根据地斗争的新时期。

（四）

正当黄麻地区革命斗争再次兴起的时候，桂系军阀又很快加紧了对革命力量的疯狂进攻。敌十八军一个团相继控制了七里坪、箭厂河一带的大小集镇，并帮助豪绅地主大量组织“清乡团”等反动武装，处处安设据点，实行严密的控制和不断的“清剿”。在这种情况下，工农革命军第七军又被迫同优势的敌人周旋。在流动游击的斗争中，吴光浩、曹学楷、戴克敏等七军领导人逐步感到：要对付强大的敌人，使革命力量不断发展壮大，就必须在敌人统治薄弱的地方，找一个稳固的立足点，作为对敌斗争的依托。否则，弱小的革命武装就难以坚持长期的武装斗争。一九二八年五月，第七军和地方党组织领导人在黄安檀树岗西北二里许清水塘召开会议，决定开辟柴山堡地区。即在黄安、麻城、光山三县边界的天台山、摩云山、羚羊山、木城寨、光裕山之间，创造一个稳固的立足点，作为对敌斗争的依托。这个决定，是“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在鄂豫皖边界的最初反映，是第七军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部队进入柴山堡后，戴克敏与吴光浩负责指挥工农革命军反击敌人的“围剿”。清水塘会议后第三天，敌十八军驻黄安长

冲一个营，由土豪方小亭带路，向第七军驻地河南湾进袭。戴克敏和吴光浩当即指挥部队迅速抢占有利地形，向敌突然反击，以少胜多，将敌击败，缴获驳壳枪三支。这次战斗，打响了开辟柴山堡根据地的第一炮，给了当地群众很大鼓舞。此后，在天台山、韩家老屋等地，又打退了敌人的进攻。

戴克敏在指挥工农革命军进行军事斗争的同时，又积极会同曹学楷、徐朋人等人做地方民团和红枪会组织的工作，对这些本地的头面人物晓以大义，宣传党的政策，要求他们今后对老百姓实行公买公卖，不动人民的财产。并明确指出：只有弃暗投明，与工农革命军合作，才是他们的唯一出路。不久，又提出“有绅不劣和有土不豪者不杀”的口号^①，稳定了一部分中小地主，争取了其中较开明的分子，不与革命为敌或至少保持中立。由于戴克敏、曹学楷等领导人在工作中采取了符合当地政治情况的政策，当地的上层分子，如中小地主的代表朱香州、“红枪会”头子杜子朋、民团头子郭小五爷、吴文路等便开始和工农革命军联合起来。工农革命军利用这些人掌握的“民团”和“红枪会”，曾一起打过国民党的“清乡团”。大部分“红枪会”组织也逐步被改造过来，变成了革命群众武装组织。

为了广泛发动群众，扩大革命的影响，配合军事上的斗争，戴克敏等领导人还利用朋友、亲戚等社会关系，深入各村，积极串连，建立农民协会，发展党的组织。同时教育部队严守纪律，爱护百姓。戴克敏还亲自带头写标语、贴标语，经常派红军宣传员，三五人一组，到鄂豫边要道上的凉亭、茶棚

^①陈士农、林浣芬：《具有地方特点的工农武装割据政策》，载《河南师大学报》1981年第1期。

等歇脚处，向赶集的农民、行商和担贩，宣传革命道理和党的政策主张。过路的人们非常感动地说：“革命军队不但保护穷人免税过关，还倒茶水招待，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好队伍”^①。经过几个月艰苦细致的工作，广大群众迅速的组织起来，积极拥军参战。在黄麻老区，数千名逃亡在外的党员和群众，纷纷返回家乡，恢复革命斗争。每当红军与白军作战时，群众或直接参战，或在后面助威，激励红军的斗志。群众还经常掩护我军便衣队员侦察敌情，使得国民党的“清乡团”、保甲连坐法在鄂豫边地区毫无用处。党和工农革命军得到了边区十万余群众的支持，开始在这里站住了脚跟。

一九二八年七月，工农革命军在柴山堡的尹家嘴召开会议。会上根据上级指示，宣布改编工农革命军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三十一师，吴光浩为军长兼师长，戴克敏为师党代表^②。部队改编后，黄安、麻城等县委和部分区委以及边界各地党团组织迅速恢复，一些区乡苏维埃政权也相继建立。新组成的县、区赤卫队等群众武装，积极配合红三十一师开展游击战争，粉碎了敌人对柴山堡地区的多次“围剿”。十月，重建了当地最高统一领导机关——鄂东特委，戴克敏为特委委员^③。从此，在鄂豫皖边出现了第一块红色区域。这块红色区域北至柴山堡，南至八里湾、尹家河，东至麻城的黄土岗，西至孝感的汪洋店，纵八十里，横四百三十里。它的创建，标志着鄂豫皖地区的革命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①王树声：《从栏山到柴山堡》，载《星火燎原》第1卷第1集。

②《鄂豫皖苏区历史简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③郑位三、戴季英：《鄂豫皖苏区红军历史资料》（1944年7月）。

(五)

一九二九年三、四月间，蒋、桂战争爆发。红三十一师乘机向外扩大游击，先后消灭了黄安县的禹王城、高桥河、麻城县的西张店等多股反动民团，缴枪一百四十余支。部队每到一地，便发动当地群众，恢复各级党团组织，建立苏维埃政权。黄安县紫云区苏维埃政府就是在戴克敏和曹学楷的主持下成立的。为了扩编红军，戴克敏亲自过问红军的招兵工作。他会同曹学楷在紫云区檀树岗设招兵站。一九二九年春至秋，檀树岗招兵站共招收红军战士达千人以上。为了培养党的红军干部，鄂东特委办起了党务干部学校，轮训党和红军的干部。戴克敏经常利用战斗的间隙给党员干部讲课。在他和曹学楷的直接支持下，红三十一师还办起了小型医院、被服厂和修械所。

这时，红三十一师党委会进行了改组，戴克敏任师党委书记。四至六月间，黄安、麻城、黄陂、孝感县委和红三十一师党委连续召开两次联席会议，产生了中共鄂东北特委，统一领导鄂豫边区的武装斗争。

五月间，红三十一师司令吴光浩带着十多人去河南商城南部帮助开展工作，途经罗田藤家堡时，遭地主民团袭击，在战斗中不幸牺牲。六月，徐向前受党中央派遣，前来鄂豫边接替吴光浩的工作。戴克敏、曹学楷和徐向前共同担起全师军事指挥工作的重任，他们之间“合作得很好，真诚、坦率，遇事相互商量，没有隔阂”^①。因此，部队在他们的指挥下，粉碎了敌

^①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

人对鄂豫边根据地连续发动的三次“会剿”。

一九二九年六月，中共鄂东北特委召开了黄安、麻城、黄陂、孝感四县县委及红三十一师党委第二次联席会议。戴克敏出席了这次会议，并参与起草了关于扩大游击战争问题决议案。在这个决议案中，要求加强党的核心作用，加强红军与赤卫队的政治工作，使红军战士和赤卫队员知道，他们“不仅是一个武装士兵，而且是一个群众的宣传者和组织者”，纠正了部队中的散漫倾向和盲动情绪。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二十日，中共鄂豫边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在河南省光山县南部胡子石召开。在会上，戴克敏和徐向前共同起草了《军事问题决议案》，更明确规定了红军的任务：“（1）发动和帮助白色区域内的民众的各种斗争；（2）坚决实行土地革命；（3）夺取反动武装；（4）保障和扩大根据地。”再次强调了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和军队中的政治工作^①。还具体规定了红军与地方党政群众团体的关系以及扩大红军、瓦解敌军等政策。这些规定和政策，对鄂豫边红军和地方武装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戴克敏还将部队和群众实际斗争经验加以提炼、概括、总结，创造了“八会”的游击战术原则，即“会跑、会打、会散、会集、会进、会退、会知、会疑”^②。这些游击战术原则，奠定了鄂豫皖红军战略战术原则的基础。

（六）

一九三〇年二三月间，中共中央为统一鄂豫边、豫东南、

^①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烈士资料汇集》。

^② 《历史的回顾》。

皖西三块革命根据地的领导，在上海召开会议，决定成立鄂豫皖特区，在中共湖北省委领导下建立鄂豫皖边特委。戴克敏为特委委员。三月十八日，中央给鄂豫皖边特委和红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师师党委及全体同志指示信，决定将上述三个师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三月下旬，郭述申从上海回来，在箭厂河向特委及红三十一师、三十二师领导干部传达了《中央关于成立红一军及军事工作的指示》。会后，部队即进行改编，戴克敏任改编后的红一军一师政治委员，师长由徐向前兼。

红一军成立后，立即乘蒋、冯、阎军阀混战之机，向外发展。根据军部决定，六月间，徐向前、戴克敏率领红一军向平汉路出击。红一军首先袭占杨家集车站，消灭川军郭汝栋两个连。战后我军移驻黄柴畈。下旬，郭汝栋从广水派出一个团进至杨平口以南的郑家店；另一个团也从花园进至小河溪，企图寻找红军作战，进行报复。红一师领导人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召开会议，进行部署。决定采取诱敌伏击的战术，在杨平口附近消灭郑家店之敌。二十九日上午十时左右，敌人进入我军伏击圈内，我军攻击开始。战士们俯冲而下，戴克敏、徐向前、刘英等干部身先士卒，经过四小时的激战，毙俘敌一千二百余人，缴枪千余支，取得了鄂豫皖红军成立以来首次歼敌一个整团的重大胜利。七月下旬，红一师再次出击平汉路，在突袭花园镇的战斗中，又取得了全歼守敌一个团的战果。八月中旬末，红一师在二、三师的迂回配合下，诱敌戴民权师一个旅进至黄安西北四姑墩附近，歼敌一个团，溃敌两个团。戴克敏、徐向前指挥的红一师在三个月的时间内，三次出击平汉路，积极向外发展，取得了巨大胜利。

十月中旬，红一军在光山召开了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会议主要解决了两个问题：（一）检查领导工作并改选前委^①；（二）反对山头主义等不良倾向，部队实行混编。光山会议后，各师均着手整编部队。戴克敏调任某支队及团政治委员。这次混编，在统一全军的领导、统一意志、统一作风、统一纪律及打破地方宗派观念上，起了积极作用。但由于当时的特委和军领导仍在积极的贯彻立三路线，检查工作，以是否坚决执行立三路线为尺度。在部队混编过程中，对戴克敏等许多土生土长的干部采取了不信任和压抑打击的过左行为，或调离降职，或干脆撤换，因而造成了不良的后果。戴克敏怀着对革命的无限忠诚，毫不计较个人得失，仍一如既往的忘我工作。

一九三一年一月中旬，红四军成立，戴克敏任军直警卫团团团长，不久又调任第十师二十八团政治委员。

这时，党中央召开了四中全会，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领导在中央占了统治地位。四月间，张国焘作为中央代表进入鄂豫皖苏区。十二月，张国焘在新集召开会议，宣布撤销鄂豫皖特委，成立了鄂豫皖中央分局和新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张国焘任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分局的成立，标志着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贯彻和张国焘错误领导的开始。从此，根据地的斗争便出现了曲折的道路。

十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在黄安县七里坪成立。这时，蒋介石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虽未开始，但重兵云集，已呈箭在弦上之势。为粉碎敌人第三次“围剿”，红四方面军主动发起了黄安、商潢、苏家埠、潢光四次战役。

^①“前委”指红一军前敌委员会，与红一军军部同时宣告成立。前委归中央军委直接领导，与省委和特委发生横的关系。

在方面军总指挥部指挥下，戴克敏率部从鄂东北打到皖西。商潢战役期间，红二十五军七十五师在皖西成立，戴克敏任师政治委员^①。他和师长廖荣坤指挥部队转战皖西，一度攻占敌人重要据点苏家埠，将敌四十六师牵制于苏家埠附近，有力配合了方面军主力胜利完成商潢战役的计划。一九三二年三月二十二日，苏家埠战役开始，戴克敏率部包围青山店之敌，以配合主力部队实现“先敌进攻，围城打援”的作战方针。青山店被围之敌于三月二十三日夜间逃遁苏家埠，青山店遂被我军收复。不料，张国焘竟抓住青山店战斗一事，诬陷青山店之敌乘夜出逃是戴克敏私通敌人所致，将其逮捕。在张国焘所谓的“火线肃反”中，戴克敏被错误杀害^②，时年二十六岁。

戴克敏的一生是短暂而光辉的一生。徐向前在回忆戴克敏时曾高度称赞他“对党忠诚，联系群众，有文化，又有游击战争经验，深得部队的信任。”^③但是，就是这样一位将自己的一切贡献给革命的忠诚战士，竟然惨死在张国焘的魔掌之下。更难以容忍的是，张国焘等人竟将在火线上杀掉戴克敏和陈奇师长看成是取得苏家埠战役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还将这个所谓“火线肃反”经验介绍给其它苏区，这是多么令人痛心的历史悲剧！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除文中注明的外还有：

1. 《鄂豫皖苏区历史简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2. 《红安革命史简编》。

① 《红四方面军战史》。

② 许世友：《我在红军十年》解放军出版社1983年版。

③ 参见：《红四方面军给中央转全国红军及苏维埃政府的信》1932年5月8日上午九时于苏家埠。

3. 戴季英：《鄂豫皖苏区红军历史》。
王树声：《黄麻起义及其前后的一些斗争情况》。
程启光：《工农革命军第七军在拦山的游击活动》。
《中共鄂豫边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关于军事问题决议案》。
上述资料均载《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
4. 戴觉敏：《革命家庭回忆》，马诗训：《记毛泽东同志的好学生戴克敏烈士》，《戴克敏烈士革命活动大事记》，《关于檀树岗招兵的情况》，《关于紫云区成立苏维埃政府的情况》，《戴克敏烈士生平简介》。
上述资料均藏红安县革命博物馆资料室。
5. 刘名榜：《鄂豫皖苏区的统一战线工作》，载《鄂豫皖苏区历史研究会第三届年会论文选集》。
6. 王树声、陈再道、占才芳：《从黄麻起义到鄂豫边割据》，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年征文稿。
7. 笔者走访有关人士的调查记录。

张 文 彬

凌 辉

张文彬，原名张纯清，别名刘宗义、张南杰，曾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第七军政治委员，第三军团政治保卫局局长，第十五军团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南方工作委员会书记，中共广东省委书记。美国记者尼姆·威尔斯在《续西行漫记》一书中，称誉张文彬为“保卫井冈山的独胆英雄”、“中共第一流青年政治家。”

(一)

张文彬，一九一〇年七月五日（农历五月二十九日）出生于湖南省平江县西乡梓江东港高基墩一个半自耕农家庭。父亲张财裕是一位勤劳忠厚的农民；母亲朱蒲贞是一位善良贤慧的家庭妇女。文彬兄弟姐妹五人，他最小。五岁开始在家乡高基墩小学念书，十岁进入平江县城基督教会创办的培元学校就读。

一九二二年，张文彬在培元小学毕业。因家境贫穷，无力升学，只得辍学在家，帮助父兄做些力所能及的农业劳动，常到附近的小山洞放牧割草。翌年，在堂兄张子谋的帮助下，进入长沙基督教青年会办的半工半读学校就读。这期间，张子谋常

给张文彬灌输基督教义，使张文彬在少年时期就成了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他那时认为耶稣是一个伟大的人物，曾幻想过要使自己成为中国的马丁·路德，使基督教在中国本土复兴，使中国摆脱帝国主义的统治，以恢复耶稣教主的纯洁性。

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发生，张文彬耳闻目睹帝国主义的罪行，参加了反帝的宣传活动。在这个反帝爱国运动中，他阅读了毛泽东、陈独秀、恽代英等人的文章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现实生活中，有一件事对他的震动很大。他的堂嫂抱着生病的孩子，到基督教堂求耶稣保佑，救治小孩的病。教主满口答应，对他进行了洗礼，说一定健康长命。第二天，那小孩病情越愈加重，昏死过去。这时，一个医师闻讯赶来急救，才把那小孩救活了。这件事使张文彬看到耶稣不是救世主。要解救人民的苦难，靠的还是人民自己。他结合学习马列主义唯物辩证法，认识到：必须与自己头脑中的宗教思想决裂，从宗教迷信的枷锁中摆脱出来。他的思想开始从有神论转变到唯物主义。

同年，共产主义青年团湘区委根据张文彬的表现，吸收他为团员^①。此后，他更加积极地投入了反帝爱国斗争。十二月七日，他与长沙市民一道到日本驻长沙领事馆举行游行示威，强烈要求日本人退还大金码头。一九二六年一月，张文彬投入了长沙人民驱逐赵恒惕的斗争。七月，他遵照团组织的决定，组织学生宣传慰劳队，发动人民，欢迎北伐军进入长沙。八月，支援北伐军占领平江。

^①杨康华：《艰难困苦何足论，誓斩楼兰复河山——忆张文彬同志在东纵的日子里》，载1984年8月25日《羊城晚报》第二版及张文彬档案资料。

(二)

一九二七年春，张文彬被党组织选送到武汉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他聆听了毛泽东、邓演达、恽代英等人的教诲，思想觉悟有了很大提高。同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①。

“马日事变”后，党派张文彬从武汉回湖南平江组织工农武装。他回到平江后，参加了平江人民讨许大会。他亲自起草了《平江人民讨许大会敬告民众书》和《平江农民协会讨许宣言》。宣言指出：“我们为拥护中央党部，拥护国民政府，巩固北伐后方，谋自身解放起见，即集中力量讨伐许逆，讨伐许逆即是我们自存的一条生路，革命前途的一线光明”^②。宣言号召：“扩大我们的联合战线，去肃清反动派，由破坏而达于建设，以期革命成功。”^③宣言还提出了响亮口号：“打倒蒋介石的走狗许克祥！”“农民武装起来！肃清反革命派！”^④

这年九月，张文彬参加了中共平江县委在献钟罗家洞召开的党的代表会议。会议决定成立“平江暴动委员会”，由罗纳川任主任。会后，文彬组织西乡人民投入了县委组织的秋收暴动。他的未婚妻黄喜凤也一同参加了革命（后牺牲）。他们高唱着“梭标亮光光，擒贼先擒王。打倒蒋介石，活捉许克祥”的战歌，于九月二十日攻打平江县城。这次扑城，因攻城信号

^①杨康华，《艰难困苦何足论，誓斩楼兰复河山——忆张文彬同志在东纵的日子里》。

^{②③④}湖南省档案馆、平江县委党史办合编，《平江革命历史文献资料集》142页，1982年内部出版，原件存湖南省档案馆。

失误，没有成功。

这时，反动的清乡队到西乡梓江一带进行搜捕，张文彬的家被清乡队包围。张文彬沉着地把文件藏在茅屋内，身上的炸弹没来得及藏，就被团丁抓住了。他呼叫着要去厕所，趁机把炸弹丢在粪缸里。敌人走后，张文彬赶紧把炸弹捞起，连同文件转移到了另一个地方。当晚反动团丁又来张家搜查，将张文彬兄张闪堂一并抓去，关在大段祠堂里，严刑拷打，张文彬坚强不屈。敌人没有得到任何证据，又见他年仅十七岁，便从他家里敲诈去两百块大洋，具保释放。

张文彬获释后，以平江西乡杨梅山为据点，建立了一支三十多人枪的游击武装，袭击驻在梓江的一个“清乡”连，击毙连长一名，缴获子弹两箱，救出了被捕的胞兄张意清和其他群众十余人。

一九二八年二月，平江县委在嘉义召开了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决定成立平（江）湘（阴）岳（阳）游击总队，下分五个大队，分驻五个乡。同时为了加强党对武装暴动的领导，成立了党的五个乡的特委。张文彬任西乡特委书记。他组织西乡五万农军投入了“三月扑城”之役。不久，他被委任为平江县委军事部长兼县工农赤卫队党代表。

（三）

一九二八年七月二十二日，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等在党的领导下，发动了著名的平江起义，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张文彬率领平江县工农游击队的骨干参加了红五军，任第一大队党代表。八月，根据中共湖南省委的指示，红五军冒

着酷暑，从平江黄金洞出发，向井冈山转移。部队行至万载大桥时，遭到反动军队朱耀华旅的伏击，伤亡很重。张文彬矢志不移，根据红五军党委的指示，将部队带回平江龙门休整。这期间，他到平、修、铜与地方党委联系，动员了数百名地方游击队员和进步青年参加了红军。随后，部队编为五个纵队，张文彬任第四纵队党代表。他率部跟随彭德怀、滕代远，采取欲南先北的策略，经过辗转苦战，终于在十二月十一日到达了宁冈新城。这天傍晚时分，张文彬和彭德怀、滕代远、邓萍等红五军主要领导人，由何长工陪同前往红四军军部宁冈新城城隍庙会见了毛泽东、朱德、陈毅、谭震林、伍中豪。第二天，在新城西门外的旱田里，举行了庆祝两军胜利会师的大会。

一九二九年初，湘赣反动军队大举集结，“围剿”井冈山根据地。这时，红四军主力已向赣南发展，红五军留守井冈山。张文彬和李灿所率的队伍被派守黄洋界哨口。敌人从正面攻击被打下去后，收买流氓分子带路，从密林的流水小沟摸了上来。在敌众我寡的严重时刻，他和李灿组织部队解下绑腿，吊下悬崖陡坡，冲出了敌人的重围。后来他们在山下打游击，截击了敌人的运输队，缴获的汽车因为没人会开，只好破坏掉。是年三月，同彭德怀率领的红五军主力会合。

一九二九年八月，正当湘鄂赣边区群众处在十分困难的时刻，张文彬随彭德怀率部返回湘鄂赣边境。他们于八月十四日一举攻克万载县城。八月底，在平江黄金洞、桐木桥地区，与黄公略率领的湘鄂赣边境支队会合，全军达三千多人。仍编为五个纵队，张文彬任第四纵队党代表。十月一日，红五军攻占平江长寿街。此后，他率第四纵队到湘赣边莲花一带游击。

一九三〇年六月初，红五军军委在大冶刘仁八召开军委扩

大会议。根据中央指示，红五军五纵队扩编为红八军，军长何长工，共八千余人。红五军九千余人，由邓萍任军长，张文彬任党代表^①。红五军和红八军合编为工农红军第三军团，彭德怀任军团总指挥，滕代远任政治委员。七月三日，红三军团一举攻克湘北重镇岳阳城，切断了长沙与武汉的水陆交通，敌人十分惊恐。武汉行营忙调长沙的十五师一部、咸宁罗霖部、浏阳钱大钧部向我军进攻。我军主动退出岳阳，重返平江。遵照中央命令，决定攻打长沙。张文彬率领部队挥戈直扑晋坑，向敌人发起猛击后，敌人招架不住，退至殷家洞一带，我军前后夹击，歼灭危宿钟师一个整团，俘敌团长侯鹏飞，危宿钟慌忙率残部退守金井。我红八军沿平（江）长（沙）大道直逼金井，张文彬和邓萍率红五军绕道从左后方包抄金井，夹击敌军，从上午八点激战到中午，终于冲破了敌人的防守阵地。

金井战役后，国民党反动派四个旅防守在槩梨市一带。七月二十七日，张文彬和邓萍率红五军向槩梨市进发，在七里港与刘建绪等部展开了激战。张文彬亲自上前线指挥，不幸左腿中弹，警卫员要背他离开战场，他坚决不肯，带伤继续指挥战斗。在红八军和湘鄂赣边区各县赤卫队的全力配合下，二十八日，胜利攻克长沙。这是我军在红军时期唯一攻占的省城。

“对全国革命运动所产生的反响是非常大的”^②。

（四）

一九三〇年冬，张文彬率部进入了中央苏区。此后，他们

• ①《湘鄂赣苏区史稿》86页，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②毛泽东语，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第151页，1979年三联书店出版。

参加了第一、二次反“围剿”战斗。

一九三一年十月，张文彬被调到红七军当政委。由于前政委葛耀山忠实执行王明“左”倾路线，把红七军看成是由军阀部队收编过来的军队，使红七军的许多干部蒙冤受屈，军长李明瑞也被误杀身死，因而部队思想波动很大。在这困难关头，张文彬深入到干部士兵中去调查研究，停止逼供信的错误作法，使广大冤屈的同志得以解脱，并用军团长彭德怀和红五军也是从国民党部队起义过来的而受到党和人民器重的实际事例来教育大家，很快稳定了军心。

一九三二年，张文彬调任红三军团政治保卫局局长。他从红七军肃反扩大化造成的严重损失中得到教训，主张重证据，反对刑讯逼供。对一些重大案件，他总是亲自审理，并坚持向军团党委请示报告。据当时在他身边担任侦察处长的刘复之回忆，张文彬性格温和，处理问题头脑冷静，实事求是，作风民主，是一位很有才干、很受人尊重的领导干部。

一九三三年二月，红一方面军开始第四次反“围剿”。七月，红军第一方面军组成东方军入闽作战。张文彬跟随东方军司令员彭德怀和政治委员滕代远由广昌地区东进入闽。这期间，他特别加强政治保卫工作，有效地保卫了军团首长的安全。

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苏区主力红军开始进行长征，这时张文彬任十五军团保卫局局长。长征中，他常常自己步行，把马匹让给伤病员骑。他自己也吃草根，把干粮节省下来给伤病员吃。过草地时，一个个的泥潭，不少人倒下去了。张文彬去拉一个战士，自己也倒进泥潭，警卫员去拉他时，他却要警卫员先拉那位战士。

在困难面前，有人脱离了队伍，被保卫部门抓回。有人主张一律处死，张文彬不同意这样作。他主张查明原因，分别处置。对为首叛逃分子就地处决；对确系伤、残、病者，或一时思想模糊掉了队的，立即释放归队。他向军团首长建议，在全军团开展坚持革命到底的前途教育。他用一九二八年平江起义后，平浏游击队员中，有的经受不住艰苦环境的考验，逃回家去，被反动派砍了脑袋的实例，教育大家要记取教训，在困难时要看到光明和前途，要提高信心和勇气。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一九三五年十月，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不久，张文彬到红军大学学习。他联系实际，刻苦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的著作，认真总结经验教训。这段学习使他在思想上、理论上有了很大的提高。

一九三六年二月，中央决定以十五军为主力军，组织渡河司令部，指挥渡河东征事宜。任命周士第任司令员，张文彬任政委。张文彬和周士第随即率领大队人马，在极端困难的渡河条件下，冲破敌人的碉堡封锁，渡过了黄河。

东渡黄河不久，张文彬被调到毛泽东身边担任秘书。

（五）

一九三六年夏，党派张文彬到西安领导西北地区党组织和西北军的统战工作，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当时在杨虎城身边，有一些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他的宪兵营长金冈生、副营长童陆生，都是西北特支的成员。张文彬秘密到西安后，由金冈生安排他住在参谋长李兴中家里。李有汽车，出入方便，便于掩

护。

张文彬持毛泽东给十七路军总指挥、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和总参议杜斌丞的亲笔信，面见杨、杜，对杨、杜进行统战工作。他阐述我党联合抗日的主张，帮助杨虎城解除思想上的疑虑，同杨虎城领导的十七路军达成了协议，并在杨虎城军队里建立了秘密的红军联络站，由张文彬、徐彬如、谢华等负责。这个联络站是红军和西北军之间的秘密通道。联络站主要是接送干部，冯雪峰、丁玲等都是从这里进入苏区的。联络站也负责向瓦窑堡运送物资。鲁迅、茅盾给红军长征胜利的祝贺电文及他们慰问毛泽东的一副火腿，也由联络站转送。联络站在各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

张文彬还广泛发动群众，组织救亡团体，投入抗日救亡运动。鲁迅逝世后，为了把西安的文化界发动起来。张文彬领导西北特支以救国会名义召开大会，悼念鲁迅。张文彬让救国会联络西安有名望的“八大家”老先生中的四家出来主持此事^①。并以这些老先生署名请张学良、杨虎城、邵力子等人也参加悼念，使国民党特务无可奈何。他还亲自担任总指挥，领导西安人民为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举行了声势浩大的请愿游行。游行前一天，张文彬和中共西北特支负责人一起研究各路游行群众的集合地点以及如何请愿。第二天，当发生警察打伤小学生激起群众义愤时，他及时引导请愿群众赴临潼向蒋介石请愿。那次游行，规模之大，秩序之好，情绪之悲壮，都是前所未有的。这次请愿、游行，对张、杨发动西安事变起了促进作用。

西安事变爆发后，党中央派周恩来、博古和叶剑英等组成

^①刘树新、叶文益：《张文彬同志传略》，载《广东党史通讯》1984年第5期。

中央代表团，参加调解谈判。张文彬到机场迎接周恩来、博古等，代表西安地下党组织向中央代表团汇报了西安事变发生的经过情形，谈了有关方面人员的思想动态，提供了生动具体的第一手资料。在谈判期间，他协助周恩来做了不少具体工作。当时西安的爱国军民普遍要求杀蒋抗日，张文彬根据党中央的指示，通过我党在西安的地下组织，向爱国军民宣传联蒋抗日的道理。他打了一个比方：一家两兄弟正在打架，突然外面来了伙杀人放火的强盗，该怎么办？是继续打下去呢？还是先团结起来撵走强盗，然后再分清谁是谁非^①。通过宣传，使大家认识到大敌当前，能说服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会使中国免于被日寇灭亡，争取一个好的前途。如果杀掉蒋介石，不仅不能停止内战，还会引起更大规模的内战。

西安事变得和平解决后，张文彬继续留在西安，在杨虎城的十七路军里挂了一个少校秘书的职务，穿上了十七路军的军服，继续做党的抗日统一战线工作。一九三七年五月，张文彬任红军驻兰州办事处主任。为营救被关在兰州集中营的西路军指战员做了大量工作，终于使被押的西路军指战员重新回到党的怀抱，参加了伟大的抗日战争。

（六）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爆发，张文彬奉党中央之命，于九月间抵达广州，领导广东等地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他不畏艰难险阻，往返于广州、香港之间，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开展抗

^①刘树新、叶文益：《张文彬同志传略》。

日救亡工作。同年十月，他在香港召开党的会议，对中共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进行整顿，正式成立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张文彬任书记。一九三八年四月，遵照中央指示，撤销南方工作委员会，成立中共广东省委员会，张文彬被选为书记。

中共广东省委成立后，张文彬坚决贯彻党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使广东党的组织发展很快。到一九三八年五月，先后建立了中山中心县委、东莞中心县委、南顺工委以及南雄、韶关、惠阳等地中心支部，很多过去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的县、市，也相继恢复了党的组织。八月，他主持召开省委第三次执委扩大会议，提出了“为建立强大的群众性的广东党而斗争”、“为全省发展一万党员而奋斗”的口号^①。经过深入细致的发动工作，到同年十月，在广州地区（包括香港）党员人数骤增至二千五百余人，潮梅地区发展到二千余人，琼崖发展到五千人，其余地区也有较大发展，新发展的党员绝大多数都是经过斗争考验的先进分子。从一九三八年到一九三九年九月，县一级党的组织机构在全省各地普遍建立起来，并分别建立了东南、粤中、东江、西江、北江和南路等特委。

张文彬很重视也很善于做统战工作。他从当时的实际出发，领导省委制订了“切实做好建立党的基础工作，团结余（森文）谏（小岑）左（恭）钟（天心）等并以公开合法名义积极开展我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②的工作方针。为此，省委派石辟澜、叶兆南、司马文森、黄新波、郁风等到第四战区司令官余汉谋的政治部第三组的上层机关开展工作，还先后动

^①刘树新、叶文益：《张文彬同志传略》。

^②左洪涛：《张文彬同志四十周年祭》，载1984年8月27日《羊城晚报》第二版。

员了八百多青年（内有共产党员一百二十名）到该部的政工总队，在广大青年中、文化界、教育界、新闻界和抗日救亡团体中做了大量工作。

由于以张文彬为首的广东省委正确执行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使广东的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不少群众抗日救亡团体，如广东抗日救亡先锋队、广州市学联、香港学生赈济会、潮梅、惠阳、韶关、佛山、南路、西江等地大批群众救亡团体，名义上是国民党领导，实际上都接受了我党的领导。

张文彬在进行统战工作中，坚持我党又团结又斗争的原则。一九三八年五月，国民党顽固派鼓吹“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反动论调。对此，以张文彬为首的广东省委决定，除在报刊上撰文公开批驳反击外，同时由廖承志出面，在广州永汉路哥伦布酒家召开各界人士座谈会，对国民党“三个一”的谬论予以驳斥，重申我党团结抗日的方针^①。事后，党内有些同志认为这样做会影响国共团结抗战，他严肃地批评了这种只讲团结不讲斗争的错误思想。

一九三九年冬，国民党掀起的反共逆流严重地危及广东。张文彬针对这种情况，及时制定了“政治上的进攻和组织上的保密”的策略。他在省委第五次执委扩大会议上提出：在这反共逆流翻滚的形势下，全党应“实行组织的转变、群众工作的转变和严密党的组织”，“既要坚持反逆流斗争，又要在斗争中积蓄（我们的）力量”^②。针对当时已变化了的情况，张文彬及时向党中央汇报了余汉谋在国民党中央势力的压力下妥协退让的政治态度。及时撤出了在四战区政治部工作的同志，保

^{①②}刘树新、叶文益：《张文彬同志传略》。

存了党的骨干力量。他在一九四〇年四月二十三日给党中央的报告中明确指出：“我们对余汉谋不能有过分的幻想。”尔后，他赴重庆南方局汇报广东工作时，又再次谈了这个问题。他的这个正确观点得到了周恩来的赞扬。

（七）

张文彬很重视武装斗争。一九三八年四月，在广东省委成立时，他就把军事工作问题提到省委议事日程进行讨论，省委成立了军事委员会。并决定各级党组织必须把建立民众抗日武装作为当前的中心任务。张文彬还提出了“党员军事化”的口号，号召党员学习《论持久战》和郭化若注释的《孙子兵法》，掌握游击战的战略战术。

一九三八年八、九月间，张文彬去延安参加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一九三九年春，他从延安南返时，经他向党中央请求，中央给广东派来了梁鸿钧、李振亚、谢立全、谢斌、庄田等红军干部^①。他还把有武装斗争经验的干部卢伟良、邬强、陈志强调到东江游击队，派刘向东、严尚民等到吴勤领导的“广游二支队”去，把该部改造为我党直接领导下的抗日武装。

一九四〇年六月，根据中央指示，广东省委划为粤北和粤南两个省委，张文彬任粤北省委书记。同年十月间，中央指示成立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简称“南委”，直属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领导），张文彬任南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他与书记方方一道领导粤北、粤南、闽西、闽南、潮梅、广西、江西、琼崖、湘南等地区党的组织和抗日斗争。翌年一

^①尹林平：《纪念张文彬同志》，载《广东党史通讯》1984年第五期。

月，蒋介石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在各地逮捕、杀害我党干部和抗日群众。在险恶的环境中，张文彬与方方等迅速组建南委领导机关，建立南方电台中心，保持与党中央的联系。同时，他根据南方局的指示，把党的组织由原来的党委制改为特派员制，采取单线联系，党员实行社会职业化，开展勤学、勤业、勤交友活动。他深入到海南、东江抗日游击队，具体指导游击队的工作。为了统一东江、珠江敌后武装斗争的领导，张文彬代表南委决定成立广东军政委员会，并成立了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对部队体制进行了全面的整编。这时，日寇施展一套狠毒狡猾的诡计，他们疯狂扫荡我华北、华东抗日根据地，实行“三光政策”，而对正面战场则暂时停止进攻，企图拉蒋、汪合流。因此，国民党顽固派调一八七师到惠州，纠合保八团、挺六纵队和四个支队共约七、八千人，准备向我大举进攻。在这困难的关头，张文彬号召大家一定要“紧握枪杆子，坚持抗日反顽斗争”。他要求大家根据毛泽东所讲的“老子”、“重耳”、“礼记”三原则办事，即《老子》毋为天下先，可以“后发制人”；晋文公对楚成得臣（尹子玉）“退避三舍”，诱敌深入以分散敌人兵力；《礼记》“礼尚往来”，“来而不往非礼也”，紧握枪杆子，实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当时有人认为顽军强而我军弱，活动地区又狭小，难同顽军周旋。张文彬指出，他在延安向毛泽东汇报东江情况时，毛泽东主席曾说惠东宝游击区的范围不能说小了，比井冈山开始时还要大，他进一步分析了东江地区的有利条件，断言：“熬过困难就是胜利”，“熬过困难就是大发展”^①。

^①杨康华：《艰难困苦何足论，誓斩楼兰复河山——忆张文彬同志在东纵的日子里》，载1984年8月25日《羊城晚报》第二版。

(八)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日军占领香港。张文彬在香港坚决执行中央的指示，同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的廖承志一起周密布置抢救知名人士和重要文化人的工作。他们先后在香港、惠阳等地召开香港、东江地方党组织和部队负责人会议，精心布置。经过努力，终于把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茅盾、夏衍等七、八百名知名民主人士和重要文化人从香港日军的严密控制下抢救出来，安全地护送到后方。受到党中央的通电表扬。

一九四二年五月下旬，江西省委遭到破坏，张文彬当即同南委书记方方布置机关撤退工作，决定南委机关分头向闽西、东江等地转移。六月初，张文彬向东江方向撤退，途经高陂镇，遇上叛徒郭潜（原是南委组织部长）及所带引的特务，张文彬极力反抗，终因寡不敌众，不幸被捕。六月二十日，张文彬被特务解押囚禁于江西太和县国民党监狱。

张文彬在狱中立场坚定，严厉驳斥国民党特务诬蔑我党的谰言，痛斥劝降的无耻叛徒，明确表示“宁可坐牢而死，决不跪着爬出去”^①。始终大义凛然，坚强不屈。

张文彬身患肺病，入狱后，在敌人的残酷折磨下，病情日益严重。敌人要挟他，说什么只要他转变立场，不但可以获得自由，还可给他治病。张文彬铮铮铁骨，对敌人的威胁利诱嗤之以鼻，不予理睬。国民党中统局驻赣观察员、特种工作办事处总干事庄祖芳等特务头子，多次找他谈话，攻心诱降，都遭

^①杨康华：《艰难困苦何足论，誓斩楼兰复河山——忆张文彬同志在东纵的日子里》。

到他的严词拒绝。

张文彬在生命垂危之际，还十分想念党，想念与自己共同战斗过的战友。他与廖承志同关在一所监狱。他最后与廖承志见面时，挣扎着起来对廖说：“我现在身体不行了，不能为党继续工作了，心里感到很难过。”^①又说：“我一生为党工作，坚信马列主义、坚信党，现在生命快到尽头，但我死而无憾。将来你出去时，请你将我在狱中的表现转告给党中央、毛主席”^②。一九四四年八月二十六日，他带着脚镣，用嘶哑的声音哼着《国际歌》同廖承志诀别。

狱中人员在检查张文彬的遗物时，发现他生前留下的一封信，题为《我誓死不能转变》的信。信中说：“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我现已有四十七岁了（实际年龄应是三十四岁），又犯（患）了严重的肺病，生的时期不多，吃苦也快到尽头，因而更是誓死而归，乐于就义，愿为江西人，尤其为整个中华民族的革命儿女留此正气吧。”^③

一九八三年四月十五日，廖承志在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张文彬同志同我关在一起，他牺牲是我亲眼看到的……。广东党委能够重新恢复和建立，张文彬同志的功劳很大。”

附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

1. 《平江县革命历史文献资料集》。
2. 《平江起义资料集》。
3. 《平江革命斗争史》。
4. 《平江革命烈士英名录》及《平江人物志》。

①②③刘树新、叶文益：《张文彬同志传略》。

5. 平江县谈岑区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张纯清烈士生平活动简介》。
6. 《广东党史通讯》1984年第5期所载下列文章：
 - (1) 刘树新、叶文益：《张文彬同志传略》及《生平年表》。
 - (2) 廖承志同志的讲话。
 - (3) 尹林平：《纪念张文彬同志》。
 - (4) 钟期光：《张文彬早期的革命活动》。
 - (5) 徐彬如：《深切怀念张文彬同志》。
 - (6) 李寿轩：《回忆张文彬同志》。
 - (7) 方强：《张代表慰问我们》。
 - (8) 欧阳文：《诚挚的怀念，无限的敬意》。
 - (9) 左洪涛：《张文彬同志重视统一战线工作》。
 - (10) 邓戈明：《怀念党的好干部张文彬烈士》。
7. 刘田夫、吴南生、杨应彬：《忆共产主义忠诚战士方方同志》，载1984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第五版。
8. 尼姆·威尔斯：《续西行漫记》。

卢冬生

李海文

卢冬生，湖南湘潭人，参加八一南昌起义，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入党，是湘鄂西苏区的创建者之一。历任七师师长，四师师长。红二、六军团长征时，他是主力师红四师师长，战功卓著。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在进军哈尔滨后，混乱中不幸被苏军中的败类枪杀而牺牲。

(一)

一九〇八年三月十六日，卢冬生出生于一个雇农家庭。父亲是煤矿工人，母亲在家租种地主几亩土地生活。由于家庭贫穷，卢冬生七岁就离开家乡——湖南湘潭七都一甲史家坳，到湘乡二都柳树铺当了牧童。

十岁那年，父亲送他到湘潭十三总老王泰厂当了钢行学徒工。一九二五年春节后，卢冬生到衡阳唐生智第四师当兵。唐生智第四师改编成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出师北伐，卢冬生随军来到武汉。

一九二七年春天，卢冬生遇见了陈赓。此时陈赓已是有五年党龄的共产党员，在黄埔军校时他曾是唐生智弟弟的上级，因而到了唐生智的第八军任特务营营长。陈赓深知卢冬生出身

贫苦，为人憨厚，忠实可靠，遂调他到营部担任警卫员。

特务营有四个连，兵员充足，装备精良。战士多是安源煤矿的工人，不少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特务营驻在汉口，负责驻地机关的警卫任务。陈赓利用每次出操点名的机会，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和革命的道理。

卢冬生随陈赓常常到驻地的中共中央军委机关，认识了周恩来等著名共产党员。从这些党员那里他听到许多革命道理，从这些党员身上他认识到共产党和国民党是截然不同的。卢冬生的思想发生了飞跃，他从扛枪找个人出路，明白了为人民掌握枪杆子的道理。当时武汉地区国民党右派活动越来越猖獗。五月连续发生夏斗寅叛变和马日事变，风声越来越紧。国民党新军阀何健部将机枪对准陈赓的门口，逼迫陈赓交出特务营。而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步步退让，也主张交出特务营。陈赓被迫离开军队。卢冬生跟随陈赓一起离开军队，退到武昌。七月下旬他又追随周恩来、陈赓到了南昌，参加了八一起义。

南昌起义的枪声打响后，卢冬生随陈赓到了贺龙领导的第二十军第三师六团一营，陈赓任营长，卢冬生任副官。三师的师长是共产党员周逸群。这支部队学生兵多，革命热情高。

八月五日，起义部队按计划放弃南昌，南下会昌，第三师是先头部队。八月二十日晨八时，在会昌城外第三师和敌钱大钧部短兵相接，一营冲在最前头，一口气攻下了三个山头。但是因友邻部队走错了路，未能及时从两翼发起攻击，三师成了孤军奋战。钱大钧派四个团堵截三师，激战四小时，三师仍未能打退敌人的进攻，弹尽援绝。下午一时三师被迫后撤。

敌人疯狂地扑过来。卢冬生和陈赓为掩护大家，走在最

后，边打边撤。突然卢冬生看到陈赓跌倒了，他冒着弹雨冲到陈赓身旁，发现陈赓腿部受伤，血流如注。他抱着陈赓滚到山下的田沟里，帮助陈赓脱掉制服，包扎好伤口。这时敌人已攻上山来。卢冬生照护着陈赓在草丛里隐蔽到叶挺的部队反攻上来，才和几个战士将陈赓抬到会昌城里。

部队继续南下。从会昌到汕头，一路上卢冬生尽心照顾陈赓。到了大埔，组织上考虑前面全是陆路，行走困难，要陈赓就地养伤。卢冬生一再表示：再累，再难也要把陈赓抬到汕头，陈赓也坚决要求随队行动。领导见卢冬生态度坚决，词语恳切，同意了他们的要求。

九月二十四日，起义军到达汕头后，卢冬生陪陈赓住进城里外马路的博爱医院。这个医院是日本人开的。因为来看望陈赓的人很多，日本人知道他们是起义军的干部，态度很不友好。

九月三十日汤坑战役失利，起义军连夜仓促撤出汕头。忙乱中，周恩来仍记挂着每一个同志，派人给陈赓、卢冬生送钱。不料这位同志未找到医院，所以陈赓、卢冬生不知道撤退一事。

十月一日清早，卢冬生到司令部打听消息，刚一出门就看见国民党的军队开进城里，街上看不见一个带红带子的人。心中大惊，转身回到医院。日本人又下了逐客令。陈赓伤势很重，膝盖处的筋被打断，脚腕的骨头被打折，伤腿肿得很粗。因失血过多，身体虚弱，不能行走。卢冬生处变不惊，先将陈赓藏在工人的房间里，然后在一位护士的帮助下找了一条小船。医院前面靠着海边，十月初旬退潮了，岸边全是淤泥。在工人、护士的帮助下，卢冬生将陈赓抬到小船上。卢冬生和那

位工人踩着没膝的泥水，一步一步吃力地推着小船，把船推到水中，告别了工人。他和护士划着小船将陈赓送上开往香港的轮船。

这条船是复航后的第一条船，船上有不少起义军的同志，引起香港当局的注意。船刚靠岸，巡捕就上船搜查。卢冬生急中生智，找了把椅子请人把陈赓抬下船。走出码头，他累得气喘嘘嘘。刚要在路边歇歇，巡捕过来不由分说抡起警棍一顿打。陈赓不能走动，卢冬生用身子护着他。等巡捕扬长而去，码头上已看不到一个熟人。还是陈赓熟悉城市环境，说到医院挂个号，延宕时光。可是医生一检查是枪伤，马上就推出门外。到马路上又要挨打。陈赓见前面有个厕所，灵机一动，叫卢冬生把他背到厕所暂避一时。

在厕所里无人打扰，松了一口气，这才感到饥肠辘辘。陈赓天性乐观，抬头看见前边有家西餐馆，开玩笑说：叫客西餐来吃才好。卢冬生老实憨厚，摸摸身上还有二十来块钱，就真去叫西餐。餐馆的服务员端着餐盘跟着卢冬生，走到厕所门口，勃然大怒。饭未吃上又挨了一顿臭骂，陈赓感慨地说：冬生，你太老实了。

怎么办？他们俩商量：唯一的办法就是离开香港，到上海去找党中央。卢冬生忍着饿，来回奔波，打听到下午一时后有船到上海的船开航。好不容易将陈赓背上了船，在一个工人的帮助下买了船票，找来一张行军床，一起把陈赓抬到货舱里。地方狭窄卢冬生只能蜷缩在一边休息。

船到了汕头，周逸群上了船，也躲进货舱，和陈赓、卢冬生不期而遇。因认识周逸群、陈赓的人多，他们不便活动。一路上都是卢冬生跑上跑下照顾他们。在卢冬生的护送下，他们

平安到达上海，顺利地找到了党中央机关^①。

陈赓住进牛惠霖骨科医院，和在上海坚持地下斗争的妻子王根英相会^②。

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笼罩神州大地。在历史的紧要关头，有的人消沉，有的人倒戈，而卢冬生心中的革命之火越烧越旺。从武昌到南昌，从南昌到汀州，再到上海。这一路上他看到多少志士仁人英勇地牺牲了，也看到多少共产党人不畏艰险，坚持斗争。他从周恩来、贺龙、周逸群、陈赓的身上看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光辉榜样。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终生，这个愿望在卢冬生心中激荡。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七日经陈赓、王根英介绍，卢冬生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③。

（二）

不久，贺龙辗转来到上海，周恩来闻讯后，派卢冬生把贺龙接到党中央机关^④。

贺龙和周逸群向周恩来要求回湘鄂边组织红军，开辟根据地。党中央经过再三考虑，批准了他们的要求。可是贺龙是鼎鼎大名的人物，怎么才能通过敌人的层层关卡，安全到达湘西呢？必须派一个可靠并机警的同志护送。党中央决定派卢冬生去完成这一任务。卢冬生既熟悉湖南、湖北的情况，又是周逸群、贺龙所信任的人。卢冬生毫不迟疑地接受了这个任务，告

①参见陈赓：《从南昌到汕头》，载《星火燎原》第1集。

②傅涯：《报国何许女儿身——王根英烈士传》，载《红旗飘飘》第23集。

③卢冬生自传。

④1980年11月4日访问杨秀山记录。

别了周恩来，告别了陈赓、王根英，于十二月二十二日踏上征途^①。

到达武汉后，湖南省委书记郭亮留贺龙在武汉领导暴动。腊月二十三日（一九二八年一月十五日）因计划泄露，敌人大肆搜捕。贺龙、周逸群、卢冬生一行二十余人雇了一条船，离开武汉。

一月十八日船过观音洲。贺龙早已打听好了洲上只有十几个团丁，决定将计就计夺取他们的武器。

船徐徐靠岸，卢冬生等簇拥着贺龙上了岸。贺龙身穿皮大衣，围着围巾，戴着墨镜，一副阔商打扮。他一上岸就说：“去拜客。”团防队长见贺龙气宇轩昂，不同凡响，急忙迎了上来。

贺龙一把抓住队长的手，威严地说：“我是贺龙！有件事麻烦你，特地来借枪用用！”团防队长吓得魂不附体，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卢冬生站在贺龙的身旁，警觉的目光向四周扫去，看见一个团丁要举枪，说时迟那时快，卢冬生掏出枪，一扬手，那团丁象麻袋似的倒在地上。其他的团丁见此阵势，赶快丢下手中的武器。同志们一拥而上，夺过了枪支。团防队长只得将子弹、枪支全部交出^②。同志们一下子得到了十几支枪，二百发子弹，真是如虎添翼。一九六〇年贺龙回顾二方面军的历史时，曾深情地说：“卢冬生这一枪打得好，立了一功，这一功可不小啊！”^③

①卢冬生自传。

②贺龙：《回忆二方面军》，载《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1册。

③1980年11月4日访问杨秀山记录。

从此贺龙更加信任卢冬生，部队分散行动时，贺龙常常把卢冬生留在身边，同行同往，形影不离。

贺龙、周逸群带领的这二十多人在监利反嘴和贺锦斋领导的部队会合。在下车湾贺龙找到了石首中心县委，召开了会议，传达了中央的指示，决定举行年关暴动。贺龙、周逸群、卢冬生为了发动群众举行暴动，常常是昼夜不眠地工作。

年关暴动后，起义军发展到五、六百人，但是打监利城的战斗失败。二月，贺龙、周逸群总结了教训，认识到在鄂西建立碉堡、搞寨子的办法行不通。不如依山建军，再向平原发展^①。二月底，贺龙、周逸群、卢冬生七个同志回到贺龙的家乡桑植洪家关^②。由于贺龙在当地声望很高，很快拉起了三千人的队伍，占领了桑植县城，震动了湘西。部队刚刚拉起来，还未来得及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建立党组织、进行整顿，国民党反动派就发动进攻。部队被打散，周逸群过了长江，到宜昌组织开辟工作。贺龙和卢冬生十几个人退到洪家关。

贺龙、卢冬生十几个同志在桑植、鹤峰边界的高山崇岭中坚持斗争，收集了数百名失散的人员。贺龙从这次失败中认识到光依靠个人号召、家族亲戚、旧部下的关系，没有党的组织不成。现在又和党的组织失去了联系，如何建立根据地？如何建立红军，这些重大问题，都急需得到党的指示。环顾四周，只有卢冬生熟悉中央、中央军委的情况，并且忠实可靠，精明能干，贺龙决定派他到上海和党中央联系。

当时部队的处境十分困难，同志们连布鞋都穿不上，天天在深山老林里转战，脚上被荆棘划得一个个口子。贺龙筹不出

①贺龙：《回忆二方面军》。

②1984年2月17日访问廖汉生记录。

到上海的路费，只找出六个铜板。卢冬生拿着六个铜板，告别了贺龙和同志们上路了^①。他一路上打短工、讨吃、睡屋檐，住牛棚，风餐露宿，千里跋涉，终于到了上海。

党中央从国民党的报纸上知道贺龙失利的消息后，不知委由，焦虑不安。一九二八年四月，卢冬生找到了中央机关，中央的同志喜出望外，听取了他的汇报，马上做了指示，派人送出。

这时又接到湖南省委遭到破坏的消息，中央考虑到卢冬生是湖南人，熟悉情况便于活动，决定他先到湖南帮助重建省委机关，再回湘西。

当时湖南的白色恐怖为全国之首，有“死地”之称。卢冬生到湖南后，省委见他工作得力，就留他在省委工作。七月份省委机关又一次遭到破坏，卢冬生虎口脱险回到上海。

在这几个月内，中央几次派人给湘西送信，都未成功。派了四个搞军事的同志带着文件到湘西去工作，由于敌人封锁，也未能接上关系。卢冬生回到上海，中央遂派卢冬生去湘西。

八月八日，中央特地给湖南省委写了指示信。信中说：为传递此信，中央特派卢冬生前来。信中分析了全国革命形势，介绍了朱德、毛泽东领导三、四千红军建立根据地的情况和经验。指示湖南省委和贺龙：要扩大土地革命和苏维埃政权的宣传，组织农民协会，发动农民起来斗争，发展党组织。实行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农民耕种，以求得革命的深入和扩大苏区。指出依靠小股土匪实行土地革命是一种幻想。

卢冬生身藏机密文件，历尽千难万险，于一九二八年九月在鹤峰的大山里找到了贺龙。此时，贺龙两次拉起队伍，两次

^①1984年1月访问罗坤山记录。

失败，部队只剩下九十一个人，七十二支枪。在最艰难的时刻，贺龙得到中央的指示，真是久旱逢雨，找到了方向。

不久，贺龙又派卢冬生到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卢冬生见到周恩来，周恩来刚从苏联出席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回来^①。中央立即进行研究，于十一月四日发出指示信。信中指出：党的六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规定我党总的政治路线是争取群众，宣传武装暴动。湘西的工作是一种农民游击战争，在目前农民群众日益受反动派压迫的情况下，乡村游击战争自然很有向前发展的可能。信中传达了六大规定游击战争的主要任务：第一，实现农民斗争的口号，没收地主土地，建立乡村苏维埃；第二，建立红军游击战争，扩大成为工农革命红军；第三，削弱反动派的力量。

卢冬生带着指示信和六次代表大会的文件，回到湘鄂西。这时，贺龙领导的部队已改编为工农红军第四军。贺龙得到中央的指示，特别是六大的文件，如同在迷雾中看到了灯塔。他按照中央的指示领导斗争，红四军很快发展起来，到一九二九年夏天发展到四千多人。

贺龙十分喜爱卢冬生，把他留在司令部手枪连当班长，又叫从兵班长。一九二九年三月一日贺龙给中央的报告里特别提到了这件事。因为中央到湘鄂西已建立了交通线，中央六月十五日回信同意卢冬生不再担任交通员，留红军工作。

（三）

卢冬生在手枪连先后担任班长、排长、连长。一九三〇年

^①周恩来：《关于湘鄂西苏区发展的几个问题》。

手枪连扩充为警卫营，卢冬生升任营长。警卫营的武器装备很强，每个人配备两支枪，一支快慢机，一支花机关炮，又叫轮子枪，从兵力到火力警卫营战斗力和一个团不相上下^①。

一九三〇年七月，红四军和红六军会合成立了红二军团，红四军改称为红二军。十二月，军团总指挥部和十六师驻在杨林市。敌人从两面进攻杨林市，直冲到总指挥部的前面，情况万分危急。贺龙亲自率领警卫营坚守总指挥部，顽强作战，终于打退了敌人的进攻，转危为安，稳住了战局，并将十六师打散了的同志接了出来^②。

战斗结束后，部队从公安杨林市撤到鹤峰的走马坪一带休整。贺龙的姐姐贺英送信说：甘占元等土匪三千多人到鹤峰附近活动，他们自称“共产军”，但纪律很坏，骚扰民众。当时驻在走马坪的只有总指挥部和卢冬生的警卫营，加起来不过三四百人。要硬打，红军势单力孤；不打，红军在鹤峰站不住脚。贺龙和邓中夏商量后决定用计消灭这股敌人。一面派人命令二军、六军到五里坪一带待命，一面派人同甘占元联系。甘占元迫于红军的威势，同意原地驻防。

过了几天，贺龙以接风为名宴请甘占元等人。酒席摆在总指挥部的前厅，卢冬生和十几个精明强干的战士藏在厅堂的两厢，以贺龙起身离席为号。甘占元毫无防备应邀赴宴。酒过三巡，酒酣耳热，贺龙借口上厕所起身向后院走去。卢冬生一声令下，战士们如猛虎下山扑向甘占元，手到擒来，甘占元等人顿时成了阶下囚。

^①1984年1月访问罗坤山记录。

^②贺龙：《回忆红二军团》，1980年访问杨秀山记录。

贺龙刚到后院还未坐定，卢冬生提着手枪兴冲冲地跟着进了后院，兴奋地说：总指挥，全部解决了，一个没跑，一切顺利，请下令让二、六军迅速行动。二、六军接到命令后，向五里坪合围，将“共产军”的三千多人、二千多支枪全部武装收编，部队得到了扩大和补充^①。

不久，卢冬生调到二军七师当营长，随后升任二十团团长。几年来他随红三军（一九三一年红二军团改称为红三军）转战汉水两岸，大江南北，洞庭湖畔，在战争中学会了军事指挥。一九三二年七月卢冬生担任独立师政委，当他跻身于红军高级指挥员的行列时，还只有二十四岁。

一九三二年六月，蒋介石调集十万军队对洪湖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四次“围剿”。由于当时中央分局主要领导夏曦坚持分兵作战，没有能打破敌人的“围剿”，根据地日益缩小。九月，夏曦决定突围，洪湖根据地丧失殆尽。部队转移到石陵三柴湾，受到敌人的袭击，被拦腰截为两段。夏曦、王炳南率独立师的第一团在浩子口过了西荆河。卢冬生和第二团未能过河，浴血苦战，终于杀出了一条血路，突围出来几百人。卢冬生收集残部退到荆门、当阳、远安、兴山一带坚持斗争^②。

战败之师，又远离主力，人困马乏，给养不足。卢冬生采取游击战术，碰上大股敌人，打不赢就走；碰上小股敌人，坚决消灭，连打了几个胜仗，缴获了敌人的枪支弹药，士气大振。卢冬生又设法找到了地方的党组织，会合了当地的独立团，部队扩充到一千多人，仍用独立师的番号活动。在地方党

^①蹇先任：《尊重历史，端正党风——关于湘鄂若干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党史研究资料》1981年第3期。

^②1983年6月，访问杨秀山记录。

组织的配合下，独立师每到一地就发动群众打土豪，使部队站住脚跟，得到休整。卢冬生和同志们同甘共苦，从不摆首长的架子。他对同志们爱护、关心、谦和、诚恳。在他的领导下全师上下同心同德，团结一致。在失去上级领导的情况下，卢冬生独当一面，充分显示了他的领导才能和组织指挥能力^①。

一九三三年初，卢冬生从敌人的报纸上知道红三军经河南、陕西、四川，长途跋涉七千里回到鹤峰，卢冬生马上率独立师到鹤峰走马坪同红三军会师。此时，红三军由于长途行军，连续作战，再加上肃反扩大化，减员很多，全军由一万四五千减少到九千人。卢冬生回来了，而且带回一支兵强马壮的部队，给红三军增添了有生力量。还带回来几万块白洋和一些布匹，解决了红三军的很大困难^②。

会师后，独立师改编为教导团，卢冬生任团长，负责训练干部。同年七月，调到红三军主力师当师长。

贺龙给卢冬生很高的评价，他说：“他以一个工人出身的同志，依靠对革命的热情，在不断地学习和战斗中，锻炼成为一个人民军队的坚强的领导者和指挥者。他从开始组织游击队起，直到后来率领部队转战大江南北，他都能以自己模范的工作和胜利的战斗，获得部队的高度信任”^③。

走马坪会师后，夏曦坚持其错误主张，在红军中继续进行第三次、第四次肃反。使部队锐减为三千人。夏曦不认识错误，还不相信红军中的党组织，不顾大家的反对，于一九三三年三月悍然解散了军中党组织。一时间红三军只剩下四个党员：夏

①1980年11月4日访问杨秀山记录。

②贺龙：《回忆二方面军》。

③贺龙为卢冬生写的碑文。

曦、关向应、贺龙、卢冬生。前三名是军里的领导人。卢冬生因为在上海入党，是中央派来的交通员，又是工人出身，才保留了党籍。但是党内的很多事情不许他参予，他只能算半个党员。这就是三个半党员的来历。夏曦的错误肃反，搞得红三军内人人自危。夏曦两次想整贺龙，都被贺龙顶回来了。夏曦也想整卢冬生，只是抓不到把柄，无处下手。

一九三三年七月，红三军七师、九师分开行动。贺龙和九师在一起。夏曦以为自己 and 卢冬生都是湖南同乡，提出和七师一起行动^①。卢冬生是一个坚持原则、嫉恶如仇的人，早就对夏曦不讲民主、作风霸道，不从实际出发，自以为是，对同志不信任，解散政治机关，乱抓人、乱杀人等行为不满。他不相信夏曦。

七师在石门地区活动时，与保安队打了一场恶仗。卢冬生要夏曦赶快率非战斗人员过宣沙河，向西斋、磨盘洲的方向撤走，他自己率部队在后面顶着。夏曦到了河边，见山洪暴发，河水陡涨，一筹莫展。第二天卢冬生率部队赶到，见部队仍在河边，火冒三丈，指着夏曦大骂：你为什么没有过河，你的本事哪里去了？你把那些创造苏区的同志都杀了，说他们创造苏区是为了破坏苏区……今天过不了河，部队受损失，你算什么党员！……夏曦自知理亏，连声说：我的好同志，昨天我一夜未睡觉，把我急得……。卢冬生很快指挥部队过了河。从此夏曦才知道没有卢冬生他指挥不了部队，对卢冬生敬畏三分^②。

在贺龙、关向应、卢冬生的坚持下，一九三四年六月红三军重建了党组织，卢冬生当选为红三军党委委员。由于军党委坚

①贺龙：《回忆二方面军》。

②1983年6月访问杨秀山记录。

决反对，终于制止夏曦搞第五次肃反。缩小了夏曦的错误，保存了红三军的基本力量。

(四)

一九三四年十月，在贵州印江的木黄，红三军和红六军团会师。会师后红三军恢复了红二军团的番号，开始清算夏曦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夏曦调离红二军团。红二军团释放了被关押的同志，七、九师分别改为四、六师，卢冬生任四师师长。两军会师时，二、六军团各有三、四千人，三千多支枪，每支枪平均不过十发子弹。贺龙在会师大会上风趣地说：六军团的同志问，我们的根据地在哪里，根据地就在我们的脚板下。这年的冬天，整天刮着北风，经常下毛毛细雨，不见太阳。战士们没有过冬的棉衣，有的同志还穿着短裤，寒风刺骨，许多战士生病。只有打胜仗，才能摆脱困难。红二、六军团决定首先消灭湘西军阀陈渠珍，创建根据地。

十一月十三日，红二、六军团主动退出永顺，向北转移。卢冬生率四师留在最后和敌人保持接触，且战且退，引敌人上钩。十六日，四师退到永顺城北九十里的十万坪地区。十万坪是狭长谷地，两侧山上是参天大树，二、六军团早已埋伏好，以逸待劳。卢冬生率四师一到，不顾疲劳，马上做战前的准备。

敌人连日来未遇到顽强的抵抗，大摇大摆进入我埋伏圈。黄昏，敌人在龙家寨一带准备宿营。乘敌不备，我军从东、西、北三个方向向敌人发起猛烈攻击，战士们居高临下，猛冲猛打，经过两个小时激烈战斗，歼灭敌人两个旅的大部，击溃

了一个旅又一个团。红二、六军团乘胜追击，占领了永顺。这一仗给陈渠珍以歼灭性打击。红二、六军团建立了以永顺、桑植、大庸为中心的湘鄂川黔根据地。牵制了敌人，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①。

敌人为阻止中央红军和二、六军团会师，派十余个师对湘鄂川黔根据地包围，包围圈一天天缩小。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六军团在后坪鸡公垭打了一仗，鸡公垭是有名的隘路，它的两侧一面是武陵山脉的高山，一面是澧水，只有一条狭长的隘路从鸡公垭下通过。原计划乘敌人半渡澧水立足未稳，我军在鸡公垭打个伏击。可是因下雨，我军守鸡公垭的部队撤回，第二天敌人先行占领了鸡公垭，控制了制高点，这对担任正面攻击的四师造成很大威胁。卢冬生到了前沿，见敌人已过河，就带头向上冲，将一部分敌人赶下河，敌人的防线动摇了。可是鸡公垭上敌人的火力又把四师压下去，给正面的敌人造成喘息的机会，敌人反扑过来。卢冬生提着枪要冲上去，从鸡公垭射出的一颗子弹打中了他的腿部，警卫员在同志们的帮助下强行把他背下去。

卢冬生曾经数次受伤，但每次均一直坚持战斗。这次因伤势严重，不能亲临前线，只好随军部行动。当时医疗条件差，脚虽保住了，可是留下残疾——坐骨神经疼。八月，他回到部队，参加了津市战斗，二、六军团顺利地占领石门、新洲、津市等城市，发动群众，扩大红军，解决了冬装，缴获了大批军火。

敌人不甘心失败，派了一百多个团包围湘鄂川黔地区。二、

^①1983年访问朱绍日记录。

六军团只有二万来人，寡不敌众。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九日，二、六军团从桑植出发，四师担任前卫，实行突围。二、六军团突破澧水、沅江两道封锁线，部队转了一个弯，向湘黔边转移，一下子把敌人的十多个师甩掉了。

敌人以为红军要北渡乌江占领遵义。贵阳、黔西敌人惊恐万分，倾巢而出，在乌江两岸设防。为了迷惑敌人，卢冬生派一个团北渡乌江吸引敌人，掩护主力西进。同时四师派了一百多名身强力壮的侦察员，急行军一百二十里，强占鸭池河的渡口，保证主力顺利西进^①。主力渡过鸭池河后占领了黔西、大方、毕节等县城，开辟了新的根据地。

早在一九三五年九月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率陕甘支队北上时，周恩来曾用明码给二、六军团发报，询问二、六军团的近况。任弼时接到电报后即用密码回电。此电被控制红军总部、攫取红军总部通讯专用密码的张国焘截获了。张国焘以总部的名义几次命令二、六军团北渡金沙江与四方面军会师。朱德认为和二、六军团会师后，会有助于推动张国焘北上，有利于解决张国焘的问题，同意发报。

接到红军总部电报后，二、六军团领导人几经讨论，于一九三六年三月决定北上。四月八日四师抢占了普渡河的铁索桥。四师、五师和六军团在普渡河沿岸给滇军孙度纵队以重创，使滇军无力穷追。四师连日急行军赢得了时间，于四月二十四日到达金沙江畔的石鼓镇。能否顺利北上，抢渡金沙江是关键的一仗。石鼓渡口江宽水急，地势险要，对岸有敌人的一个团防守。敌人据碉凭险，封锁了渡口，并将船全部拖到江北

^①王绍南：《鸭池河上》，载《星火燎原》第3集。

岸。卢冬生派侦察连长朱玉庭找渡船，空手而归。卢冬生当机立断，命令扎木筏、竹排，他亲自给船工做工作，宣传红军是人民的军队，讲北上的意义，并在生活上给以优厚的待遇。在船工的协助下，从上游找到了渡口渡江。部队渡江后，消灭了敌人，夺过渡船。二军团用二天的时间渡过了天险金沙江^①。卢冬生由于指挥有方，受到嘉奖。

六月，红二、六军团分别向甘孜进发。红六军团为右纵队在理化以南之甲洼与前来迎接的红三十二军（原九军团）会合；红二军团为左纵队在绒坝岔与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会合。七月二日，红二、六军团齐集甘孜和红三十二军组成为第二方面军。这时才知道张国焘成立了伪中央，盗用中央的名义发号施令。贺龙、任弼时、王震、卢冬生等坚决支持朱德、刘伯承同张国焘的斗争。张国焘见二方面军拉不过来，恨之入骨。北上时，四方面军先走，二方面军殿后。甘孜一带，地广人稀，物质匮乏。前面留下的粮食有限，有时前面的部队把野菜采光了，二方面军连野菜都难以找到。卢冬生左腿受伤，行走不便，组织上给他配了一马一骡。因为没有吃的，一天夜里战士们偷偷地将他的骡子宰了。有人要追究，他知道后，下令不准追查。

过草地后，军分会开会，有人说五师的后卫团团长支援友邻部队不力，使骑兵连被藏族土司武装歼灭，要枪毙这个团长。保卫局局长马上派人把团长反绑起来，关在保卫局。会场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无人讲话。卢冬生挺身而出，说明情况：这个团离骑兵连几十里地，连枪声都听不见，支援不力，从何说起。

^①1983年访问朱绍南、1984年2月访问罗坤山记录。

再说战士们天天吃野菜、树皮、皮带，忍饥挨饿，体质大减，即使听到枪声也不可能驰援。他心情沉重地说：雪山爬过来了，草地也走过来了。过去多少干部被错杀，长征中牺牲了多少干部战士。干部宝贵啊，我们不能再随随便便地杀干部了。他又说：这个团长当红军当了这么多年了，身上挨了多少颗子弹，因为一个过错，就杀？！我们看干部是看他一时的表现，还是看他一贯的表现^①？！

整整争了一夜，卢冬生说得那位提议枪毙的同志哑口无言，说得大家点头称是。刘伯承赞许地说：卢冬生说得有理。

军分会决定不杀这个团长。卢冬生仍不放心，拿出自己的毛毯和二十块大洋，派警卫参谋罗坤山送到保卫局，亲手交给这个团长，让这个团长想办法买一点青稞吃^②。

部队继续北上，二方面军计划从六盘山的南山脚下直奔洪德、环县。突然遇到敌人骑兵，总部决定四师留在南山脚下狙击敌人，掩护全军转移。

卢冬生亲临前沿阵地，观察地形。他对营连干部交待任务：“咱们是一个师，只不过一千多人，而敌人有两个军，上有飞机支援，下有骑兵，任务艰巨。这是关系到全军的一战，必须打好。”正说着，敌人的飞机呼啸着从头上掠过，卢冬生马上命令各就各位，进入阵地。一场恶战开始了。在飞机的掩护下，敌人的骑兵出动了。卢冬生命令炮兵集中火力打骑兵。一颗颗炮弹在敌群中开花，受惊的战马四处乱跑，敌人抱头鼠窜。第一次进攻被打垮了，敌人又发动第二次进攻，炮火越来越激烈。卢冬生鼓励战士：沉住气，骑兵的目标大，越近越好打。坚持到天

①1984年1月访问罗坤山记录。

②1984年1月访问罗坤山，1983年1月访问李文清记录。

黑就有办法了。战士们奋勇杀敌，血战了两天，打退了敌人数次进攻，坚守住了阵地，掩护主力安全过了六盘山。

(五)

抗日战争爆发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卢冬生任一二〇师三五八旅旅长。部队开拔前线前夕，中央同意他的要求，决定张宗逊接任他为一二〇师三五八旅旅长，卢冬生调回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回到延安后，毛泽东亲自接见了卢冬生，并和他谈话。

一九三七年底，中央决定从抗大、党校选一批身体不好的同志到苏联边养病，边学习。卢冬生是其中之一。临行前周恩来和卢冬生谈了话。一九三八年二月，卢冬生同刘亚楼等一起离开延安，经兰州、新疆，五月到达莫斯科。

在共产国际安排下，卢冬生等先到黑海边疗养、治病。一九三九年初回到莫斯科学习。学校设在郊外一个庄园里，学校分为军事班和政治班。卢冬生在军事班学习。一九三九年二月，共产国际的宣传部长、组织部长和中央驻国际的代表团团长任弼时到学校参加了开学典礼。军事班是由苏联伏龙芝陆军大学的高级教官讲课，所以又称为伏龙芝陆军大学特别班^①。

卢冬生从小没有念过书，参加红军后，在戎马倥偬中，坚持学习，能够看报、写信。在军事班不单学习中文，还要学习俄文，学习军事、政治、经济、马列主义理论。他刻苦学习，圆满完成了学业。卢冬生还和其他同学到共产国际各国共产党代

^①1983年访问方志纯记录。

代表团做报告，介绍中国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情况，增进各党之间的了解，扩大我党的影响。

一九三九年秋，周恩来、邓颖超到莫斯科治病，特地到学校看望同志们。见到卢冬生，周恩来勉励他努力学习，并赠送照片签名留念。在此期间共产国际领导季米特洛夫接见了中国同志的代表，卢冬生是代表之一。

一九四一年九月，卢冬生从陆军大学毕业。因苏德战争爆发，回国的交通断绝。卢冬生被派到远东地区，在苏军八十八旅工作。八十八旅是由一部分东北抗日联军编成的，为了方便编入红军序列，卢冬生成了一名苏联红军军官^①。

一九四五年八月苏联红军出兵东北，卢冬生和周保中一起回国，先到达长春，后到哈尔滨。当时八路军还未大批进入东北，哈尔滨市的秩序混乱。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三日，陈云到达哈尔滨，连夜召开会议，研究东北工作。会上决定卢冬生到松江军区任司令员。会议开到次日凌晨结束。因陈云等的行李在离会场几百米处的地方，考虑到安全问题，大家请陈云不要回住所。卢冬生自告奋勇为同志们取行李。他带了一个警卫员扛着行李在回来的路上，碰上几个行为不轨的苏军战士利用夜深人静，仗着人多势众拦路抢劫。卢冬生十分气恼，批评他们，并拿出红军军官的证件。这几个人见他是军官，自知闯了大祸，为了逃避处罚，起了歹心。把卢冬生和警卫员押到僻静的铁路边枪杀^②。

卢冬生遇难时只有三十七岁。他无儿无女，在家乡湘潭订婚一个月的妻子，因为敌人的迫害疯癫早死。

^①1983年10月10日访问彭施鲁记录。

^②1980年2月访问刘达记录。

贺龙得知卢冬生牺牲的消息后，悲痛地说：“正当党和人民需要他作更多工作的时候，不幸与世长辞了。这是党和人民的一个重大损失。作为卢冬生的一个同艰苦共患难的战友，我深切知道这一损失的沉重”^①。

^①贺龙为卢冬生写的碑文。

许晓轩

冯 开 文

许晓轩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无产阶级的忠诚战士。他曾任中共川东特委青委委员、宣传部长，重庆新市区委委员。他坐牢九年，宁关不屈。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殉难于重庆白公馆监狱。牺牲时才三十四岁。

(一)

许晓轩，学名永安，字小轩，一九一六年十月生于江苏省江都县仙女庙镇（今江都县江都镇）。他的童年是在颠沛流离中度过的。父亲因欠债、失业、流浪、忧闷而死得很早，给晓轩幼小的心灵烙上永不忘却的印记。他决心奋发读书，寻求真理，改变这不合理的社会。

许晓轩幼年先后在靖江县和仙女庙镇读书。他读书很用功，语文成绩优异，常得老师赞扬，并得到字帖之类的奖品。当时的私塾中有一门作对联的课程，先生出上联，学生对下联，要求非常严谨，既要讲平仄，又要论对仗。有次先生出的上联是“柴门闻犬吠”五字联，许晓轩对的下联是“茅店听鸡鸣”，生动形象地描绘了一幅农家景色。老师十分赞赏，提笔

眉批“起句甚佳”。他把唐代诗人温庭筠的名诗《商山早行》中“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的佳句灵活运用，显露了他少年时代的才华。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抗日民主运动蓬勃兴起。年仅十五岁的许晓轩，为祖国的大好河山惨遭蹂躏而悲愤。由于生活所迫，他停止了学业，到镇上震泰钱庄当学徒，由于环境和工作关系，他接触了许多中、下层群众，结识了在镇上电信局工作的陈世德，参加了他组织的外语讲习班。陈世德十分赞赏他勤奋好学勇于探索的精神。陈世德在教授英语之余，还常向大家讲述俄国十月革命的故事，鼓励大家学习时事，阅读进步刊物。许晓轩在陈世德引导下，也积极参加学习时事，认识不断提高。

由于国民党特务的破坏，外语讲习班被迫停止了活动，陈世德遭逮捕。陈出狱后，又和俞未平、杭蕴美等组织私立苏州全民流通图书馆，从事抗日救亡宣传活动。许晓轩是这个图书馆的董事之一，积极为图书馆募求经费、征集图书，并主办图书会，组织话剧团下乡，为农民演出，不辞辛劳，四处奔走。

一九三五年，许晓轩到无锡公益铁工厂工作。这是一所制造成套纺织机械和部分面粉加工机械的制造厂。全厂职工近千人，并聘有英国工程师李威斯，当时可称得上是民营机械厂的佼佼者。

许晓轩到厂后被安排当会计。他办事认真负责，很受经理器重，不到一年就被委任为财务会计的主要负责人。一九三七年八一三抗战爆发后，上海前线缺乏兵工器材和手榴弹等武器。兵工署与厂长施之铨洽谈，要求工厂承接军需制品支援前

线。许晓轩积极支持，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①，使大家明白了“国难当头，匹夫有责”的道理。由于形势日渐紧迫，工厂决定将部分机器设备和全部技术资料转移到武汉。许晓轩也随厂到武汉。他除了坚持日常工作外，还积极组织职工以“无锡抗日后援队”名义，参加武汉各界发起的救亡、捐献、支前等活动。一九三八年秋，日军逼近武汉时，许晓轩又与工人一起，再次承担了迁厂的任务，想方设法把大批机器设备运往重庆。

(二)

一九三九年初，许晓轩到重庆后，仍在铁工厂当会计。后经救国会负责人沙千里的介绍，认识了青年职业互助会的领导人杨修范，并参加了互助会的活动。

互助会是在我党领导下，组织青年学习革命理论，宣传抗日的社会团体。经常开展演讲、座谈、出壁报、歌咏、演剧、街头宣传等活动。在一次以“我们要过集体生活”为题的座谈会上，许晓轩说：“一切组织都是集体生活，但集体生活却不一定都是有组织的。理想的集体生活是有组织的集体生活。集体便是力量，集体生活可以产生一加二等于三的力量。集体生活可以培养个人的道德性”。“只有在群众的、集体的生活中才能发挥青年人的热情。独乐乐乎？不乐也，群才是乐……集体生活是斗争的武器，生活就是斗争。轰轰烈烈的一·二九运动，是北平学生集体生活的产物。现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

^①施子铨的回忆材料，存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资料部。

国，他可以欺侮个别的中国人，但在团结一致的中国人民面前，它就只好发抖。”^①由于他待人热情、诚恳，有组织能力，很快就成为互助会的一个核心人物。在他周围，聚集着一批有理想有抱负的纯朴青年。一九三九年五月，经杨修范介绍，许晓轩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成为青年职业互助会的党组成员，杨修范任书记^②。

许晓轩入党后，因为革命工作需要，经常更换职业。他先在复兴铁工厂，后到重庆当局办的液体燃料管理委员会，再到民主人士黄炎培、杨卫玉等人创办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工作，还在沙坪坝开过青年书店。每次他都非常愉快地接受任务，把工作开展起来。他常乐观地说：“工作的地方越多，认识的人就越广，更有机会接触群众，这才有意义呢！”^③

他平常生活非常节俭，从不乱花一分钱，把积存的钱用在革命工作和解决同志的困难上；而对自己的家却从不花费过多的精力。母亲曾埋怨地说：“你一点不管家里的事情，简直不要家了。”^④许晓轩耐心地对母亲说：“帝国主义正在侵略中国，民族灾难这么深重，只有有国才有我们的家。只有国家富强了，才会有家庭的安宁。”^⑤同时，他还说服家庭，动员妹妹许永清参加进步活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他给三妹的信中写道：“……《子夜》今天寄给你。这书很好，虽然故事旧了一些，不适合目前的环境，但还是可以告诉你一些中国

① 《青年生活》第5期，存重庆北碚图书馆。

② 杨修范：《抗战时期我在重庆地下党工作情况》，载《重庆党史研究资料》1984年第4期。

③ 许德馨：《我的爸爸》。

④⑤ 许瘦峰：《许晓轩事略》，存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资料部。

社会里各种代表人物，工人、老板、小姐……是怎样在生活。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国社会是怎样组成的。中国的厂主是怎样一方面走到买办的路上去，一方面帮助敌人来压迫自己人，中国的工人是怎样在双层——国内和国外的压迫下生活着。中国的农村是怎样的在穷下去，而都市又是怎样的在畸形发展。这是一幅半殖民地的写生画……对于了解中国社会的本质有很大的帮助。关于中国问题，有两本书可读：1.《中国是怎样降到半殖民地的》；2.《中国近代革命运动史》。”^①在他的教育下，许永清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一九三九年五月，地下党川东特委青委决定创办刊物《青年生活》，由青委书记杨述任主编，编委有许立群、许晓轩。许晓轩还负责发行工作。每期稿件编好后，由许晓轩送到《新蜀报》或《商务日报》印刷厂排印，每期大约印一、二千份。除内部赠送外，大部交生活书店出售。同年九月二十五日，第一期《青年生活》月刊问世。在编印刊物期间，许晓轩给刊物撰写了不少文章，许晓轩曾在题为《五四在今年》的文章中写道：“五四到今年，已经是二十年了。童年的中国，经过这二十年的奋斗也发育成一个朝气蓬勃有作为的青年……。按照现实环境所需要来完成五四未完成的任务，这些任务也是抗战过程所必须完成的。第一要为民权主义的实现而奋斗，发挥民权以逐渐达到民主政治；第二要提倡科学的方法，科学的人生观，在进步了二十年的祖国，遭受空前大难的今天，我们更要学习前一辈青年英勇爱国的精神，为完成五四的任务，解放中华民族而工作”^②。后来由于日本飞机狂轰滥炸，社会秩序很

^①许晓轩给其妹的信存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资料部。

^②《青年生活》第8、9期合刊，存重庆北碚图书馆。

混乱，国民党特务肆意逮捕革命群众。在这种情况下，刊物很难再出版，被迫停刊。

一九四〇年春，许晓轩担任了中共川东特委青委宣传部长，后调任重庆新市区区委委员。

(三)

许晓轩担任新市区委委员后，经常深入基层，特别是到工厂，领导工人同国民党顽固派开展斗争。一九四〇年四月，他去大溪沟兵工厂开会，由于叛徒出卖，被早已埋伏在外面的特务逮捕。以后家人曾四处打听，都不知下落，通过狱中的秘密关系才得知他被关在重庆望龙门22号军统的一个看守所里。不久许晓轩从狱中带出消息：要见面是可以的，但不能到监狱里来，只有在空袭的时候见面。那时日寇的飞机常到重庆扰乱，特务要押“犯人”进防空洞，只能利用这个机会在途中见面。在一次躲警报进防空洞时，他意外地与哥哥许瘦峰见了一次面。

许晓轩在狱中得知亲人正在设法营救他，便用铅笔在包香烟的薄纸上写了“宁关不屈”四个字，托人捎出。现珍藏在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展览大厅里。

许晓轩在以后给家人的信中告诉了一个秘密的联系办法，就是在收信后的一号或十五号，在《和平日报》（即《扫荡报》）的广告栏里连续登一星期这样的寻人广告：“庆辰×弟，自汝离家，已经数载，老母……妻……望速来信×××处转。兄泰贞白。”^①许晓轩在狱中可以看敌人的报纸。如发现广告，

^①许晓轩从狱中写给家人的信，原件存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

可找人按上面的地址去取信。这样与家人取得过一些联系。他每次带出的口信都说：身体很好，生活也不差，以安慰亲人。他还曾在一封信里写道：“货殖为求慈母喜，时艰倍觉弟兄亲。”^①同时还把自己在除夕写的一首七律抄寄家人：

不悲身世不思乡，
百结愁成铁石肠。
止水生涯无节日，
强颜欢笑满歌场。
追寻旧事伤亡友，
向往新生梦北疆。
慰罢愁人情未已，
低徊哦诵“惯于”章^②。

他还请哥哥转告爱人美琦华，一、我无归期，请她早作打算；二、希望她能找点事做以谋自立；三、馨儿长大务必送到我的老友处去教育^③。

一九四一年十月，军统白公馆看守所的全部“犯人”转入息烽监狱。许晓轩也被解走。在息烽，国民党特务称牢房为斋房，按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来命名。囚犯在监狱里不准用真实姓名，用号码来代替名字。许晓轩编号是302号，囚在义

①许晓轩从狱中写给家人的信，原件存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

②“惯于”：指鲁迅的《无题》诗。原诗是：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

③许晓轩从狱中写给家人的信，原件存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

斋。

一九四一年下半年，监狱主任周养浩以便于管理为由，提出“监狱学校化”、“监狱生产化”口号。在加强所谓思想教育感化的同时，也搞些生产业务，如开办工厂、兼营商业和运输等。凡出来参加这些工作的都叫工作修养人。去不去当工作修养人，曾引起一些争论。许晓轩认为这是国民党特务的圈套，是剥削我们的劳动成果，主张不去。也有同志说，在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下可以去。狱中党组织分析了国民党特务的用意和当时狱中的形势，认为党员是少数，只有因势利导，将计就计，利用这个机会团结更多的难友，开展斗争。最后决定除罗世文外（因他的身份在狱中是公开的），都可以当工作修养人。后来许晓轩被安排在印刷厂木刻部、铅印部。

有一次，监狱要许晓轩在一棵核桃树上刻下“先忧后乐、忠党爱国”八个字。当他把先忧后乐刻好后，故意从梯子上摔下来，把脚跌伤了，忠党爱国四字也就没有刻成^①。如今在集中营旧址的核桃树上，先忧后乐四个字还清晰可见。

许晓轩在狱中威信很高，难友们都尊敬他，每当危难的时候，他鼓励大家：“越是关键的时刻，我们越要叫敌人知道，共产党人是不可动摇的。”^②一次有位叫文泽的难友，因不满特务的残暴，拒绝外出参加劳动，遭毒打昏倒在地。许晓轩挺身而出，怒斥敌人的蛮横无理。他说：“你们这样蛮干，干脆把我们枪毙好了！”^③特务无言以对，只好快快而去。事后许

①韩子栋：《许晓轩同志狱中二、三事》，存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资料部。

②③姜士豪：《回忆许晓轩烈士》，存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资料部。

晓轩主动找文泽交换意见。肯定了他斗争坚决、勇敢，但也十分坦率地指出：“我们处在这样特殊的地方与凶残的敌人斗，不但要勇敢，更重要的是谋，要讲究斗争艺术。”^①

在监狱里，许晓轩抓紧一切时间学习。每天早上天刚亮，他就开始学外文；晚上，利用走道上透进牢窗的微弱桐油灯光读书，天天如此。他在狱中两、三年，通过自学已能翻译一般的俄文；同时还自学英文。他也认真阅读《孙子兵法》。有人好奇地问他：“为什么连这样的书都看？”他说：“我们搞政治的人，只要有时间，什么书都要看。既来之，则安之，应充分利用时间，为将来打好基础。”^②

一位难友回忆说：“许晓轩对人态度和蔼，肯帮助人。谁愿意学外文，他都热情地教。有次教我学俄文的弹音，由于我舌头不太灵活，他叫我把头闷在装有水的洗脸盆里反复练习。”^③在狱中，他常与罗世文接触，有时敌人发现他俩在谈话，走到旁边偷听，但一句也听不懂，原来他俩在用俄语对话。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八日，毛泽东亲赴重庆谈判的消息传到狱中，难友们无不欢欣鼓舞。许晓轩深情地说：“天快亮了。”^④大家笑逐颜开，都认为要释放政治犯了。谁知国民党反动派背信弃义，暗地将一些政治犯秘密杀害或异地监禁。

一九四六年七月，军统息烽监狱撤销，除释放一百多人外，剩下的七十余人转重庆并入白公馆看守所。这里囚禁的大

①姜士豪：《回忆许晓轩烈士》，存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资料部。

②姜士豪：《回忆许晓轩烈士》。

③龚浩然回忆材料，存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资料部。

④韩子栋：《许晓轩同志狱中二、三事》。

都是国民党认为案情严重的政治犯。

许晓轩与罗世文、车耀先、谭沈明等都转囚重庆。由于斗争的需要，由许晓轩、谭沈明、韩子栋三人组成临时支部，许晓轩任书记^①。经临时支部研究决定，准备组织难友越狱逃跑。难友们为此三三两两在议论着，有的同志说不能犹豫，要果断。谭沈明回忆说：“从阳朗坝解重庆的那天中午，因天气太热，汽车经长途行驶，水箱的水沸腾了，车暂时停在名叫半壁山的陡坡处。几个狱卒象一滩烂泥，横七竖八躺在树荫下，许晓轩与我们商量想法逃走。因车耀先腿不方便，正在想办法的时候，汽车发动了，就这样，一次难得的逃跑机会错过了。根据敌人监狱警卫森严这一特殊情况，临时支部最后决定：跑一个是一个，谁有机会谁先逃。”^②

后来，许晓轩、谭沈明考虑到韩子栋有机会逃走，因为他当时在狱中小卖部和伙食团干一些杂活，于是告诉他做好一切准备。韩子栋利用可以进出监狱的机会，画了一张道路、壕沟、岗哨、四周环境的简图交许晓轩，并将他在狱中积存的钱换成了现钞。随后他们商量了几个具体意见：一、逃出后要想法化装；二、逃出后要向山多的地方跑，最好能准备一把刀子，遇上敌人可以跟他拚；三、四川山多易迷失方向，夜里要看准一个方向，一个星座，白天要想法与抬滑杆的人接近，他们都是穷人，可请他们帮忙^③。一九四七年八月十八日，韩子栋随看守卢兆春等人去磁器口街上买菜，乘他们打牌之机，机智地逃脱

①韩子栋：《许晓轩同志狱中二、三事》。

②③韩子栋 1972 年 9 月 11 日写的材料，存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资料部。

了。以后历尽艰辛到了延安。许晓轩还曾和李子伯等难友筹划过集体越狱，因条件不成熟未能实现。一九四七年底，李子伯转囚渣滓洞，临别时，许晓轩曾作《赠别》诗相送。

相逢狱里倍相亲，
共话雄图叹未成。
临别无言唯翘首，
联军已薄沈阳城。

在狱中，敌人曾要许晓轩保证不越狱逃跑。他义正词严地拒绝了，后被罚带重镣，在烈日下做苦工，被关在终日不见阳光的地牢里。一次，他与难友们一起被押到外面做苦工，在回监狱的途中，他悄悄带回一株石榴树苗，种植在白公馆放风坝。这株石榴树苗经难友们精心培育，冬去春来，顶霜傲雪，逐渐根深叶茂，年年艳花硕果。解放后，当人们前来白公馆参观时，无不对这株象征着革命先烈碧血的不寻常的石榴树发出崇敬的赞叹。

有一天，狱中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挺进报》白公馆版被敌人发现了。一位无辜的青年遭到敌人毒打。敌人追问他纸条上的消息是从哪里来的，是谁写的？在这紧急关头，许晓轩胸有成竹地出来说是自已写的。看守进一步追问他消息从哪里来的？许晓轩从容地回答，是从你们的办公室、你们的报纸上看到的。接着，他厉声地说：“你们打报告枪毙我吧！我永远是一个共产党员！”看守们怕事态闹大了反而下不了台，当即居心叵测地宣布：今天停止放风。这件事就这样平息了下来。许晓轩这种临危不惧、舍己救人的高贵品质，使难友们十分感

动，而他却因此被带重镣关地牢。敌人碰了一鼻子灰，无可奈何，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他是一名不容易对付的共产党员，任何刑具对他是没有效果的。

敌人见硬的不行，便改用软的花招，派他当会计，并诱以相当高额的津贴。他却回答说：“我对倒马桶，洗茅房很有兴趣。”^①又有一次，中美合作所所长丁敏之说：“我们打算释放你，并介绍你去教书。”许晓轩答：“先无条件放出去，再谈工作吧！”^②

一九四八年七月二十一日，敌人在重庆大坪公开枪杀了地下党重庆市委委员、工运负责人许建业和共产党员李大荣。他们壮烈牺牲的消息传到狱中，许晓轩怀着对敌人的无比愤恨和对战友的深切悼念，写下了祭奠战友的七律一首：《吊许建业同志》

噩耗传来入禁宫，
悲伤切齿众心同。
文山大节垂青史，
叶挺孤忠有古风。
十次苦刑犹骂贼，
从容就义气如虹。
临危慷慨高歌日，
争睹英雄万巷空。

^{①②}《美帝蒋匪重庆集中营罪行实录》，中央革命博物馆编（1950年8月）。

(四)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向大西南进军，重庆解放在即。十一月十四日，蒋介石由台湾飞到重庆，亲自部署了对西南的应急措施，主要是对西南的重要工业城市重庆进行大破坏，安插一批特务游击潜伏和对革命者实行血腥大屠杀。

十一月二十七日，解放军的炮声已隐约可闻。难友们积极准备迎接解放。在这曙光即将到来的时候，国民党反动派对集中营的革命者开始了疯狂的屠杀，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一一·二七”大血案，三百多人被残杀，连不满周岁的婴儿也未能幸免。白公馆的革命者一批批被押到松林坡附近杀害，顿时歌乐山麓枪声、口号声交织在一起，震撼着这杀人魔窟。

在生死攸关的时刻，许晓轩从容地对难友说：如果在我临死的时候，敌人问我有什么要求，我就说，要看当天的《新华日报》，看后死无遗憾了^①！他在黑狱窗口凝视着新中国的曙光，怀着对党的深厚感情、崇高的共产主义信念，留下口头遗言：“请转告党，我做到了党教导我的一切，在生命的最后几分钟，仍将这样……希望党在胜利以后，经常注意整党、整风，提高党的战斗力，不断纯洁党的组织。”当刽子手叫他出来的时候，许晓轩把自己身上的一件棉衣脱下，披在一位难友身上说：“我穿着没多少用了，同志，你披上吧！能用多久就用它多久。”随后大步跨出牢房，气宇轩昂地走向刑场。他蔑

^①韩子栋回忆材料，存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资料部。

视地声斥敌人说：“你们这狗东西也活不了几天，人民就要审判你们了！”^①

刽子手胆颤心惊地扣动了枪机，罪恶的子弹射向他的躯体。他高呼口号，倒在血泊中。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三十日，重庆解放了，在党和政府的亲切关怀下，收殓了被难烈士遗体。在收尸的时候，发现许晓轩烈士的双手被手铐紧锁着。一九五〇年一月十五日，在青年馆为死难烈士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刘伯承、邓小平等亲往祭奠，并与张际春、李达联名送了挽联：

为烈士复仇，彻底消灭反动派；
争人民幸福，努力建设新中国。

^①毛晓初：《关于中美合作所的一些情况》，存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资料部。

赖若愚

李 贵 仁

(一)

赖若愚，原姓来，名秉敬，字仲达，乳名明义，山西省五台县唐家庄人，生于一九一〇年一月一日。他的祖父来风林曾多次会考未中秀才，后来学习中医，串乡治病，受人尊敬。他的父亲来生元，又名来献瑞，经商并主持家务，两位叔父均教书。赖若愚同胞兄妹八人，他排行第二。家里有八十多亩田地、两处商店，粮有余，钱不缺，生活比较富裕。

赖若愚自幼活泼好动，六岁时跟随二叔父在本村小学念书，不甚用功，但每次考试，成绩都很不错。在学校里爱护弱小同学，老师不在时，常常代教小同学，人们叫他“小先生”。一九二〇年，他参加五台县全县会考，名列前茅。一九二一年，他初小毕业后，考入五台县第二高小。是第二高小有名的高材生。

一九二三年夏，十三岁的赖若愚高小毕业，考入河边村川至中学。川至中学是阎锡山办的私立学校。赖若愚在这里学习，除喜爱历史、文学外，其它各门功课也都学得很好。

北伐战争开始以后，对山西、对川至中学影响和震动很

大。广大师生欢迎革命，欢迎北伐，这时有一些宣传国民革命和宣传北伐的传单和小册子传到学校，赖若愚看了以后，感到既新鲜、又振奋。

一九二七年末，赖若愚中学毕业。他很想上大学，可是家里对他上学意见不一。后来，他不顾家庭阻拦，气愤出走，跑到北平，考上北平大学工业学院。

在大学里，赖若愚对新文艺发生了兴趣，喜欢读《少年漂泊者》、《石炭王》、《屠场》之类的小说。一九二八年夏，他在山西同乡同学赵希真（即赵全璧）的影响和介绍下，参加了进步社团——人言社。在这里，他看到了马克思、列宁的著作；看到了过去出版的《新青年》，阅读了许多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文章，开始明白了共产党的主张，明白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是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源。他渴望参加到拯救中华民族的斗争中去，也希望参加共产党。赵全璧当时已是中共地下党员，和赖若愚同住一个公寓，对赖若愚很了解。赵全璧有意送他进步书籍并带他一起参加社会活动，经过一段时间的培养和锻炼，一九二九年九月，赵全璧介绍赖若愚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一九三〇年上半年，在白区工作中，“左”的倾向开始抬头。北平市党组织决定在四月十二日——蒋介石背叛革命三周年的日子里，举行“飞行集会”。赖若愚参加了这次行动，并遭敌人逮捕。因为敌人没抓到更多的证据，关了六、七天后，就把他放了。随后组织分配赖若愚做电车工人的工作，并分配了一位叫小胡的同志做他的助手。

是年八月，学校放暑假，中共北平市委派赖若愚去上海党中央接受暴动训练。训练结束后，赖若愚回到北平，组织上委派他为北平市军委书记，参加“行动委员会”，他开始成为北平

市党的主要活动分子和骨干。

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初，省委直南交通陈鹏举路过北平，通过赖若愚和史俊明找河北省委军委负责人廖化平。到了北平东车站，陈被敌人跟踪逮捕，介绍信未来得及毁掉，落入敌人之手。侦缉队按照介绍信上的姓名地址，找到了赖若愚的公寓，逮捕了赖若愚、史俊明、韩国刘、胡国栋、王汝林等五人，并从赖若愚的房子里搜出了《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小册子一本和洋东夫同志的一个《意见书》。

在法庭上，敌人问赖若愚是不是共产党员，赖若愚回答说：“不是”。敌人从桌子上拿起一本小册子和几张字纸在赖若愚面前晃了晃，然后说：“这两件东西是你的吧！”赖若愚否认，说是一个姓樊的人留在他那里的。

敌人再追问道：“你认识一个姓陈的共产党员吗？”

若愚回答道：“我不是共产党员，怎么能知道别人谁是共产党！”

时隔不久，敌人又进行第二次审讯。审讯室四周放着各种刑具，有几个彪形大汉站立两旁。赖若愚感到严重的考验时刻到了。但他很镇静，做出满不在乎的样子。

敌人审问说：“来秉敬，你想了几天，可有新的要交待的吗？”赖若愚说：“就是上次说的那些，没有了。”敌人再追问说：“在你家的那四个人是共产党员吗？”赖若愚说：“我不知道！”

敌人站起来，走到赖若愚身边，恶狠狠地吼道：“难道你不怕受刑吗？”

赖若愚说道：“怕不怕不由我，你们硬要冤枉人，我有什么办法！”敌人见赖若愚不招认，便下令用刑。几个大汉七手

八脚把赖若愚抬上了老虎凳，手里还拿着烧红的铁棍。在敌人的重刑威逼下，赖若愚毫无惧色。重刑用过之后，敌人又把陈鹏举押上来与赖若愚对质，陈鹏举没见过赖若愚，自然说不认识。敌人没有掌握确凿证据，只好把赖、史、王、陈四人押送北平高等法院。

在北平高等法院的看守所里，赖若愚得了黄疸性急性肝炎。由于环境恶劣，再加上受过重刑，病势日重。同房里有一个艺术学院的学生袁仁杰，看到他受刑以后又得重病，很是同情。就象护理自己的亲兄弟那样，为他喂水，喂饭，精心护理，终于使赖若愚慢慢得以恢复。

高等法院后来判决赖若愚一年半徒刑，关在北平第一监狱。狱中有七个党员，他们组织了狱中临时支部，并且很快和在狱外的赵希真取得了联系。在狱中，赖若愚和刘尚志、赵子昂等领导狱中难友首先为争取放风、洗澡、改善伙食进行斗争。接着提出买书、看报的要求。敌人不答应，他们就绝食。当局只好被迫答应。好友续吴山按照赖若愚的要求，多次探监，送书送钱。在这段狱中生活时期，赖若愚认真阅读了许多政治理论书籍。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全国人民一致要求国民党政府团结抗日。赖若愚在狱中得到赵希真、薄一波的指示，团结狱中难友，配合九一八事变后的新形势，进一步展开了斗争。一九三二年的九月，赖若愚刑满获释。一年零九个月的狱中生活，使他经受了锻炼和考验。

(二)

赖若愚出狱后，河北省委派人和赖若愚谈了两次话，省委

认为他出狱不久，不适合在北平工作，便派他前往太原，担任山西特委组织部长。

到了太原，见到了朱宝善、王伯堂等人。旧友重逢，同志相见，分外高兴。他很快熟悉了山西、太原的斗争形势。为了开展党的工作，他经常下乡活动。先后到过河东虞乡、解县、运城和晋中的祁县、晋东南的沁源等地，巡视当地党的工作，推动了党组织的发展和斗争的开展。

经组织同意，赖若愚于一九三三年春，回五台探家。

赖若愚回家休养了一段时间，至夏季，又患病拖到了秋天。当他正决定要走时，突然接到一封没有落款的来信，说太原的党组织遭到了破坏，赖若愚也在敌人通缉之列。这样一来，他又走不成了。

这个期间，他曾在本村和上下邻村的贫苦农民中走家串户，作了些访问，谈论了一些革命的道理，做了一些宣传，引起一些贫苦人的兴趣。但他的活动，逐渐引起了当局的注意。

一九三四年旧历年前，国民党五台县第二区区长樊恩德带领一助理员，从耿镇来到唐家庄想抓赖若愚。助理员平素与来生元关系较好，把来意透露给来生元。来生元一面应酬他们，一面告知赖若愚速上山潜逃。待樊恩德向来生元要人时，来推说：“秉敬不在家，等他回来以后，叫他亲自前去。”就这样应付过去了。

赖若愚离家之后，绕道来到五台县一区南茹村其岳父家暂住。其岳父刘生元在这个村里也是一家财主。南茹村里有一高小，赖若愚到学校当了语文教员。

一天，一区公所有个人来村里打听赖若愚的情况。使他感到预兆不好，他决定离开南茹村，去太原寻找党组织。一九三四

年夏，他不辞而别，离开家乡，潜入太原去寻找党组织。

赖若愚来到太原后，通过同学张雋轩在“雷得社会调查统计社”栖身。不久，他通过吴熙菴找到了党组织。党组织对他未经组织同意就找灰色掩护提出了批评。赖若愚向组织做了检查并接受考查以后，组织上把他和朱宝善、冀云程编为一个特工小组，进行活动和斗争。

从一九三四年夏到一九三五年十月，由于工作的关系，赖若愚认识了太原女子师范学生自治会的常委、地下党员王子如。两人在工作上互相支持，互相配合，感情日深。于是，经组织批准，他们结成了革命伴侣。

一九三五年九、十月间，太原党组织又一次遭到了局部破坏，赖若愚再次被通缉，王子如处境也很困难。在这紧要关头，党组织通知赖若愚夫妇立即转移，到北方局特科报到。赖若愚夫妇同赴天津，后转派到张家口工作。

来到张家口，赖若愚的公开身份是税务局职员。王子如无公开职业，做秘密交通联络工作。他们属于北平市委特科领导，不与张家口地方组织发生关系，只和扶轮小学教师赵常泰及建设厅一科长郭某有关系，任务是帮助他们做组织发展工作。

一九三六年四月，张家口税务局调换局长后，环境也变得恶劣了，组织上遂调赖若愚回北平，分配做市委组织部干事。当时，北平分两个区，赖若愚负责北区的组织工作。他非常需要有一个合法身份做掩护，于是写信给好友续吴山请求帮忙。吴山托人弄到一个《民国日报》记者证，寄给赖若愚。赖若愚欣喜若狂，带着它外出活动就有了一个护身符，可以通行无阻。为了象一个记者，他买了一套廉价旧西装，一双旧皮鞋。

那时，党的活动经费来源十分困难，活动费很少，每月两

个人也不过七元，生活十分艰苦。

一九三六年的十月，因为工作需要，赖若愚由北平市委转到北平军委系统做人民武装工作。自华北事变以后，日寇步步深入，华北各地在党的北方局领导下，群众正在纷纷组织起来进行抗日反蒋斗争，各地的会道门聚集了一部分武装力量。为了联络组织各种抗日力量，赖若愚先后到过山东的临城、枣庄；河南的汤阴；江苏的徐州；北平附近的斋堂；河北的磁县、彭城等地工作。他有时以党的名义出现，多数情况下是以会道门首领的身份出现，与各种会道门的大小头目往来，和他们称兄道弟，宣传形势，激发他们的民族感情和爱国热忱，帮助他们加强组织，共同抗日。为了适应这一工作，他曾用了很大的努力，研究了华北各地会道门的具体情况，掌握了大量的行话、暗语。并且由他负责，组织了一部分同志，进行训练，从事这一工作。外出工作时，经常带一、二人做为随从，俨然是一个会头人物。

一九三七年初，北方局领导打算在会道门力量比较大的地区组织暴动，北方局军委派赖若愚和孙镒搞这一工作。赖若愚带着孙镒来到山东微山湖附近薛城车站旁边的古井村。当地有个小刀子会，头目是王守金、王守银兄弟二人，有相当大的一支武装力量。他们和军阀韩复榘是死对头，为了抗盐税，曾经把韩复榘的一个师打垮。王守金牺牲了，后来小刀子会就由王守银领导。赖若愚带着孙镒，多次和王守银接触，宣传抗日，谈得很投机，于是三人做了磕头兄弟。王为老大，赖为二哥，孙为三弟。此后不久，赖若愚又到别处活动，孙镒把从组织传来的抗日消息不断传给王守银，帮助他训练和教育小刀子会。由于赖若愚、孙镒认真细致的工作，王守银终于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抗战开

始以后，王守银在青龙山举旗，建立抗日农民救国会。一九三九年改编为八路军，王守银还上了抗大，入了党。他带领的一支武装，成了党领导下的一支真正的抗日力量。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爆发后，北平城内十分紧张，组织上决定赖若愚和王子如二人赴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在中央党校，赖若愚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的马列主义著作和中央规定的其它有关文件，并且多次听到毛主席的报告和中央许多首长的讲话。时间虽短，收效甚大，从精神上、理论上得到进一步武装。三个月学习结束了，他和王子如一起，接受党中央的派遣，于一九三七年底，重返华北，进入敌后开辟工作。

赖若愚从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归来，以一二九师唐（天际）支队联络参谋的公开身份，来到山西省晋城县任中心县委书记，王子如被分配到屯留县做组织部长，不久任晋城县委组织部长。

晋城中心县委管辖范围包括阳城、沁水三县。县委主要成员除赖若愚、王子如外，还有宣传赵培心，工运赵明，农运徐一贯，特派员洛宏章等。

当时晋城县的斗争形势很复杂，各种矛盾异常尖锐。一九三八年阳历一月二十七日，日寇占领晋城县城，建立了以李廷相为首的伪政权。阎锡山对我党领导晋城人民的抗日活动采取拆台政策，委派晋城原公安局长程树华担任晋城县县长兼保安二十四团团团长。此人是青帮头子，独揽晋城一切大权。本县地主势力有马、李两派，马骏是阎锡山的高级官僚，李生达是阎锡山手下的高级将领，并且受到蒋介石的垂青。晋城处于党团帮派林立、各种政权并存、各有军队支撑的局面。

晋城中心县委在赖若愚主持下，于一九三八年五、六月间，在两大阳成立了农救会、工救会。组织各区、各乡党员，以牺盟会的名义深入农村，发动群众，建立各种人民抗日组织，向地、富借粮，搞合理负担，减租减息，反奸反霸，并随时注意在群众斗争中，发现积极分子，作为培养对象，发展党的组织。党的组织随着群众运动的发展而壮大，群众组织则随着党组织的发展壮大而更加发展。赖若愚和王子如都直接抓党组织的发展，一九三八年和一九三九年两年内，党员由五十多人发展到五千多人，从中又涌现出一大批骨干。

在群众组织和群众运动发展的基础上，赖若愚进一步发动群众，揭发阎派县长程树华的种种罪恶。程树华被撤职后，赖若愚抓住新旧县长交替的空间，组织各级党组织的力量，把县、区、村三级政权中的反动分子，都换成了共产党员，使晋城三级政治面貌一新。

为了巩固抗日民主政权，必须大力发展人民武装。一九三八年上半年，县委决定把县人民武装自卫队改编为晋城人民游击队，简称“晋民游击队”，人民抗日武装得到空前的发展。

一九三八年七月，中央北方局代表朱瑞来到晋城，提出放手发展牺盟会，大量吸收在乡知识分子参加抗日工作，扩大统一战线。根据中央和北方局的指示精神，赖若愚亲自抓统战工作，大力发展工农青妇各抗日组织，加强与友军五二九旅的联系和配合工作，一九三八年阴历六月初六，在我党努力下，配合友军，把日寇赶出了晋城，抓获了汉奸李廷相，并召开了公审大会。

为了培养干部，县委在高都开办了各种训练班，县委创办了机关刊物《火炬》，由王静海主编，赖若愚以及中央北方局

代表朱瑞等都为《火炬》写了不少文章，宣传党的政策。

一九三九年初，晋冀豫区党委调赖若愚到晋冀豫区党委党校工作。李雪峰以晋冀豫区党委书记身份兼任校长，赖若愚任副校长，不久又继任校长。

一九三九年七月，赖若愚接晋冀豫区党委书记李雪峰的通知，调任晋东太行二地委书记。

太行二地委管辖的范围，包括平（定）西、昔（阳）西、和（顺）西、寿阳、榆次、太谷六个县。各县皆是半壁河山。敌占城我占乡，敌占川我占山，城镇和交通要道均被日寇控制，我们集聚在山沟小庄。地委机关先后在和西的横岭、翟家庄、广武和榆社的曲里等地活动。

九月，赖若愚参加了中共晋冀豫区委在武乡县东堡村举行的第一次党代会。赖若愚在大会上听取了杨尚昆的政治报告，彭德怀的抗战形势报告。

一九三九年十月，赖若愚主持召开了一分区党的代表会议，根据中央七月宣言和晋冀豫区党委九月会议精神，联系二分区的实际情况，向大会提出了五项任务：一、开展群众性游击战运动；二、开展民主运动，区长、村长实行民选；三、加强阶级教育、民族教育，团结人民，适当改善民生；四、加紧生产建设，发展生产；五、开展敌战区工作。在这次会议精神的指导下，广大干部深入群众，各项工作有了新的起色，对敌斗争状况有了很大的改观。

一九四〇年九月，八路军在华北发动了“百团大战”。太行二分区广大人民群众，配合正规军和地方武装，在赖若愚等同志的坚强领导下，参加了这一战役。地委与专署派出三十二名重要骨干组成工作队深入各县，和当地军民一起，积极参加

了破公路、拆铁轨、炸桥梁、毁据点、收复失地的战斗，取得了很大的胜利。

“百团大战”震动了全国，也震动了全世界。但也更引起日寇的重视，惊呼要“对华北应有再认识”。正太战役告一段落，赖若愚及时召开了县书联席会议，部署战后工作，要求加紧防备敌人报复，大力开展三秋工作，力争快收、快打、快藏，实行空室清野，提高警惕，加紧备战，迎击日寇扫荡。

“百团大战”以后，从一九四〇年的十月开始，日寇接连对二分区进行了四次大规模的扫荡。第四次扫荡从一九四一年六月十七日开始，日伪军从辽县、昔阳县、榆次调集千余人，在二分区腹心地区进行扫荡，扩展敌占区。在昔西建立起维持会，同时加紧建立情报组织，逐步扩大其占领区。连续不断的残酷扫荡，造成了二分区人力、物力、财力上的极大困难，二分区人民面临着生死存亡的严重危机。

面对这种情况，赖若愚作为地委领导人，提出在游击区实行“两面政权”的主张，得到了上级党委的批准。在困难情况下，两面政权是应付环境、对付敌人的好办法，给我们带来很多好处和便利，起了积极的作用。

敌人对根据地的扫荡，使根据地面积大大缩小。大家挤在一起，带来许多问题。赖若愚和军分区的负责同志决定坚持“敌进我也进”的策略。赖若愚说：“敌人拚命向我根据地扩展，但他的兵力是有限的，他对根据地大量用兵，他的后方必然空虚。一面正面迎击，一面派武工队到敌人后方去，就会形成对敌人的夹攻，就可以变被动为主动，改变当前的困难局面。”这个策略的实行，对改变根据地的困难局面起了很好的作用。

一九四三年一、二月间，中共太行分局决定把赖若愚从太行二分区调到太行分局担任组织部副部长兼太行区党委组织部部长。

赖若愚首先抓调查研究。他对调查研究，一般采取四种办法，一是自己亲自下去了解情况作调查；二是向各级调研机构要材料，而且特别注意数字的统计；三是请地、县各级调研人员来汇报；四是集中有关人员，定题、定时进行调查研究。特别是围绕党的中心工作的一些重大问题，例如对农村支部的调查，对党员思想状况的调查，对干部作风的调查，对减租减息的调查等等。他亲自参加或主持进行了很多的调查、研究。从而使他能较快地掌握全局情况，并能作到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

从一九四二年四月起，太行区开始了普遍的整风文件的学习。正式整风是从一九四三年三月十三日中共太行分局发布《关于一九四三年的整风计划》开始的。六月五日，太行分区召开干部会议，邓小平书记作了整风问题的报告。太行区地委以上干部参加了中共中央北方局党校第七期的整风学习。

太行区的整风，主要领导者是李雪峰、赖若愚、张磐石等同志。他们充分发挥了集体领导的作用。赖若愚在领导整风中，首先强调认真学习文件，普遍提高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和提高对整风意义的认识。在敞开心扉，对照检查阶段，他对情况相近的同志进行分类指导。

整风中强调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不单指参加整风的同志之间，也包括下级对上级的批评。赖若愚发现参加整风的同志对区党委领导有不少意见，于是向区党委提出，要求领导干部都去听听意见。李雪峰亲自动员，他说要“打开窗户通空

气”。这样做的结果，使上下级关系更密切了，同志之间更团结了。

太行区党委当时管辖八个地委，全区面积约三万五千零八平方公里，辖三十六个县，范围大了，干部多了。特别是实行了“三三制”政权，干部中各个抗日阶层的代表都有。组织部不光是管理党员干部，而且要管理各系统的所有干部，工作十分繁重。

赖若愚具有充沛的精力和平易近人的工作作风。许多干部他只要见过一面就熟悉了。他和很多干部都作过个别谈话。他的谈话针对性很强，对在工作中做出成绩的同志总是及时给予鼓励，对工作中有严重缺点错误的同志决不放过，在干部眼里他是一个是非清楚、赏罚分明的好领导。特别是受过他批评的同志不背包袱，不闹情绪。因为他善于做思想工作，能抓住问题的关键，长于分析，给人以启发，给人以力量和信心，因此干部们十分尊敬和信赖他。

赖若愚担任区党委组织部长期间，还十分重视和善于使用干部，指导干部工作。一九四三年的七月五日，他在《战斗》上发表了《一个县委的开会》，指出不要召开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脱离中心的会议。

他在文章中说：“全年十分之一的时间，消耗在滔滔不绝的空谈之中了，赶到把旧的议程进行完毕之后，新的议程又该来了，那么这些诚恳的说空话的人们，又只好坐在房子里缠绵不绝的开会了，行动工作就只好让它再自流下去了。”他在文章的最后说道：“老油腻的领导休息吧！生动活泼的领导应该出现。”赖若愚这篇文章的发表，对干部们震动很大，对改正存在的问题，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三)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消息传来，整个太行山沸腾了。在万众欢庆胜利的时刻，赖若愚告诫大家：眼下还是有战争，请大家千万提高警惕。就在第二天，八月十五日，阎锡山命令他的十九军史泽波部，由汾东的东张出发，向太行山根据地杀来。八月二十一日侵入长子，二十三日侵入长冶、屯留，二十五日侵入壶关、潞城、襄垣。这还不算，阎锡山于九月二十二日又派第七集团军副司令彭毓斌率部向我晋东南根据地进犯。九月间胡宗南、孙连仲勾结日军和伪军孙殿英、庞炳勋等共计二十万人，由豫北郑洛一带，沿平汉、道清两线，大举进攻我冀南、太行解放区，爆发了上党战役。上党战役中，我军歼灭蒋阎军十三个师，三万五千多人，彭毓斌被击毙，史泽波被活捉，取得了伟大胜利。

在国内战争危险急剧增长的情况下，为了准备战争，有效地制止国民党发动的内战阴谋，党中央于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发出指示，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必须明确认识解决各解放区的土地问题是全党目前最基本的工作任务，是一切工作的中心环节，赖若愚不遗余力地投入了党的中心工作，动员、组织广大党员、干部带头参军，发展扩大正规军和地方武装；组织领导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党员学习《五四》指示，培训土改干部，举办典型试验，研究土改问题。

一九四六年七月一日，太行区党政军各机关一千余人举行集会，隆重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五周年，赖若愚在会上讲了话，号召党政军民紧急动员起来，迎接战争，为实现和平民

主团结而奋斗。

一九四七年七月，由于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决策，刘邓大军进攻大别山区，揭开了人民解放战争战略转变的序幕。太行区八万民工和大批干部随刘邓大军南下，中共太行区党委书记李雪峰也随军南下开辟新区工作，太行区党委书记由赖若愚担任。

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于一九四七年十月二日至十二月二十六日，召开了八十五天的土地会议，会议在武安县的冶陶村召开，通称冶陶会议。赖若愚带领太行区县团级以上负责干部二百七十多人的代表团，参加了这次会议。

冶陶会议是根据党的全国土地会议精神，为了贯彻执行《中国土地法大纲》进行的一次整编会议。会议主要内容是：认真检查《五四》指示以来的工作，总结经验教训，以土地改革为中心内容进行一次整风整党。

冶陶会议是在党中央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导下召开的，会议的召开对解放区的土地改革是个很大的推动，对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提高和作风的改造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步骤，对各项工作的开展也是一个有力的促进。因为土改在各个根据地进行得不平衡，干部对党的政策、方针学习领会认识水平各异，再加上总的趋势是反右倾，具体作法上又是个个检查，人人过关，因此，在某些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赖若愚在这些争论的问题上，坚持了正确的意见。

首先争论的一个问题就是老区的土地问题是解决了？还是没有解决？是差不多？还是差得多？许多同志各主一论，互相交锋，争论不下。赖若愚根据一九四二年以来减租斗争情况，特别是执行《五四》指示以来，农村土地情况的变化，根

据各县、各地区党委调研室掌握的材料，在讨论的总结发言中指出：老解放区的土地问题，应当说基本上解决了，农民基本上翻了身，土地基本上回到了无地少地的贫农雇农手里。

争论的第二个问题是：老解放区的土地要不要打乱平分？有的同志坚持说：文件就讲的是“平分土地”，平分是最合理的。有的同志则不同意打乱平分，认为“平分土地”是大原则，具体到太行行不通。赖若愚说：如何实现耕者有其田，我们应当看一看太行区的实际情况，听一听农村各阶级各阶层人们的议论。大多数贫农雇农得到了土地，而且耕种了几年，对他耕种的那几块地也有了感情，他们怕打乱平分再分出去，所以他们多数是不同意打乱平分的。因此，不应该再来一次平分，而是应当调剂土地，填平补齐，抽多补少，抽肥补瘦。针对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采取相应的办法，达到彻底消灭封建土地制度，实现耕者有其田的目的。赖若愚的意见得到了中央局的肯定，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是正确的。

关于组织形式问题。多数同志主张实行贫雇路线，提倡贫雇农打天下坐天下，平分土地要成立“贫农委员会”或“贫农团”、“贫雇小组”来领导一切。赖若愚指出：我们应该从实际出发，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形式去解决问题，而不应采取简单化的作法。

冶陶会议，围绕土改整党，涉及到的问题很多，但是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赖若愚都站在辩证唯物主义的高度，坚持了党的路线，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了正确的意见和主张。

冶陶会议之后，赖若愚和太行区的其他领导同志一起，一方面根据各个地区的不同情况给予具体指示，另一方面及时向

中央局请示报告，使土改整编得到了顺利的发展。

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华北局决定赖若愚离开太行区党委，调到榆次前线，准备解放太原后，接管太原。

为了解放太原，太行、太岳、晋绥、晋察冀各解放区派遣大批地方武装、民工、干部参战，赖若愚被任命为接管太原的市委书记。

他告别了战斗过十个春秋的太行山和他一起战斗的同志们，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四日来到太原前线。由太行、太岳、吕梁、晋察冀等解放区派来的干部组成“太原市委”、“太原市人民政府”，准备接管太原。太原就要解放了，但是党中央毛主席从战略考虑，为了配合平津战役，命令太原前线推迟解放太原。赖若愚抓紧这一个时机，进一步加紧对干部的组织训练和思想教育。向大家提出了加强团结、艰苦奋斗两个问题。

关于加强团结问题，是针对大家来自太行、太岳、晋绥、晋察冀各个根据地，在思想状况、工作作风上都各有不同的特点，进城以后情况复杂，任务繁重，需要密切配合。

关于艰苦奋斗问题，是针对我党工作重心的转变而少数干部缺乏思想准备而产生的骄傲自满情绪与贪图享受和革命到头的思想苗头提出来的。他一方面按照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和京、津、石家庄等各个城市接管的经验，结合太原的实际情况，编印了《入城工作手册》，发给所有接管干部，要求严格执行。另一方面，提出约法八章，三大纪律，密切联系群众，坚持艰苦奋斗的传统，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赖若愚从思想工作入手，从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思想上，为进城接管做了充分的准备。

(四)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命令我解放军太原前线司令部向太原守敌发起总攻，二十四日太原宣告解放。

太原的最高权力机关，是以徐向前为主任委员、罗瑞卿、胡耀邦、赖若愚为副主任委员的军事管制委员会。在军管会的领导下，以赖若愚为书记的中共太原市委和以裴丽生为市长的太原市人民政府，随军入城以后，就开始了紧张的接管工作。

入城以后，赖若愚和其他领导同志抓的第一件事就是“安民告示”。《山西日报》从四月二十六日出版，发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太原前线司令部布告”，公布约法八章，并以军管会名义发表了一系列布告，向群众宣布军事管制委员会的成立和它的权限、部队入城守则十条以及关于工商业政策、对官僚资产阶级政策、对国营企业政策，对反动党团及旧政权机构政策等等。

赖若愚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从入城第一天起，就把主要精力放在恢复和发展城市生产上。《山西日报》发行的第一号第一版，发表了《太原市的当前任务》的社论，社论说：“从今以后，太原市将永远为人民所有。中国共产党和民主政府，将与全体职工、全体劳动人民和各界人士，为建设新民主主义的太原而共同奋斗，我们将为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建设人民的工业而奋斗，为改进教育，发展文化事业而奋斗。”五月一日，赖若愚召开太原市职工代表座谈会，并在会上讲了话，他再次强调说：“要把恢复和发展生产，放在最重

要的地位。”

赖若愚不仅善于抓中心工作，而且善于围绕“恢复和发展生产”这一中心，从各个方面来促进它，推动它。为此，他召开了一系列会议或座谈会，广泛与各阶层人士接触，向他们宣传解释党在当前的中心工作和有关各项政策。如在五月二十一日，他在全市国营轻重工业召开生产动员大会上提出了四点要求：一、恢复发展工业，主要依靠全体职工的积极性、创造性。二、为了发挥职工的积极性、创造性，管理必须民主化，工人一定要参加民主管理，每个生产计划，必须经过工人讨论。三、工会工作必须做好，逐步改善生活。四、在各厂建立党的组织，党员要起模范带头作用，团结群众，努力发展生产。五月二十二日，他在太原市各界代表会上，对入城一个月的工作做了总结报告。他说，总结起来，做了五个方面的工作：第一，清除了战场；第二，安定了秩序；第三，整理了金融市场，兑换了金圆券，并供给了市民大量的粮食、物品；第四，对工人、市民、公教人员等都作了必要的救济；第五，在市政方面，恢复了水电供应，开始清除灰渣和整理水沟等等。赖若愚强调说：“以上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复工、复业、复课，都是为了生产建设，给生产建设创造条件。”

在接管工作的基础上，太原市的工作开始转向管理。五月间，赖若愚在接管干部会上报告今后工作任务时说：“今后的工作重点要来一个转变，从过去的以接收城市为主，变为以管理为主。在管理的当中主要的事情有四：第一是生产，第二是教育，第三是治安，第四是市政建设。”他说：“任务变了，组织形式也要求来一个转变，军管会还不能取消，但要逐步走向正规化，加强党、政、军、民各组织各系统的工作，建立正

常的工作制度。”他在报告的最后指出：“进城以来，大家对工作都很努力，今后要保持过去那种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不要被城市的颓废恶习所感染，我们要化这个城市，不要让城市化了我们。”

在市委领导下，六月以后，太原的主要工作转为管理，其中心也是为了恢复和发展生产，由于抓住了这个中心，太原市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

一九五〇年九月四日，省委书记、省人民政府主席程子华赴京工作，由赖若愚任省委书记，裴丽生任省政府代主席。一九五一年二月二十八日，经中央人民政府任命赖若愚为山西省人民政府主席。

赖若愚在山西工作两年零八个月中，对自己、对家属子女、对亲戚朋友，非但不允许享受任何特权，而且要求更严，不徇私情，不讲面子。一次，他的只有六岁的男孩子，在院里玩，看到葡萄架上一串串的葡萄快要成熟了，就用棍子打下了两串。这事让他看见了，把孩子叫到家里，进行了认真的教育，并吩咐警卫员要负责管理好院里的葡萄，不许任何人摘取，成熟后交公。他的弟弟来秉良在市委组织部工作，因为妻弟结婚参加婚礼，走了几天。赖若愚知道了，事后把弟弟叫到办公室进行了批评。弟弟申明向部里请过假，赖若愚说：“你去参加婚礼，影响不好，你向部里请假他们不好不准，今后如果离开工作岗位，除了向部里请假外，还必须亲自向我请假。”这虽然带点家长气味，但是他认为严格要求自己的兄弟是绝对必须的。赖若愚的大哥解放前在太原揽工，解放后仍做包工头，克扣民工，贪污公款，在民主改革运动中，被群众揭发检举，查出了他的问题。他为此曾去找赖若愚给予庇护。赖

若愚严肃地说：“你应当老老实实把问题交待清楚，听从政府的处理。”他大哥由于触犯法律被判刑，后来病死在监狱里。赖若愚的妹夫韩国俊在抗日时期给日本当过汉奸，有过不少罪恶。抗战胜利后又投靠阎锡山。一九四七年五台县解放时，逃到太原，当了屠宰场的场长。一九五一年镇反时，他被群众揭发检举出来，逮捕归案，判了死刑。在这之前，赖若愚的妹妹为此多次找他，亲戚中也有人来说情，赖若愚都严肃地拒绝了。有人背后说他“六亲不认”。赖若愚说：“权是人民的，我不能以权谋私。他欠下人民那么多债，不还怎么行！你们应当明白，不是我六亲不认，是他早就不认六亲了，他只和日本帝国主义亲，和阎锡山亲，做了很多危害人民的事，判他死刑是咎由自取，罪有应得，谁也管不了。”赖若愚就是这样一个头脑清醒、立场坚定、党性坚强、立党为公的共产党人。

（五）

一九五二年一月，党中央毛主席为了加强全国总工会的工作，点名调赖若愚到全总去工作。当时有人向毛主席建议，说赖若愚同志人才难得，应调他到一机部当部长，才能更好地发挥他的作用。毛主席反问道：那么工人阶级重要不重要？当时全总工会主席还是李立三，赖若愚调到总工会任秘书长的的工作。

赖若愚调离山西到全总去，初时有些不愿意，他认为自抗战以来自己一直在太行革命根据地工作，又对山西各方面的情况很熟悉。而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工作，自己过去从未接触过，缺乏工会工作的理论基础和工作经验，故希望最好能不去。他

和薄一波谈了自己的矛盾心情。薄一波向他表示了两点，一是毛主席点的将，不能不去；二是有了矛盾就进一步学习《矛盾论》。赖若愚一向非常尊重薄一波，他认真进行了自我反省，打消了个人的想法，决定应召到全总去。

赖若愚为要搞好工会工作，他认真学习与研究了列宁关于工会工作的许多论述和毛泽东对工会工作的有关论述，在许多著作上作了眉批，并结合工会工作的实际写了研究文章。一九五二年四月十六日，他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同志的〈矛盾论〉是解决实际工作问题的钥匙》一文。许多同志评论说，他这篇文章明晰，深刻，有特色，是继一九五一年七月一日发表的《学习毛主席的〈实践论〉，克服我们自己的经验主义》一文之后，又一篇好文章。

一九五三年五月三日，中国工会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赖若愚以《关于中国工会工作的报告——为完成国家工业建设的任务而奋斗》为题，在大会上作了报告。他总结了自一九四八年八月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以来四年多的工会工作，提出了建设时期工会组织最重要最基本的任务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联系并教育工人群众，不断地提高工人群众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巩固工农联盟，团结各阶层人民，积极地完成国家建设计划，并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地改善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物质生活与文化生活，为逐步实现国家的工业化与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而斗争。”

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赖若愚被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

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赖若愚出席了大会，并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

党的八大以后，赖若愚为使工会的工作能够适应新的形势

和新的任务的要求，便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及时发现和解决在形势任务转变中工会工作中的许多具体问题。一九五七年三月二十六日，他离开北京，先后访问了山西、陕西、甘肃三个省的总工会和太原、西安、兰州三个市工会。在路经临潼时，还访问了临潼县工会。沿途访问了十六个厂矿企业，发现了一些住在北京很难发现或者很难深刻体会的问题，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意见。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中华全国总工会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赖若愚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七届执行委员会向中国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工作报告，总结了自一九五三年工会七大以来的工作。并在总结工会七大以来工作的基础上，提出了工会八大的任务：努力发展工业，积极支援农业，集中力量执行国家第二个五年计划。在这次工会全国代表大会上，赖若愚继续当选为全国总工会主席。

中国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过不久，赖若愚又亲自布置了一九五八年的工会工作，并计划于一九五八年三月到南方去视察工作，搞调查研究。由于数月以来他的身体一直不好，长期带病坚持工作，中央有关同志提出让他休息几天，让他的随行人员先走。临行前，组织安排他去医院检查一次身体，不料医院确诊他得了肝癌。党中央政治局对此很重视，决定组织力量，进行治疗。事有凑巧，正在这时，王子如也患了重病，住进了医院。两个人住在两个医院，为使他们不加重思想负担，一段时间里，没有让他们见面。直到赖若愚病情十分严重时，李雪峰才决定把王子如转到赖若愚住的医院来。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日下午七时零五分，赖若愚因患肝癌医治无效，不幸逝世，终年四十八岁。

附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

1. 赖若愚的《自传》和党中央为赖若愚所作的悼词及有关本人的档案材料。
2. 薄一波、李雪峰、张磐石、陶鲁笳、顾大椿、刘实、李仙、刘永生、康永和、韩纯德、续吴山、孙谡、李修仁、李希曾、陈大栋、黎颖、杨奉林、麻贵书、吴德恺、陈用文、胡晓琴、樊刚、徐一贯、祁珍、赵明、郭忠、郭云贵等以及赖若愚的家属王子如、米秉良、米秉德、米春光、左风云等的访问谈话记录。
3. 中共太行区党委的机关刊物《战斗》、中共北方局出版的《党的生活》、1949年至1951年的《山西日报》、全总出版的《中国工运》、《工人日报》、中共山西省委出版的《前进》以及太行区党委的有关文件、资料、档案。

黄 火 星

缪 凤 翔

(一)

黄火星，本姓陈，一九〇九年七月出生于河南省^①。在他七岁的时候，因军阀混战和连年天灾，一家无以为生，父母带着他和他的弟弟从河南逃难至江西景德镇。后因母亲亡故，无钱安葬，父亲将他卖给当地黄姓。将母亲安葬后，父亲便带着弟弟逃难他乡，不知下落。黑暗的世道，骨肉的悲惨分离，在他幼小的心灵上刻下了深深的创伤。

养父黄聚发，系江西省乐安县三十六都新姚家村（今乐安县龚坊乡新姚家村）人。十八岁时前往景德镇学画瓷，嗣后与人合伙经营小瓷厂，一九一八年开始自办小瓷厂。黄火星（养父为其取名黄火生，号以和，参加革命后改今名）八岁时就在养父与人合伙经营的“公兴和”瓷厂学徒。十岁至十一岁入私塾读书。由于养父母未生儿育女，只是希望他为黄家传宗接代。因此，只让他读了两年私塾，又要他在瓷厂学徒，并为他收养了童养媳。不久养母病故，养父续娶李氏为妻。后母对黄

^①关于黄火星的出生地、原名，他本人亦不知道，无法详考。这里是根据黄火星1953年写的《自传》，原件存中共中央组织部。

火星百般虐待，不是呵斥，便是毒打；在瓷厂又时常遭到师傅的打骂和社会的歧视，使他极感痛苦。

一九二四年黄火星十五岁时，养父为他完了婚。次年生一女孩。一九二六年，养父病故，后母改嫁。其父所开瓷厂倒闭，欠债五千余元，他将家具财产典卖殆尽，除安葬养父外，尚欠债千余元，债息和家庭生活的沉重负担，迫使他不得不于次年到“义盛兴”号瓷厂和瓷业公司装窑。他一心想学把好手艺，提高自己的造瓷技术，多得工资还清债务。但辛勤劳动一年，仅能赚百元左右，且物价暴涨，百货昂贵，不但不能偿还欠债，而且难以养活妻女。生活的挫折，幻想的破灭，使他渐渐滋长了反抗思想。

一九二五年，他在自家瓷厂学徒时，就加入了大仲平^①行会——聚英社。后来，该会分裂为两班，工头师傅为老班，学徒工人为新班，互相斗争。一九二九年初，在党组织的帮助下，“聚英社”新班改为学徒联合会。共产党员余金德、共青团员张炳生与黄火星结为好友，在他们的直接教育启发下，黄火星开始认识到，穷人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必须团结起来进行斗争，打倒地主资本家，推翻反动统治。

一九二九年夏，黄火星参加了党组织发动和领导的景德镇工人“雄黄酒”罢工运动。端午节这天，全镇六十多个行会的万余工人，纷纷走上街头，举行了大规模的罢工游行。反动政府派出大批军警，上街捕捉了十余名工人，但工人们毫不气馁。运动持续了一个多月，反动政府只好下令释放被捕工人，并答应了改善端午节伙食的要求。罢工斗争的胜利，使黄火星受到

^①瓷业工种的代号。

了鼓舞。

不久，反动政府和资本家，大肆逮捕共产党员和工人领袖，解雇罢工工人。黄火星被工厂老板解雇后，不得不携妻带女投靠市郊岳父家，租种地主四亩地，并靠推上车替人搬运货物以维持生活。

一九三〇年春，党又发动工人开展了反“春荒”斗争。黄火星也积极参加了此次斗争。七月，红军第二次打下景德镇，公开成立了景德镇市苏维埃政府，余金德任主席。并成立了市总工会，黄火星担任总工会青年部宣传员。嗣后又参加了反帝拥苏大同盟、革命互济会等组织活动。

同年十月，红军第三次进入景德镇。觉悟了的工农群众，几天内就有三千多人报名参加红军。黄火星也想参军，但一念及家有受尽苦难的妻女，又不忍心丢下。红军离开景德镇后，国民党反动派卷土重来，到处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景德镇笼罩在一片血雨腥风之中。一个漆黑的夜晚，黄火星悄悄地推开家门，匆匆告别妻子^①。便随总工会纠察队转移到乐平众埠街，加入了浮梁游击大队，担任宣传员兼司务长。

十一月，黄火星由余金德、刘廷显、江旺发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通过党、团组织的教育，黄火星思想觉悟有了提高，积极要求进赣东北军政学校学习。一九三一年一月，他的愿望得以实现，进入赣东北特区葛源军政学校学习。在学校里，他听了方志敏、邵式平、薛子正等人的报告和讲课，学习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豁然开朗，学习更加勤奋，每次测验都在第一、二名，受过学校两次奖励。并先后担

^①其妻余玉金，1935年病故。孤女由外婆抚养，也不幸于1951年4月患病去世。

任过团小组长、支部书记、校团委委员。四月，由学校教育长薛子正和江丰、陈国洪介绍，黄火星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月底，他从军政学校毕业，被分配到义阳第四游击大队任政委。七月间，游击大队并入贵（溪）余（江）万（年）游击纵队，黄火星任纵队俱乐部主任。一九三二年二月，贵余万游击纵队改编为赤色警卫师第一团，黄火星任该团共青团团委书记兼俱乐部主任。五月，省委指示赤警师积极配合余江邓家埠一带地方暴动。由于组织不严密等原因，暴动失败，师长祝荫隆牺牲。第一团团长、政委逃跑，部队被冲散，在该团群龙无首的情况下，黄火星根据师政委倪宝树的指示，就地收容部队二百余人，陆续送过信江北岸。随后他又收容了一百五十余人，但因敌三十六师清乡搜索，封锁信江，部队不能过江，每天只能靠打土豪筹款维持生活。后来，黄火星率领这支部队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转战，冲破敌人三次包围，绕道鄱阳湖至乐平寡妇桥回到赣东北苏区。在横峰葛源，这支队伍被临时改编为红军独立第十团，一百八十余人枪，黄火星任政委，没有团长。他率队在横峰莲河地区开展游击斗争，经常出没于河汉港湾，截击敌人由信江运往浙江的枪支弹药船，曾迫使敌赵观涛部一个连投降。部队扩充到二百多人，并有了较好的武器装备。同年十一月，该团受编为红军第十军八十二团二营五连，多余人员编入其它连队，由黄火星暂任五连政治指导员。

一九三三年一月，根据中央指示，红十军改编为红十一军，黄火星被任命为三十三师九十五团政委。接着，红十一军奉命渡过信江，进入中央苏区。一月下旬，在贵溪上清宫与中央红军会合。为了配合中央红军粉碎国民党第四次“围剿”的斗争，红十一军首战光泽，继而折回金溪打击敌三十六师。黄

火星在每次战斗中总是身先士卒，勇猛冲杀，被人称为“猛子政委”^①。

四月间，组织上调他到瑞金红军学校第四期学习，并担任上干队党总支副书记。一个多月后，党将他调出红军学校，准备派他去苏联学习，后因上海联络站被破坏，未能去成，被分配到红军总政治部突击队工作，开展扩大红军运动。七月间，黄火星被调到福建省军区第三分区任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二）

福建军区第三分区辖宁化、清流、归化。分区武装以独立第七团（原独立第七师改编）为主，还有宁化、清流、归化三县独立营等武装。这里是闽西革命老根据地，但由于盘踞着土著军阀卢兴邦部和由他控制的童子兵五十八师联防总部，他们在苏区到处建立土堡，安插“钉子”，分区武装常遭他们袭击，严重妨碍着苏区的巩固和发展。

一九三三年七月，由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的中央红军（时称东方军），进入福建的宁化、长汀一带作战。为配合作战，第三分区所辖武装由彭、滕就近指挥。七月初，东方军首先取得了攻打宁化泉上战斗的胜利，拔掉了卢兴邦安插在宁化的一颗“钉子”，使宁（化）、清（流）、归（化）、建（宁）连成一片。

在东方军胜利的鼓舞下，黄火星率领独立第七团，将进攻永上店等地的童子兵击溃，追击五十里。随后，又集中分区武

^①访问阮文炳、何志远笔录。

装将童子兵五十八师联防总部打垮。特别是马家庄一役，毙敌一百五十余人，打下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七月底，三分区由宁化城关迁驻清流县。黄火星又兼任了清流县委书记。东方军的节节胜利，使闽西又出现了一派大好局面，宁、清、归纵横数百里的新苏区，纷纷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广大群众积极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运动，掀起了踊跃支前和参军的热潮。

十一月，军委任命张金发兼任归化警备区司令员，黄火星兼任归化警备区政委和政治部主任，负责指导供给兵站和医院的工作。

一九三四年一月七日，黄火星、张金发率领分区武装攻克了归化城，随即将三分区移驻归化城；黄火星在城内设立了东方军后方医院和供给兵站，安置了千余伤病员，兵站储存了大批布匹、机器等物资。

不久，司令员张金发在一次战斗中负伤，黄火星又兼任司令员。当时，正是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斗节节失利的时候，东方战线的形势也日趋紧张。二月间，卢兴邦的新编五十二师向归化城发起进攻。黄火星率领部队从城内冲杀出去，将敌击溃，保卫了千余伤病员的安全和兵站的物资。

四月，七军团在离归化城七十余里的钢铁岭与敌发生激战。中央军委电令归化警备区、医院、兵站全部于晨四时前撤出归化城，但分区武装要配合七军团节节抗击，使七军团得以在敌侧后打击和消灭敌人。黄火星接到电报时，已是凌晨四时半，又由于译电员文化低，“但要节节抗击”六字未译出，要把千余伤病员和大批物资迅速转移出去，是十分艰巨的。因时间已过了半小时，动员群众来不及，黄火星便紧急动员各机

关及驻城的两千多部队将伤员抬运后方，把兵站物资全部搬运出去，城内只留下一个多营的兵力驻守。至天亮时，伤员、物资全部安全地转移到了离城三十多里的林畚村。此时，译电员尚未译出上述六字，黄火星责令重问军委后才译出来，此时天已大亮，敌人只相隔十余里，敌机到处狂轰滥炸。因此，黄火星无法率领部队返回归化城配合七军团作战。军委来电严厉批评他抵抗命令，丧失士气，轻易放弃归化城，予以撤职，要他到红军总政治部待命。不久，他返回福建军区，军区指责他犯了退却逃跑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对他开展批判斗争，并给予行政撤职，党内严重警告的处分（后在一九四四年华中党校整风时，经华中党校干部审查委员会批准改为批评处分），分配他担任福建军区巡视团团长，派往第二分区检查工作。后敌八十三师进攻连城时，他又随军区司令员叶剑英做战争动员工作。

七月间，上杭、永定、龙岩地区的形势日益恶化，军区命令黄火星接任第一分区（杭、永、岩）政委兼代英县独立营政委，他从省军区带领二百余名新兵、三十多支破枪前往杭永岩地区。沿途遭遇敌钟少奎部多次埋伏袭击，于九月间才到达一分区。此时，已是第五次反“围剿”的末期，杭永岩苏区已日渐变为游击区，环境十分恶劣，黄火星根据省委和军区指示，部署开展游击战争。

中央红军长征后，福建省委派人来杭永岩地区召集会议传达苏区中央分局的指示。会议根据指示精神和杭永岩地区的实际情况，确定了游击战争的方针是保持、巩固、扩大有生力量，坚持杭永岩群众性游击战争，大量牵制敌人，恢复发展杭永岩苏区^①。会后分区武装改编为杭代独立营，黄火星担任政

^①见黄火星《自传》（1953年）。

委。

为了打开永定局面，黄火星率领杭代独立营向永定挺进，不久又转回上杭与廖海涛会合，在上杭坚持游击战争。

一九三五年春，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对闽西的第一次“清剿”，叫嚷在三个月内“肃清”红军游击队。在此情况下，闽西南党组织在永定赤寨召开了红军长征后闽西南地区第一次党政军会议。黄火星出席了会议，并当选为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会议分析了闽西的严重局面，确定了开展游击战争的方针。

在“清剿”与反“清剿”斗争中，反动魔首张兢明杀害上杭莲塘乡一个村四十余人，连刚出生的婴儿也未能幸免。敌人的残暴激起了黄火星和游击队的报复心理。游击队杀了张一家三十余人，并杀了替反动派带路的六七户人家。这种以杀对杀的过“左”政策，使自己更加孤立。后来，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批评了杭代县这种“左”倾错误，黄火星立即采取措施，予以纠正。他在后来总结自己这段时期的斗争经历时指出：“由于深受阶级压迫，因而造成对革命的坚决性、顽强性；同时也因阶级仇恨而产生狭隘性、报复性。”^①

九月，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第二次“清剿”，采取残酷的烧杀抢抓移“五光”政策及颁布“十杀令”、移民并村、计口售粮等，他们企图用这种毒辣手段，困死红军游击队。

在敌人的大举进攻面前，永定县委原负责人未能采取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致使独立营损失过半，整个永定苏区只剩下两个山头，革命队伍中的叛变事件日有所闻，工农群众普遍产生

^①见黄火星《自传》。

了恐惧情绪；在红军游击队中，也有人对当时的艰苦环境难于适应，缺乏革命的信心。

为了扭转这种局势，上级党组织把黄火星调往永定担任县委书记兼独立营政委。黄火星一面抓紧对县委和独立营进行整顿，一面转变过去“左”的政策。实行分散行动，依靠群众，广泛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

在那些艰苦的日子里，他和游击队员长期隐蔽在深山密林中，以山岩洞穴当房，野菜竹笋充饥，忍受着难以想象的困苦。为了坚定干部和战士的革命信念，使之能经受住严峻的考验，黄火星经常用方志敏两条半枪、贺龙一把菜刀闹革命的故事来教育大家，并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和乐观主义精神去感染和鼓舞大家。

中央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从上海联络站得到了党中央“关于开展抗日反蒋统一战线”的指示。为了传达贯彻中央的指示和讨论总结两次反“清剿”斗争的经验教训，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于一九三六年一月初在上杭县双髻山召开了第二次会议。黄火星出席了这次会议，并继续当选为军政委员会委员。

会后，黄火星回到永定苏区，领导当地党组织和游击队改变斗争策略，采取合法与非法相结合的方法。抓住群众的切身利益，开展分粮斗争，使群众的斗争热情逐步高涨。并争取了许多保甲长中立和同情我们，恢复和发展了党的组织，使永定苏区得以坚持，独立营保存了一百多人枪的武装力量。

同年四月，军政委员会根据第二次会议的决定，将所辖武装统一编为两个纵队，下辖第一、三、五、七支队。黄火星任第二纵队政委兼五支队政委，率部活动于永（定）、（平）

和、（南）靖地区。不久，纵队长刘汉牺牲，他又兼任纵队长。

随后，黄火星又代理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政治部主任，并直接领导永（定）、（平）和、（南）靖军政委员会的工作。这一时期，在张鼎丞的指导下，他运用向土豪写信筹款的方法，在大浦、饶平、南靖等县收到很好的效果；军事上，他不再蛮攻硬打，采用里应外合的策略，建立隐蔽的红色堡垒，保存了有生力量；由于他对苏区坚持了一面巩固、一面发展的方针，使永定、平和、南靖、大浦等县出现了新的局面。先后成立了永和靖县委和永浦工委，组建了红四支队，向南靖山城发展。

一九三七年五月，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根据中央关于联蒋抗日，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精神，派邓子恢为代表与粤军正式谈判，赢得了红军游击队的合法存在和抗日杀敌的权力。八月十三日，黄火星率第五支队与永定、永东、永浦县的地方武装，在永定金丰集中。月底，正式整编成立“闽西人民抗日义勇军第一支队”，谢育才为支队长，罗忠毅为参谋长，黄火星为政训主任。

一九三八年一月，新四军军部在南昌成立。闽西南二千多红军游击健儿，终于结束了三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于二月中旬全部集中到龙岩白土，正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第二支队，下辖第三、四团，张鼎丞任支队司令，谭震林任副司令，黄火星被任命为二支队委员、三团团团长，邱金声任三团副团长。

（三）

一九三八年三月一日，新四军第二支队在张鼎丞、谭震林

的率领下，由龙岩白土出发，开始了从闽西到皖南的千里转战。

四月初，部队到达安徽歙县岩寺集中。一天，叶挺军长、项英副军长等来到二支队看望指战员。叶挺、项英向黄火星、邱金声详细询问了三团的情况，叶军长赞扬三团基本上是老红军骨干，勉励他们要加强军政训练，掌握过硬本领^①。随后，三团奉命开赴小丹阳地区作战。

六月下旬，黄火星、邱金声率领三团指战员北渡石臼湖，进抵当涂、博望、横山和江宁秣陵关地区活动。

江南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地势平坦，湖沼河道纵横交错。国民党长期统治这个地区，社会情况复杂，反动统治基础雄厚。沦陷后，又成为日寇侵略中国的大本营。

为了打开局面，站住脚跟，七月六日，黄火星、邱金声组织三团一营和支队侦察连在安徽当涂至芜湖之间，击毁敌寇军用火车一列，全歼数十名押送军用品的日军，缴获了大批军用品。

八月十七日，黄火星等又组织三团狠狠打击了盘踞在小丹阳地区为非作歹的伪匪朱永祥和川军余宗臣部。毙敌一百余人，伤敌二百四十七人，缴获步枪一百五十余支，轻机枪七挺，重机枪两挺，迫击炮两门，电台一部，电话机四部及各种子弹四万余发。将川军司令余宗臣驱逐出小丹阳。黄火星抓住有利时机，积极发动群众，帮助群众建立自卫武装。到年底，抗敌自卫队等群众武装发展到四五百人。同时，部队也扩大了一倍多。

日寇对于活跃在宁沪、宁芜铁路及公路干线的我军，惊恐

^①王直：《从闽西到皖南》，见1982年福建省党史研究会、福建省委党校党史研究室编印的《党史研究参考资料》第6期。

万状。从八月下旬开始，出动数千人多次对当涂、小丹阳地区进行大“扫荡”。

黄火星、邱金声率领三团指战员，紧紧依靠群众，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先后在博望、横山等战斗中予敌重创。并不断破坏敌人铁路、公路，组织小分队直插南京雨花台，夜袭敌人警察所，威震南京城，粉碎了敌人的大“扫荡”。

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一日，粟裕亲率三团由苏南奔袭芜湖机场的官陡门敌据点，全歼守敌。随后，三团奉命调回皖南，担负保卫军部的任务，直属军部指挥。

七月初，黄火星出席了新四军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并和陈毅、项英、袁国平、周子昆、谭震林等人当选为主席团成员。

会后，黄火星抓紧整训部队，加强对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他十分重视对干部的培养、教育和使用。在整训期间，他提拔了几位年纪轻、有文化的干部，而几位老红军战士对提拔新干部有意见，认为“老同志吃不开了”。黄火星意识到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一个带普遍性的问题，于是他分别找这些老红军战士谈话，尔后又召开全团排以上干部会议，对大家说：“大批工人农民和学生来到抗日前线，加入我们的队伍，这是一件大好事。尤其是青年学生，他们会写、会唱、很活跃，给我们的部队带来了新的活力，这是应当欢迎的；但这并不等于‘老同志吃不开了’”。“那种论资排辈的思想，对党的事业危害极大”。因为“我们党的事业是伟大而艰巨的事业，要使我们的事业兴旺发达，就必须大胆提拔和使用千百万新干部”^①。通过黄火星的耐心教育，原来闹情绪的干部，愉

^①王培臣、李德安、阮文炳：《深切的怀念——忆华中模范共产党员黄火星同志》，未刊稿。原件存福建省军区党史办公室。

快地服从了组织的决定。

黄火星对干部战士既严格要求，又对他们的疾苦体贴入微。有一次，战士李德安得了重感冒，身体虚弱，卧床不起。黄火星不仅经常到床前问寒问暖，而且硬要把自己仅有的四块光洋给李德安买营养品，直到李德安收下两块为止。这两块光洋李德安至今还保留着。还有一次，侦察参谋王培臣因伤要去住院，他对黄火星说：“你是了解我的，我烟瘾太大，要多发一点钱给我”。“不行，谁都得按规定发。”黄火星当即回答，但却将自己的全部财产——十块钱和一只手表，一把塞入王培臣的怀里。王培臣实在过意不去，只好收下了八块钱^①。因为他和干部战士相处得十分融洽，三团的干部战士都亲切地叫他“黄老奶奶”。

一九四〇年一月，奉军部命令，黄火星率领三团开赴铜（陵）繁（昌）地区抗日，受第三支队指挥。

五月二十六日，日寇三千余人，在飞机的掩护下，向三团驻守的何家湾阵地进攻。邻近的国民党军队不战而退，远走避之。黄火星亲临前线指挥战斗，率领战士们英勇反击，经九小时激战，毙、伤敌三百余人，敌不支而退，粉碎了敌人的进攻。

随后，日寇对铜繁地区连续进行“扫荡”，我第三支队部被敌包围，撤出时丢失机要文件数件，其中有中央给东南局、军部重要机密指示（抄件）。以及政治情报和对敌政策等。黄火星得知后，亲自率部队至该地寻找，全部搜集回来。项英、周子昆亲笔写信表彰他“对党认真负责”^②的精神。

^①王培臣、李德安、阮文炳：《深切怀念——忆华中模范共产党员黄火星同志》未刊稿，原件存福建军区党史办公室。

^②见黄火星《自传》。

年底，以三团为基础发展组建了新三团，并成立了新二支队。黄火星任支队政委，周桂生任支队司令员。

一九四一年一月四日，驻皖南的新四军九千余人在叶挺、项英率领下，分别从泾县云岭等地出发，遵令向北转移。国民党反动派却调集七个师八万多人，发动对我新四军北移部队的围歼。一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在这次转移中，新四军北移部队编为左、中、右三路纵队（又称第一、二、三纵队）。新二支队编为中路纵队。黄火星任中路纵队政委，周桂生任司令员。军部和东南局机关及教导总队随中路纵队前进。一月四日午夜，叶挺、项英等军部领导人与黄火星、周桂生率领的新二支队部同时渡过青弋江，于五日到达茂林地区。六日，黄火星、周桂生参加了军部召开的各支队首长紧急会议，会议决定各支队黄昏行动，叶挺指示中路纵队在拂晓以前一定要攻克丕岭。

根据军部会议精神和叶挺的指示，黄火星、周桂生即令老三团三营为前卫，担负攻克丕岭的任务。三营以干脆利落的动作，于次日拂晓前攻占了丕岭。随即猛扑星潭，在坑口遭到顽军四十师一二〇团二个营的狙击。敌以火力封锁道路隘口，我军迅速抢占两旁高地与敌对峙。下午三时半，黄火星亲临前线指挥，不幸敌人的一颗子弹射进他的大腿。警卫员扶他下山上药后，劝他休息一下，他猛地从椅子上站起来，拄着拐杖就走。当他返回阵地时，叶挺、周子昆正在前线亲自指挥。叶军长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攻下星潭。黄火星当即向军长请战：“以新三团张玉辉营为前卫，你下命令吧！我们负责坚决打！”^①晚

^①谢忠良：《皖南事变与项英被害真相》，见《江西文史资料选辑》第五辑。

上九时，担任主攻星潭的新三团一营打进了星潭。由于项英坚持部队后撤，致使驻守星潭的一营一连没有后援而遭损失。

九日下午，军部决定从高坦翻过东流山到石井坑，向北突围。黄昏后，黄火星组织中路纵队向石井坑转移。当晚，他来到军部，发现叶军长身边也没有部队。项英、袁国平、周子昆等人已于八日深夜丢下部队不辞而别。形势越来越危急，叶挺非常沉着，对黄火星说：今晚“就在这里休息，待天亮再来处理。”^①第二天早饭后，项、袁、周又返回了军部。接着，黄火星参加了由叶挺、饶漱石主持召开的会议。继续研究突围问题。

十一日，黄火星、周桂生根据会议的决定，组织新、老三团从石井坑向茂林方向东村岗发起猛攻，希图打开突破口突围，而顽军新七师和一四四师组织整营整连的反扑，从拂晓一直激战到黄昏，突围未能成功。

十二日拂晓，顽军再次发起总攻。下午五时左右，石井坑我军东北主阵地白山和西南的制高点东流山先后失守，军部完全暴露在敌火力之下。这时，黄火星和教导总队政委余立金、右路纵队司令员张振坤纷纷跑到山上来向叶挺请示下一步的行动方案。叶军长沉着地对大家说：“现在开始分散突围，突围的方向自己选择，可以到苏南、江北，也可以到徽州打游击。你们都是共产党员，愿意当突围司令的，都当突围司令吧！”^②

黄火星返回支队部后，立即召集干部会议，传达军部突围命令，决定本支队分左右两路向西北方向突围，支队部随右路之后，跟进突围。

①见黄火星《自传》。

②谢忠良：《皖南事变与项英被害真相》。

半夜光景，突围的大血战开始了。

右路首先突围，大部分战士壮烈牺牲。少数沿高地山腰向西北方向冲出重围。黄火星、周桂生等人被敌人火力隔断，阻于香炉东以东凹地。此时，部队弹尽粮绝，队伍全部被冲散。黄火星当即率通讯员、侦察员及机要员与军部联络，联络中断。随后他与张永隆、刘别生率领的军部警卫排百余人会合后，由东流山嘴突围，冲破十四条封锁线，于十八日晚到达长江岸边一个村里，这时已只剩下七十余人。日军早已对长江实行了严密的封锁。幸而他们在村子里找到党的一个联络站，地下党支部的同志划着一只木盆连夜偷渡过江，请江北游击队派来了一条木船，将他们连夜接过江去。

在这七天七夜的浴血奋战中，黄火星在坑口遭遇战中被敌军枪弹击伤的大腿肿得象小水桶一般粗。他拖着伤腿指挥战斗，颠颠簸簸、半走半爬地坚持突围到江北。腿中的弹片直到建国后才在上海华东医院取出。

黄火星突围到达无为县后，立即前往江北游击纵队，向曾希圣、孙仲德报告了皖南事变的经过；并将随身携带的三百多块光洋全部交给了组织。

皖南事变后，中央军委发布了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将华中各地的新四军部队统一编成七个师，任命陈毅为代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根据军委和军部的命令，皖南突围部队与在江北分散活动的几支部队汇合，组成新四军第七师，由张鼎丞任师长（未到职），曾希圣任政治委员。

为了组建第七师，黄火星与孙仲德、李步新等一起，协助曾希圣负责收容和整编陆续分散突围过江的部队。一天，二十多名劫后余生的战友，突围来到江北，与黄火星重逢。这些在敌人

枪林弹雨中从未退却的战士，此时却泪流双颊。黄火星抹了一下眼泪，坚定地对大家说：“大家突出来就是胜利，不要悲观，要坚持干下去，革命一定会胜利。”^①

七师组成后，活动区域主要是巢南山区和无为东乡一带，南有长江，北有巢湖，西有白湖，地区狭小，四周敌伪据点星罗棋布，密如蛛网，部队活动没有回旋余地。不少人对于七师能否在这犬牙交错的皖江地区站住脚跟，存在模糊认识；一些干部想到苏北去。上级曾想调黄火星到军部工作，考虑到他在皖南有一定影响，便留下了他^②。黄火星积极协助曾希圣整理部队，配备干部，开辟税收。教育干部“只要我们大家在这里努力工作，也可以造成第二个苏北”^③。稳定了干部情绪。

一九四一年五月一日，七师在无为东乡白茆州大胡家正式成立，并成立了十九旅（师部与旅部合并办公），曾希圣兼任旅政委，孙仲德任旅长，下辖五五、五六、五七团，黄火星任五五团政委，谢忠良任团长。

根据七师十九旅的布置，黄火星、谢忠良率五五团积极向铜陵岳南行动。指挥部队首先获得了牛埠战斗的胜利，与桐东县委领导的游击队会合。随后在双庙战斗中将桐东土顽头子章赣击毙。群众的斗争情绪日益高涨，打开了无南、桐东斗争的新局面，直接威胁到桐城、芦江两县城的敌人。

不久，桐东土顽丁江及章赣残部配合桂顽（广西反共军）一七六师两团兵力的三千余人向五五团驻地三官山发起进攻。

①访问阮文炳笔录。

②访问林维先笔录。

③见黄火星《自传》。

黄火星率部还击六天之后，顽敌进攻更加激烈，为保存有生力量，部队转移到黄龙坑。由于个别领导麻痹轻敌，团部未及时转移，第二天拂晓遭桂顽袭击而仓促应战，部队被俘及逃散者一百二十余人。三官山战斗失败后，曾希圣召集五五团连以上干部会议，总结经验教训。会后，由黄火星兼任团长。

一九四二年二月，皖江根据地成立皖中区党委，何伟任书记，李步新任副书记，傅秋涛、黄火星等为委员。同时，七师师部机关正式组成，黄火星调任师政治部副主任。因主任何伟生病，又代理政治部主任，并兼任七师机关党委书记。在他的主持下，师政治部制定了各项政治工作制度，加强了各级政工干部力量，并创办了师政治部机关报《武装报》。

一九四三年三月，根据中央指示，部队实行精简整编。七师统一改编为皖南、和含、沿江、巢湖四个支队。黄火星由师政治部调任皖南地委书记、支队政委。六月，又被任命为和含支队政委。

和县、含山地区，是淮南铁路和长江宁芜段的交通要道，与汪伪政权所在地的南京仅一江之隔，敌伪把它划为“绥靖区”。这里不仅有敌伪和顽军重兵把守，并且还有土匪、刀会、三番子，社会情况非常复杂。但是，和含地区又是七师向东北发展，打通和二师、军部联系的交通线。早在一九四二年四月，七师就派马长炎等人率部开赴和含地区。他们采取军事打击和政治攻势双管齐下的策略，迅速打开了和含斗争的局面。紧接着他们把矛头直指和县、江浦、全椒三县交界的江全地区，打通了与二师和军部联系的交通线。

黄火星率部到达和含抗日根据地后，敌伪顽连续不断地对和含地区“扫荡”。一九四三年七月，桂顽一七一师及伪军柏

承钧部进占江全地区，企图切断我军的交通线。黄火星亲自前往江全地区，指挥部队进行反击，粉碎了敌顽的进攻。以后又粉碎了敌顽的多次“扫荡”和进攻。我军牢牢地控制了杨石庵、官渡河口，使这条交通线一直没有中断过。

一九四四年四月，和含地委召开扩大会议，黄火星在会上作了和含支队一年半军事总结报告。指出：“要巩固扩大和含抗日民主根据地，必须壮大坚强和含支队”^①。大会闭幕后，地委书记孙仲德前往军部汇报工作，黄火星代理地委书记，完成了税收工作。主持召开了和含民主参议会，广泛地吸收党外抗日民主人士、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的代表参加政权工作。从而在敌伪“绥靖区”的广大土地上拔掉了“太阳旗”，摧毁了日寇汉奸的反动政权。

七月间，黄火星奉调参加华中党校的整风学习，华中局根据黄火星的一贯表现，授予他“华中模范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颁发银质奖章一枚。

一九四五年六月，黄火星在华中党校学习结业后，调任七师十九旅政委，旅长为林维先。

日寇投降前后，黄火星、林维先率领十九旅配合兄弟部队在皖江地区举行了全面的反攻。十多天内，解放了皖江地区的大片土地，拔除了许多敌伪重要据点，解放区军民欢欣鼓舞，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四)

抗日战争胜利后，七师奉命撤出皖江根据地。

^①见黄火星《自传》。

部队要撤离北上，在干部战士中引起了思想波动。许多同志认为皖江解放区是七师与皖江人民在艰苦的抗日战争中打出来的，七师是皖江人民的子弟兵。撤走后，担心国民党卷土重来，家乡要遭殃。人民群众也十分留恋自己的子弟兵，部分家属、亲属到部队来找亲人，要他们回去。黄火星和林维先一起，抓紧对部队进行政治动员，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他和干部战士促膝谈心，与父老乡亲席地相叙，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反复说明北撤是党中央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是为了更好地消灭反动派，解放全中国，我们一定会打回来的。经过这些耐心细致的工作，部队顺利完成了北撤任务。

九月下旬，十九旅先行北撤，待全旅撤完，黄火星才最后离开无为地区，和皖江父老兄弟姐妹挥泪告别。一路上部队情绪高昂，没有一个战士掉队，全部顺利地到达了淮阴，受到陈毅司令员的表扬。不久，黄火星奉命率部开赴山东台儿庄，与二师及四师之九旅和山东军区一部分主力组成山东野战军。

一九四六年六月，蒋介石悍然发动了全国规模的内战。在淮北战场上，敌人从七月中旬开始沿陇海路东犯。黄火星率部先后参加了山东野战军发起的朝阳集、泗县和宿北战役。

一九四七年一月，山东、华中野战军合编为华东野战军，由陈毅、粟裕、谭震林统率。同时，将第七师拆编到其他部队去，十九旅与二师五旅合编为华东野战军第七纵队，成钧为司令员，赵启民为政委，林维先为副司令员，黄火星为政治部主任。

对于七师的拆编，有些同志一时想不通，直接找黄火星发牢骚：“我们七师为什么要被拆散？为什么你只担任政治部主任？”这种情绪严重影响着部队的团结和战斗力。黄火星耐心地

加以解释，做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他列举红军多次改编的事例教育大家，指出部队整编是正常现象，是战争和革命的需要。对于个人的职务，他明确表示：这应该服从革命工作的需要，共产党的干部就是要能高能低，能升能降^①。

七纵成立后，转战山东，先后参加了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南麻、临朐战役、胶河、莱阳战役、张店、周村战役、兖州战役等，较出色地完成了华东野战军交给的各项战斗任务。当年和黄火星一起战斗过的老同志在回忆这段历史时都说，七纵刚成立时，团结问题直接影响着部队的战斗力。黄火星以他顾全大局的高尚品德和积极协助、支持纵队领导工作的实际行动，教育和感染着干部战士。部队能够团结一致地完成各项战斗任务^②。

一九四八年三月和六月，淄川、曲阜解放后，黄火星先后兼任了淄川、曲阜军管会主任。在他的领导下，迅速克服了战后的混乱状态，安定了社会秩序。为了保护名胜古迹，他发布命令，派出部队全力保护好孔林、孔庙等，受到上级的表扬。

济南战役后，黄火星升任纵队副政委。

十月上旬，黄火星出席了华东野战军前委在曲阜召开的扩大会议。会上着重学习毛泽东关于“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的指示。野战军代司令粟裕主持作战会议，讨论研究中央军委关于“精心组织淮海战役”的具体部署。黄火星心情激动，竭诚拥护中央的方针和指示，表示要在前委的领导下，配合兄弟部队打好我军在长江以北与

①王培臣、李德安、阮文炳：《深切的怀念——忆华中模范共产党员黄火星同志》，未刊稿。

②访问阮文炳、林维先、何志远等的笔录。

敌进行的规模最大、最有决定意义的淮海战役。

十一月六日，淮海战役开始。成钧、赵启民、黄火星等率领第七纵队由万年闸飞奔贾汪，迅速完成了切断黄伯韬兵团西窜的退路和配合兄弟部队围歼固守双堆集黄维兵团的任务。

淮海战役结束后，全军实施统一整编。华东野战军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七纵队整编为第二十五军（属第八兵团指挥），成钧任军长，黄火星任政委。

整编后，黄火星、成钧率领部队挥戈南下，进抵长江北岸巢湖、无为一带，投入紧张的渡江准备工作。

二十五军在渡江战役中担任中路兵团第一梯队的战斗任务，由九兵团指挥。三野决定二十五军在和县西凉山渡江。这一带是黄火星曾经战斗多年的地区，他对这里的地形了如指掌。黄火星积极向上级提出建议：“该处渡江江面宽，对面又是湖沼地，渡江后部队展开困难，应改由无为油坊嘴渡江”^①，上级采纳了这一重要建议，这是他为胜利完成渡江任务作出的一个贡献。

渡江前，他一面摸索长江潮汛的规律，收集船只，训练水手，掌握江上驾船的技能 and 水上作战、滩头登陆的过硬本领；一面抓紧时间组织指战员学习政策，准备接收、管理大城市。

四月间，我军完成了渡江作战的一切准备，全军指战员正严密地注视着对岸敌军的活动。黄火星又一次踏上江堤，习习的江风迎面吹来，面前是一片熟悉的地形——无为大套沟。他心情激动，感慨万千：我们在皖南事变中突围出来，就是在这里渡过长江的……仅仅过了八年又三个月，我们终于打回来

^①见黄火星《自传》。

了，而且是沿着当年北上的老路打回来的。目下，百万雄师正严阵以待，只等一声令下，我军的铁拳就将直捣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心脏，结束蒋家王朝二十二年的统治，一个强大的新中国就将在眼前出现……。

四月二十日，国民党反动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后。遵照中央军委的命令和总前委的《京沪杭作战实施纲要》，八兵团召集作战会议。黄火星火速奔赴前沿指挥部，参加兵团召开的作战会议。会议根据《纲要》关于中路兵团必须紧紧抓住敌二十军西移繁昌、铜陵一线，接防敌八十八军这个难得的战机打过江去的指示，决定当晚实行强渡。

会议结束后，黄火星和军里其他领导人顾不上吃晚饭，沿着江堤的堑壕进行最后一次战前检查，并迅速地把命令传达下去。

夜晚，集结在余栅村到大套沟一线的二十五军船队，在一声开船的号令下，从河湾港汊里一涌而出，实行全线强渡。敌人集中所有的火力猛烈地打过来，我军强大的炮火象狂风暴雨般地压向南岸。黄火星和军领导人乘坐的指挥船，紧紧跟在突击团的船队之后，他站在风帆下瞭望江面，只见滔滔大江之中，船桅如林，信号弹、曳光弹满天飞舞，敌人的滩头阵地上一片火海，把白帆、江水、人脸映得通红。国民党反动派依靠美国主子苦心经营的“天险防线”、“立体防线”，我军只用了三十分钟就给它撕开一条长达二十里宽的口子，先头部队向敌纵深勇猛地插了进去。

二十一日拂晓，二十五军七个主力团全部渡过长江，控制了铜山、岳山、羊山尖等制高点，直叩繁昌城守敌的大门。

二十一日黄昏，人民解放军第二、第三野战军发起全线猛

攻，在西起九江东至江阴的千里战线上渡过长江，敌人的江防全线崩溃。二十三日，东路兵团解放了南京城，残敌向杭州方向溃败。三野首长命令二十五军不顾一切疲劳向吴兴疾进，配合东路兵团截歼南京、镇江逃敌。此时正逢江南春雨连绵，黄火星、成钧率领部队冒雨出发，以一昼夜一百六十里急行军前进。二十四日黄昏，二十五军在湾址地区一举歼灭蒋介石江南残敌中的一支“王牌”——二十军，敌军长杨干才在逃跑中被击毙。同时被歼的还有敌九十九师（缺一个团）和一个保安旅。

二十七日，各路大军会师吴兴，切断了京杭公路，把南京、镇江逃敌团团包围在郎溪、广德地区。在这次围歼战中，先后歼灭敌人八个整军和四个军的一部分，俘敌八万余人。

郎、广之敌被歼后，敌汤恩伯集团剩下的二十四个师二十余万人龟缩于上海及其周围。

五月十二日，解放上海的战斗打响了。二十三日，黄火星、成钧率领二十五军接替二十九军向敌发起总攻。当即多路突破敌阵地，我军乘机楔入敌纵深，从吴淞口一举插入市内虹口区。至二十七日，除汤恩伯率五万人登舰逃窜外，其余十五万之敌全部就歼。

上海战役结束后，根据中央军委指示，第三野战军命令第十兵团立即进军福建，追歼残敌，完成解放华东大陆的任务。

三野从其他部队中抽调一批熟悉福建情况的干部，加强第十兵团的领导力量，黄火星被调任第十兵团第二十九军政委。

七月初，黄火星和军长胡炳云率领部队向福建进军。时值炎夏，道路被暴雨山洪冲坏，指战员身负数十斤重的武器、装备和粮食，发扬艰苦奋斗和团结互助的精神，克服重重困难，于

七月下旬胜利到达南平地区。

第十兵团决定采取钳形攻击战法，首先围歼福州守敌，控制福建中部，打开局面，然后乘胜南下，续歼泉州、漳州、厦门之敌，解放全省。

八月上旬，在游击队的引导下，黄火星、胡炳云率领指战员翻高山，抄小路，忍饥耐劳，隐蔽疾进，迅速插入敌侧后，协同三十一军攻占了连江、马尾、福清等地，封锁闽江口，控制福厦公路，截断了敌人的海陆逃路。然后配合正面攻击的第二十八军，压缩和聚歼被围之敌，全歼守敌五万余众。八月十七日，福州市宣布解放。

接着，黄火星又率领部队挥戈南下，在完成外围作战任务后，矛头直指厦门。

厦门为福建沿海的重要岛屿，扼海上航运要冲。残敌退守海岛后，以海峡天险为依托，加紧赶修工事，企图负隅顽抗，决一死战。

十月十五日二十一时，二十九军、三十一军打响了攻击厦门、鼓浪屿的战斗。我军数百门大炮，以排山倒海之势压向对方，炮弹象雨点似的倾泻在敌阵地上。攻击部队分三路向厦门、鼓浪屿发起强攻，首先从厦门岛北端打开缺口，登陆部队在打退敌人数次反击后，扩大了滩头阵地。守敌纷纷向东南海岸撤退，企图由海上逃走。我军乘势猛攻，经两昼夜激战，歼敌第八兵团等部两万七千余人，使厦门二十万人民获得了解放。

（五）

刚刚回到人民手中的厦门，是国民党反动派留下的千疮百

孔的烂摊子，特务活动猖獗，社会秩序混乱，工业倒闭，商业萧条。

黄火星来不及洗涤征尘，又投入了新的、更加复杂而艰巨的战斗——接管城市、医治战争创伤。厦门市解放的第三天——十月二十日，军事管制委员会宣告成立，叶飞任主任，黄火星任副主任。军管会为军事管制时期最高权力机关，统一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管理事宜。他积极协助叶飞，全面开展接管工作。不久，叶飞回福州主持第十兵团和福建军区的领导工作，厦门军管会的实际责任由黄火星担负。

为了肃清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势力，建立革命秩序，军管会首先接管了国民党的各级政权机构，建立了厦门市人民政府和各级人民政权。

在彻底摧毁反动统治的基础上，黄火星号召“全市工人阶级组织起来，团结起来，迅速恢复生产，团结与领导农民和其他广大劳动者、知识青年，共同努力建设新厦门”^①。广大青年学生要“以战斗的姿态站起来，为建设新厦门、新文化而奋斗。”^②全市人民积极响应军管会的号召，在较短的时间内，全市有六十家工厂、二千四百六十二家商店^③和所有的学校，恢复了生产、营业和教学。

军管会还成立了治安委员会，发动群众开展了检举特务、反革命分子的活动。警备部队、公安机关和人民群众密切配合，严厉镇压了那些凶杀、抢劫、盗窃情报、贩卖军火、扰乱市场、破坏治安的特务、反革命分子，建立了革命秩序，保障了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①②见1949年11月4日、6日《厦门日报》。

③见1950年2月6日《厦门日报》。

在财政金融方面，由于国民党特务的造谣破坏和少数不法奸商的捣乱，致使物价一度暴涨。黄火星一方面在报纸上公开发表谈话，揭露特务造谣惑众的阴谋；另一方面，采取措施，打击少数奸商投机取巧，操纵市场，捣乱金融，哄抬物价的不法行为，宣布人民币为合法货币，停止使用金银外币，抛售大米二十万斤，食油四千余斤，吸收通货六亿元以上^①。同时，制定保护侨胞利益的政策，欢迎爱国侨胞向祖国投资，发展生产和参加建设，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九月份侨信六百二十件，到十一月份达到一万五千三百九十一件，增长二十七倍，汇入侨汇达六十万美元^②。从而有力地粉碎了敌人的经济封锁，保证了支援战争和保障供给两大任务的需要。

经过两个月的斗争，接管工作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使厦门成为东南前线对敌斗争的坚强堡垒。在迎接一九五〇年的时候，黄火星进一步向全市人民发出号召：“全厦门人民英勇地团结起来，继续支援人民解放军，彻底解放金门，解放台湾，解放全中国，为建设新厦门，新福建光荣伟大的任务而奋斗到底。”^③

一九五〇年一月，厦门市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黄火星代表军管会作了《两个半月的接管工作》报告。各界代表一致认为两个半月的接管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就，特别是对解放军纪律严明，各部门工作人员的认真负责、刻苦耐劳、廉洁奉公的工作态度和作风，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会议结束时，黄火星当选为厦门市第一届协商委员会主席。

五月二十一日，黄火星主持召开厦门市第二届人民代表

①②见1950年2月6日《厦门日报》。

③见1950年1月1日《厦门日报》。

会议，并致开幕词。在这次会上，他继续当选为第二届协商委员会主席。

六月，黄火星奉调担任第十兵团政治部主任兼福建军区政治部主任。在省委和军区党委的领导下，他选调、配齐了新成立的各军分区的政工干部，加强了政治工作。并抽调了万余干部协助地方开展土改和剿匪、镇反斗争。为了迅速提高干部的文化素质，黄火星还亲自兼任了福建军区速成中学校长。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他当选为福建省委委员。

一九五二年十一月，经组织批准，黄火星进入南京军事学院政治系学习。正规的理论学习是他盼望已久的愿望。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使他深感理论对于指导革命斗争的重要性。他把这次学习作为新的革命斗争的起点。在一年半的学习中，他刻苦攻读，孜孜不倦，进步很快，结业时各门功课都获得了优良的成绩。

一九五四年五月，黄火星从军事学院政治系毕业，调任江苏军区（驻镇江）党委第一书记、第二政委。

（六）

一九五五年五月，黄火星奉令赴京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任军事检察长。

建立军事检察院，在我军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对黄火星来说，也是比较生疏的。当时组织上又没有配备副职。因此，从人员调配，到制定各项政策、规定，他都得具体抓。人员新、业务生，是遇到的第一个困难。他迎着困难上，到处请教学习，认真研究地方的经验，他随身携带一个鼓鼓囊囊的公文包，

装着各种文件、业务学习材料和笔记本，随看随记，边干边学。为了提高检察干部业务水平，他亲自主持制定业务学习计划，组织编写、印发学习资料，使检察干部的政策业务水平迅速得到提高。

军事检察院初建时期，从体制到办法都是照搬苏联的。黄火星经过认真研究后指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的优良传统，军事检察工作也不能例外，必须接受党委和政治机关的领导，决不能搞“垂直领导”，要从我们的实际情况出发。学习人家的先进经验，但不能全盘照搬，既要依法办案，加强法律监督，又要接受党的领导，以保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他严格按照组织原则办事，自觉服从党的领导，对军委、总政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指示，及时组织传达学习；对检察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和重大案件，及时向总政党委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请示报告。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批准任命黄火星为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兼军事检察长。

在检察工作中，黄火星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一九五六年为了搞好肃反甄别定案工作，他亲自到部队检查指导，一再要求参加这一工作的同志要严格掌握“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认真审查材料，核实证据，防止错漏现象发生。他反复强调：“中央对肃反工作的方针、政策很明确，叫做‘有反必肃，有错必纠’，能不能做到这一点，不仅是个水平高低的问题，而且是个党性问题”，“检察工作人命关天，又重要又复杂，作为一个检察干部，一定要坚持原则，秉公执法，学习《十五贯》中的况钟，

不做过于执”^①。他对每一个案件的处理都十分慎重，做到重调查，重证据，重事实，不枉不纵。

他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领导制定了加强检察工作，严格依法办案的制度和措施；提出了处理罪与非罪，由思想问题而引起的刑事犯罪与反革命犯罪的政策界限，受到罗瑞卿的赞扬。

一九五七年，全国开展反右派斗争。黄火星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他的领导下，整个军事检察系统没有一人被打成右派，抵制了扩大化的错误。后来有人指责军事检察院。他刚直不阿，反复教育大家必须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要用感情代替政策，混淆敌我界限和是非界限。在当时“左”的空气笼罩下，他的这种精神是极为难能可贵的。

一九五九年，在中央军委和总政党委的领导下，黄火星负责组织举办以“揭发犯罪，教育群众，加强法制观念，交流经验，改进工作”为中心内容的全军保、检、法工作展览会。为了取得好的教育效果，从材料的选用，场地的布置，展品的制作，到讲解词的编写，他都和大家一起研究，亲自审定把关。在一些部队巡回展出后，很受欢迎。对开展法制教育，搞好预防犯罪起了重要作用。

他工作作风深入，每年都要用两三个月的时间到部队基层或边防海岛进行调查研究工作。一九五八年八月，他到福建研究战时政治工作和军事检察工作，从闽西南到闽东北，从山区到海岛，到处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一次在厦门前线调查的路

^①见1972年4月27日《解放军报》。

上，一位老农挑着一担蔬菜，正艰难地爬坡，黄火星走上前去，一把接过老农的担子，挑着就走。突然，蒋介石军队打来的一发炮弹在他身旁爆炸，幸被警卫人员将他按倒，才得脱险。最后，他患了急性肝炎，大家劝他回京治疗，总政领导也十分关心他的疾病，动员他回京治疗，他都婉言相拒，只在当地住了半个月医院，就又带病坚持搞调查，直到年底才返回北京。

一九六〇年十二月，周恩来总理任命黄火星兼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直属队政治部主任。在此时期，由于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身体欠佳，组织上决定由他主持高检的日常工作。他身兼数职，工作更加繁忙，常常是忙了这家忙那家，有时还要参加中央政法小组的会议，晚上回家经常工作学习到深夜一两点钟。他没有星期天，没有节假日，也没有任何嗜好，除了工作，还是工作，呕心沥血，把全部身心扑在人民检察的事业上。由于劳累过度，他的糖尿病越来越严重，医生多次劝他住院治疗，最后病倒了，才去住了几天院。

一九六三年九月，组织上考虑到他的身体和工作重负难以适应，免去他兼任的解放军总直属队政治部主任的职务。

一九六四年，黄火星被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

(七)

黄火星不仅为加强人民检察工作呕心沥血，而且十分重视加强对青少年的思想教育，关心他们的成长，经常给青少年讲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教育他们接好革命的班。一九五七年，他多次在共青团北京市委和北京市少年宫组织的报告会上为青少

年讲述方志敏的革命故事。总政治部曾向军内青少年转发了他的报告。同年夏天，共青团天津市委邀请黄火星去作报告，晚上十点钟一下火车，他顾不得休息，立即找天津市委宣传部长和团市委的负责同志，了解当前青少年的思想动态。第二天上午，他在大会上联系青少年的思想实际，连续讲了四个小时，深入浅出，生动有力，使青少年受到了一次深刻的革命传统教育。团市委在机关刊物《读书月报》上登载了他的讲话，号召全市青少年联系实际，认真学习。中午，团市委设宴招待黄火星。他对大家说，今天我给青少年讲党的优良传统，自己却不能丢掉啊！于是，坚持回到招待所吃便饭^①。他罢宴的举动，赢得了人民群众的高度赞扬。

他对子女的要求也很严格，从小就注意培养他们爱集体，讲朴素的优良品德。他的专车从不让家属小孩“沾光”。有一次，他外出需路经小孩上学的学校，工作人员劝他顺便让小孩搭车，黄火星一口拒绝，坚决不同意。他是中将六级干部，可他的六个小孩穿的衣服都是补丁连补丁，老大穿了给老二，一个接一个。同志们对他说：“检察长，你也太寒酸了，该给孩子做点新衣服。”他说：“我们干部的子女不能娇生惯养，不能使他们有优越感、特殊感，娇惯他们不是爱他们，而是害他们，这方面的教训不少啊！”^②

他的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和谦虚谨慎、平易近人的高尚品德更是堪称楷模的。一九五五年九月，经周恩来总理批准，黄火星被授予中将军衔，他深感不安，总是以人之长，比己之短。在物质待遇上，他从来不伸手、不张口。军检建立前期，

^①访问李孔俊同志笔录。

^②见1982年4月27日《解放军报》。

他的住房、车辆、营具都比较旧，同志们多次提议向领导反映，他总是说：“反映这些干什么，现在比过去好多了，不能不知足啊！”①组织上几次安排黄火星去北戴河疗养，都被他谢绝了，直到逝世，他一次也未去疗养过。他衣着十分简朴，夏天一身旧单衣，冬天披着从解放战争时期留传下来的军大衣。身上经常带着针线包，衣服破了自己补。一九五九年国庆节，党和国家、军队的领导人齐集天安门城楼和群众一起欢度国庆十周年盛典。检阅马上开始，一位上将衣服上的一个钮扣掉了，正在他左右为难时，人群中走出一位中将，从身上拿出针线包，帮助他缝好了扣子。他，就是“黄老奶奶”。这件事一时传为佳话。黄火星的绰号也一直从抗日战争时期流传到军事检察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一九六〇年，他到大连出差，晚上十一点多钟，房间里还亮着灯，随行的同志进屋一看，发现他正在补衬衣。这位同志说：“检察长，我来给你补吧”。“艰苦奋斗是咱们军队的老传统，人人都要保持发扬，我也不能例外呀！”②他一边说着，一边继续缝补衣服。随后，他又前往大连外长山列岛，看望长年坚守小岛的连队干部战士，和战士们同吃大锅饭。战士们十分激动地说：我们在这远离内陆的小岛上，竟能见到北京来的将军，我们一定要不辜负首长的关怀，守好祖国的海疆。

（八）

一九六五年八月，组织上批准黄火星退出现役，免去军事

①②见1982年4月27日《解放军报》。

检察长的职务,以便让他集中精力负责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

正当他为人民检察工作,为加强我国的法制建设而大显身手的时候。一九六六年三月,他被派往河北省荣城县参加农村“四清”运动。接着,“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全面爆发,黄火星从河北农村被召回北京参加运动。

不久,政法学院的红卫兵开始冲击最高人民检察院。黄火星和许多老干部一样,遭到飞来的横祸。一次,他们围住黄火星,逼他交出档案室钥匙(高检档案室两把钥匙分别由张鼎丞和黄火星保管)。黄火星坚定而又气愤地说:“这是党和国家的机密,我个人没有权力把钥匙交给你们”^①。造反派企图冲击高检档案室的阴谋未能得逞,他们便恼羞成怒,猛力将黄火星从二楼楼梯上推了下去,当即跌倒在地,被摔伤了腰部。

随着运动的“深入”,冤狱遍神州。一天,两位来自当年黄火星坚持游击战争老区的来人,千里迢迢来到北京求见黄火星。黄火星热情接待了他们。原来,他们的父亲生前在当年主力红军长征后,做着“白皮红心”式的工作,表面上做敌人委任的工作,实际上暗中帮助我们通情报,黄火星当年曾在他家落过脚。可在“文革”中,其子女却因此而受牵连,打成了“黑五类”。黄火星听后十分愤慨,不顾自己随时被批斗的恶境,立即为他们写了证明,两位烈士的后代感激万分。事后,黄火星曾感慨地说:“出张证明事虽小,但却关系到这家人今后一辈子的事;而更重要的是澄清是非,不能把对革命有贡献的人当成敌人,我们搞检察工作任何时候都要实事求是。”^②

^{①②}黄力飞给作者的亲笔信。

一九六八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实行军管，进驻军代表。年底，高检被撤销，留少数人员成立留守处。一九六九年初，身患严重糖尿病的黄火星和机关干部一起，被赶到湖北沙洋“五七”干校劳动。

他虽然身处逆境，但仍然忘我地工作。干校从选点、择地到基建，都是在他的组织下完成的。干校平均每人种地两亩多，他和干部们一样，起早摸黑，日晒雨淋，从小麦、棉花等农作物的播种、田管到收获，汗水晒在一块。繁重的劳动，使他积劳成疾，身体一天天消瘦，经常出现便血、拉稀，糖尿病血糖达到三个“十”号，可他只在当地吃些药，仍然坚持带病参加劳动。

一九七〇年春，他的病情越来越严重，同志们都劝他回京治疗。四月间，他启程回京时，不顾自己病重，仍然惦记着同遭厄运的检察长张鼎丞，特地绕道从湖北到广东从化疗养院看望张鼎丞。张老夫妇看到黄火星被折磨成这样，十分难过。两位老战友促膝长谈，他们对法制被践踏，公、检、法遭砸烂感到愤慨，为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担忧，为自己作为人民的检察官不能从事检察工作而痛心疾首。

回到北京后，当时把持政法大权的谢富治根本不管他的死活。他只得在妻子的陪同下，前往北京医院检查。“文化大革命”给医院带来的“成果”是“派”仗不停，“触及灵魂”，大夫敷衍一下，诊断结果为胃肠炎。诊治后病情不见好转，反而厉害，只好又多次求医，却遭到医生、护士的白眼：“这点小病，何必老来”。他有病无处医，只好又先后来到中医院、盲人医院检查，直到八月份才被确诊为绝症——结肠癌。可是已经折腾了三个多月，肿块扩散，已到晚期。这时北京医院才同意他住院治

疗。

周恩来总理得知黄火星患病后，及时指示成立医疗小组负责治疗。黄火星感动得泪如泉涌，拿起笔给总理写了一封信，表示一定要积极配合医生治疗，争取早日恢复健康，更好地为党工作，报答党的恩情和总理的亲切关怀^①。

为了鼓励自己同疾病作斗争，他在床头贴上“既来之，则安之”的条幅。就是在病情十分严重的情况下，他还充满着乐观主义精神，对前来看望的同志说：“我很快就会好的，病好了，我还可以为党工作十年。”^②凡接触过他的医生和病友都为他的顽强意志和对党忠诚的革命精神所感动。

年底，医院为黄火星动了手术。术后病情一度好转，他非常高兴，回到家里和亲人欢度春节，许多战友前来看望他，他满心喜悦地以为可以实现自己继续为党工作十年的夙愿。

当时，全国正在开展批陈（伯达）整风，黄火星不顾病体，天天坚持到最高人民检察院留守处阅读中央关于批陈整风文件，参加各种会议。

不久，病情突然恶化，他又躺倒在病床上。张鼎丞、邓子恢、何香凝、廖承志等曾多次看望他；何香凝还托其儿媳经普椿送来人参，使黄火星深受感动。可他对自己的子女却要求他们坚守工作岗位。女儿黄力飞在山西参军，组织上批准她回京看望父亲。黄火星批评女儿说：“你不在那里好好工作，还跑回来看我，以后不许你再来。”^③大儿子黄立平，就在北京市当工人，也只是在手术后的十多天，请过一次假来医院探望。

^①访问韩明德笔录。

^②见1982年4月27日《解放军报》。

^③访问傅霞笔录。

一九七一年四月下旬，黄火星的病情严重恶化，生命垂危。但他把自己置之度外，仍然想着如何加强人民检察工作，健全我国的民主和法制。他对自己的亲属说：“不要紧的，我还能好，不少工作还等着我去做哪！”^①充分表现了共产党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革命精神。二十七日上午十一时，万恶的病魔夺去了这位党的忠诚儿子的生命，为革命栉风沐雨、出生入死，艰苦奋斗了四十多年的老红军战士黄火星的心脏终于停止了跳动，终年六十二岁。

附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

1. 黄火星：《自传》（1953年），原件存中共中央组织部。
2. 黄火星：《大江重渡》，载《星火燎原》第十期。
3. 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闽西三年游击战争》，载《星火燎原》第四期。
4. 《党史研究参考资料》（1982年第6期）、《党史资料研究》（1983年第6期），福建省中共党史研究会、福建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编印。
5. 《福建游击战争史》（1981年11月），福建省军区游击战争史编写组编辑。
6. 《华东军区、华东野战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史》（1963年编）。
7. 1949年10月至1950年6月《厦门日报》。
8. 1972年4月27日《解放军报》。
9. 王培臣、李德安、阮文炳：《深切的怀念——忆华中模范共产党员黄火星同志》，未刊稿，原件存福建省军区党史办公室。
10. 访问杨金福、谭克仰、阮文炳、林维先、陈乃何、吴锦章、钟国柱、马长炎、余明、何志远、李恩科、李孔俊、韩明德、傅霞等人笔录，以及李步新给中共乐安县委党史办公室的复信。

^①见1982年4月27日《解放军报》。

张曙时

乔毅民 润孔壁

张曙时，是我党队伍中一位久经锻炼的优秀战士。他从一九〇九年参加革命起，到一九七一年因病逝世，在这漫长多艰的岁月中，他经历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三个历史时期，在充满坎坷的道路上永不停步，把自己的一切无条件地献给了人民的壮丽事业，用自己的艰苦实践，写下了光辉的一生。

（一）

一八八四年的十一月，张曙时出生在江苏省睢宁县东乡张家圩一个封建地主家庭。父亲张俊哲是清朝的监生，叔父张敏麟是贡生。他系家中独子，八岁启蒙学习，家里专门为他聘请了一位塾师授课，整整读了七年。十五岁后，他参加童子试和八股试帖，随后又去应试科场。这些，都象“无形的牢笼”，把他的整个身心都禁锢起来，使他“难以呼吸到自由、新鲜的空气。”^①

但是，国家的危亡、民族的灾难，使张曙时不甘心于过这种

^①张曙时《自传》。

死寂的生活。就在外出应考的时候，他接触到了康梁变法维新的思想，很快就被这些新的思想观点吸引住了。他到处寻找这类书刊，带回家中阅读。尽管他的叔父对此十分不满，当面进行申斥，大骂“康梁的书是圣贤的叛逆”，严令他不准再看，但他仍偷偷地学习着、思考着，使他那久冻的心海里，掀起了层层波澜。他暗暗下定决心：再也不能象过去那样生活了，应该走新的路！为此，他不顾家庭的多方阻拦，在结婚后的第二天，就从家里偷跑出去，直奔县城，考上睢宁高等学堂，自此开始了新的生活^①。

睢宁高等学堂的学习，比起无味的私塾生活来，自然要好得多，特别是新的科学知识不断地开拓着青年们的视野。但张曙时并不以此为满足。当他发现监学和县官相互勾结，共同贪污学堂的经费时，就大胆地站出来揭露，并联合许多同学联名控告。为此，他以“乱党嫌疑”的罪名被学堂开除，只好暂时回家，另谋新策^②。

这时，康梁的变法虽早已失败，但其思想影响却仍在激励着张曙时，他的眼光由国内转向国外，开始注视着日本的动向。他想从这个邻国的迅速发展中寻求拯救祖国的方法。于是，在一些同学的邀约下，他于一九〇六年的秋初，东渡日本留学。在日本留学的日子里，他亲眼看见了明治维新给这个岛国所带来的巨大变化，更坚定了他改造中国的决心。

张曙时出国留学的行动，遭到封建家庭的坚决反对。他寒假归国刚一返家，就被祖父痛打一顿，关在家中，三天不给吃饭。这样，再去日本读书的打算也就化为泡影。但他没有被这

^{①②}张曙时《自传》。

种压力所屈服。不久，他从好友们那里知道了南京两江师范招生的消息，便又悄悄从家里偷跑出来，连随身的衣物和零用钱都没有带，连夜跑到南京，考入了两江师范学校。一学期后，他又被法律学所吸引，一九〇八年九月，他考进了南京法政学馆（又叫法政讲习所），翌年毕业后再考入两江法政学堂，攻读法律专科^①。

一九〇九年的中国，到处都在酝酿着革命运动，大家心向共和制度，重镇南京的青年中革命气氛尤为沸腾。宣传新思想的报刊比比皆是，议论革命的言论处处可闻。学校的许多教师是留日学生，他们反对封建制度，抨击清朝统治的黑暗，推崇西方的资本主义民主，公开宣传革命和推翻清王朝。这样的政治环境和大势所趋的革命潮流，推动着年仅二十五岁的张曙时走上革命道路。恰在这时，同盟会负责长江流域革命运动的赵北声到了南京。张曙时得知这个消息，喜出望外，立即找到赵北声，激动地倾吐自己对革命运动的真挚感情，提出参加同盟会的强烈要求。他的要求被批准后，就在这一组织的领导下，开始了革命生涯，积极投身到“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平均地权，建立民国”的火热斗争中^②。

（二）

张曙时加入同盟会后，负责南京学生界的宣传和联络工作。一九一一年十月，武昌起义爆发。紧接着，全国各地纷纷响应。他为这场革命废寝忘食，日夜奔走。他先是赶到江北，

^{①②}张曙时《自传》。

策动蒋雁行十三协率部宣告对清独立；接着，奔赴徐州力促张连光举起革命义旗；后来又去浦口，组织学生军数百人，会同粤、沪、苏、浙等各路起义军围攻南京，打垮了敌人，推翻了旧政权，成立了新的临时政府。在新政权的筹建过程中，他参加了有关工作，并担任司法筹备处的秘书^①。

一九一二年夏，原来的两江法政学堂改为法政大学。张曙时为了完成最后一个学期的学习，便回到政法大学继续读书。大学毕业后，他被江苏省高等法院委为邳县学习推事，第二年成为该县的正式推事。

一九一三年，窃国大盗袁世凯篡夺了辛亥革命的成果，对革命力量实行镇压。一方面，他从山东调张勋部数万人进行“南征”，在打败革命军第三师冷通部、占领徐州后，又沿着津浦路进兵，攻陷南京，一路烧杀奸淫，无恶不作；另一方面，又在各地搜捕革命党人。张曙时也受到通缉，但他并没有被袁世凯的这种反动气焰所吓倒，而是坚决地参加到“反袁护法”的斗争行列中去。在山东的潍县、沂州和江苏的徐州等地，他组织和发动了多次倒袁暴动。当孙中山到广州组织护法部队时，他立即赶到广州，参加了护法联军，在护法军总部李烈钧总司令部担任秘书，同时参加了孙中山组织的中华革命党。由于全国人民的齐声反对，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和其他反袁力量的共同斗争，终于粉碎了袁氏“黄袍加身”的美梦，推动了革命的发展^②。

随着革命势力推向长江流域，张曙时又重返南京，任中华革命党南京支部长。一九一八年中华革命党改为中国国民党，他

^{①②}张曙时《自传》。

又参加了国民党。一九二一年底，在老友徐在兹的推荐和师生的要求下，他到南京建业大学任校长。在职的三年中，他克服了经济上的许多困难，关心师生生活，实行民主管理，用师生会议制代替校长的个人独断，受到大家的拥戴。后来，国民党在上海召开党员大会，他出席这次会后，被委任为国民党南京支部长，负责南京的国民党党务工作。

一九二四年一月，经过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大力帮助，孙中山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主张，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革命政策，赋予了三民主义以崭新的内容。张曙时参加了这次大会，在思想认识上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他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英勇斗争中，深深感到她才是人民事业的领导者。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艰巨任务；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真心实意地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推进革命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把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引向高潮。他也看到了孙中山经历多次失败之后，逐渐确定了正确的政策，接受了共产党的主张，不仅使国民党得到了新的活力，而且出现了新的革命形势。因此，他衷心拥护孙中山在大会上的报告和大会的有关决议，决心作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信徒”，为贯彻革命政策，巩固和扩大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而斗争。

(三)

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标志着国共两党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也是革命高潮的新起点，全国人民拍手叫好，但遭到国民

党内右派势力的竭力反对和破坏。还在国民党一大期间，他们就背着孙中山，私自在英芳银行举行会议，策划反共阴谋。有谢持、冯自由、张秋白、刘成禹、茅祖权、邓泽如等四十余人参加。张曙时因不了解会议的反共企图，得到通知后也去了。会议一开始，主持者邓泽如即宣布反共主张，要大家讨论。张曙时尽管毫无思想准备，但一听到反共，就激起极大的义愤，他义正词严地说：“国民党过去多少年总是不能团结，青年分子加入很少，这一次代表大会，可以说是重建党的新生命，有些新分子加入党内来，是最好的现象，不问他什么党，共产党，既一致加入国民党，一致为中国革命而努力，皆是很好的，不可再有分歧的意见。”^①他责问这些右派：“在这初次团结中国新的革命力量才开始，党内就闹分裂的意见，于革命前途是不利的。过去多少年的失败，莫不是原因于党内意见分歧，各种私见，弄得步骤不一致，党内不团结所致吗！”^②当张秋白、徐清和等人一唱一和，大放厥词，恶毒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时候，他据理驳斥，说：“你们总说人家不好，何以俄国革命成功呢？你们主张反共，先破坏革命团结，怎能说人家来破坏你呢？人家如果来破坏你，首先就要你自己努力。总理这次主张改组，就是为了充实革命精神，创造我党的新生命。”^③右派们被驳得哑口无言，恼羞成怒，指责他有“共党嫌疑”、是个“共产党”^④；还别有用心地推他当“代表”，去向孙中山当面陈述他们的反共主张，当即被他严词拒绝。后来，这次反共活动因遭到孙中山的抵制，只好悄悄收场。

国民党一大以后，张曙时依然回南京建业大学³³³。后来因为

^{①②③④}张曙时《自传》。

军阀孙传芳下令要逮捕他，他才去上海，担任国民党江苏省党部的常务委员，专门从事党务工作。当时的江苏省党部内部，也有左、右两派，斗争十分激烈。张曙时坚定地站在左派立场上，与右派进行斗争。斗争的结果，左派取得了完全胜利。到一九二五年冬江苏省党部正式成立时，左派已在其中占绝对优势，诸如张曙时、侯绍裘（中共党员）等左派都被选入领导核心。

随着革命群众运动的不断高涨和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全国已处在革命与反革命大决战的前夜，帝国主义和地主买办阶级更加紧了反共反人民的活动，统一战线内部的阶级斗争也激化起来。代表地主买办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右翼的国民党右派，加紧了反革命的步伐。除原来的老右派——“西山会议派”，公开反对孙中山的革命政策，反对共产党外。以蒋介石为首的新右派集团组织“孙文主义学会”，鼓吹戴季陶主义，策划“中山舰事件”，抛出“整理党务案”，使革命遭到了严重困难。在新老右派掀起的逆流面前，张曙时站在维护国共合作，坚持孙中山革命政策的立场上，与右派进行了坚决斗争。他不断促进江苏省党部内左派的团结，并把不反共、推动民众运动和支持北伐军的胜利进军等三大原则，作为大家信守的共同纲领。由于领导核心的统一，不仅打退了右派的进攻，而且还发展了整个江苏的革命形势。为了满足形势的迫切需要，张曙时于一九二七年的春天，专程赴汉口开办江苏省党务训练班，积极培养训练革命骨干。当这项工作走上正轨后，他又以秘书长身份赶回南京，着手筹备江苏省政府的成立^①。

^①张曙时《自传》。

这时，北伐战争已经发展到长江中下游地区，工农运动的风暴席卷全国，动摇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于是，帝国主义加紧了对中国革命的干涉。隐藏在统一战线内部的蒋介石，以为时机已到，急不可待地在从江西南昌经九江、安庆到南京的路上，沿途捣毁那些国民党左派占优势的省、市党部，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到达南京后，更大打出手，又是砸工会，又是包围省党部，张曙时也被拘押起来。一时间，整个南京充满白色恐怖的气氛。面对蒋介石对革命势力的疯狂进攻，张曙时义愤填膺，多次提出要当面质问蒋，揭露其背叛孙中山的三大革命政策，背叛三民主义的丑恶面目。但蒋介石做贼心虚，不敢见他，只是指使何应钦、王柏龄等人出面应付。张曙时厉声责问：为什么捕我？为什么打省党部，打工会，捕许多人？为什么违反总理的政策而反共^①？这一连串的责问，问得何应钦、王柏龄等无言以对，狼狈不堪。本来他还要去同蒋介石进行面对面的斗争，恰在这时碰见了侯绍裘。为了掩护这个共产党的安全转移，他只好暂时放弃原来的打算，寻机一起脱险。在同车去公安局的途中，他俩借口上厕所，车停时，机智地甩开敌人，使侯得以脱险。不幸的是，侯于第二天又被敌人逮捕杀害，他也受到敌人的悬赏缉拿。眼看省党部的负责人一个个被捕，敌人越来越猖獗，在南京已无法久留。他在下车与侯绍裘分手后，就跑到一个秘密的地方，召集省市两党部重要人员开“联系会议”，决定在第二天（十一日）再开一个市民大会。当天晚上，他又召集省市两党部、总工会、农民协会、商民协会、妇女协会的代表筹备一切，但会还没有开，就被流

^①张曙时《自传》。

氓侦知，捕去了许多人^①。这样，他只好将省党部的工作人员一一遣散到上海去，细心布置好秘密工作的有关事宜后，才悄悄去到西门外，雇上一只小船离开，沿长江到芜湖，换上去武汉的轮船。在轮船上他遇到罗亦农和李立三等人，才得知蒋介石已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屠杀。听到反动派的这些血腥罪行，他的心中燃起怒火，下定决心要与蒋介石斗争到底！

到武汉后，张曙时立即投入反蒋斗争。他着手组织十六省党部的驻汉代表联合办事处，成立左派国民党干部联合机关。在他的主持下，一致决定“反蒋、东征、拥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到底。”在四月二十七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委会政治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上，他就江苏情况作报告，具体地揭露了蒋介石集团叛变革命，残杀人民的罪行，提出“要请中央用快刀斩乱麻的手段解决老蒋”问题^②，极力推动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发表声明，表示继续进行国民革命的明确态度，开除蒋介石的国民党党籍、撤销其一切职务，并下令通缉。

但是，在帝国主义的加紧干涉和蒋介石军队的包围下，武汉国民政府内部的反动倾向迅速增长，汪精卫集团的公开叛变日益迫近。在这反共形势空前紧张的严重时刻，张曙时为了作出最后的努力，亲自去找汪精卫。他尖锐地指出：“总理所决定的联共政策，无论如何不能违背，宁汉不可合作。如果违背

^{①②}张曙时：《关于“四一二”期间去江苏情况的报告》（1927年4月27日），载《党史研究资料》第2集第334—336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总理政策，宁汉合作反共，中国革命与国民党革命就完了！”他针对汪关于“现在不分共有何办法”的谬论，驳斥道：“蒋介石走反革命的路，与北洋军阀一样，你与之合作又有何办法呢？一合作就断送国民党革命的使命，不是你太对不起总理吗？”他告诫汪精卫要“慎重考虑，切不可违反总理的主张才好！”^①但所有这些忠言都遭到了汪的无理拒绝，随之而来的是召开“分共”会议，封闭群众革命团体，不久又在武汉地区进行疯狂大屠杀。武汉这个革命中心变成了反革命的基地，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了失败。

蒋介石、汪精卫集团的先后叛变革命，使张曙时陷入深深的苦痛之中，同时也推动着他去寻找真正的革命舵手，探索通向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

（四）

正当张曙时眼看武汉局势日益恶化，因自己无能为力而苦恼的时刻，作为当时武汉国民政府委员的共产党负责人之一的谭平山约见了。当谭问到他对形势的看法时，他明确地表示：“我不主张宁汉合作来反共，国共分家，两败俱伤，革命就受了很大损失。”谭告诉他说，我们党“要到江西去，从新再来一番”。听到这个消息他非常兴奋，当即回答说：“我赞成你们的办法，我愿意一同去干，不愿意与蒋介石合作！”^②这简短而明确的语言，表达了一个老革命战士对中国共产党的坚定信念，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把革命进行到底，只有

^{①②}张曙时《自传》。

跟着中国共产党走，才能拯民救国。

张曙时根据中国共产党的意图，在抓紧结束武汉党训班工作后，于七月二十三日离开武汉，乘轮船到九江，参加共产党召开的有关会议。根据会议的决定，他和其他人一起，于二十八日到达南昌，参加了八月一日举行的南昌起义，并在有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参加的联席会议上，被推选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委员，兼任党务委员会的主席^①。

南昌起义后，根据前委决定，张曙时随总部大队一起，于八月五日撤离南昌，起义军南下，于九月下旬到达潮汕地区。在行军转战的日子里，他同广大指战员一样，风餐露宿，跋山涉水，经历着种种困难，保持着旺盛的斗志，与敌人进行殊死的斗争。部队在广东的揭阳流沙、海陆丰失败后，他根据组织关于一部分人分散出去的决定，从一个海口雇民船到了香港。

党组织十分关心张曙时在流亡中的生活困难，在十分恶劣的环境下，还通过韩麟符（共产党员，后叛变）送给他一百元用费，以解决暂时困难。党的亲切关怀，使张曙时深受感动。他很了解当时的处境，更看到中国共产党人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为了更好地投身于革命事业，他恳切地向党提出去苏联学习的要求。当得到党组织的同意后，就与徐以新一道赴上海作准备，等候党的出发通知。

出乎意料的是，当他到达上海后，由于国民党残酷镇压革命，白色恐怖空前严重，不仅乘船去苏联发生了问题，而且与党组织的联系也突然中断了。这对张曙时来说，犹如晴天霹

^①张曙时《自传》。

雳。他心情沉重，苦闷异常，不知如何是好。自此，他改名刘和斋，闭门不出，不与任何人来往通信，即使过去的老朋友到沪找他，除少数感情较好外，均不接见。有些“好心人”趁机多次劝他在报纸上登启事，声明自己不是共产党员。他们说，这样做既能使国民党取消对自己的通缉，又可以到南京去做官，有享不完的荣华富贵。对此，他不屑一顾地说：“国民党现在握党权的人，连自己的同志都弄不清楚，还成什么党呢？”^①对于那帮踏着人民的尸骨爬上统治宝座的家伙，他尤其鄙夷和痛恨，指出他们连“什么是三民主义，什么是党的总理所确定的革命政策，什么是革命，一点皆不懂，皆是些吃党饭当党官的无赖分子，把革命的党弄成反革命，来冒充总理信徒，窃夺军政党权，连革命同志与革命的朋友皆不要了，而且用极野蛮无耻的手段来残害，我无论如何，不能与他们站一条线，更谈不到做他们的官的话！”这些话语大义凛然，铿锵有声，表达了一个革命者爱憎分明的坚定立场。他还郑重宣告：“我还要继续我的革命事业。他们如捕杀我就算了，不然，我坚持我的主张，革命到底，一定要打倒这些反革命的东西！”^②这是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公开挑战，也是对人民事业的钢铁誓言。有个别的人仍然企图劝他回心转意，说什么“你在党内数十年来吃苦也不少了，现在算是革命成功”，“我们老同志如见有不对的地方，应当到党内谋改，不要任性”。张曙时立即反驳说：“这不是任性不任性，是革命与反革命问题”，“现在南京是反革命的政权，我哪可能与他们同流合污！”“哪个肯到南京去，当反革命政府的走狗呢！”^③把这说客驳得面红耳

^{①②③}张曙时《自传》。

赤，悻悻而去。

但是，情况是复杂的。不久，谭平山又去找张曙时，劝他出来活动，说：“国民党左派分子还是你出来领导，团结起来，做一做左派国民党的组织工作，这是目前需要的事。”^①他感到这些话有道理，就鼓起精神，邀约邓初民、朱蕴山等国民党的左派人士十余人，开过三次会，取得大体相同的意见，决定用国民党左派联合会的名义，开始组织执委会，负责联络国民党左派，在各地发展组织。这对孤立蒋介石反动派和汪系改组派，团结革命力量，曾起了积极的作用。经过了几个月时间，这个组织有所壮大，逐渐成为一支独立的力量。这时候，又有人提出将组织另改其他的名称，组织新的政党，即第三党，并得到多数人的赞同。张曙时则表示反对。他明确地指出：“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既背叛革命，应当由无产阶级的共产党来担负中国革命任务才有前途。”至于小资产阶级，他说：“是有动摇性与不彻底性，不可能来担负这个任务。”^②由于他不赞同再组织另外的党，便立即退出“国民党左派联合会”。此后，他就利用这段难得的空闲时间读书，致力于革命基本理论的研究，结合总结自己过去的斗争经验，等待时机，准备投入新的战斗。

一九三一年，正当张曙时暂时闭门读书的时候，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发生了。这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东北，妄图征服整个中国的一个严重步骤。紧接着，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日本帝国主义又发动对上海的进攻。在这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一方面是蒋介石的“绝对不抵抗”政策，“听其侵

①②张曙时《自传》。

人”，乞求“国际联盟”的调解，并命令数十万东北军不战而退，让地千里；一方面是共产党的坚决斗争，事变的第三天就发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宣言，之后，又作出《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提出加紧领导和发动群众的反帝运动，武装群众，进行革命的民族战争，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坚决打击的主张。事实再一次教育了张曙时：国民党政府是民族利益的出卖者，只有共产党才是国家的希望，才能救人民于水火，完成革命的任务。他觉得，作为一个立志终身献给革命事业的战士，就要加入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后来他在延安整风中解剖自己的入党动机说：“我根据过去多少年的经验与教训，考虑好久时间，决定在日本的侵略下，中国革命当前的任务，仍然是反帝反封建，要致力于这种革命运动，一定要加入共产党，才不致走错了路线”；并“愿以牺牲一切的精神，为革命事业奋斗到底。”于是，他满腔热情地投身到抗日反蒋的洪流，积极参加上海的各界救国联合会的活动，支援义勇军组织，发动请愿示威；同时，更加急切地寻找共产党组织。

就在张曙时历尽艰苦，为找党而苦闷的时候，一九三二年初的一天，他在路上偶然碰见了一位多年不见的好朋友邹铭三，随即邀请至家。在相互交谈中，感到很投机，深得他的信任，便对邹倾吐了自己多年来希望加入共产党的迫切心情，请邹设法转达这一强烈要求。不久，党就派人来找他谈话，并由邹铭三、王学文两人介绍，正式批准他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时，张曙时虽已年过四十七岁，但仍象年轻人那样激动，心潮汹涌，久难平静。

（五）

参加中国共产党是张曙时生活中的一个根本转折点。自此，他就在党的直接领导下，信心十足，干劲倍增，以崭新的姿态投入火热的战斗。

他根据党的指示，首先在上海从事情报工作，利用自己原来的身份，活动于各抗日救国派别与团体之间，促进抗日义勇军的团结和发展。一九三三年春，北方各地的抗日武装先后发展起来，需要加以联络和组织。他便主动提出去那里工作的请求。经党的批准，他离开上海，先到北京接上关系，根据当地党的指示参加文协，通过这个组织的活动，为抗日救亡运动积极筹捐活动经费，然后与东北军有关系的万肇青、徐伯阳联络，并亲自到河北曲阳县，直接做驻该地的东北军的工作，发动他们起来抗日。在开展这一工作的过程中，他发现曲阳的农民和学生有抗日的要求，就抽出时间，深入到农民和青年学生中间，耐心宣传抗日形势，讲解开展武装斗争的重要性，由于他的努力，曲阳县终于建立了一支抗日武装。这支武装，到七七事变时，发展到一个营的规模，推动了该县的抗日运动。张曙时的这些活动，引起了妥协投降派的注意，驻保定的宪兵第三团几次追捕他，终因他的机智才得以幸免^①。

不久，国民党内主张抗日的将领方振武所部，由山西开到河北定县，举起抗日救国军的旗帜。张曙时根据北方党组织关于做抗日军队统战工作的指示，立即赶到那里与方见面，热烈赞扬方在困难当头时所采取的爱国行动。同时他又劝方不可孤

^①赵醒汉：《回忆河北曲阳县的抗日斗争》（1968年7月）。

军奋斗，为了团结更多的爱国力量共同抗日，应当与冯玉祥的部队会合，协同行动。张曙时的这些真诚劝告终为方所接受，但方又担心冯玉祥不欢迎而下不了决心。为了疏通冯与方之间的关系，促进各种抗日力量的汇合，张曙时又不辞辛劳，风尘仆仆地赶到张家口，做冯玉祥的工作。他对冯说：“你俩共同负担抗日同盟军的责任，大家一致为中国民族生存而斗争，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过去的个人意见现在不谈了，如果现在不能合作，就要失败，或者被蒋介石与日本勾结起来所消灭，抗日也抗不成，中国就亡了国，还讲什么呢？”^①张曙时的这些分析，深为冯玉祥所信服，不仅打消了冯对方的疑虑，而且也取得冯对他的敬佩，认为他富有才学，为人直爽可信，便委他为冯军司令部的顾问。

一九三三年五月，方振武和吉鸿昌两支部队在河北定县大操场，召开北上誓师大会。会后即开始行动，沿唐县、涞源、蔚县、灵丘方向进军，到达了张家口，与冯玉祥的部队会师。一支浩浩荡荡的抗日大军——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于五月二十六日宣布组成，并通电全国（当时称为“五二六”事变）。冯玉祥任总司令，方振武与吉鸿昌分任第一军、第二军军长，从而大大壮大了抗日的力量，振奋了广大群众的抗日热情。到了这时，方振武也进一步加深了对张曙时的了解，又聘请他为方军的高级顾问。张曙时利用自己身兼两军顾问的有利条件，为加强抗日军队的团结，宣传抗日、提高士气，促进全国抗日形势的发展，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抗日同盟军组成前后，党组织动员平津、内蒙、陕西等地

^①张曙时《自传》。

的共产党员及抗日青年云集张家口市，在抗日同盟军的旗帜下，在党的前敌委员会的领导下，成立了察省（后改为华北）民众抗日救亡御侮会，做发动和团结抗日群众的工作。“张曙时同志是这个团体的支持者之一，常在会议上发表演说，会下个别谈话，激发大家的抗日斗志，很受尊重”^①。

但是，革命的道路是不平坦的。蒋介石为了破坏、分裂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一面勾结阎锡山，以少给弹药和物资施加压力，通过南京国民党政府用高官厚禄为诱饵，“收买了抗日同盟军中一部分不坚定分子，从中分裂出去，并暗中挑拨冯玉祥与其旧部的关系”；一面调集十六个师、约二十万兵力，对同盟军进行军事威胁，同时封锁白国至柴沟堡之铁路交通，断绝全国人民对同盟军的援助。在这种情况下，冯玉祥不得不于八月九日辞去同盟军总司令职，“离开张家口，解甲归田”^②。紧接着，冯一春、庞炳勋等顽固派的部队开到张家口，大好的抗日形势因之骤变。“党的前敌委员会和吉鸿昌、方振武将军决定继续坚持抗日斗争，将部队和抗日御侮救亡会人员集中起来，撤退到张家口以北的张北县一带，改为抗日讨贼军，由吉鸿昌和方振武将军分任正、副司令，张曙时随方部的第六师行动。这支抗日部队沿察、热两省的边界向河北方向前进，准备与冀东的农民暴动队伍相结合，在那里建立抗日根据地。但沿途遭到国民党反动派军队的阻截，只得且战且走，几次突破敌人包围。当方部转战到北平北面潮白河一带时，在日本侵略军和何应钦中央军的夹击和空军的轰炸下，伤亡惨重，弹尽粮绝”。“至此，抗日同盟军宣告失败。”^③

^{①②③}安法孝：《回忆张曙时同志在抗日同盟军的一些情况》（1982年4月）；参阅王杰之、梁一鸣的回忆材料（1982年5月）。

在抗日讨贼军被围攻的时刻，张曙时以共产党员的大无畏精神，挺身而出，激动地对部队说：“我们是共产党的革命武装，绝不能任敌人来缴械，一定要把革命精神与勇气振作起来，冲破这个难关才有出路！”在他的号召下，当即有一百多人起来响应，决定冲出一条血路。但在准备夜间突围的过程中，他因几日的饥饿和疲劳，在昏迷中走错了方向，误入敌人的防线而被俘，拘留了大半天。在解往师部途中，他通过对押送士兵做工作，给以钱物，才脱险返回北平^①。

失败对一个革命者来说，只能激起更旺盛、更坚定的斗志。刚回北平不几天的张曙时，又根据河北省委的指示，前往河北南部做当地驻军冯玉祥旧属十六师的工作。到冀南后，他想在做好师长张润石的工作的基础上，逐渐掌握这支部队，再通过这支部队的力量，去发展民众的抗日游击队。殊不知张润石口是心非，表面上装做同情抗日的样子，把张曙时为抗日所辛苦筹措的四千元活动经费窃为己有后，就把他监禁起来，企图进一步谋害。在这种危急的情况下，他经过赵醒汉的帮助才逃脱虎口，辗转返回北平。可是刚到北平，又被张润石等告密，国民党宪兵包围了他的住所。幸亏他当时未在住处而脱险。北平无法立足，他只好去天津，但该地仍是敌人密布，也难以久留^②。后在党组织的指示下，他同原抗日同盟军前敌委员会负责人柯庆施一道，于一九三四年重返上海，继续从事党的地下情报工作。

^①张曙时《自传》。

^②参见张曙时给赵醒汉的信（1967年10月30日）。

(六)

一九三五年初，四川的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央红军已紧逼川南各县，川陕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发展迅速；蒋介石借追击红军为名，派了自己的大批嫡系部队涌入四川，引起了四川各派军阀与蒋介石集团之间的矛盾。为了在川东的云、万一带组织武装暴动，开展游击战争，配合长征红军在四川的活动，加深反动营垒的分裂，上海中央局特科又派张曙时前往四川。临行前，还将在上海的吕一峰（共产党员）、傅春吾两个人介绍给他。傅是老同盟会员，我党的同情者，在四川的军阀中颇有影响。党组织请傅随同张曙时前往，以配合他开展工作。

张曙时愉快地接受了党交给的任务，于一九三五年一月从沪动身，溯江而上，越楚汉，过三峡，到达了四川万县。他按原来的计划下船，经过了解，得知当地的武装暴动已经举行。由于准备不充分，起义失败，队伍也随之散去^①，再在万县组织武装暴动已不可能。这种意外的情况并没有使远道而至的张曙时灰心。他接着又乘船前往重庆，准备在那里住下来，利用傅春吾与地方实力派的关系，做情报工作，并打通与红军的联系。

初到山城，人地两生，开展工作是很困难的，特别是地方党被严重破坏后，党员也纷纷疏散，无法接通关系。他虽曾想出一些办法，也难以实现原来的计划，但他还是尽力活动，在

^①张曙时《自传》。

傅春吾老先生的帮助下，一边搜集有关的情报，一边去与那些从前方回渝的川军军官接触，给这些人陈说利害，指出他们去与红军打仗，不会捞到什么好处，与其损兵折将，徒拚消耗，倒不如休战后退，保存自己的实力。否则，蒋介石军事势力入川，就有地盘被其侵占，川军被其消灭的危险。他的这些工作，对瓦解军阀部队的斗志是起了作用的。

为了有系统地开展党的工作，打开新的局面，张曙时冷静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他认为：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国，大敌当前，民族的矛盾逐渐上升，各阶级、阶层（包括四川的地方实力派在内）正在起着变化，有转向抗日的可能；随着中央军的涌入四川，蒋介石集团与四川地方实力派的矛盾必将产生和发展，这就可以利用矛盾，推动实力派转向抗日立场，支持群众的救亡运动，从而发展革命形势。基于这种对当时客观形势的科学分析，张曙时决定克服重重困难，大力开展统一战线活动，特别是做好以刘湘为代表的四川实力派的统战工作，推动上层人士参加抗日，发展整个抗日的形势。

当时的四川，大小军阀很多，其中以刘湘的力量最强。刘湘投靠蒋介石后，依靠蒋的军力与政治上的帮助，取得了战败其他军阀的胜利，势力又进一步扩大，并被蒋委为四川省主席兼川康绥靖督办，掌握四川的军政大权。尽管刘湘实行反共投蒋政策，但蒋军的入川，蒋介石通过分化四川各军阀而各个消灭异己势力，以达到“四川中央化”的阴谋逐渐暴露，特别是“党化四川”的加紧进行和“省府迁成都”的正式提出，使刘湘对蒋感到恐惧。为了具体了解其中的真情和刘的态度，张曙时动员傅春吾去访问与刘经常接近的当地著名绅士卢子鹤，从卢那里得知“刘湘财产及商业皆在重庆，地理形势重庆也比成

都好，不愿省府迁成都，可是蒋逼迫又非迁成都不可，正在烦闷的没有办法”^①。张曙时认为这个情况十分重要。他判断借此就可以打动刘湘，替刘湘找到一条出路，进而展开我党的上层统战工作。于是，他借用与刘湘有交往的傅春吾的名义，给刘写了一封长信。信中分析了国内外的政治形势，着重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灭亡中国的严重危险，抗日势力的普遍发展和四川在将来抗日战争中的重要地位，劝告刘湘“应当确定因立新时代的需要与远大计划，才有光明前途。从军事、政治、外交、财政、经济各方面来一个新的布置，以抗日为中心的号召，造成四川为中国抗日政治的中心”。为此，就应该“把省府迁到成都，脱离中央势力的压迫，与四川各军联络起来，共同保卫四川”，“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才可得全国人民的同情与响应”^②，张曙时的这种深刻的分析，引起了刘湘的重视，立即派其亲信甘绩镛找傅春吾，表示十分感谢，并要求傅以后“常常赐教”。这封信，促进了刘湘下决心脱离蒋介石的挟制，也使刘从中受到抗日宣传的影响。

恰在这时，张表方（即张澜）来到重庆。张是刘湘的老师，深为刘所敬重。张曙时原与张相识，就又通过他去做刘湘的工作，当面劝刘站到抗日方面来，并向刘申说要抗日，就必须反蒋。因为蒋介石一面对日妥协投降，一面千方百计在四川扩充地盘、吃掉全川的地方力量，其用心险恶，不可不防。为此，只有高举抗日的旗帜，保护爱国抗日的群众，联合一切爱国抗日的派别，与蒋介石的控制野心作斗争，才有自己的光明前途。当时的成都，虽为七个军阀所割据，但在反蒋抗日的旗

^{①②}张曙时《自传》。

帜之下，是可以联合起来的。经过以上这些工作，触动了刘湘的思想，终于下定决心将省政府迁到成都，全川的政治中心也移向那里^①。

不久，张曙时因病在重庆住了三个月。恢复健康后，为了继续开展上层统战工作，推动刘湘转向抗日方面，他又利用吕一峰和蔡羿公（当时均为中共党员）的关系，前往成都。到蓉后，由蔡接去，安排好住处。后经陈克勤（后改名陈倦曦，中共党员，在上海时即与张认识）通过杨子昆（陈的同乡人，民本体专副校长）的介绍，到民本体专担任语文、历史等课程的教学^②。

自此以后，张曙时在公开身份的掩护下，积极而有计划地开展对刘湘的争取工作。首先，他通过黄子谷（当时的岷江大学教授、中共党员，与刘湘有交往）去找刘湘交谈，鼓动其抗日热情。为了收到更好效果，在张曙时的主持下，事前召开有黄（子谷）蔡（羿公）参加的会议，共同商量了谈话的内容和方式，确定谈话要针对刘感兴趣的问题，诸如：怎样治理四川，怎样联合好抗日的派别，如何对待蒋介石的控制等等，以引起刘的注意，其次，加强对刘湘的亲信人物的联络。他通过黄子谷、郭秉毅等渠道去接近黄秋侠这类刘湘手下的核心人物，分别做工作，提高他们的认识，再通过这些人去影响刘湘。第三，促进进步分子的团结。刘的下属中有一批进步人物。这些人极力帮助刘湘励精图治，想造成一个新的局面。他通过广泛的工作，促进这些人的相互合作，教育他们提高警

^①张曙时：《我在四川进行统战工作的回忆》（1959年8月20日）。

^②周源江、黄子谷的回忆。

惕，不要上右派投靠蒋介石集团的当^①。一九三七年八月，为刘湘所倚重的郭秉毅被吸收参加我党后，他就直接领导郭去做刘湘及其下属的工作，不仅使刘逐步转向抗日方面，而且也与我党建立起了直接而密切的关系^②。

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我国的形势下，日本商人和间谍分子纷纷涌进成都，进行各种非法活动。为了庇护这些活动，日本政府除暗地在成都的大川饭店设立机关外，还于一九三六年六月向南京政府要求在成都设立领事馆，派岩井英一为总领事。对此，蒋介石集团已经允许。刘湘对此也脚踏两支船，与日本暗有来往。为了粉碎日本的企图，推动刘切断与日的联系，站到抗日立场上来，张曙时在动员群众公开反对日本要求的同时，又通过郭秉毅等给刘湘做工作，反复讲清日寇势力深入四川腹地的严重危害，促使刘坚定拒日的态度。八月二十七日，成都爱国群众发动了反对日本在蓉设领事馆的示威运动，连军警和群众共两千多人开到了大川饭店内，在群情激愤之下，打死、打伤日本人各二人，捣毁了专卖日货的商店。“大川事件”发生后，刘湘受到南京政府的责难，感到难以处理，就通过黄求助于张曙时。张曙时说：这件事是因日本侵略中国而引起的群众爱国行动，是“偶发事件”，主要责任要由日本人负。政府从维护国家民族的尊严出发，当以地方事件来解决。同时，把打死的日本人埋葬，打伤的给以医疗费后送出川境^③。刘湘听从了这一建议，当即以此电复南京当局，从而结束了这一事件。“大川事件”的胜利，挫败了日本政府的阴谋，使四川人民扬眉吐气，进一步激发了抗日热情；刘湘的政治地位也得到

①韩天石、林蒙、周源江的回忆。

②③张曙时《自传》。

了加强，从而鼓起刘联合四川各抗日派别，充当四川抗日领袖的雄心。刘在一次讲演中公开宣称：“蒋介石不抗日，我们要抗日！”^①表明了刘因此事的解决而在抗日问题上又前进了一步。这一事件的处理，显示了张曙时卓越的政治才能。

西安事变发生后，刘主动提出要与成都地区的共产党负责人见面会谈。张曙时经过周密考虑，鉴于当时复杂的局势和尔后可能发生的各种变化，没有同意。但是，他仍以积极的态度表示了对刘拥护抗日的赞扬和支持，使刘湘也感到满意。之后，刘又派出自己的代表，带上张曙时写的介绍信件，前往西安与我党代表接洽，直接会见了周恩来，表达了对我党的友好态度和对抗日事业的诚意^②。

张曙时在极力打开上层工作并取得初步成效的同时，又以很大精力深入下层，着手发展群众运动。他利用在校教课的有利条件，经常向学生宣传全国各省学生救国运动的浪潮，说明日本侵略者妄图灭亡中国的民族危机，唤起大家的民族热情，受到师生的欢迎。经过一段时间的培养教育，一批思想进步、抗日热情高涨的骨干分子形成了。然后，他又通过这些骨干力量去创办宣传抗日救亡的半月刊《力文社》。在这个刊物的影响和指导下，许多教师和青年又发起组织救亡会，创办了《建设晚报》、《妇女周刊》（后改为《妇女呼声》）。自此，在各方面革命力量的共同推动下，四川抗日团体日渐增多，宣传抗日的报刊如雨后春笋，形成了一派空前活跃的抗日救亡的大好局面。

为了巩固和发展全川的抗日形势，张曙时一面积极支持与

①张曙时《自传》。

②张曙时、黄慕颜的回忆。

推动成都地区的抗日工作，另一方面又于一九三六年十月再去重庆了解情况，指导当地党员积极建立类似“民先”的救国会组织，掌握合法团体，进行公开与秘密相结合，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相结合的救亡运动，并责成刘传蕻加入救国会，与漆鲁鱼合作。自此，重庆救国会及其所属秘密学联、秘密职青救、秘密文救会、秘密工救会，都根据张曙时的指导精神，按“民先”的形式建立起来，成为我党直接领导的外围组织。这些组织所开展的各种运动，如纪念鲁迅大会，声援救国会七君子的“入狱运动”，拍卖走私日货运动，四川大旱中的救灾运动，一直到七七事变后的抗日大宣传活动，都成为党所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的一部分。张曙时返回成都后，时刻关心着重庆的工作，经常给刘传蕻等人写信，及时将党的有关文件秘密送去，进行工作上的指导；张曙时对发展新党员的问题也很重视，甚至让党组织的负责人亲自带上有关材料到成都，当面汇报情况，进行认真的审查^①。

随着群众抗日情绪的高涨，国民党四川省党部对抗日运动的仇视和压制也更厉害。为了击退这股逆流，张曙时通过郭秉毅等人给刘湘做工作，说明各群众团体都拥护刘的抗日主张，劝刘与之联系。由于此时刘对群众救亡运动采取欢迎态度，就指派郭经常与各群众团体接洽。这样，群众运动因有刘的支持，得以顺利地发展。各个救亡会成为各界救联会的扩大组织，由秘密走向公开的活动。由张曙时等创办的《建设晚报》，还得到刘湘每月四百元的津贴，群众救亡团体每月也有一百元的经费。四川国民党省党部见势不好，企图进行镇压，

^①刘传蕻：《关于张老在重庆的一点情况》（1980年8月11日）。

把群众的抗日行动诬蔑为“共党分子捣乱”，送出公函要省政府禁止或封闭各抗日刊物。张曙时得到这一消息后，为了抢在顽固派动手之前，立即派人给刘及其下属做工作，鼓励他们不要低头让步，使刘顶住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压力。在省务会议讨论封闭抗日刊物一事时，刘湘大加反对，置省党部的公函于不理。与此同时，张曙时还派人去安慰那些民众救亡团体，劝他们注意方法，“不要做得太红了，使国民党害怕”。

鉴于四川地下党自一九三五年遭到大破坏之后，没有下层组织的基础，开展党的工作非常困难，张曙时除了大力开展上层统战和群众团体的工作外，又致力于党的组织建设。他以十分严肃的态度和高度的责任感去考察和发展党员，不断壮大党的队伍。熊复回忆说：当时“张老（曙时）根据中央的指示，一面做上层统战工作，一面着手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由他一个一个地吸收，够了三个就编成一个小队”；“张老对我进行了审查，并在他的亲自监督下，吸收我入党。”^①从一九三六年八月起，先后发展了周源江、吴均、林露、郭秉毅等入党，并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了自一九三五年四川省委被破坏以来的第一个基层党小组^②。之后，还在学生和教师中吸收了十余名党员^③。到一九三七年十月，张曙时又要刘传蒞在重庆积极发展党员，特别要注意在各抗日团体中吸收经过考验的骨干分子入党^④。

对于新发展的党员，张曙时总是耐心进行教育，注意提高

①②熊复在四川在京老同志党史座谈会上的发言（1981年8月22日）。

③周源江、吴均的回忆。

④刘传蒞：《关于张老在重庆的一点情况》（1980年8月1日）。

他们的觉悟，增强斗志。除了入党时的亲自谈话外，还经常给以勉励。周源江入党不久，他就写诗激励：“天将明的黑暗，不久就要过去了。在这朝雾尚弥漫天空的征途，不问男女老幼，携起手来前进前进，奔到我们光明世界。”在日寇步步进攻我国的危亡关头，他又向新党员赠言说：“黑暗的世界，已接近透明的曙光；无情的血腥的炮火，已惊了被压迫的人们，群起向敌人作最后的抵抗。这时候不必说老少无用，更不必留恋甜蜜之乡！我们要铁一般的团结起来，消灭那吃人的魔王，争取我们的真正自由与解放，自由之花，才能发挥它万丈的光芒！”“我们欢迎觉悟分子来团结在一条战线上携手前进，同时还欣庆先觉者握携后觉者，足以促成社会推动力的发展与扩大。”^①他的这些热情的鼓励与鞭策，对刚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新战士来说，既感到非常温暖，又使其充满了前进的力量。

除了上述的紧张工作外，张曙时还致力于马列主义的传播工作，用革命理论武装党员和群众。据熊复回忆：“张曙时曾派他同《四川日报》当时的总编辑杜桴生同志联系，从他那里取得由报社印刷的列宁的著作，如《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两个策略》、《进一步，退两步》、《怎么办？》等书，通过我认识的祠堂街几个书店的店员，暗中发售。”在回家之前，“张老又交给我一个任务，就是把几万本列宁著作运到重庆，交给漆鲁鱼和刘传蕪同志。”^②

为了进一步确定地下党在抗日新形势下的任务，张曙时于一九三七年三月离开成都，取道汉口回延安，直接向党中央和毛泽东汇报情况，请示工作。经中央研究，决定他以中央特派员

^①刘传蕪：《关于张老在重庆的一点情况》（1980年8月11日）。

^②熊复在四川在京老同志党史座谈会上的发言（1981年8月22日）。

的身份重返四川，继续开展秘密活动和发展党的基层组织，而将上层的统战工作交由李一氓负责。

当张曙时从延安赶回四川时，已经是七七事变后的一九三七年七月底了。在全面抗战形势的推动下，刘湘提出了“对外抗战，对内建设”的口号，并拟定出建设四川的三年计划，四川民众动员委员会也宣告成立。于是，张曙时根据党中央关于进一步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抓住有利时机，积极活动于各抗日组织之间，扩大抗日团体，培养和提高进步分子，发展党员。同年冬，邹风平、廖志高抵蓉，成立四川省工委，张曙时是委员之一。到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召开省工委扩大会议，决定分别建立川东和川康两个特委时，他除任川康特委委员外，还兼任统战部副部长职务。

随着抗战相持阶段的到来，在日本诱降和英美劝降活动日益加剧的情况下，蒋介石集团对抗日更加动摇，对在抗战中日益强大的我党力量更加仇恨，到一九三九年冬至一九四〇年春，发展为大规模武装进攻，掀起了抗战以来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国民党顽固派于一九四〇年三月在成都制造了“抢米事件”，逮捕我川康特委书记罗世文、党员车耀先等和其他一些爱国人士。对此严重形势早有戒备的邹风平、程子健、张曙时等川康特委的负责人在处理好应变工作后，立即疏散到成都郊区，使猖狂的敌人多次搜捕扑空。随后，张曙时又根据南方局的指示，于是年六月转移回延安，从而结束了近十年的艰苦地下工作。

（七）

张曙时回到延安后的一段时间里，“因当时的领导干部很

多，暂时没有安排工作。他总是抓紧时间读书，连晚上也不休息”^①。之后，他担任了西北中央局的统战部副部长。

从一九四一年底开始，张曙时根据党的需要，进入了法制战线，从事人民的法制事业，直到一九五五年，先后担任过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法制室主任，中共中央法律委员会委员，华北人民政府人民监察院副院长，最高人民法院西南分院院长，西南政法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务，为人民的法律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由于张曙时在学生时代就喜爱法政专业，具有专门的法律知识，加上党每年的教育和实际工作的锻炼，他深深懂得执行革命法律，维护人民利益的极端重要性。因此，他在法制岗位上总是兢兢业业，谦虚谨慎，处处严格要求自己，模范地遵守党纪国法，从来不搞特殊。为了做到判案无误，他不顾自己年老多病，经常深入实际，注意调查研究，弄清各种复杂的情况，把案情搞准。在他主持西南分院工作期间，案件很多，桌子上的卷宗经常堆积如山。他每卷必看，“事必躬亲”，即使看到半夜，甚至通宵达旦，也不马虎半点。领导和同志们劝他注意身体，他仍坚持搞完。为了提高工作效率，便于及时检查，他规定所属科室一律都要写出周记。他再忙也要一一阅查，指出不足，以利改进^②。

人民的法律，是通过无产阶级的政权而建立起来的法律制度和社会秩序。这就要执法人员不徇私情，切实做到“执法如山”，保护公民的合法权利。张曙时正是这样的英勇战士。还在延安整风运动的后期，他就对康生等人搞的“抢救失足者”

①王定国：《我所知道的张老情况》（1982年6月30日）。

②朱绪煌：《我给张老当秘书时的一些回忆》（1982年5月），

謝安嘗問諸人：「人當自畫進，誰名最優？」

謝安嘗問諸人：「人當自畫進，誰名最優？」

生们促膝谈心，交换各种意见。他那耿直豪爽的性格、平易近人的态度，给大家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①。在生活上，张曙时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还在延安时期，他就积极参加农业生产，经常下地劳动，带头交公粮，还总以“应持粒黍辨，方免游瑕侵”^②自勉。党中央在困难的情况下，对包括张曙时在内的“十老”及一些年高体弱的老同志曾作出给予特殊生活照顾的有关规定，他总是感到不安，时时自省。进入大城市以后，党对老干部的一些物质上的照顾，他总是多方推谢，连配给他的小轿车也不轻易使用，更不准家人借机享受。他的家里陈设简单，饭桌上只有清淡的菜肴。他常用过去斗争的艰苦事例来勉励自己和教育孩子们。当孩子在身边时，他总是提醒他们“要节约用钱”，要“谦虚谨慎，不骄傲，不自满，处处学习，时时进步”；当远在别处时，又一再写信，指出：“世界上的事，统由吃过苦头才晓得是不容易来的，尤其是革命事业皆是由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牺牲精神创造出来的胜利，这个真理时刻不要忘了。”^③

张曙时很早就参加革命，对革命事业有贡献，但他从不居功自傲。直到临终前，还想到自己的缺点，努力保持晚节。一九七〇年他在写给一位老战友的信中说：“我自一九三五年到北方，又到四川，前十几年里多半做地下工作，解放后由北京又到四川来，已二十多年，没有离开此地”。“青春不再来，现已白发苍苍”，虽“私心可告无愧”，但“小毛病还是很多的，

①朱绪焯：《我给张老当秘书时的一些回忆》（1982年5月）。

②《怀安诗社诗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③张曙时：《给张蓉的信》（1970年2月22日）。

希望你老朋友给我指导，以便改正，好保持革命晚节”^①。

张曙时从一九六五年起，病情不断加重，经常卧床不起。即使如此，他仍孜孜不倦地学习，时时不忘党的事业。即便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肆虐的日子里，他对共产主义事业的信念，也没有丝毫动摇。一九六七年他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说：“马列主义决定成功，共产主义在中国一定要实现”^②。这发自肺腑的心声，表达了张曙时对党和人民事业的必胜信念！一九六八年，在林彪炮制的“一号命令”下，他被迫转移到南充，一九七一年三月十八日于忧愤中逝世。

^①张曙时：《给长林的信》（1970年1月7日）。

^②张曙时：《给赵醒汉的信》（1967年10月30日）。

赵品三

李峻晨 于平

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姊妹篇《续西行漫记》（韦尔斯著）中，记述了一批中国文化史、话剧运动史上可纪念的盛事：鲁迅先生的不朽名著《阿Q正传》于一九三七年春由抗日剧社首次搬上舞台，轰动了延安全城。书中“苏区之夏·流动剧社”一节这样写道：“那有趣的农村无产者阿Q是由剧社主任曹彬三（译音）扮演的。从此以后，他无论去到那里，人们都高声喊着‘阿扣一伍’这个玩笑的称呼欢迎他了。”这个令人喜爱、受人欢迎的阿Q扮演者“曹彬三”，就是赵品三。

（一）

赵品三，名振鑫，字品三，参加红军后即从字行。山西省榆次县西郝村人。一九〇四年六月十八日（农历五月初五）出生于一个半农半小商贩的贫农家庭。弟兄七人，他排行第三。父亲赵景升，早年在邻村一家地主开的小商店内做杂务工，以后转到太原府“信昌源”油面行当了一名跑外的店员。直到二十七岁上，才成家立业。后来，自家在太原府开了一间小磨行，捎带耕种二十几亩贫瘠的旱地。赵品三自小身体瘦弱，

四岁才能直立行走。十一岁时随父到太原府读私塾，十四岁入太原府阳曲县立第一高等小学校读新书。他练得一手好字，在书画上显露才华。十三岁时，他自编自书一幅对联：“面对绿草清香味，头顶蓝天白色云”，深得先生赞许。

五四爱国运动爆发时，赵品三正读高小。新思潮启迪了他的认识，激发了他的爱国心。一九二二年，他考入太谷县铭贤学校。铭贤学校是美国基督教公理会出钱由孔祥熙任校长经办的一所私立教会中学。学校里新旧思潮的斗争十分激烈，赵品三积极参加各种进步的学生运动，逐渐倾向并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一九二五年，铭贤学校第一个共产党员张维琛（字淮珍）介绍赵品三和张卿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们三人组成了铭贤学校第一个党小组，这是山西继太原建立第一个党支部之后成立最早的党小组之一。他们在学校里组织了科学研究小组和书报流通社，搜集并向学生介绍进步书报和革命书籍，如《中国青年》、《向导》、《马克思主义浅说》、《共产主义ABC》等。还编辑了《国民党与共产党》一书，并自己刻印出版《锐锋》期刊。五卅运动的反帝风暴席卷全国，铭贤学校的党小组以铭贤学校学生会的名义，倡议组织学生自治会和学生联合分会，掀起声援五卅运动的学潮，张维琛为学生会会长，赵品三任学生会学艺部主任。他们带领学生冲向社会，开展下乡宣传，街头演讲、演新剧、募捐、办工人夜校等活动。赵品三充分发挥了自己的组织能力与特长，他的戏剧表演初露才华。他们还参加和组织了“非基督教同盟”的活动。在学运浪潮的冲击下，学校当局被迫废除了吃饭前颂经、祈祷等宗教仪式。张维琛、赵品三在学生中威信越来越高，成为学生运动公认的领导者。当时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他们乘五卅运动

形成的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吸收进步学生加入国民党，公开成立了左派国民党支部，并同以贝露女校为据点的右派国民党支部针锋相对地斗争。到一九二七年春，铭贤学校的左派国民党党员已发展到七八十人。赵品三还曾到太原参加了“西北革命同盟会”，回校后成立了同盟分会，进一步扩大了革命力量。随着北伐战争的迅猛发展，统一战线内部国民党右翼势力加紧进行分裂活动。铭贤学校的高向杲、吕其哲等右派骨干到处张贴反动宣言，散布西山会议派的谬论，散布“张维琛、赵振鑫是跨党分子！”力谋争夺学生运动领导权。赵品三同张维琛经过周密计划，召开左派国民党党员大会，将高向杲等五人开除出党。并组织郝金和、杜义田、郝德青、李维桐、陈增吉等几个同学，在一天夜里将高向杲痛打了一顿，赶出校园。高跑到山西省党部告了一状，后不得不逃往河南。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山西国民党省党部也进行“清党”。张维琛、赵品三、郝金和等遭到通缉，无法立身。不久，郝金和在太原被捕。九月三日，赵品三和张维琛结伴南下武汉。

（二）

九月的武汉正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赵品三和张维琛住在汉口笃庆客栈，千方百计寻找党的关系。在汉口租界内，张先后找到共产党员高鹤桥、高仰止。谁知，刚接上头，机关就被破获，关系又断了。张维琛又跑到河南去找新的关系，赵品三匿居客栈留守，等待机会。不久，赵在客栈里结识了几个打散了的共产党员曹汝谦、曹祖谦、杨松青、周凯、宋维新等，大家相议分头找党。为响应中央关于武装反抗国民党屠杀政策的

总方针，赵品三先后拟打入京山县皂市邓明理土匪部队，安陆李纪才旅部，但均未得手，不得不退回武汉。是时张维琛也从河南返回。直到一九二八年春，曹汝谦在上海接通了党组织关系，赵品三等才奉党的指示动身去西北弓富魁部开展兵运工作。不料车到河南驻马店，恰逢战事，交通被阻。他们只好改变计划，通过关系到驻扎在河南确山的陕西军队岳维峻部王绍猷的第二混成旅新成立的政治处工作。不久，张维琛也到了。他们通过驻马店铁路区五号房的共产党员赵周车（辛人）与河南军委、中央军委接通了组织关系。此后，从海陆丰返回北方的程子华也来到该旅政治处，参加他们的行列。一九二八年七月，中央军委派人到确山传达指示，张维琛、赵品三、程子华、曹祖谦、周凯等成立了党在该旅的支部，张维琛为支部负责人，秘密开展在该旅发展组织和士兵教育工作。到一九二九年初，党员发展到七十余人，形成了一个能控制约十一个连武装的战斗堡垒。一九二八年秋，该旅缩编为团，政治处人员编入第一营，张维琛任政治教官，赵品三任书记长，程子华任副官。冬，部队移驻安徽阜阳（颍州），岳部缩编为新编第一师。张维琛、赵品三、周凯、姚俊明被裁减离开部队，程子华下到六团二营五连任排长。部队移防淮阴清江浦。赵品三等绕道赶往清江浦，在山西会馆建立了党的秘密机关，继续和部队中的党员保持联系。在阜阳时，赵品三等已和地方党（聂鹤亭为负责人之一）接上关系。此时，党支部又与耿卓吾、季步高、张雄生、张经武、成耀、高晓等失散的党员接上了关系。一九二九年初，蒋介石对这支非嫡系武装继续整编。新一师移驻武昌南湖，以曹万顺为师长。又有几个秘密党员被迫离队。赵品三这时潜入部队以六团二连上士文书的身份抵南湖，代张

维琛做军中党的负责工作。党支部抓住该部开往沙市、宜昌一带参加军阀混战之机，利用官兵反蒋情绪，决定在沙市、宜昌起义，随即成立了以张维琛为统一指挥的起义司令部。赵品三、高峣赶往沙市，郭子明、耿卓吾、季步高赶往宜昌。不料，五团反动团长王俊杰抢先在宜昌发动兵变，带走了四、五两个团。耿卓吾在刺杀敌旅长时壮烈牺牲，起义失败了。程子华所在的六团和四、五团残部被改编为独立十五旅移驻汉口桥口一带，除程子华一人外，部队中任职的负责党员全部被清洗，然而士兵中的党员却基本上保存下来了。赵品三和高峣带一支盒子枪回到汉口，以武昌箍桶街艺英小学为据点，同曹祖谦一起继续开展党的工作。不久，即与程子华取得了联系。赵品三随时把独立十五旅的党组织活动转报湖北省委、中央军委，将上级党的指示及时下达给程子华。独立十五旅的兵运工作在党的指导下又活跃起来。

一九二九年十月，独立十五旅奉命开拔到大冶、阳新一带打红军。此时，何长工、李灿率领的红五军第五纵队和鄂东南的红十二军正在这一带开展游击战争。程子华闻讯后即跑来与赵品三等计议，打算趁此机会在大冶、阳新一带举行兵暴参加红军。恰好中央派柯庆施、石仲伟、邓乾元到武汉，探明此讯，当即表示同意兵暴计划。十二月初，赵品三、郭子明追上正向黄沙行进的红五纵队，向何长工传达了湖北省委的指示。红五纵队党委与大冶中心县委立即召开扩大联席会议，赵品三等出席了会议。会议决定尽快派人与程子华联系，商定日期，由红五纵队与程部里应外合举行兵暴攻取大冶城。十二月十四日，大冶兵暴在程子华直接指挥下获得成功，起义部队与红五纵队胜利会合。赵品三接到程子华的来信，即与柯庆施、郭子

明、杜中美、吴敏生一道，由武昌动身，到鄂东南阳新龙岗头，参加了红军第五纵队。大冶兵暴是红军初创时期党在兵运工作中一次重大的胜利。

(三)

赵品三参加红军后，担任过红军第五纵队第十六大队政治委员、特务大队政治委员，红三军团第八军政治部宣传科副科长，红三军团总指挥部秘书、军团直属党委书记，中央红军特别训练大队政治委员……。他参加过攻打通山、崇义、平江、岳州等战斗。还参加过两次打长沙，三次反“围剿”的战役。一九三一年以后的几年中，赵品三在苏区主要的是从事革命文化工作。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定都瑞金后，他任职时间最长的是中央红军学校俱乐部主任。他成了苏区话剧运动的开拓者、领导者和实践者之一。

红军学校是专门培养红军指挥员的军事政治学校。红校除军事政治课程外，还设有文化课，并特别注重各项文化娱乐的课外活动。这些任务完全由校俱乐部负责实施。俱乐部下设文化、体育、戏剧等三个管理委员会，各学员队设有列宁室。赵品三既负责全校的工作，还兼做模型室的工作，制做了大批教学用的图表、模型、仪器、标本等。并根据刘伯承校长的指示，为红校学员设计了一套校服，以后被推广为中国工农红军的军服。

红校俱乐部是当时中央苏区的“文化中心”。因部队政治工作和群众工作的需要而蓬勃兴起的话剧运动成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的主要形式。红校的话剧工作特别出色，很快推广到

苏区各部队、各部门以至乡苏维埃。戏剧管理委员会由赵品三、李伯钊、危拱之、蔡纫湘、伍修权组成。一九三二年年年初，赵品三主持成立了红军的第一个专业剧团“八一剧团”。这年冬，以该团部分人员为骨干组成了工农剧社总社。红校几乎每周都举行晚会，演出歌舞、话剧。露天剧场挤满了观众。除学校学员外，还有苏区老百姓，远在十几里外叶坪的中央负责人也常来观看演出。每逢“二七”、“五一”、“八一”等节日纪念和重要会议召开时，演出更为盛大。赵品三既是演出的组织者，也是编剧和出色的演员，经常在剧中担任主角。他和李伯钊、伍修权、李克农、胡底、钱壮飞、王普青等人，合演过《父与子》、《破牢》、《阶级》等很多话剧。一九三四年一月，庆祝全苏二大的演出活动是苏区文艺活动的高潮，赵品三负责这次大会的会场设计、布置和安排文艺演出。当时《红色中华》报道了演出的盛况：“楼上楼下照耀着灯光，同志哥、同志嫂、同志妹，同志……挤满了雄伟的会场。……准备了，大家都准备叫哑了喉咙，鼓肿了手掌。这是对工农剧社热情的祝颂，祝颂它放射着工农大众艺术的光芒，祝颂它到群众中去，深入广大的工场村庄，成为我们的艺术战线上精锐的武装，成为我们战争动员中雄伟的力量”^①。全苏二大会议期间组织了七八次文艺晚会。赵品三饰演赤色游击队长、李伯钊饰演小妹、胡底饰靖卫团总、钱壮飞饰反动师长、李克农饰土豪的大型话剧《我——红军》受到全场观众的热烈喝采。当时报道说：“这几个要角是全苏有名的明星，表演极努力”，人们称颂他们的这次演出是“尽善尽美”的^②。这次演出受到中

^① 《红色中华》1934年2月3日，《歌舞晚会上》。

^② 《红色中华》1934年1月24日，《一个精采的晚会》。

央负责同志的表彰，毛泽东主席专门招待赵品三等剧团同志们吃了一餐饭。

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工农红军开始长征，红军学校随军出发。赵品三因身患痢疾未能随军行动。留在苏区的教育部长瞿秋白任命赵品三为教育部艺术局局长兼工农剧社总社长。工农剧社将所属人员编成三个军事化的剧团：火星剧团（由石联星、王普青率领）、红旗剧团（由施月娥、刘月华率领）、战号剧团（由赵品三、宋发明率领），在部队、火线、群众中以多种形式边战斗边宣传，紧密配合保卫中央苏区的战斗。一九三五年元宵节，在雩都县小密地区由瞿秋白亲自主持，赵品三具体负责举行了盛大的军民联欢晚会。这次晚会盛况空前，军民冒雨同看，通宵达旦，情绪十分高昂。留守苏区的中央局党政军负责人项英、陈毅、贺昌、刘伯坚、何叔衡、陈潭秋、蔡会文等都出席了晚会。赵品三在一九六二年曾作七律二首追忆当年盛景：

十里听歌冒雨来，
辉煌灯火照山台。
军民同乐逢佳节，
星月联华逞妙才^①。
东边唱罢西边和，
前幕收场后幕开。
披蓑张盖通宵立，
三度闻鸡不肯还。

①“星月联华”为周恩来在全苏二大观看演出时称赞石联星、施月娥姊妹、刘月华、彭舜华等女演员的妙语。

元宵结彩赣江春，
壮舞高歌洗战尘。
夜雨绵绵弦韵急，
红灯冉冉掌声频。
蒸豚煮酒劳军旅，
磨剑擦枪待敌人。
三十年来谁记得，
雩都情景宛如新。

赵品三根据瞿秋白关于“话剧要大众化、通俗化，采取多样形式，为工农兵服务”的指示，组织剧社同志深入前线，深入群众，深入生活，开展剧本创作活动，写出了很多好剧本，如《李保莲》、《堡垒中的士兵》、《追击》、《游击》、《我们的队伍来了》、《菜刀下的营长》、《收租粮》等都是反映战争生活和白区人民苦难生活的新剧作。其中《我们的队伍来了》、《游击》系赵品三所作，曾收入瞿秋白亲自编辑的苏区第一个剧本集《号炮集》里^①。

当时，大多数同志尚不知时局的严重，唱着“胜利的号炮”歌，盼望着一两个月后主力红军会带着俘虏和缴获的武器凯旋归来。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日敌人占领瑞金，接着雩都、会昌均陷于敌手。一九三五年二月，局势恶化，中央分局动员留守部队突围。赵品三亲自将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刘伯坚的三个儿子虎生、豹生、熊生送到一位老乡家里寄养起来，他还把

^①现在只保留下一本《号炮集》，在陈诚“石叟书屋”的档案史料中。那是敌人占领苏区后抢去的。

工农剧社的剧本、演出材料密藏在老乡家的楼上。工农剧社的人全部分散编入林华司令员的支队，开始有一千多人，刘伯坚也在这一路。三月四日，突围开始，一出发就遇上倾盆大雨，天黑，路滑，山路崎岖……。队伍冒着敌人的炮火，冲过云河、马岭、牛岭三个关口，付出了惨重代价。红七十团周建平团长在牛岭一战挂花，信丰唐村一战，刘伯坚左腿中弹，不久被俘遇难。三月六日，又传来阮啸仙牺牲的消息……。冲过两道封锁线后，林华支队减至五百来人，在茶林又遭敌袭击，只剩三百多人了。三月八日，走到磨盘山附近，林华支队决定分成六个连分散突围到油山会合。赵品三、韩进分在林华所率的这个连。当日，他们翻过一座山，走进一所院子正准备吃午饭时，突然枪声大作。赵品三、韩进跟着林华冲出，涉河爬山，躲进灌木丛中。在敌人搜山时，他们不幸落入魔掌。被押进敌人团部，这个团是粤军余汉谋部叶肇师莫希德团。林华被俘后机智脱险（后来他找到了陈毅部队，在三年游击战争中牺牲了）。赵品三、韩进、石联星等三十多人在敌团部关了几天，敌人认为他们是“演戏的”，不久陆续释放了。当敌人问及赵品三和韩进姓名时，他们谎称一个叫曹炳生，一个叫韩思进，蒙混过了敌人。三月十三日，赵、韩二人脱离了虎口，开始了一段患难与共、并肩找党的艰险历程。

（四）

赵品三、韩进步行一天，到达赣南信丰。为了少招麻烦，他们将敌人开的路条扔到河里，决定以难民身份行动。从苏区出发时带的钱被国民党士兵搜去了，连好点的鞋子都给换走

了。身上一文不名，何以为生。所幸韩进写得一手好文章，赵品三则长于绘画和书法。一路他们靠卖字画度日，从信丰到赣州、吉安，又到南昌、九江，沿途寻找党组织和红军部队。在九江，因孔荷宠叛变革命后，在南昌、九江一带到处指认、追捕共产党员和打散了的红军，活动十分猖獗。赵、韩二人不便滞留，买了两张车票前往上海。韩进早年在上海搞过工运，满怀希望通过旧关系找到组织。一路上敌人盘查甚严，遇到难过的关卡，赵品三用肥皂刻个假官防盖在“介绍信”上混过去，竟然一次也没露破绽。他俩到达上海已是一九三五年五月，上海党组织已破坏殆尽，几经周折，毫无线索可寻。他们二人决心北上。但路费又成问题。他们以画会友，从同善书社门口一位书画家处得到五元钱的周济，在国民党政府公安局救济科弄到两张廉价船票，上了开往天津的客轮。在天津仍一无进展，好在赵品三在“三山裱画铺”谋到个画扇面的营生，百张五毛的工钱，勉强糊口。韩进找得一位工友家，做为联络通讯处。韩进在此又病了一场，赵品三三天两头背扶他到红十字会看病。韩病愈再返上海找党，赵暂回山西老家向西北方向寻找红军。四个多月颠沛流离的生活，使他们结下生死与共的情谊。

（五）

一九三五年六月，赵品三回到山西榆次家中。他曾设想过托在西伯利亚赤塔做过生意的亲戚帮助直奔苏联，也曾有人想帮他谋个学校教员的职业暂顾饭碗，都无结果。冬天，他忽然在一张报纸上看到红军东征的消息，并登有林彪、李弼庭等人的名字，才确信中央工农红军已胜利到达陕北。他喜出望外，

立即求亲友凑集了十二块钱赶到西安，在一个朋友开的汽车行里找了个干杂务的差使，并写信告诉韩进。一九三六年五月，韩进来到西安，补个名字混进了东北军一〇九师当文书，想寻找机会跑回红军中去。部队开往庆阳去打红军，韩在偷路条时被敌发现，遭到毒打，伤好后又被迫回到西安。韩、赵二人又开始合作，在东北军的《西京日报》上投《西京百咏图》稿，由赵画画，韩做诗、文，宣传抗日主张。随之，他们结识了《西京日报》主编魏文伯（时名魏雷）。在宣传抗日活动中，他们又认识了革命青年李文一，共同发起组织了“西北救亡反帝文化大同盟”。西安事变后，赵品三参加了“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分配做宣传工作。不久，在街上他陆续碰到在苏区就熟识的伍修权、危拱之、博古、叶剑英、张文彬等。一天傍晚，赵品三和韩进在解放日报社同李一氓见了面。李告知中央已收到韩进的报告，决定恢复他们二人的组织关系，组织上将派丁白同他们联系。几天后，在汽车同业工会，赵品三见到了丁白，正式接上组织关系，回到了党的怀抱。赵品三立即搬到内部同志称之为“六国饭店”（实际是基督教青年会）的地方——红军秘密办事处。不久，分配在冯文彬任部长的中央青年部工作。一九三七年二月四日，赵与冯文彬同车奔向延安。中央苏区的老同志们听说他回来了，纷纷来看望他，刘伯承邀他到家中促膝长谈，邓颖超、蔡畅等都与他亲切会面，互道分离后的经历。四月，西北青年救国会正式成立后，赵品三任军事部长兼西北抗日剧社总社长。军事部主要任务是领导准军事组织赤卫队和青年文化、体育活动。一九三七年初，西北抗日剧社在延安公演了许多话剧和歌舞节目。话剧《阿Q正传》的公演轰动了延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都观看了

演出，给予很高评价。赵品三和廖承志、朱光、王玉清等领导的西北抗日剧社和其它剧社一起，将苏区话剧运动大大提高了。韩进后来在太行山八路军总部作《题品三》七律一首，以浓情重墨塑造了这位革命者的生动形象，细腻刻划了他的品德与情操。诗曰：

又是春花烂漫时，
太行山上数君痴。
甘同老骥伏残枥，
愁看雏莺上别枝。
阿Q头衔犹自许，
小D手腕漫相欺。
风光只忆沙洲好，
艺苑魁星榜上题。

抗日战争的烽火势如燎原，八路军奔赴晋北疆场。一九三七年九月，赵品三奉调到太原八路军驻晋办事处任秘书（上校军衔）。当时彭雪枫任办事处主任。周恩来到太原同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谈判，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就住在办事处。周指示赵品三除做好本职工作外，兼任丁玲率领的西北战地服务团顾问，指导该团的工作，嘱他为八路军收集文艺人才。太原失守后，办事处迁临汾，赵品三随周恩来前往，并为八路军招集了大批文化人才。如徐肖冰、吕班、吕骥、崔嵬、丁里、陈强等许多著名文艺工作者就是在这时期先后参加八路军的，刘白羽也是经赵品三送到延安的。有人后来成了名人，仍一直把他当做“引路人”。

一九三八年春，临汾失陷，驻晋“八办”撤销。赵品三回延安，滕代远留他在八路军后方政治部任宣教科长，兼任新成立的西北电影社社长。一九三八年冬，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以后，赵品三随北方局书记杨尚昆到太行前线任北方局秘书长。不久，改任统战联络部秘书，和朱瑞一起负责党在敌伪军中的秘密组织工作。后来石友三部队学生队很多青年学员受党的影响参加了八路军。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中央军委成立秘书厅，经朱德推荐，赵品三任副秘书长兼队列处处长。根据中央精兵简政的方针，他在朱德、王稼祥指导下成功地主持了军委各机关、部队和所属单位的精简整编工作，军委所属人员从七千多人精简到二千多人，改变了机关臃肿、重叠的局面。一九四三年三月，赵品三调到陕甘宁边区政府物资局驻鄜县支局任局长兼禁烟督察处长。一九四四年二月，他进入中央党校二部十二支部学习。他在党校一边积极学习，一边参加生产。一九四四年九月十四日《解放日报》以《党校赵品三同志制成地球仪》为标题表彰了他。其中写道：“党校二部赵品三同志曾花数月时间，悉心研究制造地球仪。几经改造，已于日前制就一个，其质量不下于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所制作者，甚得各方好评。此种地球仪，既可供学校部队地理教学之用，同时又可做室内陈列。现赵同志已陆续制造，以供有关机关需要”。他为延安保育院制作的玩具也受到过中央的嘉奖。

赵品三是一个放在哪里就在哪里放光发热的人。解放战争时期，他随大军奔赴东北。初期任过一段东北铁路管理局经理部长兼秘书长。一九四六年秋调到齐齐哈尔任东北军区工兵学校政治委员，在严重缺乏器材的情况下，他带领同志搞到了一批操舟机，经过改装成为机动船。这就是既能运输武器、兵

员，又能并排连接架浮桥的“操舟艇”。在三下江南，四保临江的战斗中，工兵学校用它迅速架设浮桥投入战斗，对战斗胜利起了重要作用，东北军区曾授予参战操舟艇以“功勋艇”的光荣称号。一九四七年冬，东北军区军工部部长何长工调他任军工部顾问室主任。他带头参加技术工作，本着“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的态度，大胆起用留用技术人员，组织试制并亲自参加高性能炸药和硬胶木炮弹壳的试验，军工生产很快打开了局面。一九四八年七月，他兼任新成立的军工部工业专门学校校长，为培养兵工专业人才支援解放战争做出了贡献。

建国以后，赵品三先在中央公安部政治保卫局任副局长。接着在一九五二年从公安战线又转到军事工业战线，任二机部北京航空工业学校校长兼南苑二一一厂厂长。在建校办校工作中呕心沥血，一直保持着苏区红军学校的传统和作风，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的方针，对生搬硬套外国教育制度的做法敢顶敢纠。这个学校为我国培养出不少合格的航空工业人才。至今，那时的学生和干部都对这位“老校长”称赞不已。

一九五五年九月，赵品三任中华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干部局局长。他是第三届、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一九六二年六月被任命为中国革命博物馆副馆长，直至一九七三年九月九日病逝。

（七）

赵品三是一个老党员，是革命队伍中不可多得的多才多艺的人才。他的人品和情操为人称道。在苏区和延安时代的老同志都钦佩他忠贞自爱的品质。他一生艰苦朴素，一贯乐于助人。他

常以这句话自勉：“有两种人，一种是‘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另一种是‘磨顶放踵，利天下而为之’，我是要做后一种人的”。他说到也做到了。在十年动乱中，他冒着风险保护过不少受难的老同志、战友。如韩进一直蒙受冤尘，动乱中有一年时间躲在他家里。他为不少老同志、老干部证实历史，特别是证明党籍问题，其中就包括胡耀邦、杨勇等老干部。面对所谓“专案组”、“调查组”人员的训斥，他仗义执言，毫无惧色。他为人正直，在党内斗争中有自己的独立见解，从不鉴貌辨色、人云亦云。特别可贵的一点是他反对特殊化，时刻为执政党脱离群众的危险而担忧。一九七二年，他已半身不遂，有感于“四人帮”的倒行逆施，他振笔抒怀：

万里长征世所惊，
红军伟迹震乾坤。
挥毫难写英雄史，
愧煞当年一老兵。

在他逝世后，朱德曾评价他：“品三是个好同志，对党忠心耿耿”。邓小平在一份有关赵的后事处理的报告上亲笔批示：“赵是很老的同志，从不计较名位”。“忠心耿耿”，“从不计较名位”，这是共产党人多么可贵的品质啊！

当然，历史不可能给每个人都安排好一个恰当的充分发挥才能和智慧的位置，赵品三亦不例外。但他确是实实在在地为主义和信念战斗了一生，后人不会忘记他的光彩……。

附 本传记主要参考资料：

1. 赵品三 1956 年所写的《自传》。
2. 赵品三 1957 年写《关于中央革命根据地话剧工作的回忆》，载《中国话剧运动五十年》（田汉主编）。
3. 赵品三：《综合外调材料》存底。
4. 何长工：《回忆红军大学》，载《党史资料》1955 年第 2 期。
5. 何长工：《开辟鄂东南》，载《星火燎原》（下）1958 年版。
6. 程子华：《大冶兵暴》，载《星火燎原》（下）1958 年版。
7. 李伯钊：《回忆瞿秋白同志》，载《忆秋白》1981 年版。
8. 石联星：《秋白同志永生》，载《忆秋白》1981 年版。
9. 陈丕显：《赣南三年游击战争》，《中共党史资料》1982 年第 2 辑。
10. 《太谷铭贤学校党领导下的革命斗争纪实》，《太谷地方史志资料选》（1）。
11. 《红色中华报》，《解放日报》。
12. 访问何长工、程子华、冯文彬、黄镇、孙毅、韩进、石联星、袁血卒、罗青、陈秉忱、徐肖冰、赵发生、韩俊义、刘光、贺士章等谈话记录及赵品三亲属回忆材料。

封面设计：王艺光

统一书号：11094·210

定 价： 3.40 元